

秘密战线

〔奥〕威廉·霍特尔 著



时事出版社

秘密战线

(纳粹特工局黑幕)

[奥]威廉·霍特尔 著

时事出版社

THE SECRET FRONT

Wilhelm Hoettl

Weidenfeld & Nicolson, London, 1954

秘密战线

(纳粹特工局黑幕)

[奥]威廉·霍特尔 编著

*

时事出版社出版

(北京海淀万寿寺甲2号)

交通部第一公路工程总公司印刷所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10 字数 218000

1988年4月第1版 1988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8000

ISBN 7-80009-016-7/k·03 定价: 2.30元

本书译者

第一至第四章：孙家新

第五至第十章：赵蔚青

第十一至第十三章：李庄藩

第十四、十五章：齐宗华

第十六、十七章：王培清

出版说明

《秘密战线》作者威廉·霍特尔，是奥地利籍的德国情报官员，1938年加入纳粹特工局系统工作，后来在舒伦堡领导下的第六局工作，负责外国政治情报活动。

这本书第一次在奥地利利用德文出版时，作者署“瓦尔特·黑根”这个笔名；后来由于作者身份已被很多人知晓，所以在英文版出书时，决定改署真名发表。

英文版的编者是伊恩·柯尔文，他对第二次大战期间纳粹情报活动很有研究，为了核实书中的史实，他直接和霍特尔作过长时间的谈话，对这本书的真实性给以很高的评价。

这本书中所记的事实，主要是纳粹德国在整个第二次大战期间(包括发动战争准备时期在内)，在中欧、南欧和巴尔干地区搞颠覆、破坏活动，制造民族纠纷，收买叛徒，扶植傀儡政权，等等一系列罪行的自供状。给我们研究第二次大战史、国际关系史和这期间的谍报特工活动，提供了罕为人知的资料。但作者本人毕竟是纳粹特工系统的重要骨干，是站在反苏、反共、反人民的立场上写下了这本回忆录。又为迎合50年代初期美国垄断资本冷战政策的需要，对东欧和其他欧洲国家的一些政治运动、领导人和人民群众在战争期间所进行的反法西斯斗争，进行了不少攻击、歪曲和污蔑，请读者阅读时注意。

本书在翻译过程中，略作一些删节。

目 录

英文版序言	伊恩·柯尔文(1)
第一章	德国特工局概况(6)
第二章	我所知道的一些人物(13)
第三章	海因里希·希姆莱(37)
第四章	海德里希和他的敌手们(49)
第五章	苏联元帅被谋害的案件(69)
第六章	安放一颗炸弹(80)
第七章	粉碎捷克斯洛伐克(93)
第八章	岌岌可危的南斯拉夫(104)
第九章	与铁托捉迷藏(124)
第十章	我们上了国王的当(151)
第十一章	匈牙利的悲剧(171)
第十二章	以喀尔巴阡山脉为目标的竞争(190)
第十三章	对意大利的侦察活动(203)
第十四章	独裁者的冥想(217)
第十五章	法西斯党人的覆灭(250)
第十六章	棱堡的神话(267)
第十七章	现在的秘密战线(280)

英文版序言

这是德国S·D·(特工局代号)的历史,记载着它是怎样从秘密警察和纳粹党组织中发展起来的,它怎样在希特勒战争的活动中效尽了犬马之劳,怎样吞并了它的对头德国军部的军事谍报局,以及最后怎样为盟军解散。

作者威廉·霍特尔,原是奥地利籍的情报官员,1938年参加德国特工局,后来在舒伦堡领导下负责(国家安全总部)第六局(处)的工作,他所负责的工作使他在战争开始的几年作为S·D·驻维也纳的代表,担任东南欧事务的顾问官。

这样就给作者特殊的条件了解到德国反对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罗马尼亚和匈牙利的阴谋活动内幕。1943年他回到柏林国家安全总部,担任一定领导工作,继续从事政治颠覆活动,并被授予在快要垮台的同盟者意大利法西斯统治区内建立特工组织的任务。

所以霍特尔在书中写出了一些历史学家极感兴趣的内幕,纳粹特工人员在欧洲一些国家中怎样逐步渗透,最后一举颠覆了这些政权。

他的特工局工作,使他同匈牙利的霍尔蒂政权,同意大利的齐亚诺及其法西斯政府,以及1938~1945年同英美等大国中某些代理人联系。

书中最引人注意的部分是,1945年初在瑞士同阿伦·杜勒

斯的美国情报组织打交道时最后一次玩了一个花招，使美国人相信德国人在巴伐利亚和奥地利的阿尔卑斯山区建立了一条被称为“棱堡”的防线；德国人在这条防线上的抵抗，可以使战争持续下去。霍特尔承认这个“棱堡”的神话，编造出来不过是为了使西方盟国在占领条款上更优惠一些。所有撰写第二次大战史的学者，写到最后一章时都不能够忽略霍特尔提供从卡尔顿布吕纳和舒伦堡那里得到的实际情况。这两个人战争最后阶段是希特勒政策的主要执行人，当然有些政策是他们自己设想出来的。

《秘密战线》是这本书第一次在奥地利出版时采用的书名。作者用的是“瓦尔特·黑根”这个笔名，随后，由于作者的身份已被很多人知晓，所以英文版出版时他决定用真名发表。

至于这本书的真实性，这本书的译者以前任职英国外交部的R·N·史蒂文斯上校，给我提供了有价值的证明，史蒂文斯上校曾在1939年11月被舒伦堡的特工人员绑架，当时称作“文洛”事件，使他能在1939~1945年在德国拘留期间对德国谍报工作和组织有进一步了解，他对霍特尔所写的书内容的判断，可能对读者了解本书有参考价值。

“我从事翻译《秘密战线》，对这本书有三个显明的印象：第一，作者是以个人第一手材料来写的，第二他写作时带有一种鲜明的批判态度，使他能更好地选择资料，第三是他尽其所知把这本书写成，符合事实，不违背良心和客观。写过去自身经历的历史，做到不受过去情感和道义的牵制和偏见的影响，是很难的，本书的成功受到赞赏。

“对我特别有兴趣的是对于一系列纳粹领导人

的刻画，以及作为本书的开章，如对希姆莱、海德里希、舒伦堡和缪勒等人的描述。我在五年半被盖世太保囚禁期间和他们都接触过，作者无疑与他们接触比我更直接，他对他们描绘传真程度使我完全相信，他描绘的其余我不知道的事件也是符合实际的和忠实于事实的。”

在整理史蒂文斯上校的译稿时，我与霍特尔在奥地利一起呆过几天，核对他关于德国特工组织资料的来源，这就使得英译本中增加了很多的补充材料，显然他对德国特工局活动的描述不是毫无保留的，但仍然给读者展现了一个国家机构怎样完全服务于一个极权主义政权的需要，不时地使用下列手段改变历史的进程，如伪造文件、对反对他们独裁统治和进行战争的人进行污蔑中伤，有时假装从事一些不成功的阴谋活动，以便制造烟幕，声东击西地发动一场真正的政变。

霍特尔给我们描述了在他领导下的特工组织在中欧、南欧和东南欧的活动情况。他的亲身经历对历史事实的证词胜过了我读过的历史学家的客观著述。

无论怎么说，特工人员永远保留一些事实和某些情报关系不使公众知道。霍特尔在我查问他的情报资料来源时就给我以这样的印象，他不愿意象L.C.摩依兹克写的《西塞罗》那本间谍小说所使用添油加醋的方式，他也不愿意讲出和盟国进行间谍斗争时，所使用的手段和成功的事例——虽然他关于最后进行和平谈判时所扮演的角色在书中讲得够坦白的了。

他还告诉我一件他在布达佩斯从事间谍活动的事情，他计划偷取美国使团战争时期的机密废纸，这件事是花钱买通了当地一家制造被称为“狼”的机密垃圾粉碎机厂家。专门

替美国使团制造了一架加上特殊装置的“狼”型文件粉碎机。这架机器能够把放进去的机密垃圾中的文件完整的保留下来，在清理垃圾碎屑时，由一个机器维修工乘机偷了出来。所以他在一段不长的时间内，通过这架“狼”型粉碎机获取国务院的一些文件，直到后来美国外交人员产生了怀疑才作罢。

我所看到的霍特尔是一个黑黑的脸膛，不容易动感情的奥地利人，年纪37岁，家在撒尔兹卡莫古特地方的湖泊与群山之间的百德一奥西小镇，那里就是所谓神秘的棱堡中心地带。

他的家乡离开那些像月球上的沉寂景象的、被称为“死山”的地带不远，在第三帝国垮台时，卡尔顿布吕纳以及其他战犯都想在这里找一个地方潜伏下来。虽然我在前面说过：特工局已经被盟国取缔了，实际上它的实体还是像水银一样四散奔流，留下几粒水银珠，如霍特尔这样的人，在注定悲剧结局的舞台上，无论是西方或东方，哪里有一点震动，都会使它们心惊胆战。

现实生活并不是和他毫不相干。他还不时地同一个为苏联特工系统服务的旧日同事私下有些来往，为此最近美国人讯问他和苏联占领区的哪些人有联系。他又告诉我苏联人也想找机会问他这个问题。所以他一直躲在山村的偏僻住所，保持沉默和谨慎。虽然在1953年5月号的《明镜》杂志上指责他的七拼八凑的记录有不少是错误的，迫使他不得不写信给杂志，要求刊出他的为自己辩护的文章。

我在这里不涉及对他著作内容的审定的评价，还是认为他试图写一本对他所从事的工作的客观史实的书。如果说这里缺少大量文献引证，主要是因为那么多第三帝国的档案在

希特勒神奇的死亡时被销毁了。同时盟国占领时所封存的其余大量文献档案又太多了，不是当前历史学家能全部阅读一遍做出提要供人引证的，这就给德国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和贩卖虚构史实的商人以可乘之机，为推销他们胡乱改编的历史，借口由于没有文献引证，回忆录就是最好的根据。当今这种事很多，但我认为这不包括霍特尔的回忆录在内。

也许他会夹杂有什么动机，但从这本书内容来看他除了想给读者提供他亲眼所见的纳粹特工发展的历史外，看不出有什么其他目的。如果他的视野所见有什么缺漏，别人会补充，如果在他的著作中带有民族偏见，那也是可以理解的，如果他过低估计了德国人民中反希特勒的秘密活动，这也不是他一个人独有的见解而带有时代的影响。

他在舒伦堡领导之下从事的工作，表现出他的独有的才能，他对少数民族和政治运动有深入的研究，这正是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控制多民族国家的情报工作的传统。著者在他书中毫无掩饰地把自己展现在读者面前，看起来就像一只类似变色蜥蜴的动物，警惕万分地从灰色阿尔卑斯“棱堡”的墙缝中伸出他的头来，他没有把他自己的画像硬加上关于民主思想的表白。著者不管怎么说还是一个现实主义者，我们无疑会听到霍特尔继续讲他的故事。

伊恩·柯尔文

德国特工局概况

1938年德国侵占奥地利以后，当时德国特工局还被叫作国家安全局。每个国家都强调自己的特工组织完全是为了保卫国家安全，尽管这些组织的工作范围中自然包括谍报工作，经常还包括破坏工作。我们的任务就属于这种性质，我承认“德国特工局”这几个字对我这个工作部门是恰如其分的写照。

那时德国特工局当务之急的对外目的，就是尽量利用奥地利陷落的机会，不给盟国留下喘气的余地，而毁灭小协约国。当时我还是个大学生，对未来没有十分明确的看法，只对我自己的历史研究工作感兴趣。

当特工局招募我的时候，我还在维也纳大学历史系读书，专攻东南欧问题。特工局希望在大学内和我们系建立联系，并建立一个特别机构来训练学员在欧洲各国进行颠覆活动。招募我的人是一个普鲁士的情报军官波尔特，他就那些当年构成哈布斯堡王朝的各民族集团的心理状态，问了我许多深刻的问题。他很关心各国和它们的少数民族之间的紧张状态。

我被派到柏林去。在柏林时我住在科本尼克一条小街上的一间小房里，我是从这里开始受训的。我们在柏林的战时总部设西柏林郊区施马根道尔夫的贝克尔大街。总部里有500

名工作人员，分三班昼夜轮流工作。办公厅是现代化的红砖建筑，设备很好。这里原来是养老院，所以有许多单人卧室的小房间。在战争爆发时这个建筑物被征用了，只容纳安全部的对外联络处，从事国外各种活动，并对来自国外的材料进行鉴定。战前，在外交部管辖下另有一个相当小的核心组织在威廉大街办公。

在战争最初几年中领导我的是党卫军约斯特将军。我们在柏林的办公厅由党卫军武装部队严密警卫。每一个官员要进大楼都有自己的通行证，对技术部门颁发通行证是极其慎重的。技术部门的办公室是在西柏林汪因湖区，还有伪造护照的机构和主管刑事警察实验室及秘密无线电站等部门。该电站官员训练后，进行人所共知的“无线电游戏”的工作：对在现场工作的谍报人员进行无线电通讯或哄骗外国谍报人员。这些任务是特工局专有的，军事谍报局就没有这些工作，所以人们对这些任务特别重视。

战争爆发以后，我晋升得更快，1943年升为少校，1944年升为中校，并且为第六局代理局长，负责主持在中欧和东南欧进行谍报和反间谍的工作。

我在东南欧的总部设在布达佩斯。我的办公厅离布达佩斯古城奥芬地方的古堡不远，设在一座17世纪的小宫殿里，这座宫殿原属于巴强尼伯爵家族，是在土耳其战争时期建筑的。我只掌管6个特工人员，任务是与匈牙利特工局及日耳曼少数民族保持接触。

我的薪金支付到我在维也纳信贷协会银行存折帐户内，但每当我到国外进行工作时，每月能领到700美元的生活费和500美元的旅差费。我们可以无限地使用德国马克来支付给特工人员，但是美元和瑞士法郎却很少。我的工作起初是政治

事务，但是随着战争继续下去，就更具有军事性质。在战争的最后一年半里，我派了许多谍报人员到苏联战线后方去。在敌后进行工作的高级间谍和情报人员平均收入可以高达5千美元，而用在一批人身上的最大款项是5万美元，像住在阿根廷的一批德国人，他们从事对美国的间谍活动，就得花这么多钱。因为这些人还活着，还在那里工作，我不便在这里透露他们的姓名。

我想这些情况足以向读者表明我和特工组织有多么密切的关系。但是本书的目的不在揭露一个特工组织的技术性工作。我希望的倒是想说明德国特工局的一些活动是怎样影响历史进程的。

我认为英国的特工组织在作为政策工具所起的作用远比不上我参加工作的那个组织——至少在国内事务方面它们肯定不能相比。我所在的组织在一定程度上甚至能制造事件或者使将要发生的事件从速进行，以使德国的政策得到顺利执行。

在描述一些我由于工作所接触到的一些人物以后，我还要叙述一些已经成为历史的一部分的秘密政治活动。然后我再叙述德国特工局在更广阔的范围内所进行的活动。这些活动涉及中欧和东南欧各国的命运，那些国家是我当时工作的直接对象。

在那些年头，我们在进行工作时，是和我们自己的其他组织相竞争的。特工局也一度称为安全局，它来源于党卫军盖世太保和纳粹党，并且效忠于它们。因此它是希特勒政策的一个执行机关，尽管它宁愿遵循现实主义的原则。

我们的主要敌手是军事谍报局，这个组织成立较早，但在处理战争的迫切问题上，却老态龙钟，不够全心全意。因

为这个组织受到陆军参谋本部的支持，隶属于德国国防军最高统帅部，只对三军最高统帅负责，享有高度的独立性。因此特工局要限制它，并且最后合并了这个组织。那时战局已经不可收拾，这次合并也不可能带来什么好处。

本书主要情节展开之前，请读者容许我简单说明一下特工局和军事谍报局两个机构的组织。这样读者对本书中所说的一些历史事件的发展过程更可一目了然。

德国有两个主要的特工组织：一个是军事谍报局，在1944年以前，一直由威廉·卡纳里斯海军上将领导；另一个是S.D.，即特工局，在1944年时由党卫军的华特·舒伦堡少将领导，他后来又接管了军事谍报局的外事部门。

军事谍报局的指挥总部是德国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的国外谍报局，在1944年以前，局长一直是卡纳里斯海军上将。他下面有两个副职，一个是贝克纳海军上将，他在实际上和保安事务毫无关系；另一个是皮肯勃洛克中将，他在谍报工作方面是真正的第二把手。

贝克纳兼任外事局局长。外事局主要是属于政治军事性的，包括同外交部和三军参谋总部的各个参赞处的联络工作等。

此外卡纳里斯作为军事谍报局的局长，下面还设有总办公厅——这是一个没有谍报任务的行政机构，主要只负责处理有关组织、财政和法律的问题。

国外谍报局长领导下还有一个“特别单位800号”，后来改名为勃兰登堡处。这个单位原先是在第二处的领导下，或者属于现役的前线队伍，担任突击队的任务。

国外谍报局下面分设三个处：第一个处，负责搜集和传递军事情报；第二个处，负责心理战、颠覆活动和破坏活

动，第三个处，负责反间谍和保安工作。

每一个集团军都有自己的谍报处，其组织情况与国外谍报局相同，分为三个科。军和师也有类似的组织，称为谍报中心，在1944年改组以后改名为近侦队或者干脆叫作突击队。

在每个军区也都有谍报和保安组织，为自己的军区司令部服务。这些军区的机构和柏林的中央机关完全一样，也分为三个部门。在中立和友好的国家里也设有类似的组织，称为作战组织。它们并不是直接对所在的国家进行工作，而是用来作为对所在国的邻国或者敌国进行活动的基地。

陆军武官和其他兵种武官，也都可作为各种情报的来源。他们不隶属于军事情报局，而分属于陆、海、空三军参谋本部相应的武官处。

德国特工局的前身是国家安全部的第三局。它后来改名为国家安全总部第六局。该特工局是在党卫军少将舒伦堡指挥下，按区域设置下属机构，积极进行情报工作、搞破坏活动和工业情报等工作。

在德国本部，第六局在每个特工区都有所谓“观察员”，他们的任务很像那些军事谍报机关的工作人员的任务，不过开始时规模较小。在中立和友好的国家内，特工局组织由“第六局主要代表”来掌管。

在有些德国驻友好国家的使馆中也设有警务参赞，然而他同特工局活动没有或者很少有什么关系。它们只从事纯警政事务的联系。

第六局的职权与国家安全总部其他部门的职权完全不同，舒伦堡本人的主张又特别强调特工组织和警察一定要绝对分开，于是它渐渐在安全总部的体系内得到一种独特的地位，和盖世太保以及其他部门只有很少关系或者毫无关系。当

第六局合并了军事谍报局并且接管了大批军官以后，它这种独特的地位就进一步加强了。

外交部有它自己的谍报机构，这个机构可以使用德国驻国外的一切外交代表人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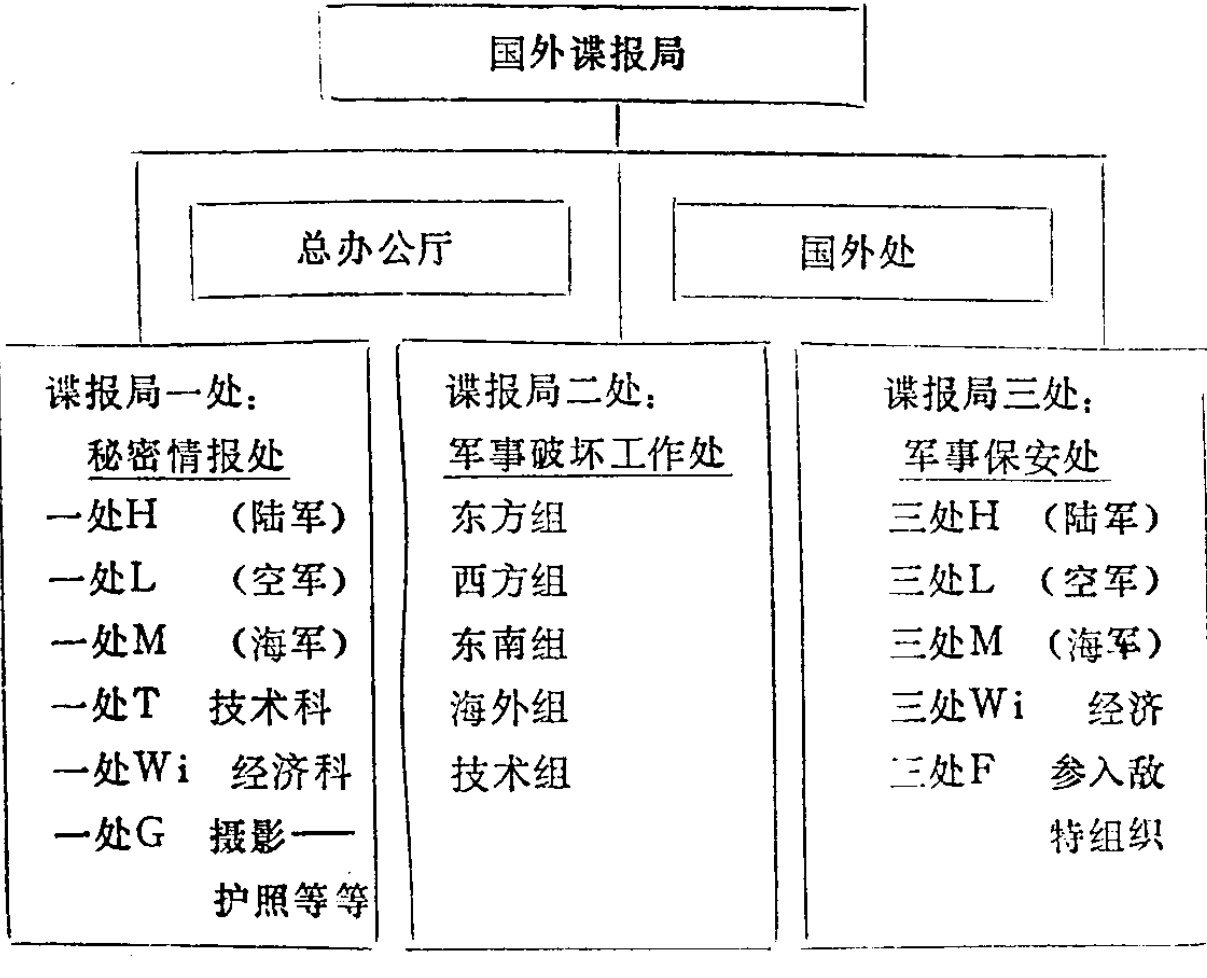
最后，德国还有很多的“专门机构”，仅举一例来说，如空军研究所，它除了担负其他任务外，还担负秘密电话和无线电监听的任务。

下列图解说明在1944年舒伦堡合并军事谍报以后，德国特工局组织和在合并之前军事谍报局的组织情况。

德国特工局（1944年以后组情报）

第六局（国外政治特工局）		军事局：（军事谍报局）	
VI.A	组织	Mil.A	组织
VI.B	西欧	Mil.B	西方
VI.C	苏日势力范围	Mil.C	东方
VI.D	英美势力范围	Mil.D	破坏工作
VI.E	中欧及东南欧	Mil.E	技术科
VI.F	技术	Mil.F	前线侦察
VI.G	科学及实验	教练团：Kurfürst	
VI.I	破坏工作	特别突击队：“Dora”	
VI.Wi	经济		

德国军事谍报局（1944年以前）



我所知道的一些人物

一提到德国特工局，人们同时就会提起海德里希的名字。特工局的建立诚然不是一个人的工作，许多各种各样的人共同构成了它，赋予它一种特殊的性质。这些人中，卡纳里斯海军上将1944年以前一直是独立的德国武装部队军事谍报局的首脑，还有两位副局长贝克纳海军上将和皮肯勃洛克中将。此外还有恶名昭著的党卫军最高司令官希姆莱和政治特工局局长华特·舒伦堡少将。舒伦堡在1944年又接管了卡纳里斯的工作。但是莱因哈德·海德里希是所有这些人中最威风凛凛的，他是一个你只要见过他一面就会终生难以忘怀的人。

海德里希是谁呢？当他在1931年夏季参加党卫军的时候，他还是个27岁的青年。人们只知道他原先是个海军中尉，因为同情国社党而被那“反动的”德国海军部开除出海军，而海德里希本人也竭力帮助传播这个史话，这史话是接近真实的，但并不十分真实。

事实上他被开除的原因，大半是与政治无关的其他问题。海德里希所在的部队当时驻在基尔，他在那儿同一位海军建筑工程师的女儿恋爱，出了点问题。这位青年中尉当时以乱搞女人出名，他已经有无数丑事，都是以轻率不负责任的态度脱身了。尽管如此，那位海军建筑工程师还是准备把自己

的女儿嫁给海德里希。于是他用显然常规的办法来找他心目中的未来女婿商谈，深信只有婚礼的细节需要磋商了。他却遭到拒绝。海德里希宣称：无论如何也不能说服他去娶一个轻易得到的女孩子，这样的年轻女人休想成为一个军官的妻子。

一些地位较高的海军军官出来干涉也无济于事，海德里希仍然矢口拒绝这桩婚事，于是那愤怒的父亲就把这件事上告到海军总司令雷德尔海军上将，这位严明刚直的上将立即把海德里希从海军中撤职。

这件轶事的详细情节只有很少人知道，而海德里希煞费心机去保证不让这些细节传播到自己私人小圈子以外。这是海德里希被撤职原因的真相，我是从党卫军的赫尔曼·贝伦斯将军那里听到的。贝伦斯将军和海德里希在特工局里是同事。1940年有一次有个退伍的海军军官，在一次宴会上抖落出了他的老底。海德里希后来听到了，那个不幸的人立即被关进集中营，罪名是恶意诽谤，同时随送一份说明情况的备忘录，注定了那个人永远也出不来。

身为“一个因自己有国社党倾向而被排挤的军官”，海德里希很受汉堡的党卫军的欢迎。那时党卫军还是个小小的组织，大都是些骨瘦如柴、头脑简单的乡下人。这个极端聪明的新人很快就出人头地，受到党卫军首领希姆莱的赏识，认为他肯定是个大有作为的青年人。

海德里希是个野心勃勃的人，对自己的未来有明确的抱负。他同特工局以及盖世太保发生接触，既不是由于偶然，也不是由于别人的敦促。他自己采取主动，对希姆莱提出了连篇累牍的备忘录，大谈起这种性质的机构如何必要和如何组织。希姆莱立刻被说服了，就给了海德里希以全权，让他在党卫军的体系内组织起所谓安全部，同时答应他在国社党

执政以后，委托他担当组织一支秘密警察的工作，大概还要让他进行改组现有国家警察的工作。

尽管如此，海德里希的名字还是几乎完全默默无闻，即使在党内也是一样。希特勒的副手确实发出过一道通令，内容是说今后海德里希所主管的党卫军安全部将成为情报总局，党和冲锋队的其他情报组织都要撤销。可是海德里希是何许人，是干什么的，大家谁都不清楚。暂时待在幕后，正是海德里希计划的一部分。他希望被看成一名普通的、忠实的党员，并且是他的首脑希姆莱的部下。

1933年3月，希姆莱就任慕尼黑警察总监。他立刻派海德里希接管警察总部的政治处。海德里希执掌这个部门以后，在短短的几个月中，就创立一个办事效率极高的机构——新巴伐利亚政治警察局。

海德里希完全蔑视理想主义者，蔑视意识形态。他在选择自己身边的僚属时，把心甘情愿服服贴贴看得比对国社党的政治信念更为重要，这件事典型地表现出他的玩世不恭，而不是说明他的心胸宽广。在他左右的亲信中，有许多并不是纳粹党人，而只是规规矩矩、勤勤恳恳、不动脑筋的警察人员。

例如，后来成为整个盖世太保首脑的海因里希·缪勒，在1933年以前一直是公然反对国社党的人；但是尽管国社党一再根据这个人的历史材料表示反对，海德里希却把他很快提升到党卫军的高级职位，一直到战争即将爆发之时，希姆莱才千方百计地说服了党组织让步，使这位盖世太保首领终于被接纳为国社党党员。

这并不是唯一的例子。像海德里希自己的安全部副部长瓦尔纳·贝斯特博士一样，那些热忱的富于理想的国社党员，就因为他的理想主义而一直起不了多大作用。到最后他还是

把贝斯特调到柏林去，作为他的代表，渗透到普鲁士警察组织里去。

海德里希的第一个目标就是接管德国诸州中的最大一个州(即普鲁士)的政治警察。赫尔曼·戈林作为普鲁士的总理，名义上也是普鲁士政治警察机构的最高首脑；事实上，这个组织是鲁道夫·狄尔斯博士主管的。狄尔斯这个人在普鲁士的德国部长弗朗兹·冯·巴本下面早已是大名鼎鼎的秘密警察组织者和管理者。

狄尔斯是一个高个子、黑皮肤的人，面貌有点像黄种人。他能说会道，是个精明强干的阴谋家。海德里希生平第一次遇到一个这样棋逢对手的敌人。狄尔斯一方面由于他那出类拔萃的行政才能，一方面由于他参加了一个极有势力的学生兄弟会组织这个方便条件，仅仅32岁，在纳粹执政之前就为自己谋得一个极有权势的地位。他本人不是纳粹，倒是德国国家党和右翼钢盔队退伍军人组织的支持者。在和普鲁士的社会民主党政府，特别是对内政部长卡尔·塞福林的斗争中，狄尔斯曾经全心全意地支持冯·巴本。可是当他看到所向无敌的国社党的胜利前进时，他就迅速地倒戈了。他同国社党的领导人物勾搭上了。当戈林被任命为总理时，狄尔斯就力所能及地把他手中的秘密情报全部奉献给戈林。1932年，狄尔斯已经掌握了普鲁士州警察对于政界人物的非常详细的秘密档案，这是狄尔斯亲口告诉我的。这些档案对在普鲁士州警察职权范围内的那些国社党的领袖们更特别引起注意。凡是曾经在柏林住过的较重要的纳粹领袖们都有详细的个人档案。甚至连最隐秘的个人琐事，一概都逃不过这些密切监视的警察的眼睛，而所有这些宝贵的材料都掌握在狄尔斯一人之手。戈林很快就了解到自己可以靠狄尔斯的这些知识获得很大的

政治利益，于是他立刻批准狄尔斯继续担任原职。戈林之所以在德国升到那样高的地位，也许就是由于狄尔斯使他对纳粹党骨干分子的丑恶秘史了如指掌。

狄尔斯经过政府的更迭还保留了原先地位以后，就像海德里希在慕尼黑所干的那样，在自己的柏林总部一心一意地大干特干。显然这种局面是不能持久的：两个性格基本相同的人，两个人都同样野心勃勃，两个人都竭力想得到同一战果，这两个人是不可能和平共事的。狄尔斯竭力奋战。海德里希不止一次像胜利已经在手心了，却发现狄尔斯使尽花招竭力使戈林相信没有他是不行的。然而1934年4月，狄尔斯终于不得不让位。戈林被说服把普鲁士州秘密警察的领导权交给作为希姆莱的代表的海德里希。狄尔斯被排挤出去，派到科隆去担任地区行政长官。但是，戈林是在万分无奈的情况下才同意这种解决方法的。看来他几乎最后时刻还想改变主意。狄尔斯正在参加他原机关成员们为他饯别的宴会，突然戈林来电话，告诉他还是决定暂时不让他走了。但是戈林不能采取这个决定，几天以后他又只好让步，而这一次是无可挽回了。

但是戈林和狄尔斯的关系并没有完全结束。戈林很少完全抛弃一个曾在他羽翼下的人，他对于这种人推心置腹，即使他暂时发现自己不能使他们回避敌手的攻击，依然自命为他们的保护人。狄尔斯在科隆以及后来在汉诺威任地区行政长官时，都被谴责为“不可容忍的”，戈林趁此机会，赶快把他调回到自己的身边，让他负责管理德国全国内陆水道体系。狄尔斯娶了戈林的一个表妹，她的第一个丈夫是戈林的兄弟，一个警官。

狄尔斯注意到戈林喜欢任用亲戚的偏向，很可能把这桩

婚事看作是爬向社会上层的垫脚石。但是情况并没有像他所希望的那样顺利。早在1943年，狄尔斯就认定德国必然要战败。他竭力说服他的这位新亲戚及早推断出合乎逻辑的政治结论。但是狄尔斯也像许多在他之前的失败者一样，同样无法使戈林从心灰意懒中振作起来。即使如此，他和这位德国元帅的关系，还是为他做出了无比宝贵的最后贡献：救了他的性命。1944年7月20日以后，他被逮捕并且肯定将被处死刑，显然他只不过是在那次阴谋的外围心慌意乱地搞了点小名堂。虽然海德里希当时已经被人暗杀了，但他的名字已列在海德里希准备有朝一日要清算的黑名单上。

狄尔斯被囚禁在柏林艾伯特亲王大街的盖世太保总部，戈林派了一位律师当代表来和他谈，狄尔斯答应离婚，戈林给了他一张保释的书面证明作为回报。双方都恪守了诺言，于是海德里希的最能干、最危险的敌手狄尔斯就这样救了自己的一命。

在和海德里希竞争的人们中，还有个值得一提的人，就是汉斯·伯恩德·吉斯维乌斯博士，尽管这个人不能和狄尔斯同日而语。吉斯维乌斯原先在普鲁士州秘密警察局工作，是狄尔斯的部下。他是一个身材魁梧、能说会道的人。但是狄尔斯一发现他有野心和阴谋，用他的话来说，有些讨厌，就把他调动到州警察厅内的一个不重要的位置。后来吉斯维乌斯设法调到内政部的警务司。内政部长纳粹党的弗里克博士是个毫无主动性和积极性而且因循苟且的公务人员。吉斯维乌斯发现他是个自己最称心如意的上司。于是他就把弗里克当作卒子来使用，下起一盘野心勃勃的政治棋。

吉斯维乌斯的算盘对海德里希不是没有危险的。吉斯维乌斯希望把还没被海德里希抓到手的

于内政部警务司的集中控制之下。他设法对海德里希进行了长期的地下斗争，一直到1936年，吉斯维乌斯在符腾堡作为弗里克的代表，还在紧张地策划把普鲁士以外的所有各省警察组织组成一个统一的反海德里希的集团。

但是他的一切努力都没能阻止海德里希最终成为国家安全部门的首长。很可能就是这场失败把这个钢盔队的老队员，赶到了反对国社党分子的阵营中。后来他在奥斯特少将领导下参加军事情报组织时，又卷进反希特勒阴谋集团里。但即使在这个圈子里，他也不是一个重要的或者有势力的人物。他出版了两本书，首先揭露纳粹主义运动的秘密历史，后来他又在纽伦堡审判中作为提起公诉方面的一个主要证人身份出场，使得他至少在社会舆论中被认为是一个重要角色，实际上他从来没扮演过那样重要的角色。

海德里希在升到最高地位的过程中还遭遇过一次危险。在他刚被任命为全德安全部门的首长以后，开始流传出似是而非的谣言，说海德里希的先人，从第三帝国的观点看来，不是没有问题的。这谣言最初是从海德里希的出生地萨尔河畔的哈尔一个面包师口中传出来的。这个面包师坚持宣称他直接认识海德里希的祖母。她是个地地道道的犹太女人，后来死于莱比锡。海德里希的父亲，是音乐教师，本身就是半犹太人。海德里希在法庭上去控告这个面包师，而且赢了这场官司。由于官方对新闻界发了指示，这场官司没有引起或者很少引起公共评论。那个“诽谤者”对自己的论断提不出任何文件作证据，而当他在上诉中要求在法庭上拿出哈尔镇的结婚和出生登记簿的时候，人们发现由于某种奇异的无法解释的理由，1904年3月（正好是海德里希出生的年月）的登记簿在哪儿也找不到了！

海德里希在1935年和1937年又被迫要对两个宣称他有犹太血统的人进行诉讼；但是这两次，案件都没有到达法庭。第一个人写了一张声明书，毫无保留地收回了自己的控告；而那自告奋勇要拿出海德里希有犹太血统的铁证的第二个人，却永远在一个集中营里下落不明了。

海德里希所作的事情极其简单。他命令自己的一个亲信，一个当年在汉堡共事的警佐，溜进去把一切可能指控他父亲祖先的文件和登记簿全部偷走烧毁。可是他完全忘掉了在莱比锡还存在一块墓碑，上面刻有萨拉·海德里希的名字，后来，当他想到这件事的时候，他仍旧派那个亲信把这块证据也灭了迹。一天夜里这块犹太祖母的墓碑也不见了。这墓碑被人用一辆货车运走，抛进了附近的一条河里。这一次海德里希作得万无一失，他在墓碑的地点另立一座碑，上面刻着严正的碑文“S·海德里希”。这新碑的发票1945年还存在海德里希个人的办公室里。

海德里希这样就把一切可能的线索全部消灭了吗？看来他并没有做到。他的父亲和他的祖母萨拉都在梅森住过多年，那个地方有很多证据，能证明这位德国保安警察首领的犹太血统。这些证据显然落入了他的最大敌手卡纳里斯海军上将之手。至于如何利用这些证据，我们以后再叙。

海德里希交上好运是在1934年6月30日那个“长刀之夜”。就是那一天他第一次证明了他对于希特勒是不可缺少的人，并且为希特勒作了一次使人永远难忘的效劳。海德里希以他特有的那种先见之明，预感到冲锋队及其参谋长罗姆和希特勒双方紧张局面的关键时刻，并且他敏锐机智而十分正确地认识到当时的危急性。海德里希比希姆莱看得更清楚，他了解希特勒无论如何一定要防止“二次革命”的威

胁，一旦发生革命，希特勒将无法控制，他肯定要失去个人独裁的大权。要坐等罗姆发动“二次革命”看来是太危险了。海德里希认为希特勒对于任何可能的危机都必须防患于未然。

将来总有一天，掌握与6月30日事件有关的全部材料的德国法庭会作出判决，这里我们还不该早下结论。然而我们不妨叙述一些无可争辩的事实。在1934年6月30日那天，并没有罗姆革命或者冲锋队暴动的任何迹象。最终将会发生“二次革命”，这是完全可能的，但是当时对这个革命并没有任何计划或准备。只有两个事实是无可争辩的：第一是罗姆肯定希望组织一支国社党的武装部队，这个意见是旧的普鲁士——德国国防军所反对的；第二是希特勒本人也疑虑不安地看待罗姆的意图。

但是所有这些都不足以证明对冲锋队进行这次瘫痪性的打击是必要的，或是公正的，因此海德里希就着手制造短缺的证据，并且借口提出发起先发制人的行动的必要。他在希特勒面前控告他的老战友所摆出的罪状中，只有一小部分是真实和正确的，其他全是臆测之词或者故意歪曲事实。正是海德里希使希特勒相信，罗姆不但策划要当国防部长，而且还在策划压制希特勒，或者至少把他贬黜到一个有名无实的位置上。而拿出冲锋队同某些外国勾结的“证据”的人，也正是海德里希。

希特勒确是对于罗姆的德国武装部队计划越来越不赞成；而且这也有某些技术上的理由，因为靠旧的职业军官团的帮助，肯定可以产生一支极精锐的部队。但是毫无疑问，单是这一点绝不会使希特勒对冲锋队采取行动。希特勒采取的行动，完全是而且仅仅是海德里希的材料挑拨的。现在永远不会确切知道，希特勒是真相信海德里希对冲锋队首领的控告，

还只是要相信他们，因为他们促进了他的最隐秘的计划。但是尽管如此，希特勒总归给海德里希以人尽其才的全权。

拟定在柏林和慕尼黑枪杀对象的名单的就是海德里希。并且如众所周知，海德里希在这些名单中不但列入“阴谋分子”，而且只要他认为是危险的人物，以及与这场捏造的冲锋队叛变毫无关系的人们也一律列入。连在柏林负责执行反击措施的戈林，也从海德里希手里接受了准备枪杀的人的名单。戈林当然无从看透海德里希的阴谋，他就和那乡下佬塞普·狄特里希一样。狄特里希带领从希特勒的随身卫队中选拔出来一支死刑执行队，按照交他的名单忠实地执行命令。

德国和外国报纸都把6月30日描写成德国国防军的胜利，但是海德里希肯定无意充当国防军盟友的角色，恰恰相反，他该对冯·施莱彻尔将军之死负责。施莱彻尔将军是德国国防军最精干的人物之一，曾继冯·巴本之后担任德国内阁总理。

在反对派和国防军方面，预定的被害者当中，只有冯·巴本一个人逃脱了海德里希的毒手。海德里希从来没有忘记这一点，并且尽全力来弥补这个漏洞，真到他死亡之日为止，他一直派一个特工人员，不惜任何代价要把冯·巴本干掉。另一个逃脱了6月30日屠杀的弗莱赫·冯·凯特勒，后来还是被这个特工人员杀害的。当冯·巴本被任命为驻奥地利大使时，冯·凯特勒随他前往充当特别顾问。德国吞并奥国以后不久，海德里希的刺客们在凯特勒的家里逮捕了他，把他杀了，把尸体扔进多瑙河里。过了一段时间，这具尸体被冲到捷克边境附近的河岸上。

但是冯·巴本连海德里希的无所不至的魔掌都逃过了。冯·巴本有一次在安卡拉遇刺未遂，通常认为是苏联人干的，但是却有个稀奇的事实，说明这次行刺更可能是海德里

希干的。海德里希时常交给他的刺客一枚“烟幕弹”，让那个人在完成任任务以后，就把这颗炸弹摔在地上，然后在喷出来的烟雾掩护之下安然逃逸。实际上这些“烟幕弹”就是普通的炸弹，意图是用来杀人灭口。图谋刺杀冯·巴本的凶手也有这样一颗“烟幕弹”，不过这个人是个狡猾多谋的人，他决定在行刺以前先放出烟幕，再在烟幕的掩护下使用自己的手枪。这种过于审慎竟使自己丧命，却救了冯·巴本免于死。但是我们一定要强调指出：海德里希和这次谋杀案的关系只是根据烟幕弹这种巧合所作的猜测，事实上这一猜测是否正确大概永远也无法知道。

海德里希的最终目标是什么？没有人能够肯定回答，因为他就是在自己最亲密无间的僚属中也没有对一人说出知心话；有时在酒后也能吐露一言半语真心话，那时候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出他野心勃勃梦想成为“德意志帝国的头号人物”。他一度提出了一种理论，认为元首和德国总理的位置应该分开，他这种主张就是说元首应该成为有名无实的德国总统的角色。在另一方面，德国总理应该是独揽大权的人物，而这也正是他自己梦寐以求的。

但是海德里希并不只是一个梦想家。他不仅是随便想想而已，而是精打细算地选定目标，并且以一种无愧于参谋总部本身的系统计划来竭力达到这个目标。他认为要想当德国总理，第一步就是当上内政部长，这个职务将把保安警察和整个正规警察部队都置于他的统辖之下。他认为希姆莱不妨仍然作德国党卫军的首脑；由于警察已经属于内政部，党卫军武装部队——至少在战时——又属于德国国防军，那个位置就会成为一个无足轻重的位置了。然而内政部长的地位也不是可以一跃而上的。他感到首先必须证明自己是领导公共事务

的干才。为了实现这一动机，他一心想担任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的德国副总督。

于是他给希特勒呈上一份备忘录，说德国总督冯·牛赖特一个人不可能完成任务。希特勒本来只要在可能的情况下就喜欢把一切重要职位安排给两个人担任，所以很容易地被说服了。海德里希就达到了他的第一个目的。

海德里希在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以狡诈的手腕执行他的任务。据说他制造了一片恐怖气氛，使得全捷克斯洛伐克人都仇恨他，并有“警犬”的绰号，这种看法并不完全确切。恰恰相反，他把有知识的上层阶级和工人、农民分开，从而离间捷克斯洛伐克人民的作法，大见成效。他企图把他认为是民族主义代表人物的上层阶级消灭掉——或者至少使他们不能为害，并且靠改善国家的经济情况，把工人和农民争取到纳粹政权这一边来。

这就使得捷克斯洛伐克的领袖们认为海德里希更为危险。他们决定必须把他干掉，这并不是只由于仇恨，而且还有对于国家（也可以说对于民族本身）的幸福的考虑。做这件事没有多少困难，因为海德里希不仅勇敢而且鲁莽，他时常不用警察护送乘坐一辆敞篷汽车在全国各地驶行，而英国特工组织又提供了极其有效的协助，更保证了这一行动的成功。

要想对海德里希作出定论，现在也许还为时过早。无可怀疑，他不但是纳粹主义的，而且也是极权国家整体观念的杰出人才和领袖人物。在历史上和他最近似的人物也许是凯撒·波尔查^①。他们两人都是毫不顾道德观念，两个人都同样酷爱权力，都有同样冷静的头脑和同样冷酷的心肠，同样有处心积虑、运筹帷幄的野心。

^① 凯撒·波尔查(1476~1507年)意大利的宗教和政治领袖。

海德里希有他自己处事的准则，他不但没有任何基督教徒的道德准则，连最基本的道德感都没有。他心目中的上帝不是国家，而是权力——一个人的权力。他是一个来自罗马的凯撒时代的典型，在那个时代对权力的目标从来没有人表示疑问，而权力被看成本身就是目标。海德里希对于意识形态毫不关心，对其是否真实或有无价值连都想不去想，只是纯粹看成一种工具，可以用来左右群众。在他的心目中，这一切都次于掌握和拥有权力。真与善对于他来说是没有内在意义的，只是用来获得越来越多的权力的工具，只要能促进这一目标的实现，一切都是真实的，一切都是善良的。政治对于他来说也只是夺取和保持权力的手段。辩论一件特定行动本身对或不对，在他看来是太愚蠢了，于是他必然从来不过问这种问题。

因此，海德里希的一生是层出不穷的谋杀：谋杀那些他所不喜欢的人，和他争夺权力的人，他的对手以及被他认为不可靠的人；他的一生也是不绝如缕的阴谋诡计，它们正如谋杀一样险恶，而且用心叵测，更为狠毒。人的生命之光在海德里希眼中毫无价值，要是谁干扰了他的争权夺利，他就无情地使他灭亡。他的邪恶不只是机会主义者邪恶的欺骗，而是一种恶魔式虚无主义。他的罪行不是抑制不住的冲动的结果，而是由一种极高的智力所决定，这种智力完全不受良心启示的影响。希特勒把海德里希称为“铁石心肠的人”，不是没有缘故的。有一句老话说：“好事糟了就变成坏事”。一个寻常的人总不能那样为非作歹无所忌憚，只有一个才智超群的人才能犯这样滔天的罪孽。他的罪恶不是为了某种伟大的事业，而是纯粹为了他自己的个人利益所犯下的。他毫不关心德意志帝国是否强大，他所追求的只是自己的权力。他没有为德国人效劳的愿望，他只满足自己的权力欲望。

海德里希的性格不是没有病态的一面。例如，他的过分傲慢的野心，拿今天流行的半科学术语来说，也许就是用来作为弥补他自卑情绪的。他自知这种自卑情绪是根据纳粹主义的准则自己祖先并不清白而引起的。他的北欧民族情绪^①大概也是出自同一根源。他希望在他周围只看到最纯的日耳曼型的人们，而在他本人的面貌方面，他也竭力强调他所说的他的“光荣的北欧民族体格特征”。只有他的眼眶形状有些特别，这件事可能使他不快。人们常常因此说他的远祖中有些黄种血统。

在海德里希和他妻子的关系中也有些病态的方面。他的妻子是菲玛恩岛上一个教师的女儿，她属于德国传说中所描写的那种野心勃勃的邪恶女人一类。她不停地煽动她丈夫那已不可一世的野心，并且迫不及待地把他往前赶。作为一个击剑家、飞行家、骑师和唐·璜^②，他可能在一切事情中都强烈地希望出人头地，这是由于他的婚姻生活所造成的性病态情绪引起的。也许有一天心理分析学家会把这一切解释得使他很满意，但是这却改变不了对我们第三帝国所有领袖中这个最可怕的人的基本判断。

海德里希这个无视道德的玩世者，既不相信友谊也不相信同志精神。他时常放声大笑，嘲弄这种温情。他也毫不相信对整体的自觉忠诚，只有一个关系他认为是可靠的，那就是了解别人的秘密。所以他把发现自己身边僚属们的一切隐私和第三帝国领导人物的一切隐私，看成无比重要的事。他认为知道这种事会使他对自己同类人物获得真正的管辖权，并且

① 北欧民族情绪，德国纳粹党认为只有北欧民族如德国人和斯堪的那维亚人才是纯粹而优秀的。

② 唐·璜，西班牙传说中一个专门玩弄女性的贵族，风流浪子。

将间接地通过权力之路，控制政治事件畅通无阻。他无所顾忌地承认他是从苏联那里抄来的这种制度。

纳粹德国的许多领袖人物都知道海德里希在搜集一套能证明别人有罪的材料；因此人们对他又恨又怕，因为谁也不知道他发现了什么东西，而人人都多少有些需要隐瞒的东西。他轻易就能使那些在纳粹执政以后飞黄腾达的投机分子陷于恐怖状态。犯一个小错误、接受礼物、从前一件小小的不检点，这些都足以使一个人受良心的谴责，惴惴不安，唯恐失去党的恩宠。由海德里希一手操纵的那些秘密档案，是整个第三帝国中最令人畏惧的文献资料。

就连希特勒本人也摆脱不了这种体系的注目。我们可以说，海德里希是“研究希特勒的人”中最早的一个，并且他尽了最大努力来找出他的主子过去生活中一切细微末节。在这方面他十分成功，因为他在慕尼黑有一个特别亲信的特工人员，这个人的唯一职责就是去寻求希特勒早年同事和老友们信任。这个特工人员把这个任务完成了，特别是在几次豪饮的酒席上，这个人从那些毫不怀疑的牺牲者口中得到了一些极有价值的材料（而那些牺牲者中的大多数人本来都象憎恨瘟疫似地恨海德里希）。海德里希搞的那份希特勒的档案对将来任何一个为希特勒写传记的人来说都是无价之宝。

提供这些材料的那些老人，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作过希特勒的军士长的玛克斯·阿曼。从纳粹运动初期到本世纪20年代末一直是希特勒最亲密的朋友的艾米尔·莫里斯，另一个也是密友的赫尔曼·埃塞以及希特勒的著名的私人摄影师霍夫曼等。霍夫曼和希特勒的关系从很早就开始了，当时希特勒因为自己的外甥女吉莉·拉包尔之死而患失眠症，经常和霍夫曼辩论到深夜。此外还有克里斯蒂安·韦伯，这也是一位希

特勒的早年老友，他是有权利和希特勒谈话时不称“您”而称“你”的少数人之一。与他分享这种光荣的只有几个人，他们是弗立德里希·韦伯博士、克里贝尔大使、冲锋队罗姆将军和一个姓施密特的战时老伙伴。所有以上这些人谁也没有没想到套自己话的人是海德里希所派的特工人员。

莫里斯是海德里希特别感兴趣的人，因为没有人比他更了解希特勒早年的事迹。但是莫里斯是唯一不曾酒后失言的人。即使如此，海德里希的特工人员还是从他口中得到大量极有趣的材料。至于如何得到的，谁也不知道，而且将来大概也永远不会有人知道。

显然，莫里斯够不上纳粹的纯亚里安血统标准，据说他的父亲是“一流混血儿”。尽管如此，莫里斯仍然是希特勒在慕尼黑最早的拥护者之一。他是希特勒的司机，要是希特勒能够感到真正友谊的话，他会成为希特勒所信赖的朋友。大家一般不知道，莫里斯曾有一度在希姆莱之前担任党卫军的首领，也不知道莫里斯曾有过把希姆莱开除军籍的事，他这样做是因为希姆莱过分玩弄军事把戏，莫里斯当然是奉了希特勒的命令，但是也为此洋洋自得。当希姆莱在党卫军内重新上台时，他马上开除了莫里斯，他对莫里斯给他的侮辱是永远不能原谅的。

希特勒和莫里斯的莫逆友谊延续了十年之久，后来为了一个女人而结束了他们的友情。希特勒爱上了一个叫作吉莉·拉包尔的姑娘，她是希特勒同父异母妹妹的美貌女儿。希特勒的确认为这个年轻的姑娘是唯一的无拘无束、毫无条件的有真挚爱情的人儿。可是敏捷的莫里斯就是和这个吉莉·拉色尔搞了一场庸俗而颇丢丑的恋爱。这一切莫里斯都亲口对我承认过。当希特勒发现这件事以后，他就和莫里斯完全决裂了。在决裂以后希特勒解除了莫里斯的职务。莫里斯竟然有

勇气到慕尼黑的雇佣事务法庭去告希特勒。而一向是睚眦之怨必报的希特勒却对莫里斯并不怀恨,而且在他执政以后,还设法确保隐瞒莫里斯家谱中的缺陷。

1931年秋天,希特勒决定送吉莉·拉包尔到维也纳培训她的歌喉。她的舅舅希望她成为一个伟大的歌唱家。为了种种原因她不愿意离开慕尼黑,竭力反对她舅舅的愿望,但是无济于事。她的死亡也许可能就是由于她不愿意离开慕尼黑,除此以外实在无法解释。她用手枪自杀了——那确实不是谋杀。这种可怕的行动给希特勒的生活导致一场严重的危机。这次震惊看起来对希特勒的性格有显著的影响。他一度决心要自杀,只是在许多朋友苦口劝说之下才打消这个念头。从此他的性格日趋冷酷,压抑了一切正常的人类感情,这无疑都是由于吉莉·拉包尔的惨死。就是从这时开始,希特勒才专心致志热中于搞政治。他有些伤感地,然而却是真挚地宣布过:“从今以后,只有德意志才是我的新娘。”

但是,希特勒并没有因此就终身不接近女人。他和她们的关系大都是属于暂时相识的性质,可是那种说他倾向于变态性欲的谣言,尽管流传甚广,耸人听闻,却是无稽之谈。希特勒从来没有认真想结婚的念头,而后来特别是在战争年代,他实在忙得不可开交,不可能迷恋任何私生活。所以当他面临末日的时候,突然在1945年4月30日和爱娃·勃劳恩结婚,这一事件使得最亲近的僚属都异常惊讶。

海德里希当然完全知道莫里斯的祖先有点小问题,因为他为了揭露人家一些弱点以便从中渔利,特别处心积虑发掘第三帝国一切头面人物的祖先历史。如果我们记得海德里希自己就是不做假就不能证明自己的纯亚利安血统,他的这种行动实在是很奇怪的。也许这是他在寻找自己的同犯或面临

同样危险的人吧。

关于德国劳工阵线的领导莱伊博士的情况，就是海德里希办事方法的明证。海德里希忽然碰到一些东西，使他有充分理由相信莱伊是一个“非亚里安人”。他毫不迟疑地企图偷进纳粹党首席法官瓦尔特·布赫的办公室，因为布赫根据希特勒的命令掌握莱伊的档案。虽然他在那里或者其他任何地方都找不到任何这方面的文件证据，他还是巧妙地利用了他所知道的不利于莱伊的材料。

就连他自己的顶头上司希姆莱，也不能免于海德里希这种查祖宗三代的阴险迫害。使他猛追希姆莱家族根源的是1933年春天发生的一件怪事。那时希姆莱刚刚被任命为慕尼黑的警察总监。一天，有个人来到警察总部，说他是这位新总监的表亲，要想见他。有人证明这个人是乌腾堡地方一个犹太籍的牲畜商贩。警察的第一个反应就是认为他无礼而要把他拘留起来。但是那个人泰然自若的神气使他们踌躇了，为小心起见，他们在采取狠毒的手段以前先试探一下希姆莱本人的口气。使一切有关的人大吃一惊的是，希姆莱宣称这个人是受他保护的，一根毫毛也不许碰。直到德国崩溃的时候，在慕尼黑的警察总部里一直保存着有这个插曲的国家机密文件档案，由一个完全可靠的官员负责保管。

海德里希如何利用了这点关于希姆莱的有用材料，没有人知道。但是我们可以很有把握的这样假定：他对希姆莱有偌大的影响，是由于在这件事上他大权在握。

关于海德里希搜罗别人隐私的事例，举这几件就足够了。这些事都是确凿可靠的，是从海德里希的一名亲信人员那里得来的，这个人对一些秘密档案是近水楼台，不过这批文件究竟有多么完全，和到底如何包罗万象，他大概也不清

楚。现在我们来看看海德里希的活动与方法的几个典型事例。

海德里希反对教会的斗争

海德里希一般对基督教，特别对天主教怀有一种最强烈的仇恨。这种强烈的仇恨简直是病态的，有时候竟使得这个在另外场合都是头脑冷静、深谋远虑的阴谋家，在这件事上，却毫无理智而且逻辑混乱。他确信基督教对于德国人民是一场灾祸，还相信存在一种基督教阴谋，它以梵蒂冈和耶稣会为首，其目的就是要毁灭德国。但是海德里希很机灵，他看得出要是直接发动对基督教会的攻击和在德国进行一场全面的反宗教的十字军运动，结果很可能瓦解纳粹政权的全部基础。所以他决定使教会在人民的心目中丧失威信，摧毁教会的势力，通过培养教会的内部分歧来削弱它，并且靠一系列逐步进行的慎重措施，使教会走上衰落以至于最终分崩离析的道路。

他认为使天主教和耶稣教教会瓦解的计划，最好是从教会内部来发动。于是他为了这个目的就在国家安全总部内设立了一个特殊部门，这个部门所有的主要成员都是那些被其教会开除出来的过去的牧师、神父，由一个原任福尔哈伯红衣主教的秘书的人来率领。但事实证明这种使用叛教者同教会斗争的计划是一个不高明的办法。一切叛教者都有一种仇恨的特性，使得这些人看不清现实，因而使他们犯了许多基本的战术性错误，这些错误在不小的程度上促使海德里希不能实现他的作战计划。

对德国天主教神父提出的那些关于扰乱金融和有伤风化的臭名昭著的控诉，原是想在人民群众中败坏教会的名声，可

是物证几乎完全依据由海德里希下令伪造的。整个打算完全失败了。

但是，海德里希还有一个计划，这个计划更加危险，如果他能把这个计划付诸实现，很可能在以后几年要威胁到基督教教会在德国的存在。海德里希的计划是要把一些出类拔萃、坚信纳粹主义的青年人派去作神父，以后等到他们居于重要地位时，由他们从教会内部来瓦解教会。

当然，这些特工人员不能被私运到教会里去，拙劣地化装成所谓的神父；他们必须先通过适当的神学院，获得正规接受圣职的神父的全部权利和地位，才能得到执行任务所必须的地位和信任。参加这种真同恶魔一样狡猾的计划的人需要有极高的欺骗能力和精神纪律，所以海德里希首先亲自从希特勒青年团里选拔了几个天资出众的小伙子。他准备把这些人化名送进德国和海外的神学院或研究院去。他也煞费苦心订了一套用同样方式渗入耶稣教教会的计划，预计在15年或20年内，他的密使们就能爬到很高的地位，从那里可以发动他们的致命的破坏工作。

说也奇怪，希特勒对于这种计划并没怎么表示热忱。当海德里希请求为了加速工作，对这些挑选出来的青年豁免服兵役的时候，希特勒坚决拒绝。但是海德里希并没有放弃这种打算，他只不过把它看成推迟到战争结束以后而已。并且取而代之作为临时缓冲之计，他开始在教会组织范围内着手布置起他的间谍网。尽管他在教会事务方面的顾问十分无能，他对教会最内层的活动还是能得到深刻的了解。在教会的最高阶层里他都安排了情报人员，在德国的每个教区里都至少安插了一个占据重要位置的特工人员。他的特工人员在教廷驻柏林的公使馆附近工作，他们甚至打进了梵蒂冈本

身。这使海德里希能收到关于一切重要的教会会议和主教会议的详细报告。

海德里希之死为德国教会铲除了最可怕的敌人。接替他的是卡尔顿布吕纳，这个人对教会问题的看法和他大不相同。当然卡尔顿布吕纳绝不是过着基督教徒生活或者信奉基督教教义的人，但是海德里希对教会的那种不共戴天的仇恨是他难以理解的。他很快就把他的前任所建立的反教会机构全部解散了。

众所周知，卡尔顿布吕纳最终是同教会和解了。他在临走上绞刑架前，还作了忏悔并领受了圣餐。

海德里希和犹太人问题

海德里希竟成为他所出身的那个民族最不共戴天的敌人，这一点在心理学上是可以理解的。通过消灭犹太人，在下意识里他就抹掉了那个他自以为倒霉的污点。在安全处和盖世太保中的犹太事务顾问委员会，都是根据他亲手下令组织的，而那个“犹太人出境中央组织”更是他的独出新裁。

不论是为了对外的政治权宜之计，还是由于尊重欧洲普遍接受的人道主义原则，国社党政府原来是无意于使用肉体消灭的方法来解决犹太人问题。所以他们从来没有以任何方式妨碍犹太人移民出境，在纳粹上台时就曾有过第一次大规模移民出境，在1938年德奥合并的时候又发生了第二次。海德里希认为这种移民出境考虑得不好，组织得也没有计划。因为国家收费特别高，只有那些富有的犹太人才容易出境，但是德国大多数的犹太人，除非能受到某种组织或海外亲属的帮助，都因为受经济条件的限制而只好留在德

国。海德里希想起一个对一切犹太人大规模移民出境都敞开了大门的办法，他想使那些有钱的犹太人，根据他们的财产情况，替若干比他们贫苦的同胞代付国家费用和移民出境的旅费。

那个负责执行这个计划的机构，就是犹太人出境中央组织。它奉命鼓励犹太人离境，而不要像过去德国一直实行的那样阻碍他们。允许那些愿意离境的人得到一切必须的证件、车船票等等。当然必须扣留他们的财产，大部应该交给国家。根据海德里希计划，到1941年底，德国和它的保护国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可以用这种方法把全部犹太人肃清。战争的爆发使这个意图大有挫败之虞。但是在占领了法国以后，海德里希又采取了那个拿破仑式的旧计划，把犹太人遣送到马达加斯加岛，并且得到希特勒的许可，派一个全权代表去与法国维希当局讨论这个问题。但是由于战争局势的发展，这个计划付诸东流。

对苏战争爆发以后，当海德里希了解到希特勒这时的确下了决心，要对犹太人实行肉体消灭的时候，海德里希就应用他的全部组织天才来实行这项罪恶滔天的决策。他拟定了“对犹太人问题的最终解决”的规划——这是欺骗与伪装的妖术大师的最邪恶的杰作，也是他发明了那可怕的机器，以神不知鬼不觉的方式断送了千百万人的性命。整个过程都被精心隐瞒起来，所以，关于屠杀犹太人的谣传一旦传到德国人民耳朵里，人们对这些传闻大都不十分相信。连那些一般熟悉时事内幕的人，也好多年对那消灭犹太人的机构毫无所知。

最初，保安警察的特别分队在东战场执行大批处决的任务，前任维也纳地方长官奥狄罗·格罗伯尼克在担任卢布林

警察局长时对犹太人进行过大规模的屠杀。这种屠杀所引起的恐怖和厌恶的浪潮，也许曾给纳粹政权招来相当大的麻烦。就是海德里希本人说服了希特勒采用自己想出的默然无声的消灭犹太人的机器来代替那些“粗鲁的方法”。

海德里希体系的基本原则就是要利用犹太人消灭犹太人。（这是一种特别可憎的办法，是海德里希内心的邪恶和蔑视一切人类文明的典型表现。）第一阶段是在几个保安警察的监督下由犹太人莫名其妙地进行的。这种做法有它的优点，就是这种消灭过程越进行下去，越多的知情人就要成为这件事的受害者。海德里希常常自夸他从古埃及的历史学到了一个有用的教诲，即古埃及那些为法老王建造陵墓的工人全部被处死，以便保证无人能知道有关法老长眠地点的秘密。柏林、维也纳、布拉格、法兰克福和欧洲其他数不清的许多大城市中的犹太民族事务委员会被迫自己作出决定，在他们的同教教友中，谁都得被送到波兰的犹太区去。只有很少几个人知道这次旅行的下一阶段就是最后阶段——到奥斯威辛和马丹涅克集中营。

海德里希的机构在他死后很长一段时期仍在顺利进行。1944年春天那个由德国和匈牙利政府所商订的“匈牙利犹太人移民出境”的方案，就有海德里希方式的显明标志。双方正式同意应该把匈牙利的犹太人解送到波兰犹太区去。为了使布达佩斯的犹太人没有从市区逃到乡村匿藏的机会，遣送工作先从外省开始。匈牙利宪兵队单独负责执行这个计划，但是选择被遣送出境的人的工作却硬塞给犹太长老委员会。

每天有两列火车开往波兰，每列火车上载有两千名犹太人。这些不幸的犹太人丝毫不知那等待着他们的可怕的命运。他们毫不抗拒，温顺地排长队向火车站走去，听凭被装

进那些等在那里的火车。负责的宪兵人数非常少，逃跑本来是很容易的事，而最大的犹太人生活区所在的喀尔巴阡—乌克兰地区，是人迹罕至的山岭和森林，确是以后几个月中理想的匿藏之地。然而只有很少几个人最后侥幸地死里逃生。

火车一旦装满了，通常就由一名德国警官接管，这警官也毫不知晓火车的最终目的地。他所接到的书面命令是他和由他率领的少数警察把火车护送到波兰某一指定的车站，在那儿把它交给在那里等待着他们的另一队人。通常，火车在离预定目标还差一点的地方停了下来，而那个新护送队就在等着准备接替。不仅是警官，连那些警卫的士兵也都换了班。然后那些满身泥水、狼狈不堪的一群不幸的人们就消失在森林里面，或者向前走进奥斯威辛或马丹涅克的某一分支营里，死亡的机器就在那里等待着他们。那列空火车接着开下去，开到下一个车站，在那里调头开回匈牙利。一切有关的人都对最近被迫赶出家门的人全然不明下落。

第三章

海因里希·希姆莱

德国所有特工组织的最高领导是党卫军司令海因里希·希姆莱。

这个长相很像银行小职员的人，竟飞黄腾达成为希特勒最亲密、最器重的合作者，并且作了党卫军的首领，掌握大权，成为仅次于希特勒的最重要人物。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他飞黄腾达掌握大权的过程确令人惊讶。在希特勒上台以前，领袖人物中没有海因里希·希姆莱这个名字。在名次稍后的行列里可以找到他，可是谁也不把他当回事。人们把他看成一个有点浪漫的怪人。身为一个志愿队成员的希姆莱，与1923年4月9日希特勒那次未遂的慕尼黑政变有牵连，在这以后，他就自然而然地成为一个国家社会主义的拥护者。他曾是纳粹党的组织部长格利戈尔·施特拉塞的一名默默无闻的秘书。他在1926年被任命为党卫军司令这桩事并不关紧要，因为当时的党卫军，不过像警卫队那样，只是在公共集会等场所负责保卫党内领袖的得力可靠的队伍罢了。1934年6月30日以前，党卫军一直隶属于冲锋队参谋长。在20世纪20年代中，谁也想不到后来党卫军竟然如此扩大。

那么他是怎样飞黄腾达的？对于这个问题，只有一个切

实的答案。正是海德里希把他提升到了最上层，使得他成为叱咤风云的人物。海德里希打的这个主意，就是把这个具有平庸之才、碌碌无为的人捧上去，最后时机一到，可以让他垮台，自己取而代之。希姆莱那样的庸才，长期没有为公众所发现，海德里希因为死得过早，没有能按照他所决定的计划走上最后一步。而到海德里希死时，希姆莱已经达到很高地位，从那里再继续提升已经是理所当然的事，与个人能力无关。要干掉他需要一个有海德里希那样有地位和有才干的人，另外有几个人看穿了他，但他们无能为力，又不敢干这种事。

首先是海德里希促使希姆莱注意到党卫军司令这个地位所预期的发展前途。也是海德里希设想以下这个计划，即在当权以后，党卫军第一步就应当获得全国现有警察系统的控制权，从而成为政权后面真正的警察力量。把党卫军变成第三帝国的精华，也是海德里希的主张。他设法保证希姆莱不再为党卫军搞他那一套有点荒诞的军事把戏，而冷静地进行党卫军的稳步发展；当他死去时，奠定未来党卫军力量的整个基础已经完成了。

在政府、工业和党组织的各部门中，党卫军的高级官员居于重要职位，并且当然都听从希姆莱的命令。海德里希的确把这种双重领导的计划付诸实施了，使党卫军成为国中之国。但是希姆莱没有本事充分运用他所执掌的大权。本来海德里希想在纳粹政权中把身兼要职的人都授予党卫军高级军衔，使这些人真正从属于党卫军。可是，他们在希姆莱手下却徒有其名、形同虚设。获得这种“荣誉”的人谁也不认为要承担任何重大的责任。例如，里宾特洛甫和马丁·鲍曼这样的人，有党卫军的高级军衔，要是希姆莱突然以他们的司

令官的身份向他们下命令，他们一定会极为震惊，并极其愤怒地认为希姆莱滥用职权。但是从来没有发生过这种危机，因为希姆莱从来没有试图影响过他的这些地位很高的下属。就连党卫军武装组织，即党卫军内的纯军事组织的将军们，也很少考虑他们的总司令。他们还有别的麻烦事要去考虑。他们宁愿接受德国国防军中他们上级军官的命令。至于其余的那些普通党卫军，实际上其中所有适合参加现役的人都已经入伍，所以他们在战时处于完全无足轻重的地位。

因此希姆莱的真正实权远不如局外人所认为的那样强大。海德里希一死，党卫军权力扩张活动就停顿下来；而且同其他许多事情一样，停顿就是撤退的同义词。海德里希本人如果还在，他决不会让局面糟糕到这种地步。只要是他执掌的权力有些微的作为，他就能影响第三帝国的政策。但是希姆莱则处于消极状态。

即使如此，把希姆莱看成仅次于希特勒的全国最有实权的人，仍然是不错的。他所攀登的重要位置即德国警察部队和情报组织的最高领导，后来又是内政部长和后备军的总司令，使他有可能成为第二号人物，并且给了他参与决定德国政策的机会。但是这一切都停留在可能性的领域，在有关重大事件中，希姆莱很少真正运用职权。相反，他在从上至下使用他的权力方面，则是个完全不同的人。在纳粹党的较低阶层和一般的广大人民群众中，希姆莱威风凛凛地扮演主宰命运和掌握生杀大权的主子角色。但是，至于反对希特勒和使他接受自己的意见，即使他头脑中曾经闪过这样的念头，他也是根本办不到的。

当我们叙述希姆莱的赫赫职权时，我们还没有提到他的最重要的地位，那就是他与元首的“有力地位”。希特勒是

否曾经看透这位党卫军司令呢？希特勒是否认为他真正是一个懦弱无能的微不足道的人呢？可能在很长时间里希特勒还没有了解希姆莱是什么样的劣等材料构成的，因为希特勒识人的本领是平庸的。后来他才意会到希姆莱不过是海德里希手中的一个傀儡，并且逐渐把海德里希直接拉到自己的身旁。海德里希在元首眼中完全胜过希姆莱，并且要接任希姆莱的职位，只是时间问题而已。但是这两个人之间无声无息的斗争由于海德里希的早亡而告终了。

没有第二个海德里希在舞台上出现。卡尔顿布吕纳既没有个人的迫切动机，想把希姆莱从特权地位赶下台，并且在很长的时间里他也没有表现一点要这样干的意愿。

因此希姆莱保住了他的地位，希特勒找不出理由让他解职。这时他已经成为希特勒得力的人，赢得了他的青睐。一切将军、外交家、工业领袖和许多其他的党员在独裁政体的开始阶段有时偏和希特勒为难。希姆莱和他们不同，从一开始就遵守原则对元首唯命是从。对他来说，希特勒提出的计划没有一个不是切实可行的，而当别人全都提出反对意见时，他却不加思索、满不犹豫地表示同意元首的意见。希特勒不大了解：时常完成一些行不通的事，并且经常使用那句危险话的人（“没有行不通的事”），不是希姆莱，而是那时还总是站在希姆莱背后的海德里希。即使希特勒认识到这点，大概也不会有多大区别。海德里希死后，希姆莱继续成功地扮演他一贯唯唯诺诺的角色；到那个时候，似乎希特勒不怎么重视从理论上的同意变成实际的成功，而更重视的是不要碰到一个顽固的“不行”这种事。

希姆莱不但是软弱、怯懦和微不足道的小人物，而且他的性格里有一定程度的病态特征。他对于教会的仇恨也属于

病态，他对于叛徒的憎恶几乎成了心病。希姆莱出身于一个虔信天主教的中产家庭，他的父亲曾经做过巴伐利亚宫廷的王家教师，而他的叔叔是全家最受尊敬的一员，则是王室教堂的一位本堂神父。希姆莱得势以后，强迫他这个叔叔脱离教会，要他向希姆莱传授丰富的经验，用以反对基督教。希姆莱给这个不幸的人一个党卫军中尉的头衔，可是这个人被硬塞进这“新世界”里来，他找不到扎根的地方。德国崩溃以后，他先被监禁，后来被带到纽伦堡作为公诉人的一名证人。他囚死狱中，实际上是身心交瘁致死。

希姆莱青年时代曾在教堂里当过做弥撒的助手，并且当他父亲还在世的时候他一直不敢离开教会，他不敢公开承认他无疑早已对教会怀恨在心的事实。直到他父亲死后，他才公开同教会脱离关系，成为对基督教，特别是对天主教的暴虐的压制者。他认为基督教信仰是对德国民族的一种威胁，并且他真心实意地相信那种稀奇古怪的说法，认为梵蒂冈、世界犹太人和自由共济会的联盟将灭绝整个德国民族，特别是要消灭纳粹政权。但是一个心理学家无疑会毫不费力地指出，希姆莱对于天主教的敌视并没有理智基础，只是他对自己父亲仇恨的一种表现罢了。

与此类似却更复杂的一个特征，是他对自由共济会无限恐惧。他确信共济会的各分会对于德国人是一种极其危险的根源，并且说服希特勒越来越同意他的这种说法，差不多无论哪个不利于德国的行动，无论哪次使一个纳粹高级官员造成牺牲事故，无论任何无法说清的死亡，都被希姆莱说成是共济会会员干的。他周围收罗了一批同样看法的“专家”，他们进一步加剧了他对于共济会的恐怖。在他的“有关共济会事务总顾问”身上，这种成见已经发展成为那样猛烈的迫害狂，以

致于使他不敢离开盖世太保大楼，唯恐有个共济会员在埋伏着，一心要干掉他。

希姆莱的日耳曼崇拜狂形成一种真正的精神病。他是个浪漫主义的官僚。如果有可能，他一定会十分乐意把德国人民，至少把他的党卫军带回到那古老的日耳曼时代。他的这种狂热病的症状，表现在他下令使用古日耳曼的符号、文字、建筑风格，以及他那怪特的却决非无害的想法，即依靠一种官方强加的优生法程序，在党卫军内重新建立北欧民族血统的纯洁性。要是他的愿望得以实现，古老的日耳曼宗教即将卷土重来，逐开他所怀恨的基督教信仰。

大概同这种日耳曼狂热纠缠在一起的，希姆莱还有另外一种怪异的特性。我们不能把这种特性当作只是浪漫主义的疯狂一笑置之，用心里分析家的话来说，这种特性多半是一种抑制。希姆莱完全真心相信自己是德国国王亨利一世的转世，他依仗亨利一世树立起一种可怜巴巴的浪漫和虚假的崇拜。在11世纪时，萨利克王室的号称猎禽者的亨利亲王忽然挺身而出，领导各日耳曼民族。希姆莱幻想他将来与这种命运会有些相似的地方。

希姆莱对于各种秘诀的爱好也已远远超出嗜好范围之外。说他所有重大的决策全凭他那些神通广大的顾问们给他的忠告，并不过分。听起来也许让人难以置信，党卫军司令和德国警察首领竟然让自称为炼金术的人们在盖世太保总部的地窖里替他施行法术。在党卫军的行政部门中，早在1936年就有许多人知道这件事。希姆莱给术士们的任务就是借助于古代某些炼金术士的手稿中的配方来炼出黄金，他准备使用这些黄金把德国从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的控制下解放出来。也许没有必要再说这些试验徒然花费很多钱，没有造出

黄金。这场戏到1938年就收场了。

还有一位科学家，拿到好几十万马克去进行试验，成年累月研究制造一种“霹雳”，据说这种秘密武器可以轰然一声把德国的敌人全部消灭。不过当探险家沙菲尔博士（这是同受希姆莱支持的骗子、狂人截然不同的一位严肃的著名科学家）到中国西藏探险以后回到德国时，希姆莱给他分配了一个任务，去培养一种耐冬的草原马。在希姆莱的疯狂之中也有一些道理。^①他曾企图让他的党卫军占领远至西伯利亚的整个东部地区。他准备使这些党卫军大体按照古代条顿骑士的军事社会方式住在所谓的城堡里，从这些据点统治附近的国家及其被征服、被奴役的居民。但是按照希姆莱的想法，这些城堡应该根本不用各种现代机器，而用“耐冬的草原马”来代替它们。这些草原马不仅要用来乘骑和运载，还得为防卫乌拉尔山脉一带德国边境的坚强的党卫军战士们供应肉、乳和奶酪！

希姆莱对所有这一切极端认真。在战争时期，他从世界各地买来纯种良马交给沙菲尔博士使用，一直到1944年，希姆莱还抽出时间去参观奥地利阿尔卑斯山中沙菲尔的育马场，视察一下所取得的成就。

如果希姆莱把这种奥秘的幻想世界和政治世界严格分开，并且表现出一点政治天才的真正本领，我们还可以认为这些已经发展到疯狂程度的怪癖是无所谓的。但是情况并不是这样。恰恰相反，希姆莱把他的幻想和他的政治活动难分难解地纠缠在一起。1943年10月希姆莱对一些党卫军高级军官发表演说。这篇演说没有公开发表，但全文保存下来。当

^① 莎士比亚名剧《哈姆雷特》中有一位大臣曾说：“在他（指哈姆雷特）的疯狂中也有一些道理。”

时德国各个战线都遭到猛攻，向后败退，连通过谈判得到和平都不可能，在这样的时候希姆莱还沉醉于他建立一个庞大帝国的新梦想，他说的“帝国”可以一直延伸到辽远的乌拉尔山，由他亲爱的党卫军统治着！这篇演说充满了令人吃惊的痴言，致使那些对时局了如指掌的听众，在听完离开时都大吃一惊，都认为他们的司令是个应该由心理专家来处置的病例。

于是，这样一个人，在正常时如不被家人送进精神病院，也要送进休养所去，竟然成了德国元首的左右手。尽管实情如此，任何人得知德意志帝国的仅次于希特勒的最高人物希姆莱无可置疑地是个精神失常的人，毕竟是令人难受的。

但是在国家事务和他的日常行政范围中他的头脑却能完全合乎逻辑地进行工作。神经系统看不出什么病态的扰乱。他对自己的公务和政治活动无疑应该负完全的道德责任。

党卫军一向极力宣扬自己的高尚品格和正派作风，那么作为党卫军司令的希姆莱，大家就有理由希望他比任何别人更能充当一个表率。而他远非如此，从他在1944年7月20日的事件中所扮演的那种声名狼藉的角色可以令人信服地证明这一点。希姆莱曾经由他所信任的僚属及其私人的参谋长党卫军将军沃尔夫介绍给柏林的律师兰格本博士。兰格本博士是普鲁士前财政部长伯比茨博士的密友，并且和他一样也是阴谋分子。我们决不能假定兰格本博士曾把自己所知的阴谋的全部细节告诉了这位司令。不管希姆莱还是沃尔夫都不可能不了解兰格本不是代表他个人，而是代表一个和他接触、正在准备随时采取行动的反对组织讲话。兰格本和舒伦堡一样，都认为希姆莱是适当的人选， he 可以把德国国家之舟引上一条新航线，并且把它驶到与西方国家媾和的避风港。兰格本同希

姆莱及沃尔夫进行了一次谈话，在谈话中用词慎重，可是意图十分明确。兰格本在谈话后离去时，他一定有这样一个印象：希姆莱同意他的意见，并且准备扮演分配给他的角色；不然的话，作为警察的头子，他当然就把兰格本当场逮捕了。希姆莱不但没有逮捕兰格本，反而和他连续磋商了几个月，并且还为他在1943年和西方国家建立联系而到一个中立国去提供方便。在同年夏天，兰格本又和希姆莱及沃尔夫在东普鲁士的一个庄园内秘密会晤了一次。几个星期以后，兰格本被盖世太保逮捕，后来在1944年10月被处死。当时希姆莱从没有帮助过他。对于伯比茨博士，希姆莱除了把他从监狱里提出来进行一次非常机密的面谈以外，也没有为他做过任何事情。

希姆莱极愿和兰格本商谈，也许认为是可借以追踪整个阴谋的一种警察的妙计，但是即使如此，这仍然是一种卑鄙的手法。况且这也不是希姆莱两面三刀手段的唯一例证。人们常提出一个问题，就是在别的方面向来那样干练的盖世太保，为什么没有及时发现7月阴谋呢？其实事情根本不是这样的。盖世太保早已深悉这个阴谋的底细。并且，虽然他们对于参加者及其意图没有得到确切的线索，他们还是完全知道它的领袖们是哪些人。到1944年6月底，他们已经搜罗到那么多的证据，所以根据一切正常的警察和刑事程序的规定，盖世太保应该立刻逮捕贝克将军和戈台勒博士。但是因为盖世太保的首领卡尔顿布吕纳和缪勒都没有思想准备对两个这样显要的人物发出逮捕证，就只好向希姆莱本人提出申请。尽管向他紧急提醒过不止两次，希姆莱还是没有采取任何行动。直到8月上旬，当盖世太保已经处于7月20日事件所引起的骚乱当中时，那份申请书才被驳回，而上面批示的是：“申请逮捕证不准”——上面标的日期却是7月17日！

虽然盖世太保十分了解阴谋的底细以及阴谋分子准备采取的大致路线，然而他们在出事那天，却毫无准备。举例说，盖世太保总部里的武器仅仅有十一二支连发手枪。在下午两点左右一接到头一批报告，卡尔顿布吕纳就立刻飞往元首的总部，告诉缪勒发生了什么事情，并且命令他采取一切必要的预防措施。4点半时，一个盖世太保的高级官员请求缪勒准许他离开柏林，因为他希望去拿一下丢在别处的换洗衣服。一向对于自己的下属毫不体贴的缪勒这次却立即同意。而请假者不是别人，正是那负责管理阴谋分子个人档案的官员。对这样一个专门掌管情报将在以后几小时内有极重大作用的人，缪勒给了假，看来真是难以相信。况且缪勒也是到7月20日很晚的时候才要求一队党卫军武装部队来加强盖世太保总部的警卫工作。

希姆莱和缪勒对于这件事的阴谋到底知道多少，他们真正的意图是什么，要对这些问题作权威性的回答，现在还为时尚早。可是有一件事情是相当肯定的，就是希姆莱曾得到兰格本的许诺，说在推翻希特勒以后他将成为国家元首，希姆莱决定等一下看看会发生什么事情，而缪勒则是紧跟他的上司的领导。一直到好几个小时以后，刺死希特勒的计划显然已告失败，整个阴谋破产了，希姆莱和缪勒才决定动用他们组织的全部力量投入反对阴谋分子的斗争。

如果有什么比这更虚伪、更可鄙的行为，那就是希姆莱在战争最后阶段的行为。如前所述，舒伦堡曾竭力规劝希姆莱，说他有责任和西方盟国媾和，为此他必须首先夺取德国内部的全部大权。根据舒伦堡的意见，为达此目的可不择手段。他从汉堡找到一个占星术士，命令他拿出一张星象图，给希姆莱打气，使他相信命中注定要成为元首和德国人民的大

救星。不仅如此，舒伦堡还把希姆莱的个人按摩师菲力克斯·克斯坦拉到自己一边来。克斯坦是个默默无闻的人，他是靠一个芬兰的医药学位的招牌进行工作的。他在句句言谈中都极其巧妙地把幻想和事实结合在一起。但他肯定是第一流的按摩师。希姆莱患过非常厉害的神经病，克斯坦为他解除了痛苦，结果是克斯坦对希姆莱的影响，胜过党卫军和警察首领影响的总和。希姆莱对他绝对信任，真是言听计从。

舒伦堡、沃尔夫和克斯坦同心协作不遗余力，逐渐使希姆莱相信自己真是命中注定要当希特勒的继承人，并且应该立即采取步骤取而代之。但是他在关键时刻一次又一次地停步不前。有几次，他坚定地声称他已经准备好采取决定性行动抢班夺权；然后他对于元首的年深日久的盲目信仰忽然又占了上风，就又犹豫不决、畏畏缩缩，最终激烈地摒弃舒伦堡的一切建议和恳求。有一次他说为了德国人民的缘故他要行动起来，可是紧接着又声称他决不能下手谋害他的老领导。舒伦堡反驳说，他们所要求的不是把希特勒处死，而只是让他交出政权退出历史舞台。但是这一切都无济于事，希姆莱仍然满心狐疑，坚持不肯。

在1945年4月间，希姆莱的动摇更变本加厉了。舒伦堡认为星相术士和按摩师还不够用，又争取几位医学专家来帮助他唆使希姆莱采取行动。舒伦堡说服了他的好朋友、著名的心理分析家德·克里尼斯教授告诉希姆莱说，希特勒正患帕金森氏病(即震颤麻痹症)。舒伦堡还设法使希特勒的一位前私人医师勃兰德教授同意这个诊断。与此同时，接替勃兰德工作的施腾普菲格大夫声明他也怀疑希特勒有精神病。施腾普菲格要求德·克里尼斯准备一些给希特勒服用的药，德·

克里尼斯同意，并在自己的诊疗所里按照处方配好药。但是这些药从来没有下令服用。

希特勒和希姆莱最后一次会面是在4月20日，那天希姆莱去拜访元首，祝贺元首的生日。同时，希姆莱同他学生时代的老朋友施腾普菲格有一次长谈。当时没有别人在场，他们俩谈些什么谁也不知道。但是舒伦堡宣称希姆莱试图说服其老朋友使用一种注射药来干掉希特勒，这个假设与后来的事件并不矛盾。4月23日那天，希姆莱又到柏林检阅他自己卫队的炮兵连。大家期待他到总理府去，但是他没有去，这件事情本身就极其意味深长。当时交通通信已经十分混乱，因此访问柏林确实是良机不可失，可以和元首会晤。的确，这已成为唯一令人满意的联系途径，并且这两个人之间的裂痕还没有发生。希姆莱对伯纳多特伯爵说的当时很多人都知道的一句话：认为希特勒至多还可活两三天时间。这话是在4月24日的夜间讲的。希姆莱根据什么说出这话的呢？希特勒的健康状态不能成为他这样说的理由，当时军事局势还没有那样危急，以致可以在如此短暂的时间里预料末日的来临。

舒伦堡认为希姆莱与施腾普菲格之间的谈话同希姆莱对伯纳多特的论断有某种联系，并且认为希姆莱得到了施腾普菲格的许诺在前面所说的那段时间内对希特勒进行那致命的注射。希姆莱会见了伯纳多特以后，立刻打了一次电话给柏林的施腾普菲格，谈话很久。当然这一切都只是根据环境情况的推断，并不是证据，但是它确实使认为希姆莱正在考虑用毒药来干掉希特勒的说法可信。为什么这种设想没有实现，现在永远不会弄清了，因为希特勒是自杀的，这已无可争议，而这场凄惨可卑的戏剧中的全体演员——希姆莱、德·克里尼斯、施腾普菲格——后来也全自杀了。

海德里希和他的敌手们

莱因哈德·海德里希的画像显示出他是一个残忍、英勇和头脑冷静的人。他的僚属并不全是同样的人，这些人中最可靠、最有才能的是党卫军瓦尔纳·贝斯特，海德里希同他完全不能维持哪怕是一种过得去的关系。因此，对于像海德里希这样的人来说，僚属也就是敌手。

贝斯特是一个理想主义者。据我了解，他是个很有声名和地位的律师和行政长官，文质彬彬，通情达理，态度温和。贝斯特在决定与作为纳粹国家工具的新特工组织合作的时候，并没有什么自私的目的，或者向上爬的野心。他了解海德里希是何许人，以及他的活动将导致怎样的结局。于是贝斯特在战争初期就和海德里希决裂了，尽管他明知道和海德里希决裂是危险的事情。贝斯特受到德国国防军的掩护，他被任命为驻巴黎的军事行政总部的长官。

海德里希对于他这倒了戈的僚属心怀不共戴天的仇恨。他的巴黎特工人员密切注视着贝斯特的一举一动，贝斯特无时不受到盖世太保杀人黑帮的威胁。海德里希决定什么时候下手，那肯定只是时间问题。海德里希心里怎样打算，没有人知道，但是可以肯定他的打击一定是致命的。海德里希在认为时机成熟之前，自己却被人谋杀了，这是贝斯特的幸

运。这件事救了贝斯特的命，贝斯特的遭遇使人深信：在海德里希的身旁，没有一个品格端正的人是可以平安无事的。

后来贝斯特被任命为德国驻丹麦的摄政长官。这个职位使他面临着某些问题，他处理这些问题的方法，以致后来他被指控为违反国际法。贝斯特上诉以后，丹麦法官给他减刑为五年徒刑。这个事实是对贝斯特的为人和他的品质的赞扬。

海德里希和盖世太保首领党卫军将军海因里希·缪勒的关系，性质就大不相同了。缪勒是从巴伐利亚警察局中低微的地位开始发迹的。海德里希发现他是个好同僚，随时准备同他合作进行任何一种邪恶的犯罪活动。缪勒建立了一套以不违反公共道德原则为基础来监督改善谍报的体系。他一向以苏联政治警察作为自己的典范，成功地建立起一个符合他的理想的组织。由于缪勒的活动，德国人民已被压垮了。缪勒不但在一有任何反对运动的迹象，就立即加以扼杀，而且他对纳粹党的党员也一直实行那样雷厉风行、咄咄逼人的控制，以致谁也不敢担保自己不受到盖世太保的密切监视。

缪勒野心勃勃要建立起一个卡片索引中心，每一个活着的德国人都要有一张个人卡片，当然，对于任何“可疑的情节”，不论是多么细小，都要有详尽的记载。1939年以前，缪勒不是一个纳粹，后来他虽然正式入党，也从来没有成为一个纳粹。他判断人的原则不是纳粹党判断人所依据的原则。在缪勒看来，决定的因素是个人是否无保留无条件地服从国家，或者这个人是不是表现出任何独立思考或行动的倾向。缪勒只承认一条法则，就是国家万能的法则。他的狭隘的警察头脑认为这就足够了。只要一个人被怀疑即使在精神上对国家有所抗拒，缪勒也把他看作敌人。那些对缪勒十分了解

的人说，就是国社主义里面所包含的严格的国家纪律吸引了缪勒信仰这种主义，至于意识形态的概念对缪勒来说是毫无意义的。正如他在1933年以前一直为巴伐利亚人民党服务和1945年以前一直为国社党服务一样，他完全准备作为一条忠实的警犬为任何雇用他的政权服务。

缪勒的同事们中有些人断言他在1944年已经同苏联有接触，还说在德国崩溃以后，缪勒成功地投奔了苏联人。这决不是凭空想象的说法。盖世太保有一个特别的部门，它的工作就是使用已被捕获的苏联谍报人员的无线电机发报，仿佛那些原来的发报者仍然照常进行工作。盖世太保时常用这种方法把谬误的情报传递给苏联最高司令部，他们使得苏联人做出后果严重的错误决策。这个部门的名字是“无线电游戏部”，这是一个相当大的部，到1944年时，它的组成人员已有300名左右。缪勒在德国最终崩溃之前使用了这么多的秘密线路之一来和苏联人进行接触，乃至供给他们真实的情报，都决不是不可能的。

无论如何，有一件事已得以明确证实，就是原德国盖世太保的某些官员已经在东欧的舞台上出场，据说，他们已经在苏联由缪勒对他们加以“重新教育”。诚然，缪勒作为一个忠实的下属，一向热中于迫害共产党的人，并且对于真诚相信苏联能统一世界的千千万万共产党员死于集中营，缪勒应该负直接责任。但是如众所周知，布尔什维克对他们可能有用的人们，至少暂时是不会斤斤计较的，他们肯定能够大大地利用缪勒。缪勒不但担任德国国家秘密警察首领多年，而且随着德国几乎统治了整个欧洲，而扩大自己的警察组织，因此他有最宝贵的东西可以卖给苏联人，那就是他的广博的知识。缪勒是以他的神奇的记忆力闻名的。他能够随时凭记忆说出

甚至处在海外一个小镇里某一个不重要的特工人员的姓名。肯定没有哪个警察专家对各种人物的情况像他那样渊博，也没有人对政治事件像他那样熟悉，尤其对今天还很重要的事件的详情细节会像他那样瞭如指掌。

尽管如此，到现在为止我们还没有确凿证据证实缪勒曾为苏联人工作。不过人们知道在希特勒死后，缪勒就和他的知心朋友舒尔兹一同离开了总理府，从此不见踪影。而舒尔兹正是由缪勒委派主持“无线电游戏部”的。

缪勒是一个没有什么微妙可言、易于描绘的人物，但是帝国安全总部第五局局长党卫军将军阿图尔·奈比就不然了。奈比的个性非常复杂。他参加了7月20日的阴谋，这给人一种错误的印象，好像他是被迫接受希姆莱和海德里希的领导，实际上他是国社党的一个敌人。这种看法并不完全确切。

奈比无疑是一个聪明人。他出身于一个普鲁士文官体系中的名门世家。但是他在政治上的先见只限于纯战术性的一面。毫无疑问，他因为认识到纳粹党是个有前途的党才加入的。可是对于这个党的寿命，在最初几年他没有预见。在1932年，普鲁士的官员们不允许参加国社党。那时正在普鲁士刑事警察部门工作的奈比就化名参加该党的一个孤立的地区组织。事实证明他的打算是对的。希特勒上台以后，警官中仅有几名是纳粹党员，而奈比是其中之一，因此他有资格立即得到一个很高的职位。

因为奈比和当时许多青云直上昙花一现的新人们不一样，他实在是个第一流的警官，所以重用他是完全应该的。他从来没有使自己置身于海德里希所采取的措施之外，恰恰相反，几乎没有一次比较重要的活动他没有参加，他竭力维护自己是海德里希的可靠助手之一的名声，并且力求名副其实。

对苏作战开始后，奈比统率一支所谓的行动小组即警察突击队进行战斗，因此，他应该对数以万计的人被枪杀负责。

奈比的野心和预见使他加入了国社党的队伍，同样由于这两个原因使他在各条战线的局面逐渐恶化时，在反对势力的阵营中寻求了一个可以安全撤退的位置。他是吉斯维乌斯博士的老朋友，我们已经在前面提及这位博士，奈比机警地猜到博士与地下的反对运动有联系。于是他就去找这位朋友，并通过吉斯维乌斯的介绍加入了反对组织。

奈比预计如果纳粹政权崩溃了，吉斯维乌斯将在警察组织中获得一个重要的位置。因此想使这位朋友注意到他，把他看作是一个有关刑事警察事务的专家。这样，他就不能脱离当时工作所在的机构，否则会使他对从事反对纳粹的阴谋分子的价值大为降低，因为他们急需在政府机构内担任重要职务的人。奈比无疑是足智多谋的人，他设法在长时间中扮演了双重角色，同时还避免了在任何方面暴露自己。从我听到的关于审讯那些阴谋分子的情况来看，我相信奈比传递给前参谋长贝克将军和前莱比锡市长卡尔·戈台勒博士及其他反对派领袖们的消息，都没有什么真正的重要性。如果秘密反对组织中有人陷入困境，奈比总是表示遗憾，并认为自己无能为力。卡纳里斯上将的僚属杜那尼博士，早在1943年春天被逮捕了，那时只要奈比说一句话，无疑就可以使杜那尼获释。所以在那场大冒险中奈比所下的赌注比较说来是微不足道的，如果后来他不是突然丧胆弃职逃走的话，大概他在7月20日的事件以后也许还会活下来。

当人们开始疑心柏林警察总监赫尔道夫伯爵在某些方面与阴谋有牵连时，卡尔顿布吕纳知道奈比是赫尔道夫的朋友，就叫他打电话给这位警察总监，要他随便找个借口来看

自己。奈比立刻匆忙地得出结论，认为卡尔顿布吕纳已经看穿自己的阴谋，他就仓皇地逃走了。事实上卡尔顿布吕纳对于奈比从来没有丝毫疑心。当时，卡尔顿布吕纳还以为这位第五局的局长是由于不愿意出卖朋友才逃走的，他还深深地责备自己，不该把这个亲信置于这样一种为难和挨骂的地位。他甚至还竭力要想同奈比进行接触，请他回来并且向他道歉。直到很久以后卡尔顿布吕纳才相信奈比的逃走完全不是由于友谊和忠诚的感情所驱使。

如果有人写出奈比如何逃走，这个故事可以成为一部绝妙的惊险电影。数以千计原先在他手下的警察都在搜寻他们的前任首长，但是他却设法一次又一次地从他们的指缝中溜掉。并且，由于奈比对警察方法十分熟悉，如果不是一个女人出卖了他，他可能还要经过较长时间才能落网。

我们一定不能把奈比和7月阴谋的其他成员一律看待。奈比只是个投机分子，只要一切情况顺利，他对于海德里希种种罪恶方法是毫不在乎的，但是当局势看来不妙之际，他就采取对自己危险最小的方式倒戈了。

在海德里希部下的各部门的领导人中，最年轻的，无疑是负责国外政治特工机关的第六局局长党卫军将军华特·舒伦堡。党卫军将军约斯特原先担任当时并不十分重要的第六局局长，他在执行自己相当困难的任务时，表现热情有余，才能较差。舒伦堡接任约斯特职位时，才刚过30岁。他在政治舞台上活动了4年。在这4年中他升到德国特工局的首领，并且成了纳粹党徒中最引人注目的人物之一。

只有才干卓越的人，才能胜任舒伦堡的工作，这种职位要求他在战时担负无尽无休的非常繁重的任务。原先人们只

把舒伦堡看成是海德里希手下的一个人员，与中央安全部门的大多数领导人没有什么差别。可是他敢于在即使面对海德里希的反对时也坚持自己的意见，他的这种独立的态度必然要引起与海德里希的斗争，在这种斗争中舒伦堡自然要吃亏，海德里希很明确，很威风地让人们知道，他手下这个年轻局长的态度已经在他的眼中不受欢迎。

海德里希的早死对舒伦堡来说是一件幸运事。这使他解除了一种严重的威胁，也给了他一个机会：巩固自己牢不可破的地位。这个地位大都是他在希姆莱亲自负责中央安全部门的几个月中奠定的。然后他把自己和这位党卫军首领的关系大大加强，以至于到后来他可以利用希姆莱推进自己计划。到卡尔顿布吕纳接过总部领导工作时，舒伦堡的地位已经如此巩固，在内部的激烈斗争中，不付出代价是不能搞掉他的。

从1943年以后，舒伦堡就为德国的失败是一个必然的结局，他感觉到只有与西方国家单独媾和才能使德国免于完全毁灭。但是他的地位没有力量足以使他对政治事件的进程发生任何决定性的影响。因此，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他就着手把德国特工组织的一切部门合并成为他控制下的单一组织。1944年初，一直由卡纳里斯海军上将领导的军事谍报局终于改由国家安全总部统辖，这时在一场苦斗以后舒伦堡终于达到了自己的目的。

与此同时，他感到有必要去获得第三帝国的某位领导人的支持，而他就选了希姆莱，对希姆莱施加了强烈的个人影响。但是把希姆莱看成是一个执行媾和的党的领袖——因此也就是希特勒的一个敌手，显然是一个极其不幸抉择。这就是舒伦堡事业中的悲剧。舒伦堡竭尽全力使希姆莱变成达

到他的政治目标的工具。有时看来他就要成功了，但是在最后的时刻希姆莱总是犹豫不决，又回过头去唱他的关于“最后胜利”的老调子。由于希姆莱的政治摇摆的弱点，舒伦堡的全部计划都破产了。舒伦堡最后想通过伯纳多特伯爵作中介人与西方单独媾和，这是在最后关头孤注一掷的努力，结果还是遭到了无可挽回的失败。如果舒伦堡选另外一个领导人物，例如戈林——据说舒伦堡是和他有交情的——他会不会获得较大的成功，这诚然是一个问题。德国想同西方媾和的企图已为时太晚，那是盟军已经宣布坚决要求德国无条件投降以后的事情。

舒伦堡希望通过谈判获得和平的愿望是绝对真诚的，在他作为政治谍报部门的领导人没有直接职责关系的许多事件中，他的态度和行动都可以证明这一点。1943年夏末，当他一听到德国考虑要侵入瑞士时，他马上进行干预。他竭力说服德国政府，认为无论从军事、政治还是经济角度来看，这样做都是个严重的错误。与此同时，他又把正在发生的事情通知他在瑞士的对等人物：瑞士联邦特工局局长马森上校。我们有一些证据，说明卡纳里斯海军上将的军事谍报局也在执行这种类似的政策。舒伦堡采取这种行动的目的在于促使瑞士人采取预防措施，这样他就可以利用这一事实来作为反对希特勒进攻计划的理由。舒伦堡的行动帮助说服了希特勒，使他相信应该放弃这种计划。

1944年，瑞士的中立再度受到德国的威胁。一名试飞一种新式飞机的德国飞行员驾机逃到瑞士，他本人在瑞士被囚禁起来，飞机被没收了。希特勒害怕这架飞机的秘密会经过瑞士泄露给西方各国，便下令采取行动立即把这架飞机毁掉。这项任务交给了以解救墨索里尼而著称的奥托·斯科尔

兹内；直到一切准备就绪，斯科尔兹内只等希特勒的手令就要出发的时候，舒伦堡才听到了这个计划。他再一次进行干预，并且自告奋勇要不用武力就可以圆满解决，因此取得了暂缓此举的许诺。后来在瑞士同行协助之下，舒伦堡安排好由瑞士人自己在杜班道夫机场把那架飞机当场破坏，并且答应给瑞士十架新式麦塞施密特战斗机作为补偿。那真是千钧一发，只是几个小时的问题，苏黎世的人民差一点有机会看到那类似从大萨索旅馆中救出墨索里尼那样的奇袭场面。

恩斯特·卡尔顿布吕纳是海德里希的一个亲密伙伴，在1938年德国入侵奥地利之前他原是被监禁的奥地利党卫军的首领。海德里希被暗杀了，由卡尔顿布吕纳继任了他的职务。

在海德里希于1942年6月24日被刺死以后，希姆莱就下决心无论如何也不能任命海德里希那样可能对自己有危险的人物来接替海德里希的工作。于是这个美差便给了一个完全局外的人物：维也纳党卫军和警察首领恩斯特·卡尔顿布吕纳博士。由于卡尔顿布吕纳既没有专业警务工作的经验，又没有在第三帝国中获得高位的基本先决条件，他得到这个接任的机会谁也没有想到。

这位来自林茨的青年律师，只有一次引起人的注意，而那时完全是偶然的，当时是1936年，在比他资格高的一些人突然全部被捕以后，卡尔顿布吕纳就成了在奥地利已经是非法组织的党卫军的首领。由于这个职务，以后他就当然成为那所谓厄斯特马克区的党卫军和警察的首领——这是个不大重要的纯属助理的职位。由于海德里希的活动，那时他的职位已成为整个第三帝国最重要的职位之一。卡尔顿布吕纳被任命海德里希留下的这个职位，是完全出人意料的，尤

其是对那些幕后人物来说更是不可想象。

要想在这里对卡尔顿布吕纳做最后评定，既不可能也不恰当。可是盟国无疑过高地评价了他在德国所起的作用。

卡尔顿布吕纳以前没有任何警务工作的经验，所以他大半要依靠专业同僚们的帮助。盖世太保的首领缪勒和刑事调查处处长奈比在卡尔顿布吕纳手下几乎可以为所欲为。但是他们都很狡猾，一切重要决定都要得到他的批准，这样就好让他承担一切责任。卡尔顿布吕纳对于他领导下组织的琐细工作没有多少兴趣，他的兴趣主要在于有机会干预最重要的政治事件。他正确地认识到，控制国内外谍报组织这种权力使他有此机会。的确，他手上就掌握着这种生杀大权，但是他本人却没有充分地利用它。况且舒伦堡害怕卡尔顿布吕纳很可能设法赶走自己，便更加坚决地站到希姆莱一边，因此促使这两人之间的关系十分紧张。

在斯大林格勒战役惨败以后，卡尔顿布吕纳对德国已经不抱幻想。舒伦堡的报告和他自己部下送来的报告，以及谍报机构官员中他的朋友们直接提供的情报，加强了他的信念，那就是胜利已经不可能了，只有通过谈判与西方国家媾和才是唯一可寻求的正确途径。可是尽管人们竭力鼓励他朝这个方向去做，他仍然是个无所作为的失败者。

为什么卡尔顿布吕纳在局势已经无可挽回之前一直迟疑不决，不肯接受和平运动给他的有力支持呢？原因无疑在于对希特勒的个人忠诚。直到最终，希特勒的人格对于卡尔顿布吕纳来说，仍具有难以抗拒的魅力；他真诚地崇拜希特勒，他认为希特勒有一种超人的远见和想象。尽管卡尔顿布吕纳内心深处的信念悄悄对他说，必须不惜一切代价结束战争，必要时甚至不惜违背希特勒的意志，可是卡尔顿布吕纳既不

相信自己也不相信自己心底深处的判断，因此他继续动摇。只是到战争的最后阶段他才看清楚希特勒正在使德国处于不可避免彻底覆灭的境地，他才尽力谋取和平，但已为时太晚了。

在有历史意义的人物中，对德国军事谍报局局长卡纳里斯海军上将的评价，颇有分歧。卡纳里斯身材短小，沉默寡言，性情古怪。在国外，多数人认为他是国社党政权一切罪行背后邪恶的操纵者，他的朋友们则宣称他是反对希特勒运动的唯一精神领导人，反对国家社会主义的斗争事业的殉道者。另一方面，有些德国人却对这些判断都不同意，而只把他当作一个祖国的叛徒和对德国的失败应负大部责任的人物来谴责。

卡纳里斯家原是希腊人，曾在意大利北部定居过若干代，才搬到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年轻的卡纳里斯是德国巡洋舰“德累斯顿”号上的一名军官。“德累斯顿”号于1915年春天在肯伯兰海湾沉没以后，他和其他船员被智利当局监禁在胡安弗尔南德斯群岛上。卡纳里斯被监禁几个月以后，冒险越过安第斯山脉，逃到瓦尔帕莱索，化名里德·罗萨斯取得一张智利护照，搭上一艘荷兰船经过普利茅斯和鹿特丹回到了德国。

1916年夏天，他仍然使用他那张智利护照，潜越英国的封锁线到了西班牙。他在德国驻西班牙海军武官处工作，从西班牙基地组织对德国潜水艇的供应，观察和报告盟军船只行动（特别是出入直布罗陀海峡的船只），对德国海军最高司令部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当他准备回德国去负责指挥一艘潜艇时，他在途中的意大利多莫多索拉车站被捕。意大利人决定把他作为一名德国间谍交给法国人，但是当卡纳里斯把自己

德国军官的身份告诉了那个将他押送法国去的那艘船的船长时，那位船长就没有把他送往马赛，却把他送到卡塔赫纳。卡纳里斯在该地由一艘德国潜水艇送到德国领土上。后来他就被任命为一艘潜水艇的艇长，这艘潜水艇以卡塔罗为基地，在地中海进行活动。那时他在奥地利的海军中有很多亲密的朋友，他对奥地利人的心理也有深刻的了解。

卡纳里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有这些经历，看来正好是接管那新的德国军事谍报局的适当人选。军事谍报局是德国国防军在本世纪20年代后期开始建立的。它开始时规模很小，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才以德军总司令部军事谍报局的名称发展成庞大的组织，和英国军事情报局、法国的第二局同样闻名于全世界。

然而德国军事谍报局的组织和发展实际并不是卡纳里斯亲手进行的工作。他把这些工作大部分交给了他的部下，而他自己却转向他所谓的“谍报政治”，即使用他的组织所获得的情报作为一种政治武器，在这方面他完全是个老手。任何谍报工作都很难把自己和政治完全截然分开，因为谍报活动本身既是一种手段又是一种目的，而卡纳里斯从来也没有产生这样一种分离的念头。他认识到知识不单是指军事的秘密，而且指政治的秘密，特别是有关敌人秘密的知识，是可以导致取得政治权力的基因，他决心利用这些知识作为一种手段，来悄然影响第三帝国的政治和军事政策。

也许因为军事谍报局的局长对本职工作中纯组织方面的工作缺乏兴趣，军事谍报局逐渐变成一个过分庞大、头重脚轻的机构，尤其它的行政部门，庞大得与这个组织的目标和谍报范围完全不相称。特别是那些附设在各军区的军事谍报局的辅助单位，在人力物力方面都庞大得和它们所作的贡献不相

称，因此军事谍报局变成了一个人浮于事、官僚充斥的庞大机构。各军区司令部经常对这种既不经济、工作效率又低，表示强烈抗议，但是它们的抗议大都毫无结果。其实完全用不着这么臃肿的组织也能取得同样的好成绩，但是如果从整体来说，认为军事谍报局毫无效率也是不对的。这位海军上将之下的最高级的助手，特别是他的三个最重要部门的首长皮肯勃洛克将军、拉豪森将军和本迪维尼将军，都毫无例外地是第一流的专家。

卡纳里斯本人是个性格复杂的人。当我们评论他的时候，即使只评断他的作为军事谍报局局长这一方面，我们也必须记住：他就是属于把自己的天性表现在政治活动上的爱国者的类型。他希望德国在希特勒领导下重新获得大国地位，同时对于自己的高位和自己对这种有世界重要性的政治发展所作的贡献也感到自豪。但是他对于国社党的体制，又怀有明确而坚决的敌意。这两种矛盾的观点决定了他整个的行为，也是他的行动中充满许多矛盾的原因。这些矛盾使得他的敌人和朋友都同样认为他不可靠。

卡纳里斯与其说是由于纯粹理性的关系，对国家社会主义非常抵触，也许不如说是基于美学和伦理的观点，他的天性极端敏感，其程度简直和他们所选择的军官生涯不能相容，以致使他对武力和任何表现武力的行为都感到恐怖。他的这种憎恶如此强烈，以致他厌烦那种德国国防军的理想的军人典型：那种勇敢、英俊和效率极高的军官和士兵。他一看到军事勋章就感到愤慨，任何一个佩戴骑士十字勋章去见他的军官，可以完全预料到：他的建议肯定被卡纳里斯否决了。后来卡纳里斯虽然在值班时还遵循着一切军人外表的仪式，但他对于制服和任何军事装饰却感到十分厌恶，他爱好

的是便服和为人谦逊。

他这种在审美方面的反感，被同情他的人们认为是对德国过分重视军事事物的抗议。这种逆反心理使卡纳里斯时常偏爱那些持有“反军”态度的人们，并且有时因而引起一些麻烦。

他的内在的善良和随时准备帮助别人的好心是无可限量的。在德国一般人都知道受迫害的人永远可以在军事谍报局里面找到避难的场所，人们时常不正当地利用他这种特性。不但因为政治或种族的理由被纳粹当局迫害的人们争取并且获得了卡纳里斯的帮助，而且许多各种各样的坏人和骗子，只要一说是受到警察迫害，就立刻可以得到军事谍报局的保护，同时还能得到一些方便：如避免一些军事服役，或者获得某种有助于谋求个人私利的职位。

卡纳里斯不是一个深谋远虑的人，他高位重权，但有时刚愎自用，常常使他的僚属非常难办。尽管卡纳里斯经常把一大堆乱七八糟的材料推给他的僚属处理，然而他们却能使军事谍报局的工作收到极高的功效，由此可见他的僚属是多么精明强干。一个特工机关往往吸收一批品德有亏和那些不大安份守法的人，加以这位海军上将带有喜人奉承御下骄纵的弱点，使得在卡纳里斯的手下，许多彻头彻尾的坏家伙不但在军事谍报局里获得机要位置，并且能对局长发生相当大的影响。恶劣的贪污腐化、黑市和其他不法行为经常发现，但是这位海军上将拒绝进行必要的调查，反而竭力把它们掩盖起来。虽然他这样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避免声名狼藉，然而军事谍报局的许多对头，主要是在纳粹党、盖世太保、安全部门甚至在德国国防军里的对头，却找到大量耸人听闻的材料来证实他们指控的“卡纳里斯经营的独家店铺”。

其次，尽管卡纳里斯有很好的专业知识和资历，但他在军事谍报局里却不是人才而是个负担，特别是当他对组织工作缺乏兴趣放手不管，无论什么事，一经他插手就会乱成一锅粥。他的下属们越来越怕他的视察旅行，他在视察时，常把一切事情搞得天翻地覆，并且在他身后留下一塌糊涂的混乱局面。他手下的部门负责人深知他这种怪脾气，就总是派一个军官紧跟在他的背后，命令这个人不管海军上将可能发出什么训令或指示都要把混乱局面整顿好，恢复秩序。这样做并没有多大危险，因为卡纳里斯从来不想去调查一下人们是否遵照了他的训令和指示，只要他自己忙忙碌碌有事情干，就心满意足了。

卡纳里斯这种忙忙碌碌的强烈要求，后来发展成为一种偏好，他通过无穷无尽的旅行来发泄这种狂热。卡纳里斯不能忍受安静地坐着，他年纪越大，这种旅行热就更加强烈。他像一个着了魔的人似的匆匆忙忙地在德国统治的领土上跑来跑去，只要抓住一个借口，就从一个首都越过半个欧洲去到另一个首都。他对于自己家里的人毫不关心，虽然他的妻子和女儿们都热爱他。甚至像在圣诞节这样的假期中，他也常常远离开家，实际没有什么理由一定要作这次旅行。

他这种狂热地奔波劳碌是和他对于人际关系缺少兴趣这个特点相一致的。不管可能出现什么后果，不管是高贵人还是平凡人，他都有求必应，也不望这些人给以什么回报，可是却极爱他的狗。看管这位海军上将的猎獾犬是他的随从们最害怕的事。对这些狗的健康，卡纳里斯关切备至，它们在任何时候对于他来说都比要见的任何一个人更重要。他的这些心爱的宝贝中只要有一只稍有不妥，就能使他感到深为沮丧，并且严重地影响他的工作效率。他不管人在哪里，在德

国或者在国外，每天总要打电话去问那些狗的消息，他要求知道关于它们的“餐单”和身体状况的最详尽的细节。有一次当西班牙秘密警察首领把海军上将从丹吉尔打到柏林的电话偷录来收听的时候，他认为这是一生中碰到了最使他惊讶的事情。他原来希望搞到一些有兴趣的政治内幕情报，不料却听到一份关于一只生病的猎獾犬的身体情况的详细报告。这个电话中只有一小部分是谈公事的，而卡纳里斯在谈公事时说得那么巧妙含蓄，一个局外人是完全无法听懂的。

卡纳里斯同那些不爱动物的人自然就没有什么社交往来。如果卡纳里斯听说某些人说了看不起爱狗的人的话，即使他们是最得力的谍报员把最重要的情报搞来也不会得到海军上将的青睐。当他参加典礼或会议的时候，他也拒绝住在一个不欢迎狗的旅馆里。我们之所以提到他的这些古怪的毛病，是因为很有助于认识他这个奇人的个性。

与希特勒左右的暴徒们来往，一定会对卡纳里斯这种人的性格，引起一种切肤的憎恶。他并没有让自己原形毕露，并且能在纳粹最高阶层中这样长久地保持自己的地位，完全是亏了他虚有其表的本领和外交的才能。他绝对厌弃国家社会主义，并且在精神上准备千方百计搞垮希特勒。但是他憎恶一切暴力行动，他真诚的爱国心使他害怕在战时进行反希特勒的政变，将要对德国的战争事业不利。这两种考虑合在一起，就使他不屑去进行任何决定性的铲除纳粹政权的行动，直到最终依然迟疑不决。卡纳里斯决不是各种反希特勒阴谋的首脑，但是他曾经多少参与过这些阴谋，并且支持过他们，主要为的是把他们的成员们置于军事谍报局的保护伞之下。尽管如此，在政治天平上，他从来没有把他的身价、他的地位和他的权力全部放在搞阴谋活动这一边。

他的这种迟疑，这种缺乏最后的果断，使他受到7月20日事件的那些人最尖锐的指责，特别是克劳斯·申克·冯·斯陶芬堡伯爵一再激烈地宣称反希特勒的一切决定性行动被长期耽搁，主要应由这位海军上将负责，他说由于卡纳里斯长期摇摆和犹疑不决，削弱了一切反对希特勒的事业的劲头。冯·斯陶芬堡对卡纳里斯这样坦率的谴责，大家认为是两人思想极端不同的表现，两人的思想就像南北极一样悬殊。

虽然卡纳里斯没有把他本人无保留地交付7月20日的阴谋分子，可是他的确把他有力的副手的职位交给了他们。特别是他为这次阴谋中最热心的分子之一——汉斯·奥斯特少校在军事谍报局里找到一个位置。奥斯特后来得到少将军衔，成为他的副职。因为奥斯特对于谍报工作没有才能，对于特工局的活动也很少感兴趣（除了 he 可以从这些活动中获得政治资本以外），海军上将就在所谓的“中央办公厅”里设了一个位置，这从技术上说就把军事谍报局的整个机构交给了奥斯特。但是这两个人决不是反希特勒阴谋中的亲密战友。因为他们两个人在性格和看法上都大不相同，他们也许可以心神不安地并肩工作，但是永远不能成为推心置腹的朋友。卡纳里斯一向坚持主张用符合法制和道义的方法来和希特勒斗争，不主张以暴易暴。而奥斯特却不然，他想为达到目的可以不择任何手段，他准备不惜一切来干掉希特勒和他的朋友们。

如果将来有一天会对德国内部的反对运动写下一部有权威性的记录，它肯定会得出一个结论，就是奥斯特将军对于积极反希特勒的组织没有多大好处。他诚然是那种阴谋分子型的人，但缺少策略，而他仇恨的疯狂性和盲目性损坏了他

的判断力。虽然阴谋者们得到了很多真实的情报，他们却得到更多不真实的情况，被这些假情报引入歧途，作出错误的决定。奥斯特对于这一事实要负责任，在这方面他无疑对那次行动的失败起决定性的作用。即使他处在有权的地位，他也完全作不出任何建设性的行动，后来的事实已经千真万确地证明了这一点。

卡纳里斯本人对于希特勒和国家社会主义的仇恨也是同样的强烈。他深信希特勒每一次军事胜利都是德国人民的一场悲剧，因为从一开始起，他从未怀疑过德国最后一定要战败。所以每一次德国的新胜利都使他充满了最愤怒的沮丧，因为在他看来这更延长了战争和扩大了最终不可避免的灾祸的范围。当隆美尔元帅在北非取得辉煌胜利时，卡纳里斯听到这个消息恼怒得流泪，后来有人让他把这些事件当作孤立的事件看待，这些胜利本身就包含着最后失败的种子，他这才感到欣慰。

1939年3月希特勒到布拉格去的时候，卡纳里斯随他同去以便估计捷克斯洛伐克人的武装抵抗力量。捷克斯洛伐克人的消极态度使希特勒兵不血刃就胜利进入布拉格，卡纳里斯对此感到无限失望，并且坦率地把自己的想法对拉豪森将军讲了。卡纳里斯知道这次胜利只会促进希特勒在他那条毁灭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卡纳里斯海军上将随时准备犯叛逆的大罪，但他不准备出卖国家。^①在这方面他与奥斯特和吉斯维乌斯两个人都有冲突，因为他们认为“叛逆”和“出卖国家”之间没有多大差

^① 在卡纳里斯和许多其他军官心目中，“叛逆罪”和“出卖祖国”之间是有区别的。“叛逆罪”包括一切反对政权的阴谋和犯罪行为，包括阴谋杀害国家元首在内；“出卖祖国”的意思是把机密出卖给敌人，很多德国军官准备犯前一种罪，对后者连赞成的都很少有几个人。——原注。

异。不管怎样，卡纳里斯肯定不像许多人设想的那样，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叛国者。我认为他不大可能把军事情报泄露给德国的敌人。

尽管卡纳里斯的政治观点决不是没有人知道，他的组织又在纳粹政权的眼中那样名誉扫地，卡纳里斯却能保住自己的地位，延续到1944年2月才下台，这件事似乎使人惊讶。他那富有才华和讨人喜欢的智慧，对于那头脑单纯的德国最高司令部领袖，有强烈的个人影响。凯特尔元帅曾经多次庇护他，并且常常是明知不对仍然庇护。这无法说明他的不共戴天的敌人盖世太保和德国特工局虽然已有充分证据足以使他倒台却为什么没有下手。在盖世太保的档案处内关于卡纳里斯海军上将的国家机密文件有好多卷，因为军事谍报局里所发生的盖世太保认为不满意的一切事情，都记到海军上将的私人帐上。可是他们完全没有使用这种可以使他服罪的大量证据，而当卡纳里斯最后在1944年初被赶下台的时候，却用的是最薄弱也是最明显的借口：在土耳其有几个军事谍报局的人员叛逃到英国，于是卡纳里斯就被责怪领导无方，解除职务。

卡尔顿布吕纳在1943年被任命为保安警察的首领以后，就研究了卡纳里斯的档案，报告给希姆莱，满心相信有他刚才研究过的证据，一定会使得这位军事谍报局局长立即解职。使他大为惊讶的是，希姆莱宣称他早已深知这些档案的内容，然而他有充分理由不对卡纳里斯采取任何行动，并且告诉卡尔顿布吕纳今后也不可自作主张去采取任何行动！

卡尔顿布吕纳当然要自问这种反常的态度的原因何在，为什么党卫军司令、德国警察首领竟要庇护一个显然犯有阴谋反对现政权罪的人呢？经过多方考虑他得出这样一个结

论：卡纳里斯一定掌握了某种可以使希姆莱本人服罪的证据。直到很久以后，卡尔顿布吕纳才发现那被卡纳里斯抓住辫子的人不是希姆莱而是海德里希。

卡纳里斯虽然被解职了，然而无论在解职的时候或者在7月20日事件以后，尽管证据充足都没有对他采取任何法律行动。卡纳里斯在最后被捕时，表现得惊人的冷静和满不在乎，仿佛他知道他决不会被送去审判似的。

当戈台勒博士被审问的时候，不知道受了毒刑还是因为人家搜出了他的笔记本，笔记本上附有名单和记录，否认已经无济于事，戈台勒博士严重地牵连了海军上将和阴谋中的许多其他成员。然而卡纳里斯还是没有在法庭上被控诉。他很可能希望活下去看到纳粹政权的末日。但是他忽略了一点，就是对于那些当权的人们来说，最为重要的事是：要永远封住可以证明他们罪行的一张嘴，要消灭一个掌握他们罪证可以向全世界控诉的人，要让深知他们的罪恶和奸邪的头脑坠入万劫不复的深渊。

卡纳里斯同许多其他被囚的人，在美国军队马上就要开到的时候，根据秘密命令在弗洛森堡集中营里一起被处决。他的一生中的许多秘密就同他的骨灰一道随风散失了。

第五章

苏联元帅被谋害的案件

海德里希不仅限于关心德国国内的事。当初他就把持他的特工机关力求插手国外政治事件。他最成功的一个阴谋就是对图哈切夫斯基事件关怀备至。

1937年6月11日，苏联塔斯社宣布：根据内务部人民委员的命令，8个红军高级将领（其中有前国防部副人民委员、苏联元帅图哈切夫斯基）被逮捕，并受军事法庭审判，这个消息轰动了全世界。审讯本身并没有特别令人震惊之处。苏联的法制是举世周知的。他们对正义的弄虚作假，对托洛茨基反对派1936年的荒唐的审讯，以及被告人不可置信的供词装模作样，至今许多人记忆犹新。

因此，当据说图哈切夫斯基和他的同谋者供认他们曾组织了一个地下反对运动，并且和一个苏联有敌意的国家的军事司令部有接触，同时提供了有关红军的情报时，并没有人感到奇怪。对被告人的定罪以及他们迅速被处决，也没有人感到意外。

以军事委员乌里奇为审判长，检查总长维辛斯基为检查官的审讯过程是秘密进行的。这个事实引起了很多议论。但关于导致图哈切夫斯基定罪的事实，一点也没有人知晓。也没有人相信后来所泄露的消息，德国国家安全总部门的头子

在这个案件中起了一个决定性的作用。

海德里希开始于1925年建立反对苏联特工机关。起初，他手头只用很少资金，从事这种活动，因此，只能做到从国外，特别是从在德国居留的苏联移民那里取得第二手材料。在德国的苏联流亡者和巴黎移民区之间有密切的联系，巴黎移民区和贝尔格莱德的移民区一起，是欧洲最重要的苏联移民群。这样，海德里希就能通过他的特工人员和巴黎的白俄中央委员会接触。在那里，他的代表和前白俄将军斯科布林取得了联系。斯科布林的妻子是著名的宫廷歌剧歌唱家娜杰日达·普列维茨卡娅。这对夫妇在巴黎流亡团体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在那儿他们被认为是不完全可信靠的。海德里希的特务发现斯科布林与莫斯科最高级集团保持有极好的关系。这本身就是令人惊讶的事，因为流亡集团特务组织从未成功地渗透到苏联统治集团的高级部门中去。在他和斯科布林后来的交往过程中，德国特务进一步发现这位前将军同时替两方面工作——既替苏联工作，又干反苏的事。

斯科布林的两面派行径，对海德里希来说就没有什么理由不利用他，而斯科布林也很乐意把德国的特工机关列入他的雇用者的名单中而获取高价报酬。从他那儿，海德里希在1936年末得悉图哈切夫斯基正在策划在红军的帮助下夺取军权并清洗掉斯大林和整个布尔什维克政权。这个情报是否确实仍然是疑问，因为把图哈切夫斯基的罪证提供给维辛斯基的格别乌^①头子叶若夫本人，他在很短时期内就被处决了。当时检举的证人，差不多没有什么人还活着，而要想使当时起重要作用的维辛斯基·伏罗希洛夫元帅或斯大林本人讲出真相，未免是徒劳了。不管怎样，这个问题对结局关系不大。

^① 格别乌(GPU)，1922至1934年间苏联国家政治保安局的简称。

唯一重要的疑问是：所提供的图哈切夫斯基密谋反对斯大林的证据，是否和他与一个外国有联系的叛国证据一样，同属伪造。

海德里希究竟是在什么时候开始想出导致图哈切夫斯基垮台的罪恶阴谋的，是不能确定的。但是这个主意大概是在1936年圣诞节前他和希特勒、希姆莱一次决定性的会谈之前就设想了。当时，他把图哈切夫斯基显然想夺权的意图首先告诉了他的同伙们。希特勒和海德里希可能都意识到这个分裂苏联国家的机会，会给予苏联一个决定性的致命打击。行动发展进程有两个可能性：德国可以支持图哈切夫斯基，这样可以帮助他消灭布尔什维克主义；也可能把图哈切夫斯基出卖给斯大林，这样就会削弱苏联的军事力量。看起来，每个可能同样可得到很好的收获。一方面，促使图哈切夫斯基垮台显然比支持他冒险推翻克里姆林宫当权者容易一些；但另一方面，德国参与消灭图哈切夫斯基从而削弱红军的力量，将会使德国和苏联军事力量一直共同合作的政策倒退。

苏德军事合作于1926年就加强了，当时德国“十万人军团”参谋长冯·西克特将军寻求并得到了苏联人的技术援助。冯·西克特^①的两位继承人希巨将军和冯·哈默司特恩·艾夸尔特将军在德国国会、国防部长的全力支持下，遵循了同样的政策。在这个军事合作的背后，并没有明确的政治概念。这些将军们要求的主要是军事技术援助，特别是要求根据条约德国国防军所不能得到的装甲车辆、飞机及其他武器的教练军官。而作为交换条件，他们准备把德国军官团的经验和军

^① 第一次大战后，德国国防军领导人之一，他与苏联合作，对抗法国和波兰的军事扩张政策，1926年辞职。

事指挥基本原则方面的知识提供给红军，苏联人很可能把这看作是将来建立政治友好关系的起点，但没有得到什么具体的结果。

当希特勒成为德国总理后，局面就立刻改变了。毫无疑问，他一开始就以为和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最终生死搏斗是不可避免的——这种政治观点，从长远看来，排除了两国军队的军事合作的可能性。令人难以理解的是：他为什么不抓住这个搞垮（或至少严重地削弱）“全世界敌人布尔什维克”的机会，主动（或以其他方式）支持当时图哈切夫斯基被认为正在准备发动的军事政变？提供任何实际援助，像前面所述的，尽管有很多困难，但无疑会加强他行动的决心。可以肯定的是海德里希的介入，使事情向另一方面发展。他认为普鲁士德国军官团仍存在着传统的日耳曼—俄罗斯结盟倾向，而他对于这一种倾向所带来的政治意义及可能存在的后果做了过高的估计，他把这整个事态发展看作是一个对德国的真正危险。

在公众面前破坏他们之间的关系最有成效的做法是，揭露他们两国军队领导人搞联合的实质是用来掩饰间谍活动和彼此出卖情报。这可以有两种办法进行，在德国或在苏联，把德国将军或者苏联将军当作被告，哪一个办法都可以，而海德里希对于诬控某些德国将军或其他人犯有“叛国罪”是无所顾忌的。

但是总的看来，他认为选择莫斯科这个地点和图哈切夫斯基这个牺牲品比较有利，苏联当时国内形势提供了优越的方便条件，而在德国进行则可能要困难得多。而且把这案件放在莫斯科搞并指控一个德国军队的同伙人，可能会间接打击德国军队的领导人，而对于海德里希来说，这无疑是一个

很理想的，尽管是次要的目标。

经过多次机密的商谈以后，他竭力说服了希姆莱，而更重要的是，说服了希特勒同意他的想法。在苏联的内部争吵中，德国应表示站在斯大林一边，图哈切夫斯基和他的同伙要作为叛国者揭发出来，顺便说一下，感到愤慨的红军就会失去它的一些最能干的军官。要做的只是把图哈切夫斯基和德军统帅部叛国勾结的证据交给斯大林。为了干得完美，关于他准备军事政变的证据可以稳妥地让斯科布林去发现（或伪造）。

整个行动是在极度保密情况下进行的（从1936年到1937年）。海德里希只向他的最接近的头头们作出具体布署，并且是为了需要让他们发挥作用，才把必要的最少的事情告诉他们。后来，科伦斯将军告诉我，他是如何安排具体细节的。除了希姆莱和海德里希本人外，科伦斯是唯一知道整个秘密战争如何进行的人。在他担任贝尔格莱德的德国党卫军和警察的头头时，我和他很熟。

开始时，海德里希企图将他的主要对手军事谍报局局长卡纳里斯海军上将拉进这件密谋计划里来。他要求卡纳里斯将他手头所有的关于军事合作方面德军统帅部和苏联人之间的往来的所有文件，特别是所有从图哈切夫斯基及其他苏联高级军官那里来的原件通通交出来。但是卡纳里斯深知海德里希的为人，马上怀疑到这里有什么肮脏的行为，因此就找了一些借口予以拒绝了。可是海德里希——或者说科伦斯——未经卡纳里斯帮助，还是获得了他们所需要的一切材料。他们是怎样搞到的，不大清楚。但我知道至少有一次科伦斯闯进了德军统帅部去盗窃档案。

科伦斯得到了所需要的材料以后，于1937年4月到盖世

太保司令部在柏林的一个隔离地下室去准备必要的伪造文件。为了伪造文件，他已建起一间配备有齐全的专门器械的实验室，并由他亲自负责这里的安全措施。这个实验室和这所房子其他部分完全隔绝，只许直接有关的雇用人员进去，并设置了专门挑选的警卫。同时海德里希招募了两名几个月前俘虏的苏联秘密警察特工人员，“邀请”他们帮忙。还有一个自愿参加柏林盖世太保工作的第三个苏联特务，也被雇用来帮助伪造文件。

关于第三个苏联人，科伦斯的看法和海德里希有很大的分歧。他甚至断言，正是这个苏联特工人员，而根本不是海德里希，提出了捏造图哈切夫斯基案件的主意，实际上海德里希是苏联秘密警察的不自觉的工具。

可以肯定的是，在阿尔伯列希特王子大街(德国街名)的这个盖世太保总部的地下室里，伪造了图哈切夫斯基及其同伙与德国高级将军们在大约12个月的时间里的来往信件。这些信件暗示图哈切夫斯基成功地从德国军队得到了他在发动反对斯大林的起义时支持的保证。这些文件很快地准备好了。5月初，希姆莱就把这宗档案材料交到希特勒的手里。卷宗里除了原始的信件外，还有各种文件，包括苏联将军们出的巨额现金收据，据说是从德国特务机关那儿收到的提供情报的报酬。

伪造的图哈切夫斯基和他的同谋者的信都很逼真，表示冯·西克特·亨默斯坦因、卡纳里斯以及其他几个将军看过这些信件，把在边上有签名的笔迹，完全精确地复制出来，德国将军们写给苏联人信件的副本也包括在卷宗后面。最后为了把卡纳里斯也拖进这个阴谋活动中，伪造他写给图哈切夫斯基将军的信，感谢他们提供了有关红军的情报。给图

哈切夫斯基和其他一两个将军的信，感谢他们提供的关于红军的情报。希特勒对准备这些材料的方式表示很赞赏，并同意把它们送交苏联特工当局。

原来设想把这些伪造文件通过捷克斯洛伐克总参谋部（据了解他们和苏联人有密切联系）传递出去。经过一个特工人员取得联络后，科伦斯用一个假名去捷克斯洛伐克安排必要的准备工作。可是捷克斯洛伐克人不肯透露把文件送到斯大林手里的渠道，所以看起来不能保证文件在途中不会落到图哈切夫斯基的某个朋友的手中。海德里希认为这太冒险，因而放弃了这个想法，并宁愿直接和苏联驻柏林大使馆打交道。他和一个盖世太保了解的实际是苏联特工人员的大使馆官员取得了联系，并相当公开地把这些情报交给他们，那个苏联人马上飞往莫斯科，并且很快就和一个苏联格别乌领导人叶若夫的特别代表一起回到柏林。这个特使声称，他经斯大林亲自授权来协商购买这些文件。

海德里希根本没有想到和苏联当局进行官方交易，更不用说他能把伪造的文件卖给对方；但是他很灵活地更改了他的策略，开价 300 万卢布。当天晚上，他把他的计划报告了希特勒，并得到希特勒批准去完成这笔交易。第二天科伦斯把这个卷宗交给了苏联的代表，作为交换条件，收到了一个装有 300 万卢布的包裹。

海德里希把这笔钞票做为特务活动经费交给特工机关的苏联处使用。恰巧有三个德国特工人员在苏联使用其中一些钞票时，马上被苏联秘密警察抓去了。显然苏联人或者付了假钞票，或者在钞票上以某种方式做了记号以便易于识别，因此就立刻不再把这些钞票发给特工人员。以后几年，海德里希对苏联人用伪造的钱币支付他做得很好的伪造品，一直感

到非常恼火。可以这么说，这件对他的才干说来是丢脸的事，差不多使他对这次的成功很不满意。

海德里希的机构运行得非常牢靠，图哈切夫斯基和他的共谋者立刻被逮捕了。对他们案件的审判于6月10日上午10时开始，当晚9点就全部结束。诉讼从伏罗希洛夫的一篇关于军事叛国问题的讲话开始，跟着对被告进行审讯。根据苏联的报道，在大量证据和他们给德军统帅部的亲笔信，被告被败诉了并供认他们的罪状。维辛斯基的总结只有20分钟。他要求把被告们从红军中清除出去，并处以极刑。几分钟之内就作出了死刑判决。被告们的军队领章和勋章马上被扯掉，在12小时之内就被处决了。行刑队由勃留歇尔元帅亲自指挥——据说这是斯大林的命令。勃留歇尔本人在几年以后也成了苏联法庭的牺牲品。实际上，除了两位元帅，伏罗希洛夫和布琼尼之外，所有当时审判图哈切夫斯基案件的法庭成员先后都丧了命。

海德里希每想到他伪造的玩意儿对判这位苏联元帅的罪起了决定性作用，就感到引为自豪。直到他死，他对自己所干的这件事的重要性，始终是深信不疑的。

可是科伦斯将军就不那么肯定。他开始同海德里希一样，冷酷无情，但当苏军在1945年日益逼近贝尔格莱德时他曾对我讲起他担心的事。他本人对所参与的这个伪造事件提心吊胆。在苏军打击下，德国所遭受的决定性的败绩，使他怀疑当初支持图哈切夫斯基推翻斯大林的试验是否会更好些。他在1944年曾断言，图哈切夫斯基的垮台只是在短时期内推迟了苏军的建设，布尔什维克政权的基础仍未动摇和受到威胁。斯大林的组织能力和洞察眼光很快地补偿了图哈切夫斯基事件所引起的苏联武装力量的微小挫折。他认为一个活着

的图哈切夫斯基对德国来说，会比十个弗拉索夫^①值钱得多。即使对所谓图哈切夫斯基“起义”的计划给予积极支持行不通（因为斯科布林已经出卖了他们），德国应该尽力救这个元帅的命，把他从苏联弄出来。

勃那德行动

德国特工机关不仅伪造文件，而且也造假币，并经营一个称为“勃纳德行动”的事业。

开始时，德国特工机关钱很少，由于普遍财政资金的短缺，财政部严格限制给它使用外币的数量，1939年第六局感到不得不设法以假钞来资助特工机关在国外的活动。当然，只有伪造可靠的和为全世界接受的货币才是值得的；这个行动就限于伪造美元和英镑。

这样做有好处也有弊端，最初卡尔顿布吕纳在安卡拉一件著名的“西塞罗”间谍案中这个间谍获得的报酬就是巨额英镑伪钞。当德国尚未同美国处于交战状态时，希特勒只批准伪造英镑钞票。虽然伪造过程中实际上没有发生很严重的问题，但制造出完全像真正在英国通用的一样，在技术上却有很大困难；最后制造出的伪钞还是好得能让全世界的银行作为真品而接受，只有英国国家银行才能觉察出这是伪造的。

一直到1943年，这些钞票才被大规模地使用。为了避免这样做必然会产生经济混乱，德国经济部长有效地阻止在德国地区大批散发这些伪钞，只限于在敌国领土上这样做。

一大批特务带着大量伪钞，被派往意大利，任务是把这

^① 弗拉索夫，红军将军，1941年被德军所俘，作为一支苏联战俘和逃兵组成的队伍的指挥官，替德国工作。1945年被盟军俘获，引渡给苏联，判处死刑。

些东西散发在马上可能被英美盟国军队占领的地区内。他们在反对德国的居民中，找到特别愿意买进的人，他们很渴望脱手不可靠的里拉来换进他们未来的解放者的钱币。德国人用刚换到的里拉，在黑市中买进金子和经过极仔细检验的真正钱币，在1943年至1944年德国特工机关以很少的代价获得一笔很大的资金。

负责在意大利活动的特务人员想出一个很妙的办法。德国人知道和美国人在用潜艇和空投供给意大利游击队大批轻武器——这些武器正是德国人自己急需用来对付当地的起义者的。很快他们发现游击队中不少人愿意出售这样弄到手的武器，但是拒绝接受里拉，主要是由于他们相信的里雅斯特及附近地区会落入南斯拉夫军队手中；但他们很乐于接受英镑。结果一个在战争史中空前未有的真正荒谬的交易建立起来了。在这项交易中，德国特工机关用伪造的英镑钞票从意大利游突队员那里买到英国和美国供给的好武器！这些交易实际还不是零打碎敲地干的。武器不限于小车装运；而是整火车皮地用这样方式成交，这些武器则又被德国特工机关用来同出售武器的游突队作战。

并不是所有的意大利游突队员热中于这种荒谬的交易，整个买卖常常是很危险的。从事这项活动的一个德国指挥官员总是随同他的卡车进入游击队占领区，有一次差一点送了命，他的驾驶员被打死，他自己装死才得以幸免。可是这没有阻止他在几星期以后还在这个地区做成一些很满意的交易。

战后，盟军审讯军官告诉我，制发伪钞的结果，使英国国家银行蒙受了巨大的亏损。显然，这说明了为什么战争结束后，英国所有的5镑及大于5镑的钞票全部收回，不再流通，而代之以新发行的钞票。

德国垮台时，这些钞票、机器和印版都毁掉了。一个运输车队，把这些器材从制造伪钞的埃本西集中营运往提罗尔时，被路上的交通拥挤堵塞，未能达到目的地。结果，卡车上装的东西马上被倒入特朗西湖中，但是，箱子在湖底很快裂开了，箱内的东西漂到水面上，湖面浮起成千上万的英镑钞票，犹如一个莲花池。

安放一颗炸弹

1939年11月8日，在希特勒离开慕尼黑的地下啤酒酒店以后不久，一颗炸弹在那里爆炸了。希特勒那次是到那里去参加纪念他在1923年第一次未遂政变的传统周年集会的。许多外国观察家都认为这是个伪造的阴谋，而从事件发生后在立即被任命的调查委员会内任职的一个高级警官所提供的证据来看，也倾向于支持这种看法，虽然确凿的证据也许永远不会公布出来。

当那个被认为是凶手的乔治·埃尔塞于1939年11月8日晚在德国瑞士边境被捕，并被移交给调查委员会的时候，委员会中有经验的专家们，谁也不相信这就是他们真正要找的人。

据说埃尔塞是以相当惊人、狡猾的决心和技巧，把那颗定时炸弹放在主席台后面的柱子里的。可是现在却要人们相信：这个被充分证明为深谋远虑，有决心和有机智的人，实际上竟会几乎竭力证明他自己和这个案件的同谋关系。他随身带着一张地下啤酒酒店的明信片和一些炸药雷管；在他大衣后面他还很笨拙地藏着一个红色战线斗争联盟（纳粹当权以前的一个战斗共产党组织）的证章。而他在溜过那个德国边境的小海关所时，他表现出那样明显的鬼鬼祟祟的样子简直

好像是故意引起别人注意似的。他握有可以从当地来往瑞士的正式通行证。他已经在前几天使用它，而他不过是回来确定一下，他的那颗炸弹的定时装置是否正常地运转着。做完这件事以后，他只消用正规地使用他的通行证离开德国就行了。那么，他有什么可能的理由要冒非法越境的危险呢？

只可能有一个解释——埃尔塞决心要不惜一切来保证自己被捕。但是如果他是那种为了要得到自己的事业的宣传效果而愿意在公开法庭内站起来承认自己行为的狂热主义者，那他完全可以方便地在炸弹爆发之后立即向警察自首。可是他没有这样做，却选择要上演一出企图逃亡的复杂的滑稽戏，而这逃亡企图的主要目的，则只能明显地被解释为故意要强使他自己在边境被捕。

说埃尔塞是一个有那样强烈的想扬名的变态心理的人，甚至不惜以自己生命作代价来获得这种声名。这样假设也许还有些说得过去。如果正是如此，他在边界所干的那种设法使自己被捕的行为就讲得通，而他身上所带的那些拙劣的物证就会迫使警察指控他犯了罪，而实际上他只是为了想获得名气才谋求承担那件罪行的责任。

刑事调查处的官员们马上在11月8日夜间开始着手调查，最初他们故意先不盘问埃尔塞，他们宁可遵循在他们看来有利得多的一条调查线索。但是忽然从柏林盖世太保领导人缪勒那里来了一个电报，命令委员会立即审问埃尔塞。那时埃尔塞还没有招供，而慕尼黑的刑事调查处的初步调查的那点微不足道的结果，是手头所有的唯一的材料。柏林的盖世太保领导人已经知道埃尔塞是凶手，这有可能吗？

此外还有其他可疑的迹象，暗示有些人正在幕后操纵这个场面，而埃尔塞则不过是一件偶然碰巧的舞台道具而

已。那个传统的每年一度的庆祝典礼希特勒总是要参加的。在这典礼举行之前，地下啤酒店通常要由警察警戒一个星期，但说也奇怪，1939年这一次根据慕尼黑州警察副总监（总监本人因在波兰值班，不在慕尼黑）的命令，这种警戒被压缩到只有11月7日到8日的一夜时间。而且那个原来一直被任命担任这一任务的官员，这一次被一个持有纳粹党金质徽章的刑事调查处的人员所代替。后来没有一个负责官员受到惩罚；那个把警戒时间压缩到一个晚上，从而使自己应承担严重失职责任的警察副总监，实际上，竟然被提升任命为德国中部警察总监；最后，党卫军警察和安全系统内有关高级领导人全都安然无事地没有受到惩罚。

所有这些，都与正常办法背道而驰。通常在这种性质的案件中，即使多少有一点关系的官员都需承担责任，特别是警察部门，任何失职都会立刻导致一系列从上到下的惩罚。可是，在这一案件里——根据官方报道，元首本人的生命只是以一发之差才被保住——却令人不可思议地谁也没有触动。另一方面，那位调查委员会的主席却被调往国外，后来以一种行为稍有不检而被控，本来只该受到一次申诉，这个人却被投进了集中营，在那里一直待到战争结束。

情形还不止这些。后来担任德国对外政治特工机关领导的党卫军少将舒伦堡与一工作小组同英国的谍报机关取得联系。他和他的同事们伪装仇视纳粹政权的德国军官的姿态，竟成功地和英国高级官员进行了接触，并使他们对这场据说是阴谋的事件发生了兴趣。舒伦堡的目标是渗入到尽可能高的英国政府阶层中去。希特勒曾正式同意这个意见，而舒伦堡则刚刚得到他的英国接头人的保证，说有一位高级英国官员马上就要到荷兰来和他会面。这件事希特勒也知道。可是，忽

然在11月8日午后不久——也就是在地下啤酒店那个炸弹爆炸之前几个小时——海德里希下令停止与英国谍报机关的秘密会谈，并把英国的联络官员逮捕，押过边境，解到德国。这就是那有名的11月9日文洛事件。在这次行动中，两名英国谍报人员史蒂文斯和贝斯特被捕。

那末，为什么海德里希一反过去大家所一致同意的做法突然下这道命令，过早地停止那个即将获得成功的抱有希望的行动呢？后来官方新闻公报中试图制造这样一个印象，说是史蒂文斯和贝斯特与地下啤酒店阴谋有牵连，并且雇用埃尔塞供给他炸药雷管等物资，以便替他们进行破坏活动。这里姑且假定这是实情吧，那么，海德里希怎么会在炸弹爆炸之前几小时，就下令去逮捕两个英国人呢？是他知道他们正在策划着阴谋吗？如果他知道，他为什么没有阻止那个炸弹爆炸呢？

如果承认这个假定：即那个安排这个全部事件的人就是海德里希自己，那么我们就可找到所有这些问题的满意答案了。这就可以说明：

1. 为什么慕尼黑州警察局改变了他们监视地下啤酒店的一贯作法？

2. 为什么没有一个警察官员因为玩忽职守而受到惩罚？

3. 为什么海德里希在事件发生之前就下令去捉拿史蒂文斯和贝斯特——这样，他就可通过他们把罪责推到幕后的英国当局身上了。

4. 为什么埃尔塞费尽心机才使自己被捕——因为他是按命令行事。

5. 为什么调查委员会接到缪勒的特令，叫他们把注意

力放在一个从刑事侦察角度来看几乎连同谋的怀疑都够不上的人身上。

6. 为什么那个被认为是凶手的人始终没有被审讯。

埃尔塞被放进一个集中营中，在那里他享受到通常只是像许士尼格和马丁·涅穆勒尔牧师那样显赫的人物才能得到的最惠优待。

一个企图暗杀德国最高元首，并且的确暗杀了元首的八个元老和最可靠的支持者的人，竟然在集中营里实现了自己的每一个愿望，甚至能得到一套无线电和一个工作台来搞他所感兴趣的木工作业，对此又能做什么别的解释呢？一直到1945年4月，埃尔塞才由一道给集中营司令的特别密令而被枪决。我们可以有把握地假定：放这一枪的目的，不在于那个行刺未遂的凶手埃尔塞，而在于那个知道得太多的埃尔塞。

但是也许有人会问：如果这确实是海德里希干的，那么为什么他要安排这样一个煞费苦心的阴谋呢？这有几个很充分的理由。

在11月5日晚间希姆莱和希特勒曾开过一次会，希特勒刚和陆军总司令冯·勃劳希契将军就进攻法国的日期问题进行了一场激烈的争论，那时他仍然在这场激辩的事后影响之下。勃劳希契坚决反对希特勒要在1939年秋就发动攻势的要求，并且拿出了许多有力的论据来证明德国武装部队还无力这样做。希特勒的反应非常强烈，并且不顾总司令的反对，下令在11月12日发动进攻。（几天以后希特勒撤消了这项命令，最终经一再推迟，把进攻日期定在1940年春天。）希特勒把这场争论告诉了德国党卫军首领，强烈地抱怨陆军最高指挥部的毫无准备状态以及没有能迅速实现他的计划。显然他主要关心是唯恐德国人民会对这位元首丧

失信心。勃劳希契断言在民众中没有什么人热中于战争，或者希望看到对西方国家发动进攻的迹象，希特勒的担心大概就是对于这些断言的反应。

希姆莱在和希特勒谈话之后，立即安排与海德里希商谈，这次商谈的明显目标是把希特勒所表示的看法讲给他听。使希特勒对德国人民的士气和他们对他的领导保持信赖感到放心。如果是这样，策划这类性质的阴谋，再巧妙地利用随之而来的宣传就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达到这个目的。人们将得到这种印象：希特勒九死一生，如果不是由于神灵的干预，他一定会被炸死，而这件事肯定地预示他是由上帝选定，来担任他所受命的崇高职务。把西方盟国，特别是英国，谴责为这种卑鄙罪行的唆使者，这样，就可以激起公众对他们的仇恨与愤慨——这是发动任何大规模军事行动必要的先兆。总之，支持希特勒秋季计划所必需的热诚，就可以用这个方法来号召了。不仅如此，还可以把荷兰也牵连进去，因为舒伦堡与英国的谈判证明了荷兰参谋部正在和德国的敌人勾结，勾结的程度已到了和一个中立国家的身份很不相称的地步了，之所以后来没有进行法庭审讯并在审讯中把这一切端给德国人民，这大概是由于对法进攻推迟的缘故。对法进攻既然推迟，也就没有任何必要搞一场耸人听闻事件了，而到了1940年春天，德国的舆论已经完全变了。

上述的想法可以为制造这个事件提供足够的动机。至于希特勒是否知道海德里希的意图，则不能肯定。有利于这个假定的最意味深长的事实是希特勒突然和过早地离开地下啤酒酒店回到柏林，这救了他，使他免于成为阴谋的牺牲者之一。大家都知道希特勒一向对于这一个传统的典礼极其重视，那么他的离去就没有什么很站得住脚的理由了。在柏林11月

9日早晨10点钟要开一个军事会议是他的理由，而这个会议当然是可以推迟几个小时的！

但同样也有一些情况，可以支持希特勒并非事先就参与阴谋这个假定。这样一个计划，事先没有具体通知希姆莱，看来似乎是极不可能的。但是他无疑是相信这个阴谋是真的。希姆莱是坚持主张调查的推动者，他竭力要求找到那些在埃尔塞背后的人们。他一直在寻找新的能手——像维也纳盖世太保的头子——来帮助解决这个问题；在埃尔塞招供以后，希姆莱下令进行一次“进一步更有力的”审查，企图找出雇用埃尔塞的人是谁，并且他一般对这一案件都表示极大的个人关切。

总的说来，更可能的情况是：希特勒和希姆莱都不知道海德里希的意图，海德里希找到了一些至少仍然无人知道的理由，说服了希特勒及时地离开了地下啤酒店。

最难揭开的谜是海德里希和埃尔塞之间的关系，而这个问题将永远只能是个纯粹的猜测了。最可能解释的是一个深知这件事背景的慕尼黑州警察人员提供的说法。那个人认为埃尔塞既不清楚他被使用来扮演的角色，也不知道自己是在为海德里希火中取栗的一个工具。事实上，埃尔塞的全部企图都是他自己计划的，但是被一个盖世太保的成员发现了。这个人装作一个共产党反纳粹小组的领导，鼓励埃尔塞继续准备这样干，以便找到埃尔塞在替什么人工作。海德里希一定是从慕尼黑州警察的副总监和柏林盖世太保头子缪勒二人那里得知了埃尔塞的活动。他没有对埃尔塞采取任何行动，在找出一切可能弄清楚的事情真相以前暂不动手，这本来纯属警方的目的——并且为埃尔塞开路，撤了一切阻碍埃尔塞行动的障碍，如夜间巡逻等。当海德里希11月5日夜间听到

希特勒的计划和忧虑时，想必是他忽然想起埃尔塞的阴谋可以使他得到前面所提到过的好处。这可消除反对这样做的理由，即：海德里希在11月5日夜到11月8日之间的短短时间内，决不可能有时间亲身从柏林组织这样复杂的一个阴谋。现在，他就没有必要这样做了，因为埃尔塞把一个现成的阴谋送上门来，海德里希只利用这个阴谋来为自己的目的服务，设法使埃尔塞行事时不遇到障碍，并保证希特勒能及时离开地下室就行了。

这个阴谋必然多少会使得一些可信任的老党员丧命，这对海德里希是无关重要的，炸弹也许会过早爆炸，而把希特勒本人炸死这个可能，同样没有使海德里希太担心。不管希特勒的继承人将会是谁，他海德里希仍有把握保持自己那大权在握的警察头子的职位的。

这种说法大致说来是可信的。后来在集中营里对埃尔塞的特别优待也丝毫没有贬低这样说的真实性。埃尔塞终究不过是一盘大棋中的一个无意识的小卒，并且到头来连他自己也没有能排除在这个阴谋之外。

七

勃洛姆堡和弗立契的被解职

1937年11月5日希特勒在德国总理府内和三军总司令——弗立契将军、雷德尔海军元帅和德国元帅戈林——国防部长勃洛姆堡和外交部长牛赖特男爵举行了一次会议。希特勒的副官霍斯巴赫上校也参加了。他记录的一份抄件在战争结束时被美国军队缴获，后来在纽伦堡的国际军事法庭上被用来作为证据。记录中包括那一次重要会议的讨论细节。

希特勒在这个会议上第一次把他对德国本来的最隐秘的

想法透露给他的最接近的三军助手们，他谈到的要点是：战争是不可避免的，唯一不能作出回答的问题只是战争何时开始。会议的进展使希特勒大失所望，除了戈林一人，所有的三军首长都基本上反对他的看法和意图，即使戈林在发表意见时，也采取十分保留的态度。

会议以后不久，希特勒接见了德国党卫军头子希姆莱，把讨论的内容告诉了他。希特勒宣称已经得到了一个最终结论：就是有这样的军事和政治僚属，他永远也不能靠进行一场战争来达到他的把德国再次恢复到一个世界大国的地位的目的。希姆莱当然就立刻把这些话转告了海德里希。

这时海德里希所面临的局势在一切方面都和他在1934年夏初时的局势相同。那时，他靠替希特勒捏造了一个所谓突击队内的阴谋，给希特勒一个机会，除掉那些威胁着他的计划成功的老战友。现在，海德里希发现自己面临着一项十分相似的任务。必须撤掉勃洛姆堡和弗立契，但是决不能让人们知道他们被解职的真正理由，即他们赞成德国采取一种和平政策，根据这个，海德里希就开始以他那种一贯的有条不紊的技巧干起来。

海德里希排除那些难以对付的人最拿手的办法之一，总是把他们有些堕落行为的倾向在他们头上加上罪名，他认为这会是对付那位单身汉、沉默寡言的弗立契将军特别合适的方法。在他不停地搜集对付第三帝国领导人物使他们难堪的材料的过程中，海德里希不久以前，在柏林一个流氓集团交待的材料中发现，这个集团中的一个人在指证弗立契将军是他们的一个“顾客”。当时海德里希没有使用这个材料，可是现在他又把它翻了出来，并派人把那个告密者，名叫施密特的青年找来。

那是一个曾经因为性变态罪行和讹诈罪被判过十几次刑的青年恶棍。海德里希下令教这个恶棍如何以公诉人方面证人的身分来控告弗立契将军有败坏风化的恶习。那个青年声称,他和他的同伙在1934年就发现了这位将军的这一恶习,从此以后一直在讹诈他。

海德里希为了准备这一案件,使用了他的最亲信的僚属刑事调查处长梅辛格尔,人们知道梅辛格尔是一个为了达到自己目的什么卑鄙事情都干得出来的人。梅辛格尔把施密特“训练”成一个那样完美的检举人,于是海德里希就毫不迟疑地把这个青年人带到希特勒的面前。可是希特勒怎么可能允许把这样一个人带到自己面前来,这实在令人无法理解。

可是,梅辛格尔在对付那位将军本人时,却完全失败了。他的一切努力都归无效,甚至和施密特当面对质的时候,将军仍然是镇静自若。进一步的调查和多少次的反复盘问也没有能找到任何新东西,但是他们给了希特勒解职弗立契的借口。一个所谓因健康原故请求退职而被批准了。

那时,为了调查事实所组织的军事荣誉法庭的裁决尚未作出。原定在1938年3月10日进行由戈林担任庭长,主要审讯在开始后不久就中断了,因为组成这一法庭的德国国防军高级将领需要去执行与入侵奥地利有关的任务。直到3月17日和18日,这次审讯才告结束。那时,他们证实了这位将军毫无疑问完全清白。最终使那个证人施密特垮台的人就是戈林本人。虽然在开始时他相信这种控告有些根据。戈林尖锐地提问戳穿了梅辛格尔罩在他的证人身上的谎话的外衣,那个证人被迫招供他所说的全是一篇谎话。

对弗立契将军来说,对他的荣誉的澄清未免太晚了。他被任命指挥一个团,始终没有恢复原来的职位。他对这种丑

恶的诬陷进行了斗争，这件事极大地伤害了他的感情。战争爆发以后，他自告奋勇申请到前线去服役，在1939年9月12日他率领第十二炮兵团在华沙的普拉加郊区阵亡。无疑他是自愿追求这种军人英雄之死的结果。

德国国防部长勃洛姆堡元帅是无法以同性恋的罪状来“搞到手”的。这位60岁的军官长期以来和一名叫埃娜·格鲁恩的少妇私通，这个格鲁恩是海德里希的警犬所熟悉的人。因为海德里希在勃洛姆堡个人的事业中不能找出什么丢人的丑事，于是他就把他的注意力集中在这个元帅的年青情妇身上。他的调查小组成功地发掘出了一些材料，据说埃娜·格鲁恩的母亲曾是一个所谓按摩院的女主人，并曾多次作为妓院老鸨和拉皮条的人，和警察当局曾发生过瓜葛。

那时梅辛格尔说海德里希在1937年时对这些事全都清楚，他还说这证明希姆莱和海德里希是可以阻止元帅不走他正在考虑的那一步的——或者至少可以警告那种必然会导致的严重后果。那位元帅一直有意娶埃娜·格鲁恩，而当1938年1月12日他这样做时，希特勒和戈林都是证婚人。

希姆莱和海德里希就让这位元帅“掉进坑里去”了。希特勒和戈林这两人在全第三帝国中以最固守礼仪著称，这次他们所证婚的女人，不但是出身于一个下贱的，而且在军官团眼中看来是一个声名狼藉的家庭的时候，他们两人会觉得特别难堪。

这还不能使他们满足。在结婚以后不过两个星期——1938年1月21日——柏林警察总监赫尔多夫伯爵面前放着一个刑事记录案卷，这个记录说明勃洛姆堡的新娘多年来一直在警察局公共风化部门监视之下，并且常常和他们发生冲突；还说明德国五个大城市里都有关于她伤风败俗行为的档案

记载，另外还有许多别的事情。这种刑事记录怎么会跑到警察总监的案头上来的呢？根据至今为止所发表的所有记载，都说是纯属偶然。据说有一个柏林的侦探长听到了关于国防部长的年青夫人的风言风语，出于一时热忱，就去看了看有关公共风化的档案，结果就见到了这一份记录卷宗。

这种说法完全是不真实的。有人曾证明，几天以前见到梅辛格尔手头有一份上面登记有埃娜·格鲁恩名字的记录卷宗，他还曾在他的部门的一个官员的协助下另增加了几条项目。梅辛格尔插手此事，无疑是海德里希命令他做的。不能确定的是：档案内究竟是否有过埃娜·格鲁恩的真正记录案卷，还是海德里希干脆就伪造一份假档案塞进那里，就这两个可能性而论，后一个可能性较大。但是能证明的只是梅辛格尔在原有的案卷里添进了一些假项目。

埃娜的母亲记录卷宗，大概肯定是有，这个事实就使海德里希的工作容易多了；但是只有那个梅辛格尔的助手（据了解，这个人还活着）出来作证，才能获得海德里希参与阴谋的真正证据。（梅辛格尔后来在波兰按战犯罪处决。）

当关于国防部长妻子的档案材料放在希特勒面前时，希特勒来了一场令人震惊的大发雷霆。勃洛姆堡立即被解职。他的命运特别可悲，因为他是少数真正忠于希特勒和国社党事业的德国国防军的高级军官之一。自从1933年以来，他的最大愿望就是要促成国家社会主义革命精神与普鲁士和德国军人传统之间的融合无间，或者至少帮助希特勒达到这个目的。希特勒对冲锋队所采取的断然行动加强了他认为希特勒是完成这个任务的适当人选的信念。即使后来他开始看透希特勒的真正意图时，他仍然固守着要看到古老的军人传统和国家社会主义领导下的革命精神相结合的梦想。这个最大

愿望使得他的德国国防军中的袍泽们和他越来越疏远，他们中大多数人都抛弃了他，因为他们认为他在把德国国防军奉献给希特勒手中。

由于这些理由，海德里希的邪恶打击对他就越发沉重难忍，而他也从来没有能从他的被解职和伴之而来的不齿于社会的震动中恢复过来。他最愤激的是他为希特勒牺牲了一切，希特勒却辜负和抛弃了他。他深信当希特勒和戈林在他的婚礼作证婚人时，他们已经掌握了海德里希所提出的不利于他的证据，他还深信他们表面装傻地到场，是他们故意要扩大这件丑闻的恶劣的一举，并使他毫无可能逃过这场丑闻一关。

但是他从来没有后悔过的一件事是他和埃娜·格鲁恩的婚姻。他在纽伦堡监狱中去世前不久，格莱斯-霍尔斯特瑙将军对他说道：“元帅先生，你知道你为了一个女人而牺牲了德国国防军吗？”

我听到勃洛姆堡的回答。他简短地答道：“我没有办法。她是我一生真正热爱的人。”

粉碎捷克斯洛伐克

希特勒在一个国家的少数民族中间搞颠覆活动，捷克斯洛伐克的情况是值得特别注意的。苏台德山区地带居住有300万日耳曼血统的人，这些苏台德区日耳曼人，在希特勒侵入捷克斯洛伐克之时，起了重要作用。可是一开始苏台德区日耳曼人多数不是国社党人，而且身为体育教练的苏台德区领袖康拉德·汉莱因也不是国社党人。而且这个地区活动的两个右翼政党——即德意志民族主义党和德意志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之间存在着对立和分歧。

苏台德区的国社党没有取得与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在德国相对等的重要地位；在1933年初，它力求加强活动，并且仿照纳粹的组织改组自己的机构。但是捷克斯洛伐克政府立即进行干预，也没有遭到多大反对；按照德国突击队的形式组成的人民运动协会被解散了，其领袖被判了几年劳役徒刑。德国民族主义党和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唯恐捷克斯洛伐克政府采取类似的行动，它们就自动解散了。

1933年10月1日汉莱因呼吁建立一个各党派苏台德区德意志祖国阵线的声明，在报纸上发表了。这不是旧政党的掩护组织。发起人来自青年运动协会，其领袖汉莱因本想借助旧政党的支持，团结起苏台德区日耳曼人，在这企图失败以后，才

决定发出这个呼吁的。

呼吁的反应，震动极大。最初几个星期，新成立的祖国阵线吸引了大批拥护者纷纷加入，以致捷克斯洛伐克政府犹疑不决之后，迫不得已就认可新组织存在。不久以后它下令逮捕一批领袖。这种镇压手段只是提高了运动的威望，这样参加的新成员源源不断。原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的领袖弗朗克乘机利用苏台德区德意志祖国阵线的某些领导人被监禁而巩固他及其党羽的地位。

尽管如此，在这段时期弗朗克集团对汉莱因没有特殊影响。例如，他在1934年10月21日在莱巴的长篇大论政治演说中宣称，苏台德区德意志祖国阵线与民族主义党有根本的分歧，力求他的运动与德国纳粹的合作保留一定的限度，这一点使柏林方面大为恼火。在这以前，纳粹党的领袖们一向以极其同情的眼光看待苏台德区德意志祖国阵线的成长。此后，尤其是在希姆莱——罗森堡这一伙人中间，汉莱因竟至被他们用猜疑的眼先看待。当苏台德区祖国阵线的领袖有些反纳粹的发言，引起希特勒的关注时，希特勒本人也就对汉莱因说了许多不友好的话，从那时起，德国安全部就开始严密监视汉莱因。

在1935年5月26日的新议会选举中，苏台德区祖国阵线在苏台德区德意志人党的名义下参加竞选活动。在初次尝试中，这个党就获得苏台德区日耳曼人全部选票的2/3，而成为新议会中最占优势的一个党。紧接着一个步骤是苏台德区德意志人党提出一个苏台德区日耳曼人自治的提案，占大多数的捷克斯洛伐克人否决了这个提案。

那时候，汉莱因对德国国社工人党的态度，是极其保守的，这在前文我们已提到了；苏台德区日耳曼人的领袖们的

确在30年代初期没有设想把自己的国土并入德意志帝国的版图。甚至在最机密的会议上，他们对这样的可能性也没有讨论过，而绝大多数苏台德区日耳曼人也没有归向“帝国大家庭”的愿望。

海德里希的报告促进了希特勒对汉莱因的不信任，这个报告是根据从苏台德区得来的秘密情报。1936年5月汉莱因把许多前德国苏台德区国社工人党领袖开除出党，其中包括曾在苏台德区国社党内担任短期党劳工委员会主席的鲁道尔夫·加斯帕。

在特工局柏林总部的特别顾问的指导下，成立了一个单独监视汉莱因的情报处。这个处扩充得很快，对希特勒的政策和苏台德区问题大有影响。就是这个处的领导人促使希特勒对汉莱因和苏台德区问题的不信任，并且负责说服希特勒拒绝与捷克斯洛伐克人妥协的提议，认为这是对德国的一个威胁，至少在相当长期间可以使汉莱因和他的党在苏台德区的事态中获有强有力的发言权，而且大有可能使希特勒早已密谋的“最后解决”拖延下去。

苏台德区德意志人党企图影响世界舆论，把他们的望愿通知外国政府，并使他们了解形势的发展，希特勒对这种做法满心猜疑。苏台德区德意志人党特别期望引起英国关切，因为他们深知英国的政策旨在和平解决问题和稳定中欧。1935年，汉莱因被卡尔·库恩伯爵介绍给英国情报局一个遐迩闻名的人格雷厄姆·克里斯蒂上校。据说他当时是中欧司司长，并且是罗伯特·凡西塔特爵士的亲密同僚。

1935年和1937年10月间，汉莱因两次访问伦敦，第二次他曾和罗伯特·凡西塔特爵士、温斯顿·丘吉尔先生和其他政界人物晤谈过。主要由于汉莱因这次所造成的印象，使英

国政府要求得到苏台德区日耳曼人问题的直接报告，以便与布拉格政府送达伦敦的官方报告相比较。

苏台德区德意志人党所取得的成功，尤其是在英国取得的成功，引起柏林方面日益强烈的怒目相视。反对汉莱因的情报不只是从伦敦传到柏林来；有许多情报是在苏台德区德意志人党内部，党内的国社主义一部分人提供的；他们自从1937年初就一直不断加强自己与第三帝国的联系。从这方面来的一些情报，是有意想挑起柏林反对汉莱因的气氛。1937年年底，海德里希认为打击汉莱因的时机到了。在他给希特勒的备忘录中，他建议应该在苏台德区德意志人党内部采取内部造反的办法把汉莱因和他的死党赶下台，而应该由国家社会主义党和德国政府所能接受的其他人取而代之。

但是汉莱因一定已接到了蓄意采取这种措施的警告。他仍然感觉自己强大有力，足以抗衡德国对外政策明显昭著的愿望，于是他马上把持不同政见集团的许多成员开除出党，其中有鲁道尔夫·加斯帕（曾一度被开除出党，但又被允许重回党内）。同时他警告这个集团的其余人凡是有背叛官方党的路线的言行，将受到纪律处分。

然而德国之入侵奥地利，基本上扭转了整个局势。当“合并”顺利完成，而且没有受到西方国家的丝毫反对；他更加坚定地相信捷克斯洛伐克问题刻不容缓，可以进行彻底解决了。他计划的重点是把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并入德意志帝国版图。至于种族方面，把大约300万苏台德区日耳曼人归化到整个德国人中去，这对希特勒所关心的是次要的事。最使他热中的是两个省工业的巨大潜力和它们生死攸关的重要的战略地位。

不但对于捷克斯洛伐克人，而且对于苏台德区日耳曼人

来说，希特勒的这个决议，是一个转折点。汉莱因的政策总是希望在捷克斯洛伐克政体的机构内取得平等地位。他一直确信英国和德国施加压力会使捷克斯洛伐克政府让步，并相信苏台德区会获得充分的领土和文化的自治。正当胜利在望之际，现在他突然看到他的全盘工作和计划都被打乱了。他接受了希特勒的原则：苏台德区自治的解决办法，现在已经过时，必须全力以赴使苏台德区归属德意志帝国。由于这个决定，汉莱因的独立政策就此告终。

1938年3月29日在柏林举行了一次会议，参加会议的人有里宾特洛甫、国务次长冯·马肯森、冯·魏兹萨克男爵、德国驻布拉格大使恩斯特·艾森罗尔、其他外交官员、德国国外少数民族联络局局长党卫军洛伦兹上校、地理政治家霍斯霍弗教授，最后还有汉莱因、弗朗克和苏台德区德意志人党的其他领袖们。希特勒对汉莱因下达的训令对大家又重述了一遍。在会议上字斟句酌地运用了“训令”这个词。希特勒对苏台德区日耳曼人领导人发号施令，这还是第一次。

汉莱因同希特勒和里宾特洛甫会谈以后，根据希特勒的训令拟定了一个纲领，并且在1938年4月，汉莱因在卡尔斯巴德的一次演说中公布了纲领的细则。然而这篇演说仍不足以平息希特勒的党羽中他的敌人中的猜疑。海德里希在给希特勒的备忘录中说：只是在德国占领了奥地利以后和从希特勒接到非常明确的训令以后，汉莱因才真正归附纳粹德国；并说汉莱因在压力下而决不是出于信心，他才支持德国政策；而且说弗朗克，一个和汉莱因的观点和性格根本不同的人，在柏林会议上比汉莱因留下更好的印象。

1938年春天，捷克斯洛伐克的局势演变得空前紧张。那里看来没有和解的可能。农民联盟和德意志基督教社会人民

党，与苏台德区德意志人党合并一起，只有社会民主党从完全统一的阵线中消失了。捷克斯洛伐克境内的其他各少数民族也开始要求自治。

英国政府由它的消息灵通的情报局洞悉：苏台德区德意志人党和柏林方面对1938年夏天英国派往捷克的谈判代表伦西曼的态度截然不同，但是英国政府并不确知汉莱因将采取的路线。克里斯蒂上校因之被命令设法去摸清汉莱因的真正意图何在。汉莱因同意与他会面，但是他不得不把会晤推迟了好多次。1938年7月底，汉莱因在布雷斯劳参加一次大规模德国体育联欢节时，有机会得以跟他的新主子进行了一次无拘无束的长谈。

当汉莱因最后在8月初和克里斯蒂在苏黎世会晤的时候，汉莱因与希特勒谈话的结果，马上就一目了然。汉莱因的副手瓦尔特·勃兰德博士告诉我那次会上发生了什么事。他的温和态度不翼而飞了，他立刻宣称苏台德区德意志人党不能再等待了，捷克人必须马上让步，并说希特勒最后已忍耐不住，必要时将毫不犹豫地采取武力，以达到最后速战速决的目的。

克里斯蒂看来对这位新的汉莱因，感到非常震惊；他在给凡西塔特的报告中，宣称英国现已没有时间，或已来不及达成和平解决的局面。

张伯伦9月15日飞往贝希特斯加登，于是形势相继迅速发展了。就在同一天汉莱因对苏台德区日耳曼人发表的一篇演说中，提出了他的口号：“回到第三帝国去！”捷克政府的反应是立即宣布苏台德区德意志人党是非法的，并发出了逮捕汉莱因的通缉令。这些措施很快一转而成为命令苏台德区德意志人党停止一切活动，并且根据国家保卫法案对汉莱

因提起诉公。捷克军队下了动员令，号召各级后备军人入伍。

在张伯伦和希特勒的会谈有了结果以前，肯特以苏台德党的名义发出一个真诚的呼吁，要求人们保持冷静。但是在戈德斯贝格之后，苏台德区德意志人党的许多负责人不能不忧心忡忡，唯恐他们所遵循的政策仍会闯出一场大祸。而在另一方面，柏林当局却担心问题得到解决。以前汉莱因想使问题得到解决，这个企图不合希特勒的胃口，导致纳粹方面把汉莱因和他的支持者一个个地排挤掉。汉莱因后来被任命为不太重要的苏台德区地方长官，总算对他的功劳多少有些肯定；但是他的亲密的同僚都被轰下台，靠边站了，而其中有些人（包括勃兰德博士在内）都被关进集中营。另一方面，那位对希特勒奴颜卑膝、唯命是从，却反对汉莱因的赫尔曼·弗朗克，由于忠心效劳，受到奖赏，功利双收。他被内定提升担任要职；当捷克斯洛伐克政体最后遭到肢解时，赫尔曼·弗朗克被任命为政务部长，仅次于国家摄政，是捷克斯洛伐克全国最显要的人物。

许多当代的观察家认为慕尼黑协定，是自俾斯麦时代以来德国在外交上最大的胜利。希特勒并不这样看！无疑在1938年9月他已经决定，只有占领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全部领土，才能“解决”捷克问题，因此在他看来慕尼黑不过是一个妥协。1938年10月，世界普遍希望慕尼黑协定将保证未来若干年间的和平，而当希特勒宣布他现今对捷克斯洛伐克政体再没有什么要求的时候，他们认为希特勒许下了诺言。然而实际上，希特勒丝毫无意放弃他夺取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的真正目标。不容置疑，占领布拉格，相继建立一个独立的斯洛伐克，以及把喀尔巴阡—乌克兰割让给匈牙利等

等，都不是临时的刍议，而是许久深谋熟虑后的计划结果。

在慕尼黑协定以后，布拉格被迫允许给斯洛伐克人以自治权。新成立的斯洛伐克政体面临的第一个严重危机，就是匈牙利要求对辽阔的边界予以修正。

匈牙利要求有 100 万人口(包括一半斯洛伐克人口)居住的领土。提索在布拉迪斯拉发的政府宣布，准备把多瑙河上的格罗斯苏特岛割让给匈牙利，那里的 10 万居民中马雅尔人占大多数了，但是匈牙利人自然对这个远远不能满足的。于是谈判继续延宕下去。这一切都使德国陷于很为难的处境。柏林当局对斯洛伐克人的同情，远远超过对匈牙利人的同情。但是匈牙利人格外顽强，而且他们有经验的外交家轻易就说服了意大利和波兰支持他们的要求。

最后斯洛伐克自治政府总算熬过了这次危机，而国内的这种亲德情绪，并没有因为在维也纳所遭到的失意而大为沮丧。但是到 1939 年初，危机再一度尖锐化了。激进派领袖杜卡和当时的宣传部长山诺·马赫极力鼓吹斯洛伐克从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完全分离出来。

斯洛伐克自治政府最初对这个问题不表明官方的意见，但是让我们了解它切望与德国保持最密切的关系。因为布拉迪斯拉发政府在柏林设有外交代表，它就和德国特工局及维也纳的纳粹党总部建立了联系。

以杜卡和马赫为代表发起的斯洛伐克争取完全独立的运动，是希特勒谋划肢解捷克斯洛伐克的残余部分的一个最重要的布署。把斯洛伐克和捷克完全分立，新建立的政权要求德国保护，都可当作德国采取行动的正当理由，可以成为向布拉格进军的信号。因此斯洛伐克的独立，正是希特勒求之不

得的事。为了促使斯洛伐克见诸决定性的行动，希特勒自己采取了秘密的步骤。

因为保密和出其不意是希特勒取得成功的秘诀，所以他对外交部方面什么也不讲。他指示我们特工局人员、国务秘书凯普勒（他和外交部的联系，纯属名义关系，所以他可以守口如瓶）及其助手维森梅尔设计实现他的计划的周密细节。1939年1月底一些特工局人员受到希特勒接见，并且受命建立独立的斯洛伐克政权。在这次会议上，希特勒竭力强调他的指令要严守秘密，不得通报德国任何部、机关或国防军。

随后，2月初我们在布拉迪斯拉发附近和那些斯洛伐克领袖们开了一次会，他们将与德国特工局进行合作。我们这些特工人员发现这些斯洛伐克人极愿配合我们的计划行动。据透露，斯洛伐克政府的温和派，除了少数例外，放弃了反对斯洛伐克从捷克斯洛伐克政体中完全分离出来。他们这种决定性的政策转变，体现在提索总理和实际上他所有的部长拒绝参加3月8日在布拉格举行的一次会议。

捷克斯洛伐克政府除非准备舍弃国家残余部分的统一外，现在只有采取行动，别无其他途径。政府命令把提索和他大多数的僚属撤职，而任命议会议员约瑟夫·希瓦克为斯洛伐克的总理。在普雷斯堡^①和其他一两个城镇宣布了戒严令，因为一些战略据点都被捷克斯洛伐克军队占领了。赫林卡的警卫部队和喀尔巴阡德意志人党的本地志愿军被解除了武装，马赫和许多其他斯洛伐克领袖们也被逮捕了。

现在局势已极其复杂，而且在3月9日和13日之间，情势比以前更加复杂了。现在有两个斯洛伐克政府，每个政府

^① 即布拉迪斯拉发的德文名。

都自称是合法的政权。虽然绝大多数斯洛伐克主张独立的人都拥护提索，但他们并没有想尽方法支持他，而这种消极态度，对希特勒的计划是一大障碍。根据海德里希的提议，希特勒命令把几个党卫军突击战士非法地送往斯洛伐克，并且用一系列恐怖暴动在迟疑不决的斯洛伐克人中间煽风点火。布拉格政府所表现的强硬态度，不久就坚持不下去了，这使得局势进一步混乱。希特勒没有再继续发出指示。到现在为止，普遍都意会到不但斯洛伐克的命运，而且捷克斯洛伐克人民的整体团结都处在关键时刻。

德国人决定利用提索作为同伙。3月9日，提索引退到他的教区，他感觉在那里较安全，不致被逮捕。3月12至13日夜，我作为德国特工局两个人员之一，访问了提索，建议他应该与普雷斯堡的其他斯洛伐克领袖建立联系，并且在他的领导下成立一个新政府，并宣布在德国的保护下保持斯洛伐克独立自主。提索接受了这个提议。3月13日清晨，他与其他斯洛伐克领袖达成了协议，并且说准备宣布斯洛伐克独立。

与此同时捷克斯洛伐克总统哈查和他的外交部长契瓦尔科夫斯基请求希特勒在柏林接见他们。这就是说希特勒不能再把他们所希求的解决拖延太久了。时间急迫。在哈查和契瓦尔科夫斯基来到总统府听取他的决定以前，独立的斯洛伐克一定要成为一个既成的事实。假如并非如此，一连串事件的主要关键就失掉了。这是一个时间问题。3月13日早晨，提索接到希特勒邀请他去访问的请柬，于是他和杜尔坎斯基立即乘专机飞往柏林。在离去之前，他同意了其他斯洛伐克领袖们将采取的行动。在安排好提索会见希特勒的时间是傍晚7点钟的时候，布拉迪斯拉发的一个群众大会上，就宣布了

成立一个独立的政体。

一个古怪的事件接踵而至。3月8日已宣布禁止在斯洛伐克公开集会。布拉迪斯拉发警察当局根据命令决定驱散13日那次群众大会。因之，服服贴贴、心平气和的斯洛伐克人民就各奔东西了。直到最后一瞬间，斯洛伐克独立的庄严宣言无声无息。并没有发生流血的悲剧。德国党卫军的突击队员就在身边，但并没有要求他们采取行动。

根据提索的要求和哈查总统及其外交部长的批准，斯洛伐克议会在3月14日举行一次正式会议，在这次会上，斯洛伐克政体宣告独立了。提索被选为总统兼总理。

德国所以建立一个独立的斯洛伐克政体，是为了向布拉格进军找一个借口。一直到3月14日，哈查和契瓦尔科夫斯基才被希特勒接见，15日，他们缔结了一个条约，捷克人民也被置于德意志帝国的保护之下。德国军队顺利无阻地完成了对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的占领，在几个月之内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已不复存在了。

岌岌可危的南斯拉夫

南斯拉夫是从奥匈帝国的废墟上兴起的。它的三个小民族，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和斯洛文尼亚人，由一个塞尔维亚王室所统治，这个王室想把它们统一在一个健全的联邦之内。在两次大战之间，塞尔维亚人和克罗地亚人更是长期处于钩心斗角之中，这场斗争到1928年7月20日达到了登峰造极，那时一个塞尔维亚狂热分子在贝尔格莱德召开的一次南斯拉夫议会的议席上谋杀了克罗地亚农民党领袖斯杰潘·拉迪克。

亚历山大国王并没有想法使他国内好战的各族人民得到和解，而感觉到有必要采取紧急措施，才能挽救国家。于是在1929年1月6日，他废止了宪法，宣布王室独裁，从而为他自己签署了死刑状。克罗地亚的民族情绪马上激昂起来。一个比农民党要求高得多的激进派集团出现在政治舞台上。在拉迪克被暗杀后不久，一个克罗地亚律师和议会议员安梯·帕夫里克博士建立了乌斯塔斯（反抗之意）组织，目的在于创立一个单独的克罗地亚政体。帕夫里克是一个矮小粗壮、面孔严峻的革命家和民族主义者，他向来是南斯拉夫正统观念的反对者。早在1918年，他就反对把塞尔维亚人和克罗地亚人合并为一体；他是克罗地亚“鹰隼体

育会”的领导成员之一，这个组织象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的组织一样，是一个具有强烈的大斯拉夫主义倾向的民族主义组织。在奥匈帝国崩溃前夕，克罗地亚的“鹰隼体育会”成为南斯拉夫活动的一个掩护组织，后来这个组织从队伍内培植了大批民族主义的领袖。除了这个党外，帕夫里克还组织了克罗地亚民卫军，大部分是由学生组成的，后来在建立克罗地亚政体上自然起了重要的作用。

1929年，帕夫里克成功地回避了逮捕，逃往德国。他得到通知，他到那里不受欢迎，于1930年他继而到意大利去。意大利法西斯政府极其热诚地接待他，并且大力支持他，于是他不久就把大批逃亡而来的克罗地亚青年组成了几个训练营。在匈牙利也存在有类似的训练营。在旧奥匈帝国内，克罗地亚人一直享有很程度的自治，匈牙利摄政者霍尔蒂海军上将或许希望一个独立的克罗地亚会再度转向匈牙利，所以他对帕夫里克的雄心表示极为同情。

帕夫里克本人为了引起全世界对克罗地亚问题深切关注，他决定用破坏和恐怖主义的行动。在意大利的乌斯塔斯训练营有目的地训练出的小分队，对南斯拉夫铁路和其他政府设施进行了一系列有计划、有程序的破坏活动，这些行动引起很大的震惊。

为了进一步推进他的目标，帕夫里克还跟内马其顿革命组织(在巴尔干半岛曾建立的最强大的秘密会社)签订了一种协定。他原就已经和内马其顿革命组织的许多领袖们很友好，因为他以律师的身分，为曾经在斯科普里法庭内被起诉控告的内马其顿革命组织的成员进行过辩护，在巴尔干半岛，这样行动所建立起的友谊，在政治斗争中起了异常重大的作用。除此以外，还有其他许多形形色色的民族集团，在反对

国王独裁的斗争中，找到了共同的目标。我从范洽·米哈伊洛夫接到一份叙述导致马赛暗杀案件的报告，他本人是内马其顿革命组织的领袖，他今天还健在。是内马其顿革命组织的主要成员，他直言不讳，并且告诉了我，他们策划这次暗杀所担当的角色。

帕夫里克一切活动的关键，是一心想用暗杀的手段来搞掉塞尔维亚宗主权的代表亚历山大国王。他希望这样一种行动所引起的举世震惊，会马上把克罗地亚问题提到欧洲列强不能不关注的地步。最后决定趁国王赴法国进行国事访问之机，对他行刺。然而，他们没有得力的、技术高明有成功把握的刺客；于是帕夫里克向内马其顿革命组织请求提供几名专家，内马其顿革命组织原来不打算参与这次暗杀，但由于他们对帕夫里克的友谊之情，就慷慨接受了他的请求。

这个阴谋成功了。亚历山大国王和法国外交部长让·巴尔都于1934年10月9日在马赛被暗杀身死。如所预期，遍及世界的舆论和新闻界的反应，都集中在克罗地亚问题上。南斯拉夫的政治经济信誉在西欧陡然下降，经常有人提出这个问题，当前形式的南斯拉夫政体实际上究竟是否能维持下去。警察当局努力想搞个水落石出，但由于墨索里尼拒绝把帕夫里克移交给南斯拉夫而不了了之。在匈牙利和意大利的乌斯塔斯训练营不得不被解散了，而在意大利那些还没有平安逃脱的受训人员，则被拘禁在利帕里群岛上。但是乌斯塔斯的真正领袖们闻风而逃，定居在欧洲各地，继续宣传赞助建立独立的克罗地亚。

大批乌斯塔斯和其他克罗地亚民族主义集团的成员，现在被迫从克罗地亚本地迁往国外。原来就很残暴的警察镇压行动，现在更变本加厉了，很少人愿意留在国内受罪。这批

逃亡人中最著名的人，有奥地利帝国军队的上校后来在许多事件中担当主角的斯拉克·克伐特尔尼克，布达克博士和卢卡斯教授。在遍布欧洲的乌斯塔斯的领袖当中，最重要的领袖有：阿尔图柯维克博士、罗尔柯维克博士、伏朗契克博士和许多前奥地利军队中的前克罗地亚军官，他们都是自1918年就流亡在国外，其中有伯尔塞维克上校，他后来成为帕夫里克军政府的首脑。

亚历山大国王在逝世以前不久就决定修正他的独裁统治，并且根据宪法恢复被停止的一部分个人权利，由保罗亲王、斯坦克维奇博士和伯罗维奇博士所组成的摄政会议，就奉行这个政策。在1935年举行了一次大选。南斯拉夫的反对党派组成了一个选举集团，这个集团的议会秘书是拉迪克的继承人和前任秘书马塞克博士。马塞克理直气壮地认为自己是克罗地亚人民的代表，因为他的党，克罗地亚农民党一如既往是议会的最强大的克罗地亚集团。这个党已经扩大成为一个多边的、有权威的组织，它伸展到最偏僻的村庄，实际上包括克罗地亚人所占据的全部领土。其实没有什么反对党派。乌斯塔斯的观点肯定比农民党激进得多，但是他们在当时并不反对农民党，亲南斯拉夫的、解决克罗地亚问题的支持者，仅占极少数。

农民党和乌斯塔斯的实质区别，在于前者代表广大群众，而后者是一个搞阴谋恐怖活动的秘密组织，它自己认为是一支精锐的先锋队，所以显然应该被推举为民族运动的领导人。乌斯塔斯大部分是知识分子、学生和少数青年教士组成。然而大多数教士们都拥护农民党，不过很为谨慎。可是天主教会把它的重大影响，大力贯彻在赞成克罗地亚的自治上，这是毋庸置疑的。在少数几个农民党还没有深入的角落

里，甚至宣布自己信仰天主教这种活动，本身就是赞成克罗地亚民族运动的宣传，因为塞尔维亚压迫者是帕拉夫斯拉夫东正教教会的教徒。贝尔格莱德政府的警察对天主教会和克罗地亚的政治组织采取同样压制措施。

1938年和1939年的事件使这个国家面临转折点。奥地利和以后波希米亚及摩拉维亚并入大德意志帝国，使小协约国的针对德国复兴的战略设想全部破产。南斯拉夫的外界屏障已荡然无存，彻底改变政策已刻不容缓。这个工作是由斯托约迪诺维奇博士担当的，他从1935年以来一直是贝尔格莱德政府的首脑。他的敌人把他说成是奎斯林式人物^①，为了个人的利益，不惜把祖国出卖给德国人。这个很精明能干的政客十分洞悉欧洲的政局，因之他得出结论：在政治的赌注中，他的国家必须把钱押在德国的牌上。西欧国家对希特勒都俯首贴耳；这样看来证明他的看法是正确的。如果他看不出西欧国家继续屈服的软弱政策有一定的限度，这也一定不能责怪他。即使如此，他也没有断绝与他在伦敦和巴黎的朋友的关系；同时他仍然非常灵活地诚心诚意保持热情友好的关系。南斯拉夫的舆论大张旗鼓地拥护这种新政策，而当斯托约迪诺维奇最后被推翻时，这并不归究于他的外交政策，而是由于某些内政事务，和他关心不够所致。1938年12月的选举，是南斯拉夫反对党派的一次联合的胜利，这个反对党派自1935年以来就在马塞克的领导下结成了统一战线，但不包括塞尔维亚反对派集团。这样，农民党庆祝它的最大胜利。

斯托约迪诺维奇的继承人德拉吉沙·斯维特科维奇深知只有他能和克罗地亚人达成协议，国家才能安定团结，他自

^① 奎斯林(1887~1945)，挪威的政客、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私自勾结纳粹的挪奸。

己才能继续掌权。他和克罗地亚人进行谈判中的最重要的中间人之一，就是塞尔维亚政客米哈伊洛·康斯坦丁诺维奇。由于他和法国有关系——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曾当志愿军在法国参战——他确信最终会达成协议。在1939年8月26日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斯维特科维奇和马塞克在布莱德摄政王的夏季官邸中会晤，并且签订了所谓的“斯帕拉维姆”——这将成为两个民族取得和解的开端的一个平等条约。克罗地亚人给予一个“裁判共管区”——一个共同的行政地区——这个地区除了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某些地方和沿海地区外，授与克罗地亚人所要求的一切权利。在裁判共管区内，克罗地亚人享有一定限度的地方自治权，作为前提条件他们郑重地承认从属于共同的国家和王朝治理。

南斯拉夫与推行亲德政策有一个坚决而且危险的敌人，就是塞尔维亚军官团。早在1940年春天，参谋总长杜桑·西摩维奇将军就是以反对亲德政策的最强有力的塞尔维亚军官团的代言人身分，在政治舞台上出面。法国在叙利亚派魏刚率一个军进驻之后，西摩维奇意识到现在南斯拉夫机不可失，有土耳其的帮助，可以用钳形攻势进取保加利亚，并且迫使其按照南斯拉夫的意图，解决两国间争执的一切问题。同时，南斯拉夫应该向阿尔巴尼亚境内的意大利军队进军，并把阿尔巴尼亚完全置于南斯拉夫势力范围之内。西摩维奇把这些计划呈送给了摄政王；但他从这位有高等文化、爱好和平、毫无军人气质，而且稍嫌犹疑不决、谨小慎微的人物身上，没有取得任何成功。总算同意西摩维奇派军事观察团到土耳其的安卡拉和魏刚总部，并且批准南斯拉夫军队进行一次有限度的演习动员。

这种局部的成功，使西摩维奇付出很大代价。因为西摩

维奇作为一个阴谋家虽说很老练，但作为一个参谋官员，却显得平庸。这次演习动员，由于在各军事后备区缺乏训练有素的参谋官员，结果导致一场无法形容的混乱局面。这就给摄政王一个得意的借口，说西摩维奇无能而解除职务，但仍让他指挥萨拉热窝一个比较不太重要的军团。在事实上，这位将军从来没有就任。他请病假离职，并且立即与他的朋友米尔克维奇策划，终于导致1941年1月政变。

那时在贝尔格莱德发生的一些事件，今天被称为“冷战”。各大国外交代表都冷眼旁观，只有各国间谍机关在政治舞台的黑暗角落里处心积虑地参加明争暗斗。英国情报局、法国第二局，甚至意大利人，都比德国人更占上风。许多年来他们有一整套特工人员网，遍布南斯拉夫各地，而德国特工局，在1938年才开始组织，这时东南欧就成为德国政策活动的新地盘。一直到战争的最初几年，德国特工局没有什么锦囊妙计，足以顺利地对抗它的敌手。甚至有一个更大的障碍，就是特工局和外交部之间存在的分歧，尤其是里宾特洛甫和他的手下顾问之间矛盾重重。结果特工局有许多大有可为的计划，不能见诸实行，而内部之间互相角斗是司空见惯的。这种争斗实际的效果是把德国在南斯拉夫的全部活动一笔抹煞。

在这个节骨眼上，我们谈几句德国各领袖人物对南斯拉夫及其问题的态度，是适得其所的。在1938年，人们可以说，那时德国人关注东南欧，特别是对南斯拉夫极感兴趣。绝大多数的德国领袖们表明了亲塞尔维亚的态度。最主要的是戈林，他作为德国的代表，到贝尔格莱德去参加亚历山大国王的葬礼时，受到热烈的欢迎，从那时起他对塞尔维亚人怀着热烈的好感。关于塞尔维亚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对占绝

对优势的奥德军队进行的英勇战斗，他听人讲得很多，这使他非常赞佩。

德国总领事弗朗兹·诺豪森的见解，受到戈林的高度赞赏，诺豪森也抱着同样的看法。当1935年6月戈林访问南斯拉夫的时候，诺豪森安排了一系列盛大的招待会和向他致敬的隆重的阅兵仪式，这使戈林欢欣之至，并使诺豪森成为他的莫逆之交。虽然戈林经常被警告说，要留心诺豪森的恶劣品质，可是提名任命他当总领事的，终究还是戈林。即使特工局拿出诺豪森在索非亚以欺诈罪被判处5年徒刑的判决书的照片抄本，戈林并没有改变对他的态度。而当英国特工机关，把数以万计的判决书抄本在南斯拉夫遍处散发时，这件事只会使戈林支持他更加变本加厉，而且促使戈林把整个事件不予置理，并说成是“英国人的诬陷和捏造”。1944年当诺豪森因有多起控告他犯欺诈罪而被盖世太保逮捕时，戈林却仍支援他，强迫释放了他，而且竟说服希特勒，让授给他“战功骑士十字勋章”。那个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诺豪森归案的卡尔顿布吕纳，迫不得已只好让步。诺豪森在1946年被引渡给南斯拉夫，被判处20年苦役徒刑，这一个人据说现正居住在托普西德河畔的一个封建时代的别墅中。

在重新制定南斯拉夫外交政策的决定性年代中，德国驻贝尔格莱德最重要的代表，就是这个人。诺豪森在柏林的影响极大，与那官方外交代表维克多·冯·西伦公使相比，影响要大得多，大概因为冯·西伦是一个老牌外交家，在里宾特洛甫的眼里，对他估价不高。冯·西伦象诺豪森一样，也亲塞尔维亚。在1941年3月政变以前，德国和南斯拉夫关系的决定阶段中，他所执行的政策，常常并不称心，而且经常发觉他自己不能正确估计对南斯拉夫政务的关系。

在德国外交部内，对塞尔维亚方面的一个特别热心的支持者是新闻司长保罗·施密特博士。他并不是巴尔干问题的权威，但是他从贝尔格莱德的新闻记者丹尼洛·格里高里奇得悉了有关塞尔维亚的情报。格里高里奇在官方报纸《时代》上不遗余力地支持新的“亲柏林政策”。施密特纯属凑巧会见了，从那时起，格里高里奇就成了施密特在南斯拉夫政务上的顾问。施密特在格里高里奇的影响下，在德国报纸上发表了许多支持南斯拉夫的文章，他的主要目的是想唤起希特勒及其他领袖们对南斯拉夫，尤其是对塞尔维亚有同情心。施密特赞扬勇敢的塞尔维亚人民反对土耳其侵略者世代代的英勇斗争、尚武的塞尔维亚人的军功战绩和他们的豪侠的特性等等，他承认在德国人和塞尔维亚人之间看到一种道义关系，他把这种关系处理得恰到好处，相当成功。用这个方法，他大大加强了德国领袖们中间早已存在的塞尔维亚情感。希特勒本人三令五申，他认为与英勇善战的塞尔维亚人结为联盟，是一个特别值得赞扬的成果。

在另一方面，克罗地亚人在柏林没有真正有权有势的人物，来鼓吹他们的事业。只是在特工局才能找到几个高级官员，由于他们出身是奥地利人，倒了解一些南斯拉夫国内政务，比方说，远比施密特博士更深一层，因此他们鼓吹高度评价克罗地亚人是德国人的得力盟友。

然而德国的两手被牵制住了。南斯拉夫被公认是法西斯意大利的势力范围。不过，显而易见意大利在南斯拉夫所推行的政策，有损德国的利益，并且墨索里尼只是正在坐待良机，以对南斯拉夫施加更大的影响。德国特工局一向严密地监视意大利的真实企图：在帕夫里克及他领导下乌斯塔斯的国外逃亡组织的协助下，使意大利成为克罗地亚的宗主国。

从意大利的观点看来，对齐亚诺同马塞克和克罗地亚农民党间的关系是非常乐观的。他们之间的第一个中间人是某位彭贝尔斯伯爵，他实际上是贝尔格莱德特工局的一名谍报人员。齐亚诺是在摄政王所举行的一次射猎会上和他相遇的，齐亚诺怀着很大希望，这个人能够使意大利和克罗地亚农民党之间达成预期的合作关系。然而，马塞克从来没有让彭贝尔斯全权代表他个人。但是彭贝尔斯和齐亚诺之间的谈话，包括意大利准备对克罗地亚提供援助的细节，都详尽地报告给塞尔维亚参谋总部。德国特工局成功地窃听到塞尔维亚军事总司令部的通报也会了解这些情况。帕夫里克终究说服齐亚诺，彭贝尔斯玩弄两面派手法，而且是一个奸细，于是很快把他撤职了。墨索里尼得知在这个骗局中上当后，勃然大怒。在当时1939年，他本以为自己胜利在望，因为彭贝尔斯已经答应，如果克罗地亚人有把握得到意大利的援助，他们就可以纷纷起来，宣布成立独立国家，或由意大利亲王做国王，或与意大利共同拥戴一个王室。为了进一步推行他的计策，当然彭贝尔斯成功地从意大利弄到不少钱。

意大利和克罗地亚农民党之间的第二个中间人，也是一个同样可疑的人物。1939年3月，一个名叫卡奈鲁提的意大利血统的克罗地亚人，前去谒见齐亚诺，他声称是马塞克派来的官方代表。齐亚诺自觉没有理由怀疑卡奈鲁提的真实身分，尤其是因为这个人的一个兄弟在意大利的外交界任职。齐亚诺对德国人平素并不抱特殊好感，当这个人后来表明他的意见是反德国的，齐亚诺就进一步受到影响，而倾向赞助这个人。1939年5月26日，卡奈鲁提作为马塞克和克罗地亚农民党的全权代表同意大利代表齐亚诺，签订了一个正式的秘密条约，并由墨索里尼批准。这个条约在各方面恰好符合

意大利法西斯政府的野心，因为根据这个条约，这个新克罗地亚国家——确是还得藉革命暴力来建立——保证与意大利缔结最密切的协作。这两国将有共同的外交部和国防部，而这个条约也关系到两国之间共拥一君王的可能性。齐亚诺宣布准备以两千万第纳尔的款项来支援马塞克的独立运动，而且这笔捐助，至少有相当大一笔确实兑现了。实际有多少钱到了克罗地亚农民党手里，我们无从确知；我们也的确无法肯定马塞克曾否授与卡奈鲁提以全权代表，让他有权订立这种有深远影响的协定。马塞克从来没有承认那个议定书，而且拒绝批准它。因此，意大利第二次打算与克罗地亚农民党缔结一个有约束性的协定，也告失败了，而且还花费了一大笔钱。

显而易见，只是在这第二次失败之后，墨索里尼和齐亚诺才决定再次去和帕夫里克商洽。帕夫里克后来声称，在1940年初，齐亚诺召见他，要求他承担一些任务。他又说，他只有同意，没有选择的余地；因为他身为亡命徒，为了实用目的，已经自己投身于意大利的手中，而且任何其他大国也没有给予他以支持。齐亚诺答应他，他和他的反抗党所提出的要求，恰好与卡奈鲁提的议定书中所协议的事宜相吻合，即是一个完全亲意大利的外交和军事政策的施政方针；与意大利结成为紧密联系的王朝；最后就是克罗地亚把达尔马提亚沿海大片土地割让给意大利——这是最致命的、引起激烈争辩的条件。后来齐亚诺提议，让帕夫里克明确保证除了几个城镇外，把全部达尔马提亚沿海地带割让给意大利，而帕夫里克声称他只同意给意大利属于海军和陆军的某些临时基地和一些必要的内陆。这一争执对意大利和克罗地亚的关系、意大利和德国的关系，都造成了恶劣的影响，并且是许

多政治难题的根源。不过，帕夫里克总归以胜利者自居。他确是对意大利作了让步，不免有损他本国的切身利益，但是他反过来却会被选为克罗地亚将来的新政体的首脑，这个国家处于意大利的宗主权下，还是有一定程度的独立性。

同时，西摩维奇将军不遗余力地策划反对摄政王及其首相斯维特科维奇政权的阴谋。他已和当时美国特工机关的头目杜诺万上校建立了联系，无疑已经取得了他的支持和援助。

他们认为有必要把西摩维奇重新任命为一个重要的军事指挥官。后来在德国占领期间担任塞尔维亚政体首脑的奈迪奇将军，已经草拟并提供一个备忘录。在备忘录中，他指责南斯拉夫政府的政治态度是站不住脚的，摄政王因擅越职权，而立即被解除职务。新国防部长是帕塞克将军，他也是外交界的人物，他任命西摩维奇为空军司令。西摩维奇正在积极进行和加紧准备阴谋活动，他马上把许多主要的阴谋分子安排到空军的关键职位上，并且让更多阴谋分子到皇家护卫军里担任职务。这个护卫军在贝尔格莱德进行政变中是一支极重要的部队。西摩维奇的最亲密的同僚空军将军摩尔克维奇，得到指示要与英国空军武官搞好关系，并且设法将他拉过来，使他成为阴谋分子和英国分子之间的中间人。

在1940年底，当西摩维奇的准备工作还处在初步阶段，忽然发生了一个奇特事件。看来在那些决心要把摄政王赶下台、让小国王登位的军官们中间，对下一步该怎么办，意见并不一致。有好几次，西摩维奇在阴谋分子的机密圈子里强调说，他已经得到苏联人支持的保证，并且说他以后将运用他的影响，改善苏联与南斯拉夫的关系。他所以说这些话，大概目的在于使他的同谋者佩服他在背后有雄厚势力的朋友支持他，而且毫无疑问，甚至在早期阶段，他就与苏联代

表们建立了联系。然而，还有些军官集团，不赞成这种亲苏的态度，而且决定摆脱西摩维奇及其支持者们，他们自己打算进行阴谋计划。陆军军官不愿看到主要由空军参与的预谋政变，无疑是他们作出此决定的另外原因。

这个反苏集团获得了一个政党的支持，那个政党虽然没有追随者，然而在意大利和德国的眼光里，作为打掩护的幌子，却大为有用。这就是泽布尔党（它在已故的国王亚历山大的亲属和朋友德密特里·约迪克的领导下），这个党是一个法西斯和极权主义运动的右翼，可以指望得到柏林和罗马的青睐。自从1918年以来，约迪克就主张南斯拉夫必须推行对德国友好的外交政策，并且由于德国和意大利的军事胜利，这个运动得到相当大的推动力。在1944年底，他在伊斯特里亚一次车祸中殒命。这些人的反阴谋活动与西摩维奇的反阴谋活动有所区别，前者希望力求避免与德国分裂，但是同样也不愿看到南斯拉夫被拉进与纳粹的紧密联盟中，譬如卷入遵守三强公约之类。他们将以一个将军取代首相，强迫摄政王退位，把年轻的国王拥上王位。这两个阴谋集团的国内政策没有什么差别，而且都会形成一个塞尔维亚的军事独裁。

将近1940年底，反西摩维奇集团的秘使把他们的计划透露给德国特工局的谍报人员。他们说想使他们的活动成为德国在外交政策中的一项动议。这就是说德国要答应给他们一个空白支票。海德里希向希姆莱报告，后者只是犹疑不决，最后拒绝承诺一切。最先他看来这件事能够非正式地影响南斯拉夫的内政，从而可以及时消除南斯拉夫的反德国倾向。但希特勒认为巴尔干局势不太稳定，不能立即采取决定性的行动，这就增加了希姆莱的犹疑不决。根据希特勒的指

示，希姆莱和里宾特洛甫商谈，里宾特洛甫一口拒绝参与这样的勾当，这并不是因为他这样干涉南斯拉夫内政有违道义而感不安，而是因为他已经在探索两国与贝尔格莱德之间密切合作的可能性。施密特博士是极力促使他进行这种尝试的人，因为格里高里奇已经告诉他说，南斯拉夫加入三强公约的前景，大可乐观，所以里宾特洛甫认为那时进行任何政变，不但是多此一举，而且实际是有危险的。于是那些阴谋者放弃了想挫败西摩维奇的计划。

德国与贝尔格莱德的会谈，于1940年6月开始，虽说是正式的会谈，却仍是试探性和机密的。在这以前，斯维特科维奇似乎除经济方面外，无意对德国做任何让步。但是在法国崩溃的震天动地的影响下，南斯拉夫的舆论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从来没有一个外国像法国那样对南斯拉夫产生如此强烈的影响。法国是南拉夫的保护者和解放者，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依仗了它，塞尔维亚得以复活，南斯拉夫得以建立。法国被看成是独一无二的优秀榜样，法国的军队尤其是被南斯拉夫军事专家视为战无不胜的军队。在德国国防军闪击战打击下，无敌的法国军队竟然土崩瓦解了，贝尔格莱德以法国为后盾的日子，已一去不复返了。现在南斯拉夫政府认为与德国谋得谅解是刻不容缓，而且是不可避免的。双方的中间人是丹尼洛·格里高里奇。1940年6月，他立即和德国公使进行接触。他和德国公使间的谈话，日益公开和坦率，到1940年11月时，里宾特洛甫授权冯·西伦做非正式声明，如果南斯拉夫参加三强公约，德国就支持南斯拉夫对萨洛尼卡的要求。虽然声明很有分寸，但却对南斯拉夫政府有深刻的触动，因为占据萨洛尼卡一向是塞尔维亚人民梦寐以求的。斯维特科维奇马上接受这个提议，以授权格里高里奇继续商

谈，目的是尽快地安排一次正式会议。

格里高里奇对柏林的访问，恰好与莫洛托夫的访问巧合。正如众所周知，希特勒与这位苏联政治家的商谈，毫无成效，所以希特勒本人比以往更感到必须本着有利于德国的方式，以稳定巴尔干的局势。做到这个的先决条件，是与南斯拉夫达成谅解；如果可能时，必须把南斯拉夫争取过来，作为盟友。倘若德国要想腾出手来对付东方，首先必须把别处将发生磨擦的可能性消除。这就说明了：里宾特洛甫在1940年11月23日对格里高里奇表明批准冯·西伦对萨洛尼卡的诺言。那时，双方谈判进入了正式阶段。格里高里奇的谈判人地位，由斯维特科维奇及其外交部长辛卡—马克维奇取而代之，萨洛尼卡实际成了讨论的唯一题目。里宾特洛甫所索取的代价，是加入三强公条，而南斯拉夫则竭力想廉价取得多年希求的港口。他们极力想避免公开地倒向德国一边，但是有充分准备，接受三强公约会员国的各种义务，并且把这些义务编入秘密条约中。辛卡—马克维奇对于那种戏剧性的突然转变阵线特别神经紧张，因为德国的要求也不能看成是微不足道。于是他继续设法，力求再延宕下去。

最后看来好像已经寻求到妥协的办法。德国特工局把一个秘密备忘录呈交给希特勒，建议修订三强公约的条款，德国特工局认为这就会打消南斯拉夫的疑虑。修订的基本观念是三强公约中应该分为两组，其中一组有权保持本身中立。特工局把备忘录的内容通知了格里高里奇，希望他可以说服南斯拉夫政府向希特勒提议采取备忘录内所包含的解决办法。但斯维特科维奇和辛卡—马克维奇并没有理会这个拟议。同时，德国军队准备进攻希腊，已经进入了保加利亚国境，希特勒必定已预料到，这个行动对南斯拉夫的舆论会有

很大的反应。在这一点上，他估计得很正确，因为斯维特科维奇和辛卡—马克维奇一听到这个消息，就立刻把他们以前反对公开加入三强公约的各种理由完全撤回。

1941年3月维也纳公约刚刚准备正式签订之际，某些贝尔格莱德领导阶层当即对这个公约明目张胆地广泛表示反对。西摩维奇向摄政王和政府提出最蛮横无理的警告。他提醒保罗摄政王，1903年，一位对塞尔维亚军队极力采取敌对政策的塞尔维亚君主，怎样最后遭到了惊心动魄的下场。他所指的是塞尔维亚秘密会社“黑手”党，阴险地暗杀了亚历山大·奥布伦诺维奇国王和他的平民出身的妻子。塞尔维亚东正教大主教加弗里洛也插了一手。他靠一笔幕后交易才成功地当上大主教的宝座。在一次极疲疲塌塌的商谈后，斯托约迪诺维奇和梵蒂冈缔结了一项条约，因此引起东正教教士对他的疯狂仇恨。遍及全南斯拉夫都发生了来势汹汹的示威，议会内也遭到了巨大的困难，假若不是答应加弗里洛以行使大主教职权的身分与东正教广大教士对话，促使动乱停止的话，斯托约迪诺维奇大概会被驱逐下台的。无疑，他的确代表了反对公约的塞尔维亚教士中很大一部分人，由于教士们对人民有那样重大的影响，这件事是非常重要的。

自始至终西方盟国也极力鼓吹南斯拉夫不要加入三强公约。报纸、无线电和小册子在全国各地散布舆论，英国国王也放弃了传统的自尊自大做法，亲自拍电报给摄政王，敦促他以家族感情为重，恳请他不要采取预谋的步骤。

但是摄政王和斯维特科维奇对这些警告，置之不理，希特勒对贝尔格莱德的德国特工局所做的紧急报告，不予重视，于是那个公约于1941年3月25日在维也纳的贝尔维迪尔如期签订。这个公约的秘密条款，除了包括德国和意大利有关

萨洛尼卡的诺言外，还规定南斯拉夫可以不承担三强公约中的某些义务。公约条款规定军事物资和伤员，可以自由通过南斯拉夫，但德国军队不包括在内，而在经济方面，公约要求南斯拉夫要做某些让步，尤其是关于博尔的铜矿。

代表团于1941年3月27日从维也纳回国后，西摩维奇立刻动手了。他们经过周密的布置计划，几乎毫无阻挠地顺利执行了。参加政变阴谋人员马上掌握了国家机关各部门的重要职位，那些没有参加准备工作的许多显要人员，也立即加入胜利起义的队伍中。这次起义的一个决定因素，是在关系重大的一天，摄政王不在贝尔格莱德，在萨格勒布访问。根据西摩维奇的指示，当地军团司令要求摄政王马上回到贝尔格莱德。马塞克大概以为克罗地亚独立运动的时机已到，他自报奋勇要率领克罗地亚部队，向贝尔格莱德进军，镇压这次叛乱；但是摄政王忧心忡忡地再三考虑后，拒绝了这个提议，理由是他不希望发动一次内战，或者妨害塞尔维亚和克罗地亚两族的团结，这仍然是他最希求的目标。因此，摄政王允诺了西摩维奇的要求，返回贝尔格莱德，递上了辞呈。此后，他和他的家属获准引退到希腊去。

值得一提的是在前几天前首相斯托约迪维奇也遭到同样的命运。他的继任首相逮捕了他和他的妻子，并派人把他们押送到希腊边境。而他在希腊落入了英国人手中，在战争期间被监禁在非洲。（斯维特科维奇怎么能把他的亲德政策同德国新方针的支持者的处置协调起来，从来没有人解释清楚。）摄政会议其他两个留用人员也辞了职，那时西摩维奇才能接近年轻国王。到那时为止，据说国王所发表的宣言，大概是西摩维奇编造的，在摄政会议辞职以后，这位17岁的彼得国王，发现自己完全落到新执政党的手中，这个政党现在可以

不再冒任何危险宣布它与他的关系了。

西摩维奇已经选拔莫米希洛·宁希奇担任外交部长，宁希奇作为一个老职业外交家，立刻认识到新政权的最大危险是德国。于是他赶快向德国公使保证，南斯拉夫对德国的态度仍旧不改变，并且说尽管新政府准备承诺前政府参加三强公约的签订，它却希望德国就那些秘密条约给予更明确而更有权威的阐释。德国公使冯·西伦因了解柏林对于这种保证不会怎样重视，他就敦促新外交部长密切注视最近在贝格莱德举行的反德示威游行，特别是一群疯狂的暴徒捣毁德国旅行社的事件；他指出在这种情况下，要想让柏林相信南斯拉夫不打算改变它的外交政策，是相当困难的。

然而，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里，西摩维奇并没有把外交政策的行使权交到外交部手中，他承担起使三强公约中的第二个成员国意大利中立化的重任；他向意大利公使马米利建议罗马应该千方百计阻挠德国对南斯拉夫采取军事行动，同时他含蓄地暗示，诉诸武力行动的第一个牺牲者将是意大利本身，因为南斯拉夫在那种情况下无疑要抓住一切机会把意大利赶出阿尔巴尼亚。不过，这种处心积虑的作法，并没有得到成功。

西摩维奇和英国人的接触，完全是直言不讳的。西摩维奇以国家首脑的身分与英国公使罗纳德·坎贝尔爵士举行第一次正式会谈中，他完全公开宣布，赞成与英国密切合作；在其他条件中，他显然情愿在南斯拉夫领土上为英国人提供军事基地。另一方面，他与苏联的交往关系却极为棘手，直到今天还没有完全澄清。但是这些关系确是使人对苏联外交方法的暧昧可疑的程度，得到一个有趣的启示。在南斯拉夫政变以后，苏联代办列别杰夫马上通知西摩维奇将军，说

维辛斯基指示他向南斯拉夫提议订立一个联盟条约，这个条约的实质就是说，苏联把对南斯拉夫的任何攻击，视为对苏联本土的攻击。西摩维奇把这一次谈话和以后在莫斯科的商谈，以及他和罗纳德·坎贝尔爵士的谈话，都写下了摘要；后来德国军队进兵南斯拉夫时，这些摘要被南斯拉夫外交部发现，而被德国人没收了。这些文件是外交部一个官员主动交出的，这个人是约蒂克的党羽，因而是西摩维奇的政敌，为了这个缘故，他保存下来，未予销毁。

在这些事件不久以后，发生德国人入侵保加利亚，引起莫斯科极度焦虑不安，并且促使苏联人第一次通过塔斯社发出不赞同和警告的照会。这次入侵以前，南斯拉夫驻莫斯科大使米兰·加弗里洛维奇——一个多少有些左倾的政客——发觉他想努力使这两个斯拉夫族重新建立起传统关系，但没有得到苏联当局的多大响应和鼓励，苏联当局的确极力避免认真讨论这个问题。但是这时斯大林完全同意，而加弗里洛维奇却得到迥然不同的待遇；苏联外交部那样多的官员，鼓励他为自己的目标而奋斗，使他相信他的目标实现大有希望。恰在这时，在南斯拉夫也发动了一次由苏联人操纵的反对签订公约的地下宣传运动。但是这阵宣传的高潮，或者对加弗里洛维奇已树立起的拥戴，都不能挽救南斯拉夫政府，使它不遵循它已承诺的路线，因此，西摩诺维奇政变的成功所展示的可能性，就在苏联引起了非同小可的强烈反应。苏联政府指示苏联代办表示苏联愿意缔结联盟；西摩维奇立即派遣他的两个亲信同僚到莫斯科去，随后在4月5日夜里签订了友好条约。这个条约的确并没有完全兑现像列别杰夫曾经对西摩维奇所许下的诺言，但是条约至少批准了苏联必须十分重视维持南斯拉夫的独立、主权自主和领土完整，并且

保证一种优惠的中立政策。

当德国人进攻南斯拉夫的时候，不论在物质上或道义上苏联人毫未出力援助南斯拉夫人，这件事后来一定使南斯拉夫人迷惑不解和大失所望。在德国进袭成功以后，苏联报纸上就从来没有再提到一次这个苏联的新盟国。苏联—南斯拉夫条约在莫斯科签订时，不过是德国施图卡式飞机袭击贝尔格莱德前几小时的事。一星期以后，斯大林向全世界声明他不愿对他的小盟国有何帮助。贝尔格莱德的沦亡、南斯拉夫的分裂指日可待。

与铁托捉迷藏

我当时担任特工局第六处南方事务督察，在维也纳和萨格勒布的办公厅进行工作，我致力于支持马塞克的克罗地亚农民党，而不支持恐怖主义分子安提·帕夫里克。

阿尔弗雷德·罗森堡是纳粹党外交政策室主任。我设法让他支持我所推行的南斯拉夫路线。罗森堡回答说，里宾特洛甫走错了路，但是现在改变官方政策已经来不及了。这次谈话发生在1941年3月，恰好在西摩维奇将军政变之后。我回到了维也纳和萨格勒布，随着形势的发展，最后导致铁托与德国之间有了接触。

4月13日，斯大林出人意料地出现在莫斯科车站上欢送日本外相松冈洋右。斯大林好像要使他临别的日本客人有个深刻的印象，他走到德国副武官冯·克莱勃斯上校面前，拍着他的肩膀，说出了那句名言：“我们永远交个朋友吧，好不好？”

一个月后南斯拉夫大使加弗里洛维奇应召到苏联外交部去。维辛斯基通知他说，苏联认为他的出使任期已告一段落，因为南斯拉夫已经丧失了它的独立地位——请记住，不过就在几星期以前，克里姆林宫曾郑重承认和许诺维护的就是这同一种的独立。被打败的波兰人，1939年也受到苏联这

样的待遇，俨然同出一辙。

斯大林显然从来丝毫无意认真和南斯拉夫结成联盟。塞尔维亚军官的起义，他看来只是其中的一个插曲，对他颇为有利。贝尔格莱德的民族主义者们自己后来也相信苏联人用心叵测，而且为了本身利益不择手段，挑动南斯拉夫与德国为敌，终于导致战争。斯大林以一种典型的玩世不恭态度，把南斯拉夫代表始终拖在莫斯科，一直到他从柏林得到确实消息，德国即将开始进攻南斯拉夫为止。西摩维奇民族主义集团极为愤慨，他们认为在苏联人这方面是“卑鄙的背信弃义”和“无耻的出卖行径”。整个塞尔维亚人民也逐渐抱着这种看法。若认为在当时苏联人的态度所引起的震动，就是造成铁托元帅当前政策中反苏情绪的根源，也许那也不言过其实。

西摩维奇在他当时所处的环境中，必须和克罗地亚人达成协议。他极想以出奇制胜的战术达到这个目的，他宣布任命克罗地亚农民党领袖马塞克为副首相组成他的新政府。西摩维奇甚至没有首先问一下他是不是愿意在政府内就任这个职务。马塞克在那时并无意参与西摩维奇的内阁，他引以为慰的是把党的右翼领袖克苏蒂奇派到贝尔格莱德去，只不过是为了防止完全分崩离析。他指示克苏蒂奇将他的党的要求通知西摩维克——成立一个五人的新摄政会，其中包括一个塞尔维亚人，一个克罗地亚人，一个斯洛文尼亚人、一个东正教的教长和罗马天主教驻萨格勒布的大主教。新政府必须批准它加入塞尔维亚克罗地亚1939年的平等协定，并且正式宣布它参加三强公约。

如果西摩维奇要避免在克罗地亚遭到致命的反对，他必须不惜一切代价把克罗地亚人纳入自己的政府。他毫无异议

地接受了这些条件。他并无意遵守自己的诺言。他所希望的就是把克罗地亚领袖调到贝尔格莱德，暂时作为政府成员之一。马塞克一向认为他所提出的要求不会被接受，他提不出理由来拒绝贝尔格莱德政府的提议。柏林政府当时并没有向我暗示，如果马塞克不参加联合政府，他们反而支持他。

在这决定性的阶段，德国对南斯拉夫的政策，是极端不负责任的。希特勒完全专心致志于准备对苏联作战。他把处理南斯拉夫问题，几乎完全交给了外交部长。里宾特洛甫对于复杂的巴尔干问题毫无所知，因而他无法作出独立的判断。他所看到的贝尔格莱德的局势，正象他的南斯拉夫事务的特别顾问施密特博士所描述的。警告从四面八方纷纷传来，特别是从奥地利雪片般飞来。他置之不理。他心地狭隘，故步自封地坚持“原则”，否决了德国特工局所建议的关于南斯拉夫和三强公约的妥协。继三强公约一签订，他就认为事情已办得就绪了。南斯拉夫毫无保留地签订了公约这个事实，在里宾特洛甫看来，完全是他不妥协态度的明证。恰当西摩维奇在贝尔格莱德发出政变命令的时候，里宾特洛甫正在维也纳吹嘘他多么幸运地没有听信“那些妥协的奥地利人”的辩解。希特勒十分满意，认为他现在终于可以随心所欲地全力对付苏联了。

因此，他对南斯拉夫政变的反应，就格外变本加厉了。他大为震怒，主要是针对全塞尔维亚人，几星期以前，他还大肆赞美他们哩。他自己的外交部长也没有逃过他的盛怒。希特勒飞扬跋扈地宣称：他永远不愿意再见到里宾特洛甫。里宾特洛甫那时搞了个我们通常称之为“半夜探戈”行动。这是给里宾特洛甫起的外号，因为他有个习惯，挨了骂以后把自己关在他的黑暗的卧室里。他在那里接连待几天，任何人都

不接见。外交部特别高兴外交部副部长和部长助理乘机签署他们明知道里宾特洛甫会拒绝签字的文件。

外交部长犯的这个大错误提醒了希特勒：纳粹党内还有一个阿尔弗雷德·罗森堡领导的外交事务局。希特勒指示罗森堡，要与马塞克保持联系，但是没有给他签订任何具有约束性的协定的全权。马塞克发觉自己处于一种最不妙的情況中。西摩维奇剥夺了他拒绝参加政府的最后权利。追随他的群众，大多数是克罗地亚人民，认为退出南斯拉夫国家的好机会终于到来了。只有他很少几个同僚——其中有克罗地亚省长伊凡·苏巴希奇（后来成为伦敦流亡政府的一员）和他自己的秘书长克恩约维奇博士——都赞成与贝尔格莱德进行妥协。马塞克并不具有他的前任拉迪克的性格和决心。他犹疑不决，抱一线希望德国能直率地表示出自己的态度。

罗森堡已经到了萨格勒布，但是他不能和马塞克订立一个协定，或者给他任何保证。德国驻萨格勒布总领事卡尔·弗伦德竭力想从外交部搞出一个明确的宣言。但是他同样没有成功。我那时身为德国特工局的代表，经常与马塞克接触。但是我不能对他说德国对克罗地亚独立要求的态度是怎样的。马塞克对于这个最主要问题所能得到满意的答复，完全大失所望，便决定到贝尔格莱德去。虽然这一步使他深深受到中伤，但他并没有决心要去参加西摩维奇的政府。西摩维奇以最隆重礼仪接待马塞克，并且希望自己终于看到与克罗地亚人结成统一战线的目标，为期不远了。马塞克即使在贝尔格莱德，还拚命想和德国人进行接触，最终企图和柏林达成协议。但是德国公使和公使馆的其余人已经离开了贝尔格莱德。因为我是德国特工局的代表，他的呼吁只有向我提出了。由于我没有正式地位，我只好把他的请求转呈柏林去，

别无其他办法。

当里宾特洛甫得知自己的政敌罗森堡与马塞克 进 行 接 触，他的虚荣心迫使他不能再追随他的对手的后尘。于是他各处搜罗其他克罗地亚人物。他最后选中了安提·帕夫里克博士。一直到这时为止，德国对克罗地亚极端主义者不十分关切，他们和意大利人关系密切，这是人所共知的。现在墨索里尼和齐亚诺向他们的德国盟友建议，说帕夫里克博士是新克罗地亚的最杰出的领袖，他们这样做的目的是很明显的。如果德国选择了这个完全仰仗意大利的人物，那么因为德国干预南斯拉夫而造成意大利势力的削弱，就可得以补偿了。

里宾特洛甫热中于击败罗森堡，和热中于促使自己和墨索里尼的解决办法顺利进行，于是急忙派一个使者到萨格勒布去。他选的人物是维森梅尔博士，此人曾被任为同样的使命，派往奥地利，并鼓动斯洛伐克反对捷克人。维森梅尔并无意同马塞克及其仍然代表克罗地亚人民大多数的党进行接触。他径直去找帕夫里克驻克罗地亚的代表前奥匈帝国将军斯拉夫克·克伐特尔尼克。他发回来的报告是乐观的。维森梅尔深知什么会讨得他上司的欢心。他把乌斯塔斯描述成为与国社主义和法西斯主义息息相关，并热心追随罗马—柏林轴心领导的一个运动组织。这件事使希特勒十分满意。此外也让墨索里尼异常高兴。当柏林人人周知马塞克最后决定参加西摩维奇政府的时候，希特勒认为这件事到底证明了，力图与马塞克达成协议的政策是错误的。希特勒完全忽略了这个事实，如果马塞克从德国得到一点支持，他就决不会到贝尔格莱德去。

因为马塞克不在那里，只有任凭克罗地亚农民党其他领

袖各显神通了。有两条途径可以选择。他们不是持反对的态度，就是设法与意德的赞助人克伐特尔尼克达成协议。他们选择了后一条路，于是1941年4月10日在德国军队开进以前几个小时，克伐特尔尼克在萨格勒布宣布建立独立的克罗地亚国。

维森梅尔虽是德国的秘密特工人员，他却不能抵制出席“独立”典礼的引诱。他站在克伐特尔尼克的背后，使人看得一清二楚，促使这个新国家诞生的这个人正是他自己。

马塞克从贝尔格莱德发出了一个呼吁，要人民忠于新政府，但克罗地亚农民却违背马塞克的心愿，现在挥舞着旗帜，奏着音乐加入德国人这一边。农民队伍做出了有价值的贡献，他们的仍忠于贝尔格莱德的军队，解除了武装。农民做出的贡献，得到的报偿，极其微不足道。

新国家成立只有几天后，帕夫里克和乌斯塔斯的全体流亡集团都到了萨格勒布，掌握了实权。这个集团约有360人以上，接任了所有最重要的职位。甚至那些坚持在他们祖国的乌斯塔斯的领袖们，不得不担任很低的职位。这造成了很坏的影响；尽管如此，最初几个星期士气还是旺盛的。克罗地亚获得了多年期待的独立而感到欢欣。

5月6日，帕夫里克第一次访问希特勒归来，带来愉快的消息：这个新国家将囊括全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达尔马提亚和希尔米亚、斯拉沃尼亚及扎哥里亚的沿海地区——事实上包括克罗地亚人曾要求的一切领土。克罗地亚人的热望是无穷无尽的。德国人的要求微不足道。他们所要求的不过是在战争期间要有一小支德国军队驻扎在克罗地亚。

但是不久意大利提出了要求，而且德国接受了。1941年6月13日的罗马议定书，使整个克罗地亚大失所望。新国家

划分成德国占领区和意大利占领区。更糟糕的是意大利区又分成为主要区和次要区。在意大利主要区内，克罗地亚的主权不复存在。在这些措施中，克罗地亚人正确地看出他们准备把整个达尔马提亚沿海地区日后将并入意大利帝国的企图。人们责备帕夫里克接受了意大利的要求，达尔马提亚人还谴责帕夫里克把他们出卖给意大利。其余的克罗地亚人，也都对帕夫里克和他的政府表示强烈不满。对意大利的友好关系也大幅度地冷却下来。最后得知一个意大利公爵将作克罗地亚的国王，不满的情绪，更加高涨，达于极点。

也许只有这些缺点就足以使新国家的机构土崩瓦解了。但是乌斯塔斯领袖们的活动，致使局势每况愈下。在极短时间内，他们就把这个国家搞得杀气腾腾，一片混乱的状态。帕夫里克任命了将军之子和流亡中最密切的同僚尤金·克伐特尔尼克为负责国家保安的国务秘书。他这样做就把他的全部行政权交给克伐特尔尼克掌握了。年轻的克伐特尔尼克上台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组织一支由流亡者领导的新警察队伍，这些流亡者是由克伐特尔尼克从臭名昭著的罪犯当中招募武装起来的。他所做的第二步是把克罗地亚地区农民的队伍解除武装和遣散，新政府认为这支农民队伍可能是对他们政策的一大障碍。

因此，那些作为真正民族组织成员的人们，对建国有相当大的贡献的人员，现在却发现他们被困在兵营里。他们被机关枪包围，被迫投降缴械，并被解散。而克伐特尔尼克和他的朋友们安然地坐在意大利，这的确确是被盟友的出卖。人们愤慨的情绪达到了极点。大批人投向反对派。

乌斯塔斯领袖们的仇恨，矛头主要是对准犹太人和塞尔维亚人，这些人是不受官方保护的。虽说负责国家保安的国务

秘书克伐特尔尼克的母亲曾一度是克罗地亚民族主义首领弗朗克的女儿，弗朗克本人是一个犹太人，这位国务秘书却是最凶恶的谋杀犹太人的凶手。“国家元首”帕夫里克的妻子，原本姓罗夫伦塞维克。她是有犹太血统，但是仍无能为力来帮助她的被迫害的同胞们。比对犹太人犯的暴行更多的是对塞尔维亚人的大批屠杀。在1941年夏天，这种暴行达到了惊心动魄的程度。整村整村、整县整县被残酷无情地杀戮，居民被扫荡，背井离乡，被赶到塞尔维亚边境上去。强迫东正教徒改奉天主教。

德国国防军的格莱斯·冯·霍尔斯特瑙将军（他原是奥地利皇家军队一个军官和德奥合并前奥地利最后一届政府中的一员）被任命为萨格勒布的全权代表。冯·霍尔斯特瑙熟谙这个国家及其种种问题是无与伦比的，在1941年4月他对希特勒提出某些结论性的建议。他提议应当作为一个原则：凡是让给意大利的领土都要局限于南斯拉夫国界以南；并提议在萨格勒布成立一个联合的克罗地亚政府，以取代乌斯塔斯的独裁政权；此外应该在塞尔维亚成立一个由德军司令官统辖的具有广泛权利的政府。

然而这种解决方法，与齐亚诺对于意大利的利益的看法背道而驰。在塞尔维亚战役期间，齐亚诺曾到维也纳访问过里宾特洛甫，并且曾再度运用他著名的“以弱点讹诈”的方法。他宣称，意大利在希腊的失败，已严重地危害了意大利军队和法西斯党的威望。假如德国希望德意两国的共同事业取得进一步胜利的前途上不致受到挫折，德国为了它本身的利益，必须对他的盟友助一臂之力；德国只有许诺对意大利做巨大的让步，才能恢复法西斯的威望。齐亚诺的这种做法完全获得了成功，预计将来也会经常取得成功。希特勒本人完

全有准备答应意大利人对克罗地亚人的要求。里宾特洛甫肯定是无意接受冯·霍尔斯特瑙的提案。个人的恩怨照例是起了重大的作用。从德奥合并时开始，里宾特洛甫和冯·霍尔斯特瑙之间发生了尖锐的齟齬。里宾特洛甫决心要让这位将军垮台，首先必须不给他担任有权参与政务的职位。在克罗地亚成立了一个没有外交代表的军政府，但不为里宾特洛甫所接受。这样就会撤掉了他对国家的控制权。里宾特洛甫赶快任命了一个驻萨格勒布政府的使节。他选拔了北部德国一个旧褐衫党领袖西格弗里德·卡希，他现在要出使的国家，他差不多都没有听说过。这件事确实将引起严重的后果。

同时，在塞尔维亚成立了一个清一色的军政府。此外，还成立了一个塞尔维亚人民委员会，但是这个委员会既没有授与权限也没有权力。它并不符合政府的定义。它碰到许多艰巨的任务。克罗地亚的难民群络绎不绝，结果造成的经济混乱，引起了几乎无法解决的问题。

我作为德国特工局的专家提议应该成立一个组织完备的政府与德国军政司令官进行配合工作。外交部应该派一个使节驻贝尔格莱德，也许不需有公使的全权地位。但是这样做会使塞尔维亚政府在国外、国内都会增高威望。里宾特洛甫会明达地接受这个提议，因为有一个驻贝尔格莱德的外交使团会使他有更大的势力。一般说来，他既缺乏敢作敢为的勇气，而又自以为是。他有几星期之久拒绝把这个建议呈交给希特勒，并且断言希特勒对塞尔维亚人如此愤懑，要想说服他们对他们做出让步，是完全不可能的。

一直到希姆莱和海德里希亲自去见希特勒的时候，特工局不仅获得它的计划被批准，而且还接受了特工局推荐米兰·奈迪克将军担任塞尔维亚总理的职位。奈迪克是前国防

部长，虽然他一向认为跟德国作战是疯狂的举动，但他深受尊崇，而且没有人能说出他有什么不得体的亲德倾向。奈迪克的基本想法是要与那些拒绝承认塞尔维亚对德投降的各种力量达成协议。在这种努力中，他得到德国特工局的支持，但是他和德国其他机构打交道时，却碰到不少困难。可是他也取得局部的成功。

同时一个有组织的军事抵抗运动显然正在形成。我们丝毫没有预料到这个运动将注定发展到那样大的规模。一个相当有组织的运动很可能形成，因为德国国防军被迫仓猝对南斯拉夫进行战争。我们的最高司令部迫不及待。希特勒决定在5月15日对苏联作战，但是这个计划被贝尔格莱德的起义和相继而起的军事行动所打乱了。因此，希特勒屡次催促他的军事指挥官，尽快地结束对南斯拉夫的战斗。德国国防军没有充分时间在整个南斯拉夫有系统地肃清敌人残余的部队。德国国防军在那艰难的山国不能彻底地搜索军火和弹药库，而且因占领了主要城镇并保住了交通干线而心安理得。结果，大批坚决的小股南斯拉夫部队才能将战斗坚持下去。

除此之外，游击战可算是塞尔维亚的一个传统。奥托曼帝国时代的海杜克放弃了城市和乡村生活，逃到森林里。他们和异族压迫者的斗争，一向是对塞尔维亚民族主义者的一种激励。奥匈帝国在占领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以后，发觉自己迫不得已对起义者连年进行劳民伤财的斗争。塞尔维亚的游击队伍，也是与旧时的海杜克传统血肉相联的。

那半军事组织的“切特尼克”（这个词是出自意大利文“切塔”，意思是连队）继承了过去的传统。“切特尼克”是极端民族主义分子组成的，对整个王国都有巨大的号召力。“切特尼克”原是在南斯拉夫崩溃以前组成的，它的参

谋长是德拉查·米哈伊洛维奇上校。他拒绝承认南斯拉夫投降，并且号召“切特尼克”逃往森林和山地继续战斗。国王彼得二世和伦敦的南斯拉夫流亡政府，提升他为将军，任命为国防部长，他还被盟军正式承认为南斯拉夫国内军的总司令。

“切特尼克”吸引了许多支持者，而且在几个月内，他们的人数就增加了好几倍。乌斯塔斯大肆屠杀塞尔维亚人和强迫东正教徒改宗信仰天主教的行动，促使成千累万人逃往森林里。施蒂里亚和卡林西亚的地方长官所推行的残暴政策也把人逼得东奔西逃。这两个省里有很多斯洛文尼亚人，两个地方长官为了尽快消除自己地区内的少数民族，开始强迫移民。斯洛文尼亚人除知识分子外，从来不反德，本可以作第三帝国的忠诚公民，正如他们从前是奥匈帝国的公民一样。可是他们在接到通知几小时内就得被迫背井离乡，被赶出边境，到塞尔维亚去。在这些财产被洗劫一空的难民中，“切特尼克”招募了许多新战士。

在南斯拉夫被占领以后，民族主义抵抗运动就相应形成。另一方面，在1941年6月以前，还没有开始有组织的共产党人抵抗运动。斯大林只要看见有机会可以拖延与希特勒的冲突，他就禁止塞尔维亚的共产党人参加反德国人的民族抵抗运动。但是在苏德战争爆发后，苏联的政策就整个改变了。莫斯科的密使马上在塞尔维亚开始行动起来，而共产党人的行动这时得到了新的指令。

塞尔维亚的共产党人原来就不打算组织自己的队伍，却很想在米哈伊洛维奇的“切特尼克”抵抗运动中获得重要职位。因为米哈伊洛维奇对他自己队伍内对苏联第五纵队的形成提高了警惕，所以他就利用职权，迫切要全力以赴达成统一

的祖国阵线。然而他的努力没有得到成功。其后从莫斯科发出的命令，指示共产党人取得抵抗运动的全部指挥控制权，或者发起他们自己共产党人领导的运动，以作为与米哈伊洛维奇和他的“切特尼克”区别的一支独立的队伍。

在1941年时期“切特尼克”和由南斯拉夫共产党一个老党员所领导的人数很少的共产党小组举行过几次联合行动，那个老党员是专为这个目的从苏联派遣来的。这个老共产党员名字叫约瑟普·布罗兹。他的绰号叫“铁托”。到同年年底的时候，显而易见已经不可能维持抗敌阵线的统一。不久以后，两个小组之间的第一次搏斗爆发了。据说受过共产国际特工人员训练的铁托，不是在1939年底，就是1940年初返回南斯拉夫的，并且参与了那导致西摩维奇政变的一些事件。当人们知道他参加过卡帕尼克山区中尼什起义时，在南斯拉夫政府刚一向德军投降后，他肯定就在那里出现了。在这不久以后，他由几千亲信同志陪伴着，离开了塞尔维亚，进入了波斯尼亚的德尔瓦地区。在1941年9月，发生了第一次全部共产党人领导的起义。德国人在1942年在德尔瓦尔查获了一卷胶卷，上面显示出铁托站在阳台上，那阳台上挂了一面印有苏联红星的塞尔维亚旗。

“切特尼克”和共产党人中间存在有明显的分歧，就使得德国特工局更容易与“切特尼克”建立联系了。我可以作证：米哈伊洛维奇对我们的一切接触，都予以拒绝。但是他的助手中有许多人，其中尤其是“伏伊伏德”^①或“切特尼克”领袖佩卡纳克极愿意和我们合作。佩卡纳克享有神乎其神的名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他以在奥地利战线的后方塞尔维亚境内发动的游击战而遐迩闻名。他激烈地反共，视德国

^① 伏伊伏德：东南欧军事首领的称呼。

为两害相权取其轻。当苏德战争开始，一个纯共产党人领导的运动开始出现之际，佩卡纳克就表明，在某种情况准备停止对德作战。在这件事上，他并不孤立。许多其他民族主义者领袖都有同样的看法。他们感觉到德国无疑愿意把尽量多的部队调到东线去，因此殷切希望和起义者缔结一个协定。这样的协定的一个基本依据，那就是必须有一个独立自主的塞尔维亚主权国。

德国的政策表现出它不能利用有利时机。德国和“切特尼克”的商谈，是由没有正式地位的德国人主持的，最初阶段是由特工人员主持的，这些人没有权力缔结有约束性的协定。官方当局不发生兴趣，也不予以指导。德国在南斯拉夫的整个占领机构陷于互相扯皮的混乱状态。在贝尔格莱德，塞尔维亚政府并不隐讳它忠实于彼得国王，也不隐瞒这一点：凡是一切重大决策，它总得请求米哈伊洛维奇的赞同。这个政府与他总是保持有正规的信使往来。这并不意味着米哈伊洛维奇和奈迪克将军之间没有分歧意见。甚至有人说贝尔格莱德政府通过塞尔维亚国家银行给“切特尼克”提供经费，这件事是背着德国人还是得到许诺，就不得而知了。和政府亲密无间，并起并坐的，是一个高级党卫军的警察系统的官员，他残酷无情地企图灭绝“切特尼克”。而我们特工局的人正在尽一切力量说服“切特尼克”和我讲和，共同来对付铁托。

诺伊巴赫博士作为全权公使来到贝尔格莱德。这样促使情况稍有改进。曾任奥地利军官的诺伊巴赫，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指挥过一支克罗地亚部队，他对南系斯拉夫问题有深刻的了解。他也是第一流的善于办事的人，既有想象力，又有勇气——这种特性在第三帝国的领导人当中是很罕见

的。这使他有一种独立思考的判断力，并且导致有一条独立的路线，这条路线常常并不与希特勒和他的外长的路线协调一致。对德国说来不幸，这个专家的行之有效而积极的政策，对改变南斯拉夫的历史已为时太晚。如果有人能对“切特尼克”达到谅解的地步，那便是诺伊巴赫。但是同时局势已经改观了。所出现的问题，再也不是米哈伊洛维奇所领导的民族主义运动，而是约瑟普·布罗兹—铁托所领导的共产主义运动。

与“切特尼克”讲和的许多次企图，拖延了许久。这件事在1943年达到了高潮，计划把彼得国王接回塞尔维亚。这个主意是由“切特尼克”的一个高级领袖提出的，他经常不断和在伦敦的国王宫廷保持联系。他断言那位年轻国王是知道和同意他这样做的。他认为不管在米哈伊洛维奇的运动里，还是在铁托的部队里，主要是塞尔维亚人。在铁托的运动中，只有领导人是共产党。国王刚一回到本国，就号召所有的塞尔维亚人回到他的统率下，他就能把他们之间的内战完全结束掉。国王不能住在贝尔格莱德，却必须生活在森林中自己的随从中间，在那里他可以指挥活动。在德国人和国王及其新统一的塞尔维亚人民之间必须寻求一个临时的协议。塞尔维亚人根本不管克罗地亚人，对那里的德国占领军也不打算采取行动，并且使通过塞尔维亚到希腊和保加利亚的交通线不受到骚扰。甚至他们也许要负起确保交通线安全的责任。

这样的计划会给塞尔维亚带来和平，并会导致立即削弱了铁托。他的残余部队在塞尔维亚会被“切特尼克”扫清，在克罗地亚被德国人和克罗地亚人轻而易举地肃清。塞尔维亚人准备防止共产党游击队，不让他们越过塞尔维亚边境。

这个计划使德国特工局极感兴趣。我们觉得这正好提供给德国不用多大代价就可以结束游击战的大好机会。海德里希的继承人卡尔顿布吕纳非常赞成这个计划，竭力设法说服希姆莱把它呈交给希特勒。有些事可以越过里宾特洛甫，在希特勒做出决定以后才通知他要进行什么事。希姆莱的反应是令人振奋的。他告诉我最大的障碍是，这个计划执行必须得到英国人的承认和许诺。要让希特勒容忍和英国人进行即使隐密的合作都是不可能的。如果这个计划可以修订的话，使英国人与这个计划毫不相关，——显然国王须秘密逃出英国——那么希特勒还可能接受这个计划。

我向希姆莱保证说，从来不存在和英国合作的问题。尽管做了这样的保证，我还是不能得到希姆莱的积极支持。我后来发觉希姆莱根本没有把这个计划呈送给希特勒。他随便谈论了一下这个计划，他违背了他与里宾特洛甫的诺言，后者当然完全反对这个计划。由于希特勒绝不会考虑这个提议，于是他也就否决了这个提案。但是当1944年夏天卡尔顿布吕纳向希特勒提到这件事的时候，已经不可能实现了，他却发现希特勒并不反对这个计划。可是又为时太晚了。

照常理来说，我们很难判断国王赞成这个提案到什么程度；我们也很难判断塞尔维亚人会不会忠实地履行这些条件。但是我可以毫不置疑地证明米哈伊洛维奇、奈迪克和大多数民族主义者领袖们都心悦诚服地赞成这个计划。一个德国无线电监听站证明了“切特尼克”总司令部和在英国某地一个塞尔维亚无线电台之间在这个问题实际已经交换了不止一次无线电话谈话。在这些谈话中，“切特尼克”领袖们采取这样说法：国王现在已经不能再希望西方国家什么了，因

为西方国家已公开宣布支持铁托。这些领袖们还提议说，如果面临国王逃走的既成事实，英国某些政治集团是不会感到遗憾的。因为在那种情况下，英国会心安理得地答复苏联盟友所提出的谴责。从发来的大量回答看来，显然国王和他的顾问们认真考虑了这一切因素，至少没有立即反对这个计划。

同时，克罗地亚的局势继续朝着不利于轴心国的方向发展。“切特尼克”和“乌斯塔斯”之间的斗争，日益加剧。塞尔维亚人的被屠杀，引起无穷无休的和万分恐怖的战斗，在战争中，“切特尼克”的暴行与“乌斯塔斯”不相上下，而且铁托及其党羽的暴行，的确超过“乌斯塔斯”的暴行。东波斯尼亚和桑杰克的伊斯兰居民在“切特尼克”的暴行下惨遭蹂躏。据保守的估计，仅在桑杰克一地区，就有七万伊斯兰教徒被屠杀。塞尔维亚人对伊斯兰教徒的这种仇恨，是土耳其占领时期的后遗症。他们认为波斯尼亚接受了土耳其压迫者的信仰，因此他们是奸贼和叛逆。

乌斯塔斯政府出于仇恨塞尔维亚人，竭力设法与穆斯林建立友好关系。在建国一周年之际，帕夫里克竟不惜让自己头戴土耳其帽照了一张照片，以象征他同情伊斯兰教徒。这些穆斯林信仰的宗教被认为合法的，但那些信奉东正教的克罗地亚人就随同塞尔维亚人一起受到迫害。后来乌斯塔斯修订这个政策，承认东正教为合法的宗教，允许他们在以前俄国主教的领导下建立他们自己的教会。

我们德国人赞成宽容波斯尼亚的伊斯兰教徒，我们希望通过他们来影响土耳其人，使他们对我们抱着更友好的态度。在波斯尼亚的穆斯林和土耳其人之间，友谊的联系是多方面的，而且是强有力的，在现代土耳其，特别是在武装部

队里，有很多出类拔萃的人，都是出身于波斯尼亚穆斯林家族。我们全力以赴来培育和支持伊斯兰教会的统一工作。

但是时至今日，若想利用这种关系，已为时过迟。土耳其对双方的力量作了个冷静的估计，已经得到一个结论：德国再没有可能得胜的希望了。

在谋求把波斯尼亚伊斯兰教徒吸收到德国这边来的措施中，就是在1943年编成了穆斯林的党卫师。古老的奥地利“波斯尼亚团”的传统恢复了。这些部队差不多完全是伊斯兰教徒编成的，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精锐部队中是首屈一指的。这些部队在1915年反击意大利在伊松佐战线的进攻屡建战功。新的穆斯林党卫师的组织者，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曾统率一支伊斯兰教徒部队的一名前奥地利军官。事实上这些部队是以教会神职阶梯组织为基础而编成的，与党卫军的组织的基本原则完全不同。但是尽管如此，总是可能得到希姆莱的同意，因为他坚信伊斯兰教的值得自豪的英雄主义。更有进者，希姆莱允许新的师有自己的宗教教师，这是基督教过去多少年来就曾经在党卫军中争取而未达到目的的一个特许。耶路撒冷的最高法典官也对这些部队颇感兴趣，而且不止一次地检阅他们。把这些部队调拨到法国去后，发生了骚乱，最高法典官出面干预，而安抚了他们。

1942年初，“切特尼克”仍然对铁托占有相当大的优势，但是从那时起，首先因为他的卓越的政治战术，其次由于他得到西方国家的支持，铁托很快有了大的发展。

米哈伊洛维奇的运动主要是由塞尔维亚人组成，他和他下属的领袖们不能让他的组织达成真正的大南斯拉夫的统一局面。不消说，沙文主义在“切特尼克”中间占有统治地位，他们鄙视从前南斯拉夫国家的其他民族。克罗地亚人和

斯洛文尼亚人终于得出一个结论，就是米哈伊洛维奇的组织目的在于战后要重建一个塞尔维亚人的独霸地位。

铁托非常机智。他在苏联受到的训练，对他大有好处。他不断地强调他的运动有超民族的目标。他竭尽全力想把克罗地亚人和斯洛文尼亚人全都争取过来。铁托本人是一个克罗地亚人，这倒无关紧要。那些过去支持贝尔格莱德政府的许多克罗地亚人，很快就变得比塞尔维亚更塞尔维亚化了。那些逃脱乌斯塔斯屠杀的克罗地亚地方的居民，和从斯提里与卡林西亚家中被轰出来的克罗地亚人，发现铁托显然比米哈伊洛维奇更宽宏大度。

英国人和美国人转变了针锋相对的对立态度。最初只有米哈伊洛维奇得到西方国家的同情，并且得到武器和军火的援助。现在英国和美国都开始转而更加赞助铁托了。1943年初，德国开始对他进行军事行动，使铁托几乎接近被歼灭的边缘。许多参加战斗的人都断言：如果没有英国和美国的援助，铁托是不会幸存的。意大利在1943年的投降，对铁托却帮了个大忙。这使他一举扩大了自己管辖的领土，并且大大增强了他的军力。

在被占领的南斯拉夫的意大利法西斯政策，对于游击战士来说，既是灾难临头，又是增强力量的一个直接源泉。意大利政策的真正目的将危害德国盟友的利益，虽然意大利与塞尔维亚没有什么关系，意大利在克罗地亚的将军们，却与“切特尼克”的领袖们进行了商谈。但是罗阿塔将军和铁托的共产党运动也进行了合作。1942年时，德国宪兵队俘获了一个正首途罗阿塔司令部去的共产党游击队的信使。对他审讯结果，没有透露什么重要线索，但却证明了一点：这个人以前曾经多次在罗阿塔和铁托之间执行过任务。尽管如此，

在共产党游击队的首领和意大利总司令之间，有什么协作的可能性，在萨格勒布的德国当局看来，实在难以置信，因此他不认为这件事有什么重要性。

其后不久，1942年夏天，德国当局吃到了苦头。当时德国和意大利正在开始进行一次庞大的联合军事行动。罗阿塔已经告诉德国联络参谋部门萨拉热窝作为意大利军队挺进的方向。他却突然毫无军事必要地从意大利和德国分界线以南的一片达68至80英里的广阔地带撤退下来。铁托的游击队立即源源进入真空地区。他们相继采取的军事行动，显然证明了他们和意大利最高司令部早先就有所谅解。我们可能缺乏确凿的证明，但是这些事件让我们得出这个假定：罗阿塔完成了出色的任务，即会同“切特尼克”和铁托游击队谋划反对德国人，而同时又反对克罗地亚国。

游击队拖延时间越长，意大利军队和游击队之间进行武器和弹药的交易就越频繁。事态发展到这样地步：所有的武器（包括步枪以至野战炮）都有公认和固定的价格，可想而知，游击战士充分利用了这个市场。

从一开始起，德国军事最高司令部发觉自己处于一种很难堪的地位。他们没有考虑反对游击队的大规模战争，在南斯拉夫对德放弃抵抗后，大多数德国军队立即调往东部前线。只有很少的营队留在南斯拉夫。由于形势所迫，占领军逐步增加到几个师的兵力。但是为了对游击队作战，连这些部队仍嫌力量薄弱，因此有必要让意大利增援。在理论上，这样集结起来的军队，总会有充分力量完成任务的。可是军事行动是千篇一律的。德国军队常常成功地包抄游击队的侧翼，把他们逼进一个死角，从而把他们完全包围，并且很快可能出现俘获铁托和他的全军的局面。但是最后一刻，游击队经常

突破意大利扼守的包围圈而逃脱出来。这从来不能是意大利最高司令部蓄意制造的，或有所失策的结果。这种失败常常是归究意大利军队缺乏战斗意志的结果。若谴责意大利人缺乏军人美德，那是错误的。但是只有当他们理解和赞助这个事业，尤其是为保卫祖国，他们才能战斗得出色。意大利帝国，由于法西斯主义把它引导上了战场，这个帝国就失去了影响力。一离开意大利本土，在北非和巴尔干半岛，他们的战斗表现和士气十分不能令人满意。

虽然德国的意大利伙伴经常使他们大失所望，德国部队独自成功地不止一次包围了铁托的游击队。例如在南克罗地亚，卢德斯将军在1943年的一次特别成功的作战中，使他们遭受12 000人的伤亡。这在全部兵力中占很大的比例。但是只要铁托没有被抓住，这些胜利价值就不大。

随着战争的推进，克罗地亚的局势江河日下，而且经济危机使其他一切都黯然失色。乌斯塔斯把克罗地亚农民党的所有重要领袖都排挤掉。马塞克的许多党羽都被逮捕起来，连马塞克本人也被拘留了。他多亏德国人而没有丧命，他们不准许乌斯塔斯把他处死。冯·霍尔斯特瑙将军通知帕夫里克说德国人要他保证马塞克的安全。

除此以外，有些乌斯塔斯的人阴谋反对那些本党内仍在本国不屈不挠进行搏斗的人们。那些人也陆续被排挤出去，并被赶下台。

最后唯一有权威的人士，只剩下帕夫里克的朋友中一小帮了。就在这一小帮中，也是一再相互倾轧的。虽然小克伐特尔尼克使大多数克罗地亚人都深恶痛绝，而他却没有因为他大批屠杀塞尔维亚人和犹太人而被解职。但是当他自报奋勇卷入反对帕夫里克的阴谋时，他当即被解职了。他的已被

提升为元帅的父亲，也被迫辞职。

乌斯塔斯政权把克罗地亚的王冠呈献给萨伏伊王朝的亲王斯波莱托公爵。根据意大利国王和墨索里尼的旨意，公爵接受了王位，并且采用兹封尼密尔二世国王的称号。克伐特尔尼克元帅受到其野心勃勃的妻子的唆使，着手制订一个使自己成立克罗地亚王朝的建国者的计划。他找到好多党羽，虽然他的野心不需认真对待，但是帕夫里克唯恐德国某些方面人士也许会支持他，并且认为他们企图进行政变的谋划，大有可能。克伐特尔尼克退隐到他的夏季别墅去，他住在那里深居简出，闭门谢客，有自己的卫队，前呼后拥。实际上当时，德国人丝毫无意支持克伐特尔尼克的野心。克伐特尔尼克那时已不能拯救这个不可挽回的局面。他退出了政治舞台，携同他的儿子一并迁徙到斯洛伐克去。1949年，美国驻奥地利的军队把他引渡回到南斯拉夫，而被处决了。许多克罗地亚首要政客和官员，不管他们是乌斯塔斯的成员或者是反对派的人员，都遭到同样的命运。许多逃往奥地利和匈牙利的人，只要被英国和美国抓住，一律交还给铁托。几乎无一人例外，全被处决。那个领袖帕夫里克本人则逃之夭夭了。这位善搞阴谋与欺诈的家伙在奥地利的美国占领区住了几个月，未被发现，后来去意大利，到那里后，在罗马附近的修道院避难。他从那里又转徙到阿根廷去，并一直居住在那里。

德国公使卡希博士支持帕夫里克和乌斯塔斯政权。我努力迫使帕夫里克结束那个乌斯塔斯政权所操纵的恐怖和暗杀统治，但卡希的态度给我造成最大障碍。在克罗地亚建立一个温和的民族联合政府，也许很有可能。当德国国防军和特工局联合向希特勒提出意见反对利用乌斯塔斯进行第一次

毫无理智的、危险的大屠杀时，受里宾特洛甫所支持的卡希，驳倒了我们的建议。他们答辩说，这不过是些孤立的谋杀事件，在任何革命和转移政权的关头都是不可避免的。当革命已经完成，而且暴行仍旧猖狂进行时，辩论是无济于事的。但是卡希找到了新的辩解词，得以支持他的态度。当1942年乌斯塔斯在克罗地亚犯一连串特别令人发指的谋杀案时，冯·霍尔斯特瑙将军只这一次成功地把一小撮反抗党的领袖们解除了职务。帕夫里克毫未表示有意惩罚这些人，并且支持他们，和私自任他们做顾问。他们密谋暗杀克罗地亚参谋长波尔皮克将军和其他暗杀和恐怖行动。

努力使乌斯塔斯队伍从事文明的战争，完全不切实际。德国国防军所采取的军事行动，常常因一些参与作战的乌斯塔斯对平民胡作非为搞坏了事。由于他们的暴行，使更多的支持者投入游击战士一边，而并没有由于军事行动丧失了战斗力。乌斯塔斯的军队无疑表现了高度的英勇精神。他们和游击队作战总是拚斗到最后一个回合。

在1943年克罗地亚发生悲剧的时期，发生了一件引起全世界轰动的大事件。在黑塞哥维那的游击战中，有一小队“托特”劳工组织的队伍被游击队包围。这个小队全都有武装，并且认为被俘后会被处决，于是他们准备战斗到底。当他们弹药耗尽，一败涂地时，这些德国人没有被立即枪决，正如和他们并肩作战的克罗地亚人一样，而是被遣送到游击队指挥所去。这个德国劳工队的队长是一个姓奥特的工程师。除了他的正常任务外，还交给他一个寻找制造飞机螺旋桨所需要的特种木材的工作，这种木材只在那个地区才能找到。在寻找木材的期间，他曾经和某些游击队长有所接触，也许就这一件事才使他得到活命。他很快被解送到铁托

的司令部去，铁托让他给萨格勒布的冯·霍尔斯特瑙将军捎去一手谕。铁托提议把“托特”劳工队11个人同被俘的、当时住在萨格勒布医院的一个女游击队长交换。冯·霍尔斯特瑙将军认为与铁托直接联系极为重要，同意他的提议，并且暗示他将来在原则上总会考虑这种性质的交换。于是铁托没有等待那个女人从医院出来，就释放了那11个德国人，通知冯·霍尔斯特瑙将军说他履行他作为军官诺言，就足够了。

这种接触后来有了一些发展。在后来的谈话中，奥特证明他自己是一个野心勃勃的、有伎俩的谈判家。铁托同意了将军的建议，建议大规模交换一次俘虏。为了商谈这个问题，他派了一个秘密使者，那个人介绍他自己是皮特罗维奇博士，并说他以前是一名律师。德国将军热诚备至地接待了皮特罗维奇。他作为将军的客人逗留了十天，并且得到允许去看望他住在萨格勒布的父母。此外还发给他一个书面的军事许可证，可以去访问萨伏河以北的地区，在那里有几支铁托的游击队，铁托一直没有和他们直接接触过。

几天之后，皮特罗维奇使冯·霍尔斯特瑙将军大为震惊：他透露他实际是约波·韦莱比特将军，他受铁托的委托，给德国最高司令部送去一封信件。铁托声称，他准备就以下条件缔结一个停战协定。假若德国人不企图在双方商定的某个保留的领区内进攻他，那么他就不会把他的起义扩展到克罗地亚的其他地方去。他还准备在一段商定的、特殊时期内不进行任何恐怖活动和破坏行动，以作为他信实诚意的保证。

这个提议的意义和信使的重要性是如此巨大，以致霍尔斯特瑙将军感觉不首先与德国政府商洽就继续进行会谈是不得当的。这样性质的停战协定，将会急剧扭转整个军事和政

治的局势，从这个送交提议的人选看来，这个提议是很诚意的。韦莱比特将军是一个奥地利军官的儿子，他后来成为南斯拉夫军队的将军；他父亲是克罗地亚人，母亲是塞尔维亚人，他从1941年以来就一直是铁托的最亲密的战友之一，而且是他外交事务上的主要顾问。他在1952年作了南斯拉夫驻伦敦的大使。

格莱斯·冯·霍尔斯特瑙将军考虑得十分正确，他想要和铁托订立停战协定这样大胆的主意，是不会得到支持的，国防最高司令部的上司既不支持，外交部也不会支持，于是他首先和特工局的第六处进行联系，希望这样能通过希姆莱把这个提案直接呈报希特勒。我是南方（南斯拉夫）第六处高级官员，于是和冯·霍尔斯特瑙将军私人讨论怎样与铁托打交道，使我们的两翼真正能够摆脱游击队的威胁。

铁托想与德国人缔结停战协定的理由是有重大的利害关系。特工局同德军驻克罗地亚的情报司内部通讯科有协作关系，因此很久前截获了铁托的无线电通讯，并且破译了秘码。这个来源的情报常常可使最高指挥部在游击队行动之前就可先发制人。铁托未尝不知道德国最高指挥部常常预先得悉他的意图，最初他疑心有人背叛，于是他进行了一系列清洗。当清洗不能奏效时，他终于找到了真正的症结：他的无线电报务员不够能干，他的密码太原始了。然后他经常改变密码，但是也无济于事。在1943年春天，德国截获了许多电讯，从中看清了铁托和他的英美盟国的关系严重恶化了。铁托下令游击队队员和英美方面的一切个人接触，都必须停止，否则严惩不贷。西方国家的军官在任何情况下不得探悉游击队的内部情况和意图。此外，沿海地区游击队电台发来的无线电讯说到英美军队即将在南斯拉夫亚得里亚海沿岸地

区登陆。这些情报没有引起德国特工局的重视，一直到韦莱比特将军代表团突然到来，使整个事件更为错综复杂。

德国特工局所得到的结论，差不多从一个独立的材料马上得到证实。在匈牙利佩斯郊区，匈牙利总参谋部第二处成员——一个极为得力的匈牙利谍报组织——逮捕了一个秘密交通信使，获得了使人震惊的情报，他身上带有斯大林给铁托的重要指示：

克里姆林宫收到机密情报：丘吉尔已经说服罗斯福，打算违反与莫斯科达成的协议，将在亚得里亚海沿岸登陆。若果真有此企图，斯大林正式授权铁托与德国军队共同协作，反抗英美入侵部队，并且为达此目的，他赞同铁托与德国最高指挥部达成一个协议。

主持审讯信使的匈牙利军官是盖特·佐尔坦上尉，他过去曾经在南斯拉夫做过卓越的谍报工作。他的情报一向被证明既准确又可靠，因此在目前这个事件中也受到重视。后来他成为一个少将，并且任匈牙利情报局局长，他是苏联对西方国家进行谍报工作集团里最重要的成员之一。他作为科苏特学院的书记，负责匈牙利军官学员的政治教育和共产主义培训。

这个信使被逮捕后不久，韦莱比特将军将在萨格勒布接见了一个显然来自铁托司令部的使者。他马上要求和冯·霍尔斯特瑙将军会谈，并请求应该有德国外交部的代表出席。冯·霍尔斯特瑙将军邀请一个德国公使馆的成员参加会谈。韦莱比特将军其后发出一个重要通知，大意是铁托准备在英美军队登陆时和德国驻克罗地亚的师团对入侵者采取同共作战行动。关于匈牙利人所报道的那个信使所传的信息的真实性，现在再也无可置疑了。铁托常常同时从几个不同的渠道收到莫

斯科发给他的命令。那个被俘的信使所送来的命令，显然也从另外的途径收到了。

时间是很紧急的。冯·霍尔斯特瑙将军觉得再按常规办法辗转向希特勒请示报告会耽误大事；可是没有经过希特勒批准就采取行动，同样也是不可能的。于是他决定直接通过里宾特洛甫与希特勒联络。希特勒的回答是毫不犹豫而且直截了当。

我不和反叛者商谈——我要枪毙他们。

事情就是如此。但是铁托和德国人的谈判，仍然是一个最有趣的插曲。这些谈判确证了这个重要事实：苏联决心抵御任何入侵它的势力范围的行动，必要时将用军事行动，甚至依靠德国人的援助，都在所不惜。铁托也有可能从这次事件中吸取一个决不能忘记的教训：克里姆林宫为了本身的利益，牺牲其盟友，是从来不会忐忑不安的。这对他目下对于苏联所采取的态度很有直接关系。

德国人和铁托之间的斗争仍在继续下去。1944年6月，德国人决定以劫持游击队的领袖的办法，尽力给他们一个致命的打击。德国的伞兵准备对设在西波斯尼亚的德尔瓦尔的铁托司令部进行一次袭击，从而俘获铁托和他的全部幕僚。袭击是按照计划进行的，但是铁托本人在千钧一发之际脱逃了。他遗留下的只有一身漂亮的元帅服，这套服装是刚做好的，以后拿到维也纳军事博物馆去展览。铁托总司令部常驻的两名英国新闻记者被俘，但是逃掉一个大人物，俘获这两人真是得不偿失。德国各部门之间缺乏共同协作，对这次失败也负有一部分责任。我的特工局的分机构已经拟订了一个统一的计划，时间安排也差不多完全一致，但是德国国防军没有很妥贴地把它自己的意图通知我。我的工作人员当时为了准备奇

袭，已经要逼近到铁托总司令部跟前了，假使我的秘密突击计划与军事行动协调一致，配合进行，那么铁托本人可能被德国人俘获。

德国军队的撤退和苏联军队的进逼，使得铁托相继夺取了贝尔格莱德、萨拉热窝和萨格勒布。德国军队一部分退到奥地利中部，一部分退到匈牙利。在南斯拉夫西北部，德国人和他们的克罗地亚盟军（甚至受到少数塞尔维亚部队的支持）一直坚守到1945年5月为止。南斯拉夫各民族有史以来第一次建成反对共产主义前进的某种联合阵线，但是已为时太晚了。切特尼克和乌斯塔斯，塞尔维亚和克罗地亚的警察部队，穆斯林和门的内哥罗人，他们过去彼此都拼命作战，现在却加入新成立的新法西斯志愿军。他们全体和德国人联合一起，构成了反对铁托的红军的一条联合阵线。甚至那两个不共戴天的死敌帕夫里克和米哈伊洛维奇也都同意放下他们的分歧，联合起来。只有当总的形势表现出来继续战斗毫无胜利的可能，他们才放弃了抗争。

现在反对铁托的运动：在克罗地亚由前乌斯塔斯组成了“十字军”，波斯尼亚在新月旗帜下组成了青年穆斯林反共组织。在塞尔维亚由原来的切特尼克组成了的皇家民族主义集团。他们在战争的最后阶段开始建立了联合阵线。但是现在国外的流亡分子已经忘却1945年的教训。塞尔维亚和克罗地亚流亡者互相攻讦吵闹的声音，使全世界都知道。

我们上了国王的当

1940年6月，苏联迫使罗马尼亚割让比萨拉比亚和布科维纳北部，而8月间，德国强行仲裁裁判，把特兰西瓦尼亚北部让给匈牙利，因此卡洛尔二世国王的政权严重地为之动摇。他的王国疆域江河日下。他的外交政策所遭受的这些失败，增强了反对派的势力，他们多年来一直希求推翻这个政府，这个政府一向靠独裁专政来统治，靠贪污腐化来飞黄腾达。

在政府的反对派当中，首当其冲的是陆军军官团和铁卫军。后一个组织是1920年在大学生中间发起的。它虽然和其他地方的法西斯运动相似，但并不是这些组织的翻版。铁卫军的成员们，譬如说，要比德国纳粹党的成员更富于知识分子气味，而代表这个运动特色的主要差别是原来铁卫军具有强烈的宗教感情——一种差不多近乎神秘主义的宗教感情。这个运动在国内获得了大力的支持，政府为了消除这种威胁，最先起诉，后来下令杀害铁卫军的领袖们，其中有乔德里亚努。

在维也纳仲裁裁判之后，国王决定选出一个新人担任首相，他选中了伊昂·安东奈斯库将军。安东奈斯库不是铁卫军，我们也不能说他是反对国王的军官集团中最有权势的，或者是堂堂有名的大人物之一。他属于反对国王的军官反对集团，但是直至割让比萨拉比亚和布科维纳北部的时候，他才和铁

卫军建立了联系。再有，他的健康很差，患有白斑症；有一次他因为神经病被送进疗养院，显然并不是由于医疗的缘故，而是为了政治的理由，而且是应国王请求的。卡洛尔国王大概希望能及时充分驾驭安东奈斯库，能利用他作为反对铁卫军兵团的得力干将。当时国王还没有退位的意思。他希望办到的事，不外是借助于改组一次政府，以稳住他的摇摇欲坠的王位。

我们很有理由说，德国公使馆在早期就运用它所拥有的职权，以利于这个解决办法：不让大权完全落在铁卫军的手里。德国公使法布里修斯博士和他的顾问斯特尔泽博士都一致认为：权掌在铁卫军手中的政府，对德国的切身利益不会有好处。这个组织已经丧失了全部领袖，而且背后的智囊团仿佛也无影无踪了，因而若把罗马尼亚全国的命运完全托靠它做来执掌，将是一个重大的错误。如果德国想要能够充分利用罗马尼亚必须提供的自然资源，主要是石油，就要有国家必不可少的法律和秩序，而铁卫军在这方面的治理和维持是无能为力的。而在另一方面，一个不为铁卫军所接受的政府，同样无法治理国家，在这样的情况下，最好的解决办法，看来就是妥协——由将领们和铁卫军组成混合政府，而且军事力量要占绝对优势。

对于铁卫军来说，任命安东奈斯库将军为首相就是大规模起义的信号。风起云涌的游行和示威遍及全国，铁卫军在各阶层人民中间赢得了支持者。在这层出不穷的狂暴的压力下，国王承认了失败，于1940年9月6日又一次签署了退位宣言，他实际从1926年至1930年已在海外流亡。他的儿子米哈尔继承了他的王位，在他父亲流亡期间，他就已经登上了王位。卡洛尔由他的夫人马格达·卢伯斯库和令人厌恶的宫廷卫队长官伊昂·乌尔达里亚努陪送，非常灰溜溜地从城堡

的侧门潜逃，离开国境。但是他匆匆忙乱中把一切能搜罗到的贵重财宝，都弄到手里，装上了车才离走的，甚至连西奈尔皇家城堡里的伦伯朗^①的名画也没有忘记，后来有人在原镜框中发现的是原画的复制品。这位前国王的专车在经过蒂米什瓦拉时遇到铁卫军的枪击，但是没有人受伤。

年轻的国王批准了任命安东奈斯库为首相，并且接受了他所组阁的政府。为了加强他的政权的极权性质，安东奈斯库自命为“国家领袖”的头衔。他任命了乔德里亚努的继任人和铁卫军的新领导人霍里亚·希玛为副首相。霍里亚·希玛是比乔德里亚努差劲得多的一个人，他从来没有享有像乔德里亚努那样的个人权威，也没有得心应手对群众施展出巨大的影响；他倒是宁可由“评议会”（由各军团的司令官组成的铁卫军高级委员会）所做出的决定来指导他的行动。还有一些铁卫军被任命为许多部的部长，其中最重要的人物是前驻哥本哈根公使来哈依·斯图尔查亲王，担任了外交部长，和后来赫赫有名的瓦西尔·詹森奇，就任了卫生与劳工部长。

不久，铁卫军和前军官反对派集团联合一起的任何企图，显然是要失败的。这肯定是一个不自然的联盟；这个联盟的两个成员在观点和组织上基本是对立的，就不能合而为一；每一派都千方百计想搞掉对方，而力图自己独揽大权。安东奈斯库的活动是这样开始的：他解除了铁卫军所占据的一些重要职务，使其他许多铁卫军降职；这些措施当然引起铁卫军极其尖锐的抗议。看来很可能是安东奈斯库在寻找一个借口，想把铁卫军彻底轰出政府，蓄意有计划地向铁卫军寻衅，使他们公然叛变，听凭局势发展，可以清楚地看出铁卫军的领袖们势必面临两条抉择的途径：要么无条件地向这位

① 伦伯朗(Rembrandt, 1607~1669)荷兰著名画家。

国家首脑投降，要么用武力夺取政权。

德国军事代表团的到来，对两派之间的势力均衡，大有影响。派出这个代表团的细节很少人知道。这是罗马尼亚特工局局长莫洛索夫和德国军事情报局局长卡纳里斯海军上将的代表本蒂维尼上校双方达成协议的一个结果。他们协商同意共同协作来保卫罗马尼亚油田。据悉英国情报局正在计划对这些油田采取破坏行动。这个协议在将来会有完全预料不到的重大意义。派遣德国军事人员到罗马尼亚去的理由是为了防备破坏行动的安全措施。由德国军事代表团来改组和训练罗马尼亚陆军和空军的主意，是德国驻布加勒斯特的空军武官戈尔斯登堡空军上校所倡议的。安东奈斯库轻易地就信服了一个教官团将极为有用。他请求政府派来迫切需要的人员。德国政府当然接受了这个请求。在1940年10月，由汉森将军率领的第一批德国国防军来到了罗马尼亚。这些模范部队，增援到两个师的兵力，它们在干预罗马尼亚内政事务中是一支起决定作用的强大力量。（原先双方情工组织谈判成员之一的莫洛索夫，也和英国特工局有密切接触。在卡洛尔国王退位之后，铁卫军把莫洛索夫逮捕了，铁卫军和他有许多事要清算，后来他和其他许多与乔德里亚努之死有牵连的嫌疑犯，在吉拉瓦监狱被铁卫军一同处死，但这件事没有让铁卫军的上层领导人知晓，也没有得到他们的同意。）

同时，铁卫军和安东奈斯库集团之间的关系，已恶化到不可收拾的地步，铁卫军面临投降还是政变的紧急关头，不容再拖延很久了。铁卫军感觉和国家首脑清算的时候到了，它决定诉诸武力。因为德国军队驻在罗马尼亚，铁卫军的成败要以德国所采取的态度为转移。虽然德国没有作出约束性的宣言，然而铁卫军的领袖们理直气壮地相信德国人的同

情态度是站在他们这边。驻罗马尼亚的德国特工局和铁卫军的领导人关系特别融洽，并且竭力推崇铁卫军在东南欧是执行德国政策最可靠的伙伴。1940年10月底，希姆莱曾经派遣海里德希部下的一个人到罗马尼亚去组织一个“铁卫军联络组”，这个联络组的任务是按照德国的方式改组铁卫军。铁卫军的军团领导虽然对此不太热心，但还是热诚地接待了这个代表团，而且终于大都依照德国党卫军的方针建立了一个半警察式的军事性组织。德国纳粹的外事处也和铁卫军的军团有过接触，但是这种联络没有什么政治意义。

铁卫军和德国关系不是没有紧张的迹象。铁卫军对德国在罗马尼亚进行的经济扩张设置路障。他们反对德国在西线作战时期蓄意旨在夺取所占领国家的工厂和财产——尤其是一家法国石油公司“矿业信托公司”，及荷兰多瑙河航运公司。铁卫军也抵制把马拉克萨重工业工厂交给德国控制。马拉克萨是罗马尼亚的一个工业家，他因为是前国王卡罗尔的支持者，所以他的工厂被国家没收了。德国经济部的罗马尼亚公司打算与安东奈斯库集团合谋，把马拉克萨工厂并入赫尔曼·戈林工厂内。但是铁卫军坚持应该成立一个公司，在这个公司里，至少应该有51%的股份，掌握在罗马尼亚的手中。

铁卫军反对第二次维也纳仲裁方案，也引起了一些难题。这件事使得里宾特洛甫大为不快，因为他一直以他提出的仲裁方案自豪。再有，由党卫军洛伦兹将军领导的德国海外少数民族联络处在罗马尼亚所进行的活动，给铁卫军留下了不好的印象。由柏林和莫斯科达成的协议，就是要把德国居民从苏联人占领的原属罗马尼亚的土地比萨拉比亚迁徙出来，于是上述的那个机关就在罗马尼亚建立了人员很多的办事机构。这些工作人员和德国少数民族建立了密切的联络关

系，结果他们尽心竭力为德国少数民族争取特殊地位。新任命的德国少数民族领导人施密特和外交部官员党卫军上校罗德尔，在这方面特别活跃。铁卫军的军团认为这种活动是对罗马尼亚国家统一的威胁。虽然他们非常希望支持德国和罗马尼亚的友好关系，但他们却不愿看到罗马尼亚国内出现一个德国人的国家。

铁卫军对德国的这些计划予以抵制，必然反应到德国对铁卫军的态度。于是这引起了他们大失所望的情绪，几乎达到了不信任的程度。坦诚的讨论使这种气氛有所缓和。对铁卫军的下层人员来说这些磨擦和疑难毫无所知。他们还坚定地相信德国对他们和他们事业的友谊之情。

这种性质的误会，不会决定德国对铁卫军的态度。只有希特勒能够作最后决定。这方面有两个因素起决定性作用。11月间，安东奈斯库将军曾对柏林进行一次国事访问。霍里亚·希玛也受到邀请，却谢绝了。希玛大概毫不希望在如此重要的场合以从属于国家领袖的身份露面，以致有损于他要求作国家领袖的地位。就是在这次访问中，安东奈斯库造成了人人尽知的“好印象”，对于希特勒来说，这比任何冷静的考虑都更加重要。在这一事件上，看来考虑也是有利于安东奈斯库。在当时，希特勒已经决定要与苏联进行一场生死存亡的斗争。苏联在东欧的扩张，使希特勒相信他和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大清算，不能再拖下去，他心中这笔帐单从来未曾勾销。他从战略上考虑罗马尼亚。鉴于战争即将发动，希特勒感觉只有代表罗马尼亚武装部队法律和秩序的安东奈斯库将军才是他确当和可依赖的盟友。霍里亚·希玛和他的铁卫军只能靠革命和内战才可以当权。这样，在未来很长一段时期，会大大贬低罗马尼亚在军事上的重要性。于是希特勒明确

无疑地决定了德国对罗马尼亚的内部斗争应该支持哪一边。

铁卫军的领袖们像德国在罗马尼亚的各种机构一样，并不晓得德国已经决定不支持铁卫军。他们认为铁卫军和安东奈斯库最后清算时，德国人至少会仍保持中立。从来没有人弄清楚到底是什么事情成为导火线，突然于1941年1月21日在布加勒斯特爆发了叛乱。铁卫军的军团在进攻中差不多占领了首都的全部公共建筑物。有一度战局处于胶着状态，而只有首相设在外交部大厦的官邸和它周围的街道仍然在安东奈斯库的掌握中。他的许多部队同情铁卫军，并且拒绝对他们采取行动，这一事实说明安东奈斯库的军队指挥系统已处于瘫痪状态。

其后，德国国防军的部队出来干涉了。他们并没有动干戈，只有德国的坦克车在大街上巡逻，并且在战略据点上占领了阵地。显而易见，如有必要，德国军队会协助安东奈斯库采取军事行动。在这个偶然事件当中，效忠安东奈斯库的罗马尼亚军队，应德国的要求，顺利地运往首都。铁卫军的事业败北了。德国抛弃了铁卫军，它成了希特勒冷酷政策的牺牲品，他的如意算盘不容许不幸的铁卫军作任何考虑。这种算盘表面看来很合逻辑，只是后来证明显然是估计错误了。铁卫军运动的分崩离析，意味着安东奈斯库政权找不到支持的人。像现政权以前的卡洛尔国王的独裁一样，这个政权变成一个自动的机械。后来这个政权一到危急关头，就没有一个人伸出手来维护它。一个小的宫廷政变就足以使这个政权土崩瓦解。安东奈斯库借着德国的援助所取得的胜利，注定是一场得不偿失的胜利。

铁卫军的军团铤而走险，决定继续进行斗争，但已无济于事，只能遭到全部毁灭。于是德国驻罗马尼亚特工局长官、

党卫军上尉奥托·布尔舒林承担起安排投降工作。由于他，铁卫军才同意停止战斗，议定对铁卫军实行一次彻底大赦，发给他们撤军的安全通行证。深更半夜，在特工局长陪同下的诺伊巴赫博士谒见了安东奈斯库，劝说他接受那些条件。安东奈斯库同意了。但是，翌晨当铁卫军军团开始撤离阵地时，他们大批地逮捕，或者被用机枪杀害。八百名被害者的尸体狼藉街头。

这种破坏庄严信约的行为，清清楚楚地表明：铁卫军的领袖们如果被俘，不管他们是否押去受审，都必定处以死刑。德国公使馆再也无能为力了。新公使曼弗莱德·冯·克林格是几天前才到任的。他是奉希特勒的特急指令前来的，在任何情况下，不惜一切代价要全力支持安东奈斯库。德国特工局不顾其行动显然违背当时所隶属的外交部的旨意，又一次进行干预。特工局人员决定自己承担营救铁卫军领袖的责任。有14个铁卫军军团领导人被掩护匿藏了许久。最后他们化装成德国士兵乘军用急救车被送到德国。

霍里亚·希玛被委托给德国少数民族领袖施密特照顾。这一事实将产生一个幸运的结局。柏林方面认为特工局的干预是严重地违反纪律，而且是对“领袖”的朋友和德国的盟国有意冒犯，克林格通知特工局局长，称奉命要拘捕他。在这个万分紧急的时刻，施密特由于庇护了铁卫军的领袖，证明他自己也是“阴谋”中的人物，这一事实结果变成了安全因素。施密特是党卫军司令部指挥官伯格将军的女婿。他理直气壮要求他的岳父找希姆莱面谈，来为德国特工局辩护。希姆莱完全被伯格尔的议论说服了，于是他代表特工局极力称赞这件事。希姆莱对里宾特洛甫和外交部的严厉批评，引起了特工局的政治处和外交部之间的第一次严重的裂痕。这两

个部门有几个月之久中断了联系。希姆莱和里宾特洛甫竟至互相不再说话。

希姆莱对里宾特洛甫估计得十分正确，他是反铁卫军的代表人物，希特勒支持安东奈斯库的决议，主要是看到他写的报告作出的。这次里宾特洛甫又占了上风了。他说服了希特勒，禁止特工局政治处在罗马尼亚继续进行任何情报工作。

希姆莱同意并下达这些指令。但是海德里希毫无奉行指令的意思。在那决定性的几个星期中，他倒是没有表示出亲铁卫军的姿态，而我们有充分理由相信他认为希特勒的政策必须改变。但是他不会任凭一纸决定就把特工局从罗马尼亚事务中取缔。凡是重新在罗马尼亚国家取得地位的做法，他都大力支持。那个德国驻罗马尼亚的特工局的头子，多亏施密特和伯格爾同希姆莱的干预才逃避了惩处，但后来又被用其他借口逮捕，在柏林盖世太保总部的地下室里度过数月。而那些违背希特勒的指令，却奉自己的直接上司的指示继续搞情报活动的其他人员，也遭到同样的命运。

在这里把铁卫军最后结局和整个事件发展情况叙述一下。大批铁卫军被解送到德国去，由于里宾特洛甫的坚持要求，他们又被送到德国劳动营去。他们受到和居留德国的其他外国工人同等的待遇，只有一个差别，即他们不得与他们的本国通信，而且里宾特洛甫还进一步威胁，倘若他们违反这一条，就要把他们解送回罗马尼亚，交付给安东奈斯库。1942年晚秋，霍里亚·希玛逃亡到意大利去。他曾企图说服墨索里尼为铁卫军出面干预。这反而使情况更加恶化。他自己不但被捕，而且由于德国外交部的要求，被解回德国，关进一个集中营里。他的铁卫军同僚们，原先还许可他们有一点自由，现在也丧失无余了。他们在1943年8月又被盖世太保逮

捕，“驻屯”在布痕瓦尔德和达豪。他们一直留在那里，受到的待遇，比一般集中营的犯人略好一些。如此一直到1944年8月止，这时罗马尼亚政局大有变动，出现了反对安东奈斯库的军事政变和罗马尼亚退出战争。

此后，霍里亚·希玛被德国人找去组织一个罗马尼亚流亡政府，他欣然同意了。希玛和他的僚属们遂被释放。是什么理由说服他接受这种要求，一时还弄不清。可能他仍然相信德国终久会取得最后的胜利，或者，他感到局势虽然令人悲观失望，他仍然必须与德国人共同合作对布尔什维克主义苦战到底。但是要说希玛的接受是为了他以及他的同僚们的获释，那是毫无根据的。霍里亚·希玛常常表明自己是一个知道如何正视逆境和困难的人。在德国特工局全面监督下在维也纳建立的流亡政府，没有做出多大的成绩来。身为首相的霍里亚·希玛再也不享有他的铁卫军的一致支持。在铁卫军的队伍中产生了裂痕，由于显然的理由，这种裂痕丝毫没有公诸于世。反对派，包括铁卫军许多有声望、有地位的领袖们，他们坚决拒绝以任何方式与德国合作。这些人没有对德国人采取直接行动，只是由于共同敌人苏联的咄咄逼人的威胁。他们力图与西方国家建立联系，但是在这方面，他们没有成功。

在罗马尼亚，铁卫军被摧毁后，出现了一个新力量。到1940年春天，苏联在罗马尼亚的特工机构的活动已经大为扩张。大批特工人员遍布全国，苏联驻布加勒斯特的公使馆的人员，也大大增加，极其令人可疑。他们使用巨额款项来行贿，而且颇获成功。德国特工局知道苏联人曾贿赂罗马尼亚邮政局在苏联公使馆内安装一个窃听站，以收听一切重要的外交电话谈话。在罗马尼亚割让比萨拉比亚和布科维纳北部以后，苏联的新公使格奥尔基·拉夫连季耶夫来到布加勒斯

特，这些秘密活动更加频繁了。新公使带来数以百计的特工人员，他们为了罗马尼亚共产党夺取政权，立即展开了宣传和组织的准备工作，目的并不在于金钱。罗马尼亚保安警察仅仅在1943年1月，在苏联特工人员身上发现而没收的现款，不下10万美元。这些钱大都是伪钞。其实这不过是罗马尼亚共产党的开场白，它是由于苏联人的积极支援而活跃起来。

在1943年夏季，德国从高加索撤军、意大利退出轴心阵营以后，罗马尼亚政府才明瞭德国不能战胜了。再继续站在德国一边，会使罗马尼亚遭到灾祸。民族的生存要求根本修改罗马尼亚的政策。那个准备扭转他的祖国政策的人，就是副首相兼外长米哈伊·安东奈斯库。他无疑是政府中最明智的人，掌握大权，他的权势日益增大，成为名符其实的元帅和首相。

米哈伊·安东奈斯库的执政纲领很简单——和西方国家和平相处，同时请求他们保护，防御苏联。但是这个想法有一个基本的弱点。它是根据一个荒谬已极的假定，就是排除苏联单独与西方国家取得谅解大有可能。米哈伊·安东奈斯库完全错误估计了政治局势的现实——也许他不想正视这些现实。罗马尼亚属于苏联的势力范围。米哈伊·安东奈斯库的英勇努力，恰好如同霍尔蒂在匈牙利和穆拉维约夫在保加利亚的类似努力结果一样——但所不同的是罗马尼亚政治家在这次尝试中，最终自己丧了命。

应米哈伊·安东奈斯库的要求，那个参加推翻墨索里尼政权的巴多格里奥的秘密组织的意大利公使波伐·斯克帕被毫无异议地允许留在布加勒斯特，一定使德国人感到非同小可。米哈伊·安东奈斯库也不能阻止新成立的北意大利政府也派代表到布加勒斯特。但是一直到波伐·斯克帕被他正式拒绝以前，没有新人来递交国书。结果，新任命的保加利

亚公使和克罗地亚公使也不能正式承担自己的职务。因为外交的礼仪不能使他们在墨索里尼的公使之前占有优先地位，而那个公使不能亲自向国王呈递国书！

由于米哈伊·安东奈斯库的赞同，农民党的领袖曼尼乌尽力与西方盟国进行外事活动。1944年3月底，苏联在乌曼附近突破防线以后，曼尼乌第一次成功地和西方盟国发生接触。罗马尼亚空军上校马泰·基卡一坎塔库季诺亲王从皮佩拉飞机场逃往马耳他去了。随他同机走的还有罗马尼亚最权威的工业家马克斯·奥什尼特、美国—罗马尼亚电话公司的一名官员亚历山大·拉康塔和罗马尼亚外交家拉杜·胡穆尔采斯库。他们随身捎去致英国方面的信件，从而开始举行了英国和罗马尼亚的会谈。英国人没有马上开门见山地说出如果没有得到苏联的赞同，英国和美国既不会、也不能就罗马尼亚问题达成任何决定，因此英国人拖延了谈判。这种做法导致了罗马尼亚人存有奢望：认为他们藉着西方国家的协助可以中止敌对的行动，并且可置于它们的庇护之下。第一次试探性的会谈，大概因为某些正当的技术上的理由，回避提到以上这个重要方面的问题。但当第二个罗马尼亚代表团被派到英国的时候，英国人也没有指明这一点。据我看，在这里英国人施展了一贯耍滑头的手法。

由巴尔布·斯特尔贝亲王率领的第二个代表团，刚好在诺曼底登陆以后，从开罗到达伦敦。这个代表团受到米哈伊·安东奈斯库的支持和赞助，他很技巧地找了一个借口取得德国公使馆的同意，名义上是为了健康的迫切需要让这位亲王前往埃及。于是亲王得以合法地离开罗马尼亚，而且弄到真正的护照。在亚历山大他遇到他的女婿、英国情报局的包克斯霍尔少校，他在二次大战爆发前一直在罗马尼亚石油

工业方面工作。包克斯霍尔为了斯特尔贝亲王的下一步旅程作了必要的安排，并且保证他在伦敦可以受到接待。斯特尔贝亲王在开罗和后来在伦敦的时候，他和罗马尼亚外交部高级官员尼古列斯库·布泽斯蒂用无线电直接通过信，他除了其他的事务外，还掌握密码科。他也许是罗马尼亚媾和派的最重要而且肯定是最积极的一员。从伦敦发来的第一批报告，措词极其乐观，看来英国和美国大有可能首先单独和罗马尼亚缔结和约，其后再以罗马尼亚的保护者自居，挺身而出和苏联商洽罗马尼亚的政务问题。

德国特工局知道米哈伊·安东奈斯库的真正意图大概内容，但是它无法干涉。英国和罗马尼亚某党派之间的联系，一个熟悉情况的人只要从德·切斯特兰的事件就可以看清楚；德·切斯特兰是一个英国情报局的上校，他是在斯特尔贝离国赴埃及以前几个月同两名无线电报务员一起用降落伞空投到罗马尼亚作为英国和罗马尼亚主和派之间的联络官。由于部门之间相互配合不够，他竟被罗马尼亚的保安警察逮捕，后来这个事件闹腾起来成为人所共知的事。德国特工局自然千方百计设法探询德·切斯特兰的使命，可是米哈伊·安东奈斯库机灵地极力把事情弄得糊里糊涂。德国军官们也参加了审问德·切斯特兰，但是一无所获。罗马尼亚人已经和英国官员商妥他应怎样说法。德国要求把他交出，但是安东奈斯库元帅地位如此牢固，罗马尼亚感觉满可以拒绝这个要求，不致蒙受任何严重的危险。

大约在斯特尔贝亲王离开罗马尼亚的同时，米哈尔国王独自发动了一个运动，借助军事政变，以导致人们所预期的叛乱。他的主意是在前线的罗马尼亚将官应该成立一个敌对的政府，并且把军队的指挥权抓过来。同时，北方将掀起一场叛

乱，并下达“向首都进军”的号令，将以夺取布加勒斯特而告一段落。皇家军事参谋部的领导人，曾在1944年5月访问东线，极想争取在那里作战的指挥官们，但他没有得到什么热情响应。不管怎样说，罗马尼亚部队纳入了强大的德国军队组织内，因此他们不具有进行一次军事政变所需要的行动自由。原先的谋划终于放弃了。

同时，罗马尼亚人最终认识到若单独与西方国家签订和约以逃脱苏联的控制的企图，总归要失败。斯特尔贝亲王不能磋商有任何价值的协定，而诺曼底战事显然牵制住了英美的军力，以致妨碍了他们在东南欧作战的可能性。与此同时，苏联对东南前线的压力日益增大，最后危机迫在眉睫，一触即发。在这种情况下，罗马尼亚反对派领袖指示奥勒尔·阿尔迪将军，与红军进行直接联系。他们授权他以罗马尼亚人民的名义缔结一个停战协定。于1944年8月17日，由四个党派——国家自由党、国家保皇党、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的领袖为此签署了一个宣言。他们把这件事通知了斯特尔贝亲王和苏联驻斯德哥尔摩的公使亚历山德拉·科伦泰夫人。

然而，苏联人并不为罗马尼亚的和谈事费心思。他们丝毫无意因罗马尼亚提出停战而修改其军事行动计划。在8月19日伏尔塔瓦前线的红军发动了攻势，同一天雅西沦陷。虽然这对罗马尼亚人民是一个极大的震动，若把它认为是一场军事的灾难，还为时过早。可是新参谋总长拉克维查将军却没有和安东奈斯库元帅商谈就下令罗马尼亚军队全部撤到塞勒特防线后面的阵地。几个星期以前，当时指挥罗马尼亚第三军的司令拉克维查，曾经从希特勒的总司令部除获得骑士十字勋章外，还接受了橡树叶勋章。现在他热中于争取和平。在停战以后，他得到了应有的酬报，指挥罗马尼亚第五军，后

来他率领这支部队对匈牙利的德国人作战。塞勒特防线是一条纵深组织严密的牢固的防御系统。根据军事专家的意见，这条防线一旦遭遇对抗战，苏联军队不能很快攻破它。在苏联人同意进行下一步谈判前，拉克维查所下的撤退令，大概是他被迫履行的一个先决条件。

这时局势到了最后关头。如果罗马尼亚想单独缔结一个和约，从全面崩溃中得到一点挽救的话，那么立即采取行动确实是刻不容缓的。在这种危机中，年轻的国王和他的顾问们决定当即采取行动。

在8月23日早晨，举行一次内阁会议，由安东奈斯库元帅担任主席，首相在当天下午将会议结果向国王汇报。米哈尔国王迫不及待，立即召见他的最亲信的党羽：尼古列斯库——布泽斯蒂、宫廷司令莫克松尼——斯塔奇亚、桑纳特斯库将军和阿尔迪将军。他们决定将原先议定对安东奈斯库采取行动的日期，从8月26日提前到那天当日。他们必须火速行动起来。倘若安东奈斯库元帅自己决定要与苏联人开始谈判，那么国王和他的党羽就会发现被别人走到前面了。

在8月23日下午3点钟，当罗马尼亚政府首脑由其副首相米哈伊·安东奈斯库陪同，请求谒见国王，他发觉桑纳特斯库将军恰好在场。这次历史性的会议的情况只有国王和桑纳特斯库掌握了，因为两个安东奈斯库没有再生存多久。据说，安东奈斯库元帅描述了前线的战局危殆，并且指出现下当务之急就是休战。他说，他已经和德意志帝国的代表克劳迪厄斯博士探讨了这个问题。这个阐述使国王和他的顾问深为不安。假如德国代表已经得知罗马尼亚有意缔结停战协定时，那么可以肯定料想到希特勒会立即采取相应的对策，建立新政府，并且由他本人控制了罗马尼亚武装部队的最高指

挥权。因此国王中断了会议，退到另一间屋去。他的其他亲信下属在那里等着他。国王急切地阐明了局势，他的朋友们认为国王的焦虑确很有道理，于是力促他尽快行动，刻不容缓。

米哈尔国王回到接见室。他没有继续谈话，却以简要而不容分辩的调子声称，当今执政的现政府政策，危害罗马尼亚国家的利益。因之他不得不马上解散现政府。国王没有再理睬元帅，就离开了接见室，命令一个宫廷护卫队的少校逮捕国家首脑和副首相。最初安东奈斯库元帅好象不太理解他当时处境的严重性。当他被押送出去的路上，他遇到宫廷护卫队的司令，他对这位司令大喊道：“你们这些可怜虫！明天你们也都要被枪决！”

现在搞密谋的人急不可待地开始逮捕安东奈斯库政权下的其他首要人物。桑纳特斯库将军召集他们到宫廷来参加会议，其中大多数人（包括国防部长米哈伊·潘塔奇和内政部长瓦西里乌）都自投罗网，刚一到场，即被逮捕。罗马尼亚特工局头目克里斯太斯库上校和宪兵队司令屠别斯库将军起了疑心，便没有理睬桑纳特斯库的召见。他们倒径直到德国公使馆去，并报告基林格公使，说国家的首脑和副首相被拘押在王宫内。

曼弗莱德·冯·基林格是如此一种人：战时当过士兵，因此永远再不能安生过平民生活。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起先在各志愿兵团服役，很快就加入褐衫党，并且成为恩斯特·罗姆最亲密的支持人之一，此后不久他被任命为萨克森的国社党总裁。1934年6月30日的清党，他几乎被他干掉，党卫军执刑人已经就要开枪射杀他之际，刚好新的命令来到，挽救了他一条命。在这死里逃生之后，他对任何与党卫军有关的事，都明显地表示厌恶，这是可以理解的。当里宾

特洛甫整顿外交部的工作时他撤换了他所厌恶的那些职业外交家，委派政治可靠的党员担任各级外交岗位，他选中了基林格。基林格在旧金山担任了短期的总领事以后，被任命为驻布拉迪斯拉发的公使，同时兼任外交部政治情报司的巴尔干的总监。不久，另一个突击队长卢丁接任了他的职务，他就又被派往布加勒斯特去当公使。当时在东南欧有五个冲锋队员出身的公使：驻布拉迪斯拉发的是卢丁，驻萨格勒布的是卡希，驻索菲亚的是贝却，驻布达佩斯的是雅戈。驻布加勒斯特的基林格是最不得力的人。其他四个人并不是在各方面都够标准。他们无疑都是罗姆培养出来的和他一样地勇敢，胆大，鬼点子多善于煽动暴乱的活动分子。但是他们的确不配担任指派给他们的职务。别人尽力摆出一派正经的外交官的架势，可是基林格没有机会表演。

他缺乏一个优秀的外交人员所必备的基本条件：政治头脑、幻想和理智。因此他并不关心罗马尼亚寻求和平活动的可靠消息。德国特工局报告他关于西奈依王宫反对派领袖开会的情况，和组织所谓民主集团的消息，他认为没有什么了不起。当他知道国王米哈尔通知盟国他有意使罗马尼亚摆脱战争的消息，他也无动于衷。基林格决不让任何事情打扰他，他什么事情都不闻不问，漠不关心。自始至终他也没有认清局势有多么严重。当时局的发展严重性使他也不能不采取对策时，他只是轻描淡写为自己开脱。在8月23日夜间，安东奈斯库的政权正要倒台的时候，基林格面对危机无所作为。德国公使馆内到处是一片混乱和不知怎么办。

主和的一方目标也不是统一的。曼尼乌对苏联的真正意图比别的领袖看得更清楚而且不抱幻想。他全力以赴保护罗马尼亚的利益，以抵制苏联人的要求。布拉提亚努也完全赞

同曼尼乌的见解，但是他没有曼尼乌那样坚持自己信念的勇气。曼尼乌为了争取自己的目标，常和共产党领袖波特拉斯卡努接连争论几个小时，但是毫无结果。波特拉斯卡努通过安娜·鲍克尔接到莫斯科给他的命令，而且无意和那些命令稍有偏差。只是当两个安东奈斯库被捕，召请桑纳特斯库内阁的消息，由国王的信使给他们传来的时候，曼尼乌才让步，由四个反对党达成了一个协议。假如曼尼乌采取不同的态度，就会越过他作出决议，他的影响就将永远不翼而飞。桑纳特斯库内阁的各部长职位大都由将领们来担任，而民主集团的四个政党的领袖们则被邀请以不管部部长身份进入政府工作。

新外交部长尼古列斯库·布泽斯蒂指示斯特尔贝亲王同他在开罗的同僚威索伊安努及时签订一项停战协定。斯特尔贝被授予全权签订这项协定。苏联驻开罗的大使表示愿作中间人。到8月28日一切准备就绪，只等罗马尼亚代表前往莫斯科，签署条约。

德国采取的对策不但毫无作用，实际上使事态更加恶化。只要德国人在国王向安东奈斯库发动突然政变能先发制人，或者至少在它一发生后就立即采取行动，他们还可以挽救一下残局。德国特工局提供了足够的材料说明对国王和他的同伙（民族主义集团的领袖们和安东奈斯库政权中的动摇分子）采取行动是正确的。用很小的一支德国部队就可以达到制止政变的目的，因为这里没有群众支持和参加的运动，而只是少数几个人的行动。如果在逮捕两个安东奈斯库之后立即进行干涉，大抵也会成功的。这样就会推迟了危机，并且给人一个喘息的机会。德国公使馆的优柔寡断、基林格的办事无能和希特勒的错误估计罗马尼亚政局，这一切导致了他们的丧失了时间，导致失败。

8月23日当天晚上，公使馆参赞和代办斯特尔泽博士被召见王宫去。罗马尼亚新外交部长正式通知他罗马尼亚和轴心国已断绝关系。假如他们不进行敌对活动，这位部长可提供德国部队安全撤退的便利。这是一种让步，因为根据罗马尼亚与苏联停战协定的第一款，要求罗马尼亚改变阵线，并且继续对德国作战。

在8月23日半夜，德国派驻罗马尼亚的军事代表团才接到希特勒的“粉碎政变”的命令。德国公使的扑朔迷离的报告使德国政府无从得知事态的真正发展。还不到十点钟，罗马尼亚国王就宣布了对苏联停止敌对行动，希特勒的总司令部才弄清局势的真相。这种贻误永远无法补救。

根据他们坚定不移地崇奉元首的精神，差不多所有布加勒斯特的德国人，包括德国军事代表团的三军首长汉森和戈尔斯堡将军和蒂莱森海军上将都聚会到公使馆，会见德意志帝国的首席代表德国公使。罗马尼亚保安部队，很快就切断了他们和外界的关系。德国空军的戈尔斯登堡将军以希望阻止德国军队不要做得过火为理由，被罗马尼亚指挥官准许离开公使馆数小时。然而戈尔斯登堡将军并没有遵守他的诺言，却极力采取军事措施。他这样做时犯了一个判断的错误，后来引起了严重的后果。反击很早就应该发动，只要这个反击至少有一些罗马尼亚军队的支持，甚至那时也能够成功。所以在采取任何军事行动以前，必须有某种政治对策作为必要的条件。取得一些罗马尼亚部队的合作共同反对新政府，倒是个好机会。虽然有这样的机会，戈尔斯登堡却糟蹋了。在最初罗马尼亚军队并不愿接受苏联的要求，调转枪口向旧日的盟友开火。尽管在任何军事联盟中难免有小磨擦，而罗马尼亚前线部队对德国人并不心怀厌恶之感。德国方面采取缓和明智

的态度,无疑只会促进他们的迟疑不决。但是鉴于德国军事力量薄弱,从军事观点看来,戈尔斯登堡的行动也是愚蠢的。这迫使罗马尼亚人投向敌人一边。戈尔斯登堡在8月24日下令斯图卡飞机袭击布加勒斯特,这就割断旧日盟友之间最后的微妙的联系。

这种无意义的行动毫不能扭转驻布加勒斯特的德国军队的命运。德国从多瑙河的朱尔朱港调来援军企图向布加勒斯特挺进,以挽回不利的局面,他们只挺进到距阿巴散德酒店几百码附近,那儿是德国军事代表团的驻地,就被击退。德国军事代表团既无援兵,又只装备有小武器,他们不能再有所作为,因此德国就永远丧失了对罗马尼亚和布加勒斯特的控制。

德国公使对迎面受到致命的当头一击,迷惑不解,9月2日在罗马尼亚军队即将冲进公使馆以前,枪杀了自己和他的秘书彼得森小姐。公使馆的其他人员和德国在罗马尼亚的大多数人在短期拘禁以后,被苏联人押送到一个陌生的地点去。除极少数人例外,他们都久远下落不明。

由于反对安东奈斯库和德国当局的政变成功。俄国人在罗马尼亚取得完全胜利,红军自由地进驻罗马尼亚全境,几日以后,苏联的军队占领了喀尔巴阡山隘口,德国人在东南欧的失败命运也就注定了。

克里姆林宫怎么赏赐那些在8月23日搞政变,给红军打开通往铁关和喀尔巴阡山隘口的人们呢?那位在紧急关头,表现出有决断能力和勇于负责的政治家风度的年轻的国王,很快在维辛斯基的指令下,放弃了王位,放逐到国外。随后在一连串的审讯中,一些参与政变的政治家们,被指责为“法西斯阴谋分子”,另一些被指责为“搞和平阴谋分子”,送到苏联牢狱中,此后再也没有人见过他们。

匈牙利的悲剧

1944年3月19日德国人入侵匈牙利一举，使全世界大为震惊。但是对于那些了解匈牙利是在玩弄一种表面和德国保持友好关系手法的人，却不以为奇。表面看来，两国之间的关系是稳定的，但在骨子里却潜藏着一股尖锐而紧张的暗流。要想了解导致德国发动入侵行动的一系列事件，且让我们先了解一下德匈两国关系的发展情况。

1934年匈牙利首相久拉·高贝什步波兰的后尘，对德国取消了当时各国对德国国社党政权所采取的普遍的孤立政策。这件事本身并不怎么重要，因为匈牙利在当时世界政治活动中不是一个举足轻重的国家。但希特勒对匈牙利的这一举动却十分欣赏。其实匈牙利此举也不过是个姿态而已，它在外交政策上最关注的还是和意大利搞好关系。匈牙利的政治家们害怕匈牙利会变成德国的卫星国。他们认为和意大利搞好关系是避免这种威胁的一种明智的预防措施。他们渴望自己的国家隶属在意大利的势力范围之内，首先因为他们认为德国对意大利的利益是不得不予以尊重的，其次，意大利的军事力量不像德国那样，对匈牙利构成重大威胁。意大利一直把匈牙利当作一个前哨阵地看待，而对于德国来说，匈牙利只不过是德国向东南方扩张的一个起点。当时匈牙利的一些

身居要职的领导人看到奥地利也正想借助于意大利的力量推行它的独立政策，这使他们更加深信自己的这种看法是正确的。这样一来，就可以使一系列国家组织起来，从而可以抵制德国日益增加的压力。

当长期以来一直保障意大利—匈牙利—奥地利三国的协约关系的斯特雷扎阵线崩溃，以及奥地利被德意志帝国吞并之后，匈牙利仍然认为可以利用意大利作为抵制德国压力的一个平衡力量。

的确，有一个时期，看来匈牙利确实认真地想要加强它和意大利的关系，并且想使这种密切关系长久保持下去。1939至1941年间，匈牙利驻在罗马奎里纳尔的公使曾与墨索里尼和齐亚诺举行过一系列会谈，会谈内容是让一位意大利亲王作匈牙利王国的新国王，或者通过王室的联盟而使两国有合并的可能。据说匈牙利摄政霍尔蒂海军上将支持这些建议，虽然对于他想要以他的家族来建立一个新的匈牙利王朝，并没有什么妨碍。他在建立新王朝方面采取的第一个步骤是把摄政变成一个世袭的职位。

与此同时，匈牙利表面上和德国讲友好，这样一来给匈牙利带来的好处是又快又多。在1939年和1940年的维也纳的两次仲裁判定中，匈牙利得到了大片的领土也就是当初圣·史蒂芬斯王国领土的一部分，而且德国还允许匈牙利吞并喀尔巴阡—乌克兰。这时，匈牙利人还希望德国能让他们随意反对罗马尼亚人或者允许他们参与德国可能要反对马扎尔地区的主要敌人所采取的任何行动。只要一有机会，匈牙利参谋总部就要派军队到罗马尼亚边界去，通常是派以“流浪者旅”著称的非正规部队去。这个旅之所以叫“流浪者”是因为他们是由一批具有极端民族主义思想的志愿者组成的，他们不

穿军服，他们的目的是要恢复圣·史蒂芬斯王国在战前的领土规模。“流浪者旅”在1920年至1921年之间曾经名噪一时，因为他们企图为匈牙利重新征服特兰西瓦尼亚，但是却遭到可耻的惨败。

希特勒对匈牙利在1938年至1941年间获得的土地表示赞许。这纯粹是出自战略原因。毫无疑问，希特勒如此强烈倾向匈牙利人，是因为在匈牙利人身上，他看出他们是曾使中欧震惊的那些英勇善战的亚洲骑士的后代，后来还成为西方抵抗来自东方威胁的一支走在最前面的保卫者。此外，希特勒对匈牙利的光荣历史，对匈牙利抵制《特里亚农和平条约》，在1919年推翻共产党政府以及匈牙利首相高贝什发起的“保卫种族”运动的强硬的反布尔什维克的政策，也同样十分欣赏。

尽管如此，希特勒对匈牙利摄政霍尔蒂仍然感到很不信任。他认为霍蒂尔是一个思想僵化、老朽无能的奥地利海军上将，完全被他手下那些亲英的和犹太人的心腹所操纵，他在思想上对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党及其元首个人充满了强烈的反感。当匈牙利首相高贝什在1936年过早地死去时，希特勒认为当时没有一个可以使他信得过的首相继承人，因此，他十分关注匈牙利局势的发展。他通过德国的特工局对匈牙利的秘密外交活动了如指掌。为此，希特勒在很长时间内对匈牙利内政不加任何干涉。

在匈牙利国内也发生了多少类似德国的国社党的政治运动，但并没有使希特勒改变对匈牙利的态度。在匈牙利的政治运动中，最重要的是一个由匈牙利参谋本部的一名退伍少校费茨伦·萨拉希领导的名叫“箭十字党”。这位年龄仍然很轻的军官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时，不过刚刚从维也纳新城军

官学校毕业，在他的血统里没有多少马扎尔民族的血缘。在他的祖辈中，有一个是亚美尼亚人，另一个是斯洛伐克人，还有一个是德国血统人。一些有才干的知名人士参加了他的党，由于萨拉希是一个缺乏组织能力，思想不明确的知识分子类型的人物，所以在建党初期号召力不大。

萨拉希因为参加政治活动早已被军队开除。在他被捕之后，一个搞宣传工作的专家卡尔曼·胡贝博士暂时接任该党领袖，党员人数立即激增。及至1939年，该党成了匈牙利第二大党，这一情况一般人都不知道，但“箭十字党”作为匈牙利第二大党的时间并不长。萨拉希出狱后带着新获得殉道者的荣誉，把自己美化成永不会失败的领导人，接管了该党的领袖职务，但在几年之内，使该党进行政治运动的规模越来越小，最后竟变成一个无足轻重的政治团体。原来党内的一些智囊人物，包括胡贝在内都纷纷离开了他；有些人后来组织了另外一个党，即“匈牙利国家社会主义党”，但是这些人也没有取得多大成就。

德国对“箭十字党”采取了一种完全中立的政策。德国不愿意只是由于有共同看法就对该党表示支持，至少在能得到好处之前是不会支持他们的。国社党领袖们之所以能继续持这种超然的态度，是和匈牙利的鲜明政策分不开的，这种政策也就是“箭十字党”的纲领的一部分。该党的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则是要把欧洲划为几个势力范围。德国的势力范围应该是中欧；意大利的势力范围应该是包括整个地中海海岸的南欧；至于东南欧则应划归匈牙利。这种想法同希特勒的外交政策是不符的。德国政府对于前首相贝拉·伊姆雷迪新组成的政党也持同样超然态度，尽管这个党的纲领与“箭十字党”的纲领在思想上毫无共同之处。伊姆雷迪的外交政策是建立

在只和德国保持密切而唯一的合作基础之上的。德国对于“箭十字党”的策略是只有在看来对希特勒有利的时候，才出来对匈牙利内政进行干预和扶植该党上台。

德国和匈牙利之间最初发生分歧是在1941年的春天，当时希特勒正准备向南斯拉夫发动进攻。一个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保罗·捷列基伯爵的自杀。在此不久以前，匈牙利刚和南斯拉夫签订了一项友好条约，并且刚在2月27日才批准。现在，德国却来邀请匈牙利一起攻打它的新朋友，众所共认，匈牙利因此可以得到大量报酬，也就是把它在1918年割让给南斯拉夫的故土完全收回。此外，希特勒在一次秘密会上还答应霍尔蒂说，匈牙利还可以得到塞尔维亚的巴纳特地区。

霍尔蒂本人对于获取这一战利品毫不感到不安，可是首相捷列基伯爵认为撕毁刚刚缔结的条约不仅在道义上是可耻的，在政治上也是错误的。当霍尔蒂强迫他签署总动员令时，他发现自己面临着无法解决的良心问题。结果他只得服从摄政霍尔蒂的意愿，签署了总动员令，可是他感到身为匈牙利的贵族，不能犯毁约之罪而继续偷生，于是在第一名匈牙利士兵越过南斯拉夫边界之前，就开枪自杀了。

当德国后来考虑要进攻苏联时，摄政霍尔蒂也扮演了同样的角色。作为一个崇拜英国的人，霍尔蒂渴望避免与西方国家发生冲突，因此他对于德国要对苏联发动一次先发制人的战争的想法是臭味相投十分欢迎的。1939年，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使霍尔蒂大为震惊，大多数匈牙利人民对此也必然感到震动。到1941年德苏敌对行动爆发为止，霍尔蒂一直把通过匈牙利特工组织搜集到的苏联正在备战的消息送给希特勒，警告他不要疏忽大意。在这一点上，他对希特勒的影响决不能低估，毫无疑问，他的警告加强了德国元首要进攻苏

联的决心。希特勒本人在一系列谈话中充分地表明了这一点。他还说，如果匈牙利站在德国一边，决不会背信弃义。

霍尔蒂迫使拉兹洛·巴多希首相和他一起签署对苏宣战的命令。后来在纽伦堡审判庭上，霍尔蒂被指控犯有与希特勒1941年4月在匈牙利同谋进攻南斯拉夫，以及1941年6月同谋对苏宣战的罪行时，霍尔蒂竟想把所有责任都推到当时他的首相和部属身上。巴多希的态度却截然不同，他认为效忠于国家元首是神圣的职责。直到审判终结，他始终未提及他是在霍尔蒂施加极大压力之后，才下令匈牙利军队对苏开战。

必须指出，霍尔蒂决定对苏作战，匈牙利的准备工作是十分不够的。前线的不幸的士兵们就说明了缺乏组织性。匈牙利军队处境艰苦，伤亡惨重，所获却极微小。一系列惨重失败使他们无法招架。在初次重大的军事惨败中，匈牙利第一军在顿河地区全军覆没。匈牙利后来就变得厌战起来，而那些在1943年春天就开始想与西方国家单独讲和的领袖们，却以为全国人民一定会支持他们的。

他们和西方国家几个最重要的联系点是匈牙利驻斯德哥尔摩、伯尔尼、里斯本和安卡拉等地的公使馆。当时主张与西方国家讲和的推动力就是首相米克洛斯·卡莱伊本人。当时的顾问、曾任首相多年的贝特伦伯爵在这次讲和中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霍尔蒂对他们想单独与西方国家讲和的努力很了解，宽恕了他们，并且对这类活动的发展情况保持密切的接触，实际上，只有匈牙利的特工组织才有办法和敌对国家建立不引人注目的接触。摄政和他的首相的主要的可以信任的密使是国家安全部长（相当于德国的盖世太保）。安全部长是乌察希少将，他从参谋本部第二处处长卡达尔上校那

里得到许多帮助。

大约在1944年初，上述行动的具体结果才开始出现。匈牙利方面的调解人宣布，匈牙利愿意见定一项单独讲和的条约，并且表示想要了解对方需要哪些条件才肯同意停战。西方国家派出代表是一名美国上校。他没有任何谈判权，只是美国特工机关即战略服务局的一名军官。在其致匈牙利安全部长乌察希的一次短波电讯中，这位上校宣称他准备乘飞机到匈牙利来当面商谈进一步的细节。访问匈牙利的日期定为1944年3月中旬。

关于所有这些谈判，特别是乌察希和美国上校之间的联络，我通过匈牙利的一些谍报军官了解得清清楚楚。我把所有这些情况都向柏林作了汇报。当时，希特勒决定采取行动。他下令说：“即使东线的南段不致受到严重威胁，匈牙利决定单独讲和的企图也必须予以挫败。”准备工作立即开始了。在希特勒的命令下，陆军参谋总部制订了马格里特第一号行动计划，——保卫匈牙利。又制订了另一个行动计划，即马格里特第二号——保卫罗马尼亚；可是行动时间来到了，却搞不到军队。

希特勒原来打算用德国军队去占领匈牙利，但是也让一些罗马尼亚和斯洛伐克部队去参与后来的占领行动。希特勒只是用一般的措词而不是通过任何正式约定把他的意图通知了安东奈斯库元帅和提索总统。虽然他们没有从希特勒那里得到什么具体细节来进行军事部署，但都对希特勒提出的建议热心支持。德国国防军的计划没有把罗马尼亚和斯洛伐克部队的支援考虑在内，只想使用德国军队去占领匈牙利。

虽然里宾特洛甫和希姆莱都认定这样做法是完全错误的，但他们仍然对希特勒的计划不加思索地加以吹捧。我作

为德国特工局驻东南欧事务处的顾问，急忙草拟了一份备忘录，提出另外一个计划。可是里宾特洛甫和希姆莱两者都拒绝把这份备忘录呈交希特勒，因为他们知道这一计划和元首亲自制订的计划不一致。然而在最后时刻我终于找到了一个胆敢递交备忘录的人，即华尔特·赫拉尔——最高统帅部的外交事务首席联络官，事实证明，比起德国大多数要人来，他是个伟大得多的见义勇为的人。

我在那份备忘录中指出，使用罗马尼亚和斯洛伐克的军队，其后果是不堪设想的。到那时匈牙利人会立即放弃目前进行的战争，转而使用所有的武器来保卫自己，竭尽全力地对付斯洛伐克人，尤其是罗马尼亚人，那时想在匈牙利求得安定是不可能的，特别是在军事行动中具有特别重要意义的喀尔巴阡和特兰西瓦尼亚这两个地区。甚至在特兰西瓦尼亚边界地区会爆发一场激烈的游击战争。其结果必然和希特勒所设想的，也就是保全东南战场的交通运输线，完全落空。我那份备忘录还指出，无论如何不应推翻匈牙利摄政霍尔蒂，相反还必须想尽一切办法使他站在德国一边。这样一来，才能使现政权存在下去，否则匈牙利的秩序就维持不了。应该说服霍尔蒂解散卡莱伊的政府，以一个各党联合的内阁取而代之，以便继续和德国共同进行对苏战争，直至取得最后胜利。

希特勒终于被这些论点所说服，放弃了自己的计划，并采纳了备忘录中的建议。为了实施这一新计划而进行准备工作，他邀请霍尔蒂在贝希特斯加登举行会谈。在这次会议上他说得十分直率。他宣称，他不能再站在一边，等待匈牙利政府一次又一次地尝试同西方国家达成协议；必须罢免卡莱伊，负责组织新内阁的人，必须是德国可以信赖的人，以便

阻止使匈牙利退出战争的种种活动。他还尽力说服霍尔蒂，匈牙利在这个问题上没有选择余地，西方各国根本无意援助匈牙利，并且肯定哪一个国家都不会保护匈牙利来抵抗苏联的进攻。希特勒以动人的言辞说明，如果匈牙利退出战争，必然会自投罗网，落入苏联之手。

希特勒的论点对霍尔蒂产生了深刻影响，他毫不犹豫地接受了希特勒的反对布尔什维克的论点。希特勒很快说服了霍尔蒂，派遣德国军队到匈牙利去是如何至关重要。但是霍尔蒂则是经过一再表示异议后，才同意让高级党卫军和德国警察部队的警官到匈牙利去。霍尔蒂最坚决反对的一个条件，是德国竟提名维森梅尔博士为新的德国驻匈牙利的公使兼全权大使。此人曾于1943年被里宾特洛甫派到匈牙利进行过一项秘密使命。后来因他密谋反对霍尔蒂本人，就刚刚在几个星期以前，应霍尔蒂要求被召回国。在这个问题上希特勒也同样坚决，非要派维森梅尔到匈牙利不可，最后，霍尔蒂不得不忍辱让步，接受了他的要求。

维森梅尔被任命为全权大使是由他的保护人凯普勒博士提出来的，里宾特洛甫由于个人原因极力予以支持。他决定不惜任何代价去阻止把这一重要职务给予他的对手，德国驻萨格勒布总领事冯·赫尔斯特将军。建议冯·赫尔斯特将军任匈牙利全权大使是德国特工局提出来的。他们指出这位将领担任这个职务的双重好处，即他不仅是一个杰出的匈牙利问题专家，而且还是摄政霍尔蒂的至友。如果任命他为全权大使，肯定会被霍尔蒂认为是德国的一项友好姿态，而且会使两国间的局势大为缓和。同时，还有一个问题也是毫无疑问的，如果这位经验丰富而又足智多谋的奥地利人一旦就任驻匈牙利全权大使，他不但会对霍尔蒂产生巨大影响，还会想方设

法起到缓和德国政策的作用。

1944年3月19日清晨，霍尔蒂乘坐专车从萨尔茨堡回到布达佩斯。德国新任驻匈牙利公使兼全权大使维森梅尔同车到达。他一直守在站台上，好像在心满意足地考虑着自己的胜利。坐在车厢里的霍尔蒂一点也未察觉那个多少经过修改的马格里特一号行动计划已经开始行动了。希特勒对霍尔蒂答应一定要继续作战的诺言并不完全相信。因此，他下令在霍尔蒂回到匈牙利首都以前，一定要完成这一行动计划。结果在19日拂晓时，一些来自奥地利和塞尔维亚的德国精锐部队便到达了布达佩斯郊区。他们占领了所有战略要点。随后又开来了一些战斗力十分弱的德国部队，勉强够得占领其余的据点。匈牙利人未作任何抵抗，使这一事件被认为只不过是德国的又一场“鲜花战斗”（指亲德分子给占领军送鲜花表示欢迎）。一些报道说，德国军事列车曾遭到炮轰，高射炮也对支援的德国飞机进行射击，但这些报道纯属虚构。如果确有其事，匈牙利必然会遭到德国人的严厉报复。当时匈牙利人最为关心的是东线的威胁愈来愈逼近喀尔巴阡地区。

像往常一样，每逢这种情况，德国的盖世太保总是德军向布达佩斯和其他大城市进军的先遣部队。盖世太保手中也已掌握了一些反对同德国合作的匈牙利领导人物的名单。3月19日凌晨，盖世太保逮捕了一大批人。可是他并没有想以种族的立场来作为大逮捕的藉口。因此，在保安部队的司令中午接到希姆莱的电话，问到已经有多少犹太人被德国人拘留时，他不胜惶恐。为了满足上级的要求，他竟想出了一个妙计，立即给送去一本布达佩斯电话号码簿，选择了200名听起来像犹太人名字的医生和律师，下令把他们统统逮捕起来！当天晚上他就得意地向党卫军的头头报告，说有200名

匈牙利的犹太领导人物已牢牢地落在他的手中。

德国并没有要求摄政霍尔蒂去作任何违反宪法的事。他像往常一样回到了任所，即由他自己的卫队保卫的布达佩斯皇家城堡。他在那里采取了严格根据宪法程序的一切必要措施。

他的第一个任务是推选一位新首相。维森梅尔博士早就有一个候选人贝拉·伊姆雷迪。这个人几年前就当过首相。可是，维森梅尔没料到事出意外。伊姆雷迪拒绝的理由是他认为摄政霍尔蒂不会任命他为首相。于是，匈牙利人就建议让匈牙利驻柏林公使多姆·斯托亚伊将军出任首相。尽管德国政府人士很喜欢这个人，可是他在匈牙利内政方面却没有什么卓越的贡献。看来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他才是组成一个过渡内阁的最佳人选。斯托亚伊很快就组成了内阁，这不是一个极右党的政府，而是由过去各当政政党中有经验的人物的集合体。只给了匈牙利国家社会党一个部长的职位，并且是由一位专家担任的。“箭十字党”却没得到任何席位。

几天内，全部事情都顺利解决了。表面看来好象什么都没改变，经过一次小小的变动，匈牙利再度和它的盟国德国取得协调一致。德国取得了可以喘息的余地。但是，这是否给德国一个机会去牢牢地驱使匈牙利为它卖命呢？德国是否能够建立一支新型的匈牙利军队呢？为时太晚了，维森梅尔不是那种可以把丧失的时间补救过来的人。

维森梅尔既不了解匈牙利，也不想填补这方面知识的空白。他对于选择一些合适的辅导者方面也没有知人之明。他是一个狡黠的阴谋家，当他面临一项建设性任务时，就完全无能为力了。事实证明他无力把匈牙利的经济潜力发挥出来用于战争目的。更为严重的是，他在改善同匈牙利军队关系

方面完全失败了。

对维森梅尔说来，1944年春天，凡是在喀尔巴阡山线进行防御战的会谈就意味着失败主义。他想要作的是派匈牙利军队到苏联草原上去作战。可是，他的这种想法却毫无吸引力。如果早作准备，就很有可能导致在喀尔巴阡山的一些要隘地区把红军击退，但这一绝好机会却被丢掉了。

如果匈牙利各师团坚守住喀尔巴阡山一些要隘地区，那么战争最后阶段的情况就可能截然不同了。根据德国和匈牙利双方军事专家的意见，这些匈牙利各师足可阻扼苏联军队前进，以便使德国有充裕的时间来调整部署，这是由于罗马尼亚的转变所要求的。除了瑞士的阿尔卑斯山和比利牛斯山之外，欧洲没有一条山脉能比喀尔巴阡山脉和特兰西瓦尼亚阿尔卑斯山提供更好的天然屏障了。军队在这道山岳防线上进行抵抗，大型机械化部队就很难突破。如果当时抓住这个防御机会不放的话，那匈牙利和奥地利就可能不至于遭到苏联人的占领。今天的东欧和中欧的政治形势就可能大不相同了。当然，这一切不能完全归罪于维森梅尔个人。责任主要也是在那些对形势的严重性看来认识不足的匈牙利当权者身上。

霍尔蒂先前企图与西方各国达成谅解的努力，并没有取得任何具体成果。后来西方国家坦率地告诉匈牙利谈判者，根据他们与莫斯科的协定，匈牙利是属于苏联的势力范围，因此，匈牙利的任何停战建议必须首先向苏联提出。

西方国家的这一答复使反共的霍尔蒂大为震惊，以至丧失自信心，迷惑不解。到了1944年夏天，他再度得出结论，匈牙利除了和德国人一起进行反共战争到底之外，别无其它选择。可是，与此同时，他又得知一些他认为是最重要

的情报。通过朋友关系，他听说某些德国团体已开始与西方进行谈判。实际上进行接触的只有一个非官方的团体，不过这一情报是有意识地传达给霍尔蒂的，其目的是为了使他相信，与西方国家达成协议还是有实际可能的，即使他仍在与苏联作战。这是我们玩弄的一个计策，使霍尔蒂相信，即使他和德国并肩作战，还是有希望和西方达成协议的。

德国特工局作出坚决的努力，以利用霍尔蒂对西方国家的失望情绪。它怂恿一批匈牙利政治家组织一个延长抵抗的阵线，作为匈牙利能避免被苏联占领的唯一方法。我们为反对向共产党敌人投降而组织了一个匈牙利抗战联盟。我们说明在先，这一阵线不需要向国家社会主义党表示友好。新政府的第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必须沿着喀尔巴阡山脉全段迅速而有效地准备一条防线。在参加这些会谈的匈牙利人请求之下，德国方面同意，在英美军队在亚得里亚海岸线登陆时，匈牙利人可以不应召对英美的人侵进行抵抗。德国特工局的头子舒伦堡立即表示保证履行这一诺言。他认为英美联军既然在诺曼底战场进行大规模登陆，他们无论如何不可能再在亚得里亚海岸线从事第二次联合行动。这时德国还不知道，丘吉尔面对罗斯福和斯大林的反对，已经被迫放弃了他计划在东南欧发动一次攻势的计划。与此同时，舒伦堡还设法得到了希姆莱的支持，这样一来，在最危急的时刻，总算不失时机地使匈牙利真正动员起来抵抗了红军。

看来，困难并不算太大。萨拉希拒绝接受新政府对其“箭十字党”提供的两个部长的席位。可是却被大多数别的政治家满意地接受了。他们所以要采取与“箭十字党”的合作，不过是为贯彻各党共同参政的原则而已。这时萨拉希像希特勒在1933年所表现的那样，宣称只能以领袖的身份参加政府

工作，当时德国公使曾答应把首相职位给他，可是后来却把他甩在一边。随后新首相米哈伊·捷列基伯爵把他的内阁名单和施政方针都提交给霍尔蒂，并取得了霍尔蒂的批准。情况看来很清楚。

德国内部政策的缺乏协调一致是人们意料不到的。我以前不知道。作为全权大使的维森梅尔的确答应过让萨拉希担任国家领袖。作为德国大使的维森梅尔认为他必须实现自己的诺言。我们两个都向希特勒申诉过，阐述了我们不同的看法。我的主要理由是东南欧的安全正处于危急之中，其他的问题必须暂行搁置，不加考虑。维森梅尔却反驳说，由德国特工局支持的匈牙利人是西方国家的公开朋友，同它们有接触是人所共知的。他指出，米哈伊·捷列基曾在英国受过教育，是一个人所共知的反对国家社会主义者。

这一争取希特勒支持的斗争仍在高潮时，罗马尼亚突然出现可能退出轴心国阵营的全面危机。匈牙利于是出现了一个全新的局面。摄政霍尔蒂又转而倾向和谈。在1944年3月23日罗马尼亚政变之后，霍尔蒂认识到对德国来说，东南欧战场和其它各个战场是必败无疑的。他感到匈牙利只有尽快和苏联达成谅解，别无其它良策。虽然他已答应支持以捷列基公爵为首的各党组成的联合政府，然而他却突然出人意外地又成立了一个由拉卡杜什将军为首的军政府，这个政府都是由忠于霍尔蒂的人组成的。政府组成之后，他立即试图与苏联人接触。

他用各种方式设法同苏联联系。他把最大的希望寄托在曾作过安全部头子的乌查希将军的处事的技巧上，乌查希在卡莱伊任首相时与西方国家进行过多次谈判。为了保护乌查希、卡达尔上校和克尔恩少校等人不被盖世太保逮捕，霍尔蒂

后来把他们几个人以体面的软禁送进纳多尔兵营禁闭起来。因此乌查希的行动自由受到了限制，但并没有与外界完全隔绝。在绝对保密的情况下，还准许他溜出兵营进行活动。现在霍尔蒂命令他设法与匈牙利的抵抗运动接触，并通过该组织与苏联人接头。这个办法真是奇妙之至。乌查希作为安全部的部长，一直是匈牙利左派的最痛恨的死敌。他那残暴的镇压方式使左派对他怀有深仇大恨。然而，尽管如此，乌查希还是胜利地完成了使命，并不是由于他个人作了什么巨大的努力，倒应感谢他的朋友凯塞琳·卡拉迪那些人。

卡拉迪皮肤稍黑，身材苗条，唇型丰满，为人热情，虽然她没有多大戏剧天才，却很想成为一位电影明星。她除了有想演电影的野心外，还想在政界里扮演一个主要角色。她政治界中向上爬时间很久，也很艰苦。几年前，她还是布达佩斯一家类似夜总会的女老板。这时被青年军军官发现，吸收到各军种的军官俱乐部去。后来匈牙利安全部部长乌查希少将成了她的有势力的保护人，他的强大权势的影响促使卡拉迪摇身一变成为电影明星。乌查希变成了她的忠实的奴仆。他认为卡拉迪是安全部最有价值的谍报人员之一，设法为她布置一套豪华舒适的公寓。他要求卡拉迪在设法和匈牙利地下运动组织接头的困难工作中助他一臂之力，而卡拉迪果然胜利地和那个被莫斯科委任为匈牙利共产党领袖的人接上了头。这个人便是拉斯洛·拉伊克。

匈牙利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方式是很奇怪的。在1919年贝拉·孔政府被推翻以后，共产主义运动在匈牙利政治中，不再起关键作用了。党的领袖逃到苏联，想在那里组织一个地下的匈牙利共产党回来活动。可是一些刚成立的小组都毫无例外遭到匈牙利秘密警察的破坏。那些逃亡者只好暂时安于

为共产国际或是为苏联工作，为最后夺取匈牙利本国政权而进行准备。

住在苏联的匈牙利共产党的流亡者中，最有才智的是耶诺·瓦尔加。他的父母是一对贫穷的犹太人。他本人的职业是个面包师，后来又去经商；与此同时他还在大学读书，直到毕业。以后他曾在布达佩斯商业学院任财政经济教授。他发表的许多关于经济问题的文章曾引人注目。他对政治很感兴趣，最初参加了社会民主党。可是，在1919年贝拉·孔政府成立时，瓦尔加立刻投到共产党那一边去了，并且担任了人民财政委员。在共产党专政的政权垮台以后，他逃到了奥地利，在那里被监禁了一个时期，其后才到莫斯科去。他在苏联逐渐出人头地，取得了一个重要的地位。最后他成为苏联最高经济委员会的一名成员，并在制订五年计划工作中起过作用。

匈牙利共产党流亡者中另一名“智囊”是艾尔诺·捷罗。他在莫斯科住了20多年，以苏联上校的头衔跟着红军先遣队回到匈牙利老家。后来他当了商业和通讯部长，接着担任了财政部长，在这两项任命，显示了他是有真才实学的。

当莫斯科要任命匈牙利共产党领袖时，他们选中了马特亚什·拉科西，他是共产国际组织中的匈牙利顾问。拉科西的真名是罗茨，但为了隐瞒他是犹太人的出身才改了名。在贝拉·孔独裁政权时，拉科西曾经是匈牙利共产党的领袖。他曾亲自下令处决过无数的“反动”政客。1924年，他曾被判处死刑，可是后来又改判为终身劳役监禁。他在监狱里蹲了16年，直到1940年最后为了交换几面匈牙利的军旗他才被释放。这几面匈牙利军旗是在1848年沙皇俄国派遣军从匈牙利

叛军中缴获的。拉科西获释之后，直奔莫斯科，并且在那里住了下来。他不象贝拉·孔那样成为反对托洛茨基政策的牺牲品，总是竭力使自己的观点迎合克里姆林宫的统治者的口味。斯大林虽然支持拉科西，但从来没有完全取消对他的怀疑，并且下令对他进行密切监视。斯大林把这个任务委派给一个叫纳塔莎的女人，据说这个女人后来就是他的妻子。她是西伯利亚一个雅库特游牧民族的姑娘，有土库曼和鞑靼人的血统，深受斯大林的信任，最后成了幕后的一个权势人物，拉科西要是没有她就寸步难行。

共产国际的匈牙利部其他成员还有米哈伊·福卡斯和佐尔丹·瓦斯。福卡斯于1948年曾任国防部长。瓦斯又名温伯格，曾任共产党的第一任布达佩斯市市长。他们在共产党中只是次要人物，以后，他们原有的一点小小的权势也丧失殆尽。留在莫斯科的匈牙利共产党人仍然得到克里姆林宫的全力支持，那些留在国内的共产党同路人都得受他们的领导。

在匈牙利共产党人中，最重要的一个人物是拉斯洛·拉伊克。他出身于中下层阶级家庭，家住在塞克洛尔兰，这个地方是特兰西瓦尼亚的一个与世隔绝的说马扎尔语的居民区。由于他考上了爱特沃什学院的奖学金，使他有了受教育的机会，后来在一个中学里当了教师。他因极左观点而被解雇，于是便去了西班牙，加入了拉科西旅，一起参加了西班牙内战。在佛朗哥取得胜利之后，他便到莫斯科去受训，以便将来在匈牙利国内进行工作。1944年，苏联人派他回到布达佩斯担任匈牙利抵抗运动的领袖。拉伊克有六个弟兄，个个都积极从事政治活动。但他们都是“箭十字党”的党员。其中一个弟兄名叫安德拉什甚至还成为萨拉希影子内阁中的副部长。1944年底拉伊克曾被秘密警察逮捕，主要靠他弟弟

安德拉什的搭救，才很快获释。驻莫斯科的匈牙利共产党人对此十分恼怒，甚至诬陷他是受雇于匈牙利政府的间谍。从那时起，拉伊克和莫斯科的匈牙利共产党人之间的关系日益紧张。战后，拉伊克从内政部长这一要职被调任外交部长，只不过是执行莫斯科口授的政策而已。1949年春季，他终于落入了对立面的手里，被诬为“铁托主义”和代表西方国家进行特务活动，经过一场可鄙的闹剧般的审讯之后，被判处死刑并立即执行。

拉伊克毫无疑问是匈牙利抵抗运动的唯一真正的地下领袖。他在反对我们的工作中，显示出卓越的才智和勇敢。拉科西和莫斯科那批共产党人从来不敢脱离红军的直接保护，但是拉伊克却就在匈牙利秘密警察的眼皮底下，毫不犹豫地把抵抗运动组织起来，而且使之发展壮大。然而具有这种真正共产党献身精神的人为数不多。可是，拉伊克的成就始终不大，就以共产党领导的抵抗运动而言，也是局限于在布达佩斯和其他几个工业大城市的较贫困郊区中组织了几个小组而已。

我注意到有些属于不公开的反对派的人，也许可以把他们称为温和派。这些人后来在社会生活中成了显要人物。在这些人物中有“小地主党”的两个总理：费伦茨·纳吉和他的继任者拉约什·邓尼叶什。此外还有该党的总书记贝拉·科瓦克茨，后来被苏联人逮捕了。还有德若·苏里奥克和伊斯特万·巴兰克维茨，它们分别为自由党和天主教人民党的创始人。创建国家农民党的是彼得·维勒。他的同事，亦即该党的总书记是伊姆雷·克瓦茨，后来逃离匈牙利。还有后来成为驻莫斯科公使的历史学家久拉·泽克弗，还有大学教授吉查·捷列基伯爵，后来当上了部长。

我们不能说这些人创造了一个组织严密的抵抗运动。当布达佩斯被苏联人占领之后，为了战略理由，他们宁愿避免把共产党人置于过分显要的突出地位。因而他们转而依靠有左倾思想和同情心的知识分子以及职业政治家，并对这些人委以较高的官职。

以喀尔巴阡山脉为目标的竞争

虽然霍尔蒂希望乌查希去接头的是这样一些人，但是在1944年初，共产党统治布达佩斯的日子，看来还遥遥无期。不过乌查希还真的和共产党接上了头，有一次霍尔蒂竟在他的私邸接见了拉斯洛·拉伊克。但会谈的结果却没有取得什么成效。至于匈牙利其他各种政治集团和小派系，都因为缺乏强大的组织和事业心，没有起到什么作用。于是，霍尔蒂和他的顾问们都不愿把武器交给左派。

对执行霍尔蒂计划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军队，因为军队是匈牙利唯一有组织的武装力量。霍尔蒂首先关心的一件事是把米克洛什·达尔诺基和维勒什·达尔诺基两位将军争取过来，他们分别是匈牙利陆军第一和第二军团的司令。霍尔蒂的计划是想让布达佩斯城防司令贝凯少将对德国的卫戍部队发动一次突然袭击，预计德军必然要重整旗鼓，试图夺回布达佩斯。那时米克洛什·达尔诺基和维勒什·达尔诺基两位将军将迅速出兵，同时，从东北和东南两个方向夹击德军，从而解放布达佩斯。

布达佩斯城防司令贝凯和米克洛什·达尔诺基将军都准备行动，可是维勒什·达尔诺基将军对于这个作战计划却十分怀疑。他对苏联人有摧毁旧匈牙利的意图不抱幻想，但他深

信罗马尼亚的崩溃即将来临。如果事情果然如此，他所赞成的计划是想把在第二次维也纳仲裁决议中，匈牙利割让给罗马尼亚的喀尔巴阡山脉的领土收复过来。他主张守卫住喀尔巴阡山的各个隘口，以阻止苏联人的进犯。他的思想动机一部分是出自战略的考虑，一部分是出自民族主义的动机，不管出自什么动机，这个计划的设想是明智的，也很符合德国的利益。

由于德国十分害怕被指责为失败主义，这使他没有考虑与罗马尼亚的联盟崩溃后自己所应采取的战略。当一些混乱不清和扰乱人心的报道开始从罗马尼亚首都传到时，“一切听命于元首”的致命弱点，就以灾难性的方式暴露出来了。德国派驻匈牙利代表团不但没有马上许可匈牙利军队开进特兰西瓦尼亚地区的罗马尼亚部分，用所有可以调动的德军进行支援，反而犹豫不决，求助于元首司令部，乞求希特勒下指示。像往常一样，到达元首司令部的第一批有关罗马尼亚局势的情报，还带有乐观的色彩。对于当时形势的严重性丝毫没有反映。在真实情况弄清以后，几天宝贵的时间已经白白过去了。当希特勒最后批准占领特兰西瓦尼亚地区时，已为时过晚。苏联军队已兼程前进，到达通向匈牙利平原的进口“铁门”，消除了走向中欧的路障。维勒什—达尔诺基将军的军队装备虽然简陋，但是打得相当英勇，他们在夺取喀尔巴阡山的一些山口奔袭中，曾到达过蒂米什瓦鲁和阿拉德地区。但再不能前进了。他们只能面对着强大优势的军队，只能一面浴血奋战，一面撤退。在这场夺取喀尔巴阡山脉的竞争中失败了。

这场惨败清除了霍尔蒂的最后的犹豫不决。他决定向苏联人投降。他选中了宪兵司令拉斯洛·伐拉哥少将作为匈牙利

代表。这些准备投降的工作，尤其是最初的谈判都必须严守秘密，不能让德国人知道。至于向布达佩斯的德国驻军进行突然袭击，那是以后的事。仅从这个观点来看，霍尔蒂选择伐拉哥为代表是一个十分狡黠的行动。因为谁都知道伐拉哥是一个最大的亲德分子和共产主义的死敌。谁也不会猜疑他会与苏联人有什么秘密来往。1936年至1940年，他曾当过驻莫斯科大使馆的武官，回国以后，他写过一本严厉批评斯大林个人和整个苏维埃制度的书。现在霍尔蒂指示他取道安卡拉到莫斯科去协商投降事宜。霍尔蒂希望通过伐拉哥代表他与苏联政府的高级官员的交情，使投降谈判得以顺利进行。至于伐拉哥此行究竟取得了什么成果，那就不太清楚了。当霍尔蒂事先没有与苏联人进行商谈，就宣布投降条约之时，遭到了苏联人的谴责，说他这种行动是违反条约，并声称他们的考虑将不再受到与伐拉哥代表团达成的协议的约束。可是无论怎么说，最可能的是，伐拉哥那次莫斯科之行达成的协议只不过是无条件投降罢了。

德国特工局对霍尔蒂的意图了解得一清二楚，因此毫无疑问，他们是处于一种可以采取必要的反措施的地位。这一阴谋与广大人民群众无关。只需要抓住那一小撮人，这些人他们全都掌握了。但是在采用什么是最好方式的问题上再次发生了争执。

德国特工局认为，在这样严重的军事局势中，把政权彻底推翻，实在是愚蠢透顶。这样做的结果，只能引起匈牙利全国的普遍动乱和社会治安的全部破坏。因此，他们改而建议，应该不引人注目地迅速地把那些头目逮捕起来。贝凯·哈代、米克洛什—达尔诺基和维勒什—达尔诺基等人，至于霍尔蒂则应该剥夺他的自由行动，而不要把他抓起来。

在这一时期内，各种各样的因素都在发生作用。众所周知，霍尔蒂正在拚命使摄政的权位世袭下去。他的长子伊斯特万被任命为副摄政，可是却在离开前线时，酒后驾机失事，机毁人亡。（官方却说，他是在战场上战死的，并且围绕他死亡的情况编造了一套英雄式的传奇故事。）最初，霍尔蒂本想把他的小孙子，即伊斯特万的儿子立为继承人，后来他又考虑到这个孩子要过好多年才能到达继承摄政的法定年龄，于是放弃了这一想法，转而把他的次子米克洛什立为继承人。

作为国家领导人来说，无论从他的外貌上、道德品质上都不配做继承人，因为他长得身材瘦小，精神萎靡不振，一看就有点颓废的样子。此外，他还有许许多多臭名昭著的丑闻，迫使他曾经不得不离开匈牙利一个时期，他是夜总会的一个挥金如土的花花公子式的常客，除了夜总会的老板之外，他在匈牙利人民中间既没有朋友，也没有支持者。可是这位既没有责任感又无才能的小霍尔蒂却怀着强烈的野心。他认为匈牙利与德国关系的破裂，再加上他父亲素有壮志雄心的声誉，给他提供了继承父业的大好机会。他甚至和抵抗运动有联系，与拉伊克会谈过几次。

他决定采取独立行动，并派出一名密使前往苏联的托尔布欣元帅司令部进行联络。可是事实上这位信使却永远不会到达那里，因为他朝着相反的方向到西方去了，携带着窖藏的巨额外币取道奥地利逃往瑞士。这件事发生不久，乌查希告诉霍尔蒂说，匈牙利的特工局有一名叫马蒂的特工人员，此人住在捷肯涅什，同铁托有来往。小霍尔蒂认为这是一条最有希望的路子，如果他同铁托能就匈牙利和南斯拉夫之间未来关系达成正式协议，那么铁托就可能利用其同斯大林的

密切关系替他说些好话。可是最后他还是通过同他要好的同僚叫菲力克斯·博恩米萨的匈牙利多瑙河港口公司的董事，才同铁托进行了接触。他建议签定一项条约。匈牙利不仅将正式宣布放弃对塞尔维亚的巴奈特地区的所有主权，而且还将宣布放弃穆尔岛和巴什卡的主权。对他来说，最遗憾的是小霍尔蒂不知道乌查希的心腹马蒂实际上是在为德国人服务，并将他所知道的一切都向他的主子作了如实的汇报。此外，特工局决定在小霍尔蒂那里安插两名自己人作为“铁托的代表”，并向希特勒建议在这个年轻人同那两名伪装的南斯拉夫代表谈判的时候逮捕他。

随之而来的就是摆在摄政面前的最后通牒：或者是必须立即以摄政的名义任命一名德国人选中的将军，授予全权，担任国家和政府的元首；或者是德国政府通过广播和报纸将他和他的儿子同铁托的阴谋的整个内幕公布于众。这样一来，霍尔蒂家族妄想匈牙利政界中独执牛耳的一切希望便将付诸东流。毫无疑问，霍尔蒂是不会不接受的。

可是希特勒决定采取折衷的办法。他同意欺骗小霍尔蒂和逮捕反叛头目，但是他拒不接受那件最重要的建议，也就是说，避免彻底推翻现政权。他同意维森梅尔的意见，废黜摄政，并且应该把全权交给“箭十字党”领袖。希特勒预料这些剧烈的转变会招致麻烦，因此，他任命墨索里尼的解放者、著名党卫军上校奥托·斯科尔兹内指挥这次军事行动，由于维森梅尔近来连连失败，希特勒和里宾特洛甫都对他的能力不很信任，所以，他决定委托大使拉恩博士来主持政界大事。这位大使作为德国驻墨索里尼新法西斯政府在萨洛的代表，已经充分显示了他的外交才能。在1944年10月的决定性时刻，拉恩带着“支持援助维森梅尔”的指示来到了布达佩斯。

经过修改的计划的第二部分进展得非常顺利。10月10日清晨，小霍尔蒂的朋友贝凯在离开他的汽车走进里兹饭店的时候，被盖世太保逮捕了。当时雾气弥漫，没有任何人看见当时逮捕他的情况。贝凯就这样失踪了，连他的同谋伙伴们也不知道他出了什么事。这位打算奇袭德国驻军的关键人物的被捕，使整个计划的成功受到影响。因此，霍尔蒂决定推迟行动，把原订在第二天宣布投降的计划推迟到10月20日，他还相应地把这件事通知了苏联人。

过不多久，多瑙河舰队总司令哈代将军轻而易举地就被人从床上拖走逮捕了。与此同时，米克洛什—达尔诺基将军在他的部队的严密保护下才免遭逮捕。但他拒不承认他被解除陆军司令职务一事。但是到了10月15日，当他意识到由于贝凯和哈代的被捕，阴谋暴露时，他带着他的全班参谋人员逃往苏联去了。没有随同他一起逃走的维勒什—达尔诺基则在他的陆军司令部里束手就擒。

原订在10月13日对小霍尔蒂采取的行动，竟被那天发生的一件颇为滑稽的事情推迟了，在以小霍尔蒂和博恩米萨为一方，由两名德国特工人员伪装的铁托代表为另一方的会面时，摄政本人竟出乎意料地突然出现了！那两名扮演铁托代表的党卫军军官顿时陷入了窘境。最后，他们决定取消了原来规定逮捕另外两位谈判伙伴的计划。整段表演进行得非常顺利，直到最后也没有一点戏剧性的紧张气氛。在收场时，来了一段闭幕词，其中非常体面的摄政乞求“南斯拉夫”代表回去向铁托说明，他从来就没有当过纳粹分子，而且像他这样高龄，不会有人指望他成为一个共产主义者！在这段表白中，霍尔蒂运用了他惯常善用的柔和悦耳的奥地利方言讲话，这样一来可把两位“铁托”分子弄得心慌意乱，不知

所措。后来他们坦率地承认，当时他们很担心表演得过分地喜形于色，如果这样，就会和他们这次来谈判的那种既严肃而又带有敌意的游击队员的身份不相称了。但霍尔蒂却被这种兴高彩烈地表现所感动，在非常满意的精神状态下离开了会场。

但是，小霍尔蒂情况则不一样。在他陪同“南斯拉夫人”走到门口时，他发现了一个面容严峻的人十分可疑地在等着他。原来此人便是盖世太保的刑事处长鄂多·夫克拉格斯，他专门负责追捕小霍尔蒂的“老鼠行动计划”。该计划之所以叫“老鼠”，是因为对小霍尔蒂追捕由他的绰号“米老鼠”而命名的。^①这次不幸的会见击毁了“老鼠行动计划”。订于10月15日在多瑙河码头附近博恩米萨的办公室举行的第二次会议时，小霍尔蒂到场了，这一次他从他父亲侍卫中，精选了一分队强有力的保卫人员，他把这些人安置在所有毗连的房间里，以及邻近房舍的屋顶上。双方都可在这场斗智中各显奇能。德国人邀请了一些斯科尔兹内的人来支持克拉格斯的小分队。逮捕小霍尔蒂的行动计划没受到多少抗拒就完成了。在囚车一开走的时候，双方才发生了射击，这时克拉格斯和两名匈牙利士兵被击毙。

这一件事之后，事态发展很快。德国驻匈牙利公使和全权大使没有去拜访摄政霍尔蒂提出要他辞职，或者是当面羞辱他一番，而是决定等待他听到他儿子被逮捕消息后的反应。这时摄政完全陷于惶恐莫名不知所措的境地了。与他送给苏联信息，即将在10月20日宣布投降的通知恰好相反，而突然在10月15日，在匈牙利电台上宣布他已签订一项立即停战的协定。然而，他却没有通知大多数阴谋分子，其中包括

^① “米老鼠”是好莱坞狄斯耐制片公司出品的动画片中的主角。

许多陆军军官，他们早就预计到要阻挡德国的反措施。在霍尔蒂的宣布之后，电台就悄无声息，这样一来就更使那些既没有得到指示，又没有领导的阴谋分子陷于全面混乱之中。

在之后的16个小时里，一件又一件富有戏剧性的事件相继发生。阴谋分子中最重要的人物之一，匈牙利的参谋总长约罗什将军变卦了。他认为原来计划的政变已经失败，他赶快设法向德国靠拢，并向匈牙利军队声明摄政霍尔蒂宣布的停战协定根本不存在。在进一步命令没有到达以前，他命令匈牙利军队仍要与德国盟军并肩作战。正如大家后来所知道的，匈牙利军队内部大多数人根本不想听从摄政霍尔蒂的命令，并且放下了他们的武器。然而约罗什将军这一反声明却起了重要作用，对于那些深知阴谋内情的人造成了极大的混乱。

与此同时，在10月15日傍晚到夜间这一期间，大使拉恩博士与霍尔蒂进行了谈判，并从他那里得到了一个诺言，霍尔蒂向正式投降的方向不再前进一步。

霍尔蒂就这样白白浪费了大量宝贵时间。大约就在这个时候，德国大使馆的处境非常尴尬。因为使馆的房屋位于勃格堡上的绅士巷里，在匈牙利人占领了围绕勃格堡的整个地区之后，使馆完全被孤立了，这时他们要和德国外界其他部门维持联系遭受了极大的困难。霍尔蒂或任何一个有决心的将军肯定能战胜软弱无力的德国军队，可是匈牙利人却把他们所能利用的短暂时间浪费了，他们的抵抗终于被一个后来证明起了决定性作用的偶然事件所摧毁。

10月15日那一天，有几辆正开向东线的新型虎式坦克停在布达佩斯郊区的货场上。15日下午，驻匈牙利的德国党卫军司令菲弗·威尔敦布鲁克将军下令，急速把坦克上的弹药卸下来。然后他又命令把他所能找到的汽油灌进坦克，以便使

它们可以在布达佩斯绕行一周，亮一亮旗帜。这次示威游行，果然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影响很大。这时霍尔蒂看到别无他路，只得在10月16日清晨5点钟放弃斗争。把自己置于德国人的保护之下。然后，维森梅尔迫使他委托“箭十字党”领袖萨拉希组织新政府，辞去摄政的职务。这项声明是由摄政霍尔蒂的首相拉卡托什将军正式传达给德国全权大使的。与此同时，还附带了一项请求，即准许霍尔蒂及其家属到德国政治避难。就在同一天，霍尔蒂向匈牙利人民和军队告别。他承认约罗什将军提出的反声明是正确的。他号召匈牙利军队继续战斗下去，要显示自己配得上他们祖先遗留下来的伟大的传统。在他的呼吁之后，拉卡托什将军向全体匈牙利陆军和警察部队发出命令，停止对德国人采取一切敌对行动。附带提一下，在10月16日，匈牙利与德国的整个谈判过程中，拉卡托什将军卓越地显示了希特勒为褒奖他在东线战役中的功勋而授予他的“铁十字骑士十字勋章”的作用。

萨拉希表面上以一切合乎宪法的手续，接管了政权。霍尔蒂给议会的上、下院各送了一封亲笔信，宣布辞职。这样，萨拉希便可以任命成立一个三人组成的摄政委员会了。在10月12日上、下两院的联席会议上，萨拉希被授予总揽国家元首的大权。至于推选摄政的问题，则以匈牙利当时还是军事行动的战场为理由暂行搁置。他还被任命为“民族领袖”。

于是，萨拉希的野心得到了极大的满足。他和希特勒一样，成功地把国家元首和政府领袖的职务兼于一身。

由于最后一分钟发生的这一事件有利于局势的转折，结果使“铁拳行动计划”（由斯科尔泽尼和他的部下干预的一种行动的代号）变得无用武之地了。在几小时之内，“箭十字党”在与德国警察通力合作之下，占领了布达佩斯的所有战略阵

地以及匈牙利的其他一些主要城市。他们没有遭到什么顽抗。可是霍尼蒂当时由于心慌意乱，竟忘对他的卫队下令停止抵抗，以至卫队司令竟命令自己的部队对进而企图攻占城堡的斯科尔兹内的军队开了火。但是卫队中只有少数几个人服从他的命令，因此这次战斗很快就变成一次小小的遭遇战，不过很快就停息了。一门德国反坦克炮对着俯瞰多瑙河畔的雄伟壮丽的巴鲁克城堡——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座宫殿——开了几炮。这是有意给匈牙利人加深印象的一个不要忘记的示威行动。

10月15日以后，在匈牙利发生的一系列事件，证明一些德国和匈牙利组织事先发出的对现政权的警告是有道理的。匈牙利军队的士气不但没有提高，反而日益衰退，许多最出众的军官，在新任国家元首的领导之下，已不愿继续战斗。在首都布达佩斯和匈牙利全国，“箭十字党”的成员在疯狂的胜利喜悦中，干下了许多罪恶勾当。象往常一样，一些社会渣滓也狂热地趁火打劫，无法无天地到处烧杀抢掠。箭十字党由于缺乏得力的党员，使各阶层的行政领导职位都无人担任，最后不得不用一些不适当的人，也就由那种玩弄小聪明并善于花言巧语、伪装热心于事业的人去填补那些空缺。其结果使行政机构差一点陷于瘫痪状态。不但谈不上有次序地维持这个国家的还没有被红军占领的地区的工业和其它资源生产，而且情况混乱不堪，可以说是有增无减。以至政府工作效率一落千丈。政府更迭的最后结果加速了国家的崩溃。

在匈牙利老布尔什维克主义思潮泛滥的年代，萨拉希表现得非常软弱无能，这一点，凡是了解他的人都早已预言过的。这个人在监狱里就好象看到过一些“幻象”。据他说，他是直接从圣母那里接受了要当未来国家元首的指示。这个

人完全没有能力从事任何实际的和建设性的领导工作。最后他只好退到靠近奥地利边界的一个城堡去。在这里他远离外部世界的混乱影响，定居下来写他的回忆录，几乎是希特勒《我的奋斗》那本书依样画葫芦抄袭下来的。1945年3月，他写成了第一部分。当时，匈牙利没有被红军占领的国土只有几平方英里。没有印刷厂开业，因此他请求这部书应由德国帮助在维也纳出版。在他的假想世界中，充满了对权力的幻想，以至他像希特勒做过的那样，命令必须给每一对新婚夫妇发一本他的书，作为结婚礼物；一般职工和政府官员如果对这本书的内容考试过不了关的话，就不得提升晋级。他成了一个对祖国毫无用处的人，他的政权逐渐崩溃瓦解。

萨拉希这一时期的统治，对他的支持者来说是一场灾难，成千上万的匈牙利人因为是箭“十字党”的党员，都逃亡国外过了多年的流亡生活。他们在苏联军队入侵以前的几个星期，还以国家的主人身份出现在政治舞台上。但是现在却不得不为了他们的领袖的昙花一现的胜利而付出自己的生命。苏联军队和匈牙利共产党先遣队，对于每一个被告发为箭十字党党员的人，便立即加以杀害。只有立即宣称信仰共产主义才可能免于死。就是靠这种方法，不少箭十字党的党员才保存了生命。

其余部分的故事可以说是一个悲剧的尾声。从1944年底开始，军事局势加速恶化。在圣诞节的前夕，布达佩斯被托尔布欣元帅的部队包围了。希特勒为了支撑箭十字党政权的威望和权力，命令军队必须想方设法解救布达佩斯。与此同时，希特勒通知布达佩斯市里的德军和匈牙利军队的司令，必须全力坚守不懈，直至援军到达。市里的德匈两军的指挥官决定留下来坚守，直到救兵到来。

谁知等待他们的却是极度的失望。而这些仓促拼凑而成的训练不足的军队，作战还很顽强，巷战打得十分激烈。由于缺乏弹药和粮食，外面设法用降落伞和通过飞机在城市中心匆匆修建的小机场强迫着陆，给他们运输军火给养，这只不过起了一些缓和作用。尽管如此布达佩斯——东郊火车站由德国和匈牙利小分队一直坚守到最后一刻。仅仅在几天之内，使马利诺夫斯基元帅就牺牲了相当于整整四个师团的兵力。

1945年1月26日，一次解围的军事行动可以说是一首惨绝人寰的插曲。被誉为“德国维京装甲师”的部队从西北方的格兰沿多瑙河穿过波利斯山脉向前挺进，带着几辆虎型坦克以突然袭击之势出现在布达佩斯的门口。围困布达佩斯的苏联军队完全出其不意地受到袭击，因此未加抵抗就被德军从所有主要据点赶了出来。跟着维京师后面，来支援的还有一支高度机械化部队，即德国装甲师的“帝国师团”。胜利已经在握，维京师只要继续进逼，同时利用苏军的惊慌失措，就可以顺利地解救布达佩斯之围，并掩护被围的驻军井然有序地撤退，本来是谁也阻挡不了的。可是“元首至上”这个致命的弱点再度使我们陷于无能为力的地步，因为他的属下谁也不愿承担责任。德国最高司令部就没有下令从西北方设法去解救布达佩斯之围。有人辩解说，在继续采取行动之前，所以首先必须得到希特勒的特别许可才行。但是军团和元首各司令部之间的通讯联络中断了。人们都知道希特勒原来计划从西南方去解布达佩斯之围，因此，没人敢于抓住这个时机，个人负起责任来确定已经开展得很顺利的战斗。维京师的先锋部队撤回来了。布达佩斯及其英勇作战的保卫者已注定要失败，并被抛弃。

被围困得水泄不通的布达佩斯正处于极端混乱的情况下，苏联通过炮兵观察员和地下破坏活动给城市带来巨大的损失。开始时，布达佩斯卫戍部队相信一定会有人来解救他们，甚至在维京师撤退之后，这种乐观情绪仍然存在。但是后来，希特勒计划从西南方的巴拉顿湖发动的一次大规模的解围攻势失败了。因为苏联对西里西亚战场发动的突然攻势把德国的后备力量消灭殆尽，这样一来，解围之战就不可能指望成功了。这次解围攻势最初就摇摆不定，后来又迟疑不决，最后终于停止进攻。布达佩斯的保卫战更多的是从政治和宣传目的而不是从军事上着眼，以至不但失败而且葬送了几万士兵的生命。卫戍部队终于想方设法多次企图拼死突围。在最后一次向西北方冲击中，出击的25 000人，只有区区700人在悲惨的情况下仓皇逃到了德军防线内，其余的人不是被杀就是被俘。

在布达佩斯的东部阵地守不住的时候，卫戍部队只好撤退，跨过多瑙河退到奥芬区，可是在那里他们的阵地也只有城堡本身那样的方寸之地了。这场战斗尽管打得很勇敢，但徒劳无功。实际上士兵们已经是弹尽粮绝，可是一一直坚持到打完最后一发子弹，才向敌人投降。

随着布达佩斯的陷落，古老的匈牙利也寿终正寝。统治匈牙利几世纪之久的统治阶级原来希望通过投降来挽救垂死的命运，没想到自己垮了台，以至国破家亡。只有少数几个人得以逃生。大多数人不是在战争中被杀害，就是永远消失在匈牙利的地牢里和西伯利亚的集中营里。

对意大利的侦察活动

直到1943年，德国在意大利还没有特工机关，因为希特勒一直禁止对他的“最忠诚的朋友和同盟者领袖”的国家进行任何带有敌意的谍报活动。后来德国虽然为建立一个有限度的谍报机构打了一些基础，但那已为时过晚了，即使到这时，希特勒也还不知道这件事。所以在此以前，德国特工局只好依赖德国和意大利的有关部门的合作，主要是德国武装部队派驻意大利三军武官处，德国驻罗马大使馆的警务专员以及军事保安部。然而却不准许军事保安部设立任何反对意大利的特工分支机构。

德国国防军和意大利最高司令部的联络员之间根本没有密切合作。双方完全缺乏相互的信任。德国驻意大利的首席武官冯·林特伦将军大部分时间都花费在以下这些吃力不讨好的工作上：滔滔不绝地发牢骚，在双方关系紧张的时候使局势缓和下来，以及每当意大利人感到被德国人看不起的时候，他去平息那些敏感的意大利人的恼怒情绪。

可是在两国的警察代表之间，至少在理论上，他们的关系就完全不同了。希姆莱和他的地位相当的意大利对手阿图罗·博塞尼都认为他们有责任去仿效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榜样，积极地为维持最密切、最友好的关系而努力。通过两国

驻罗马和柏林大使馆的各自警务专员的合作，两国警察在合作上做得非常细致、广泛，例如各种警察机构的技术部门都设有联络员，着重于交流观点和经验。从1941年起，一个德国小组被派到意大利“殖民地警务处”去受训，以便将来到德国在北非的殖民地机构中进行工作。

德意警察部门之间的这种理想的合作关系并没有阻止意大利在德国，特别着重在柏林建立一个效率极高的特工机构。显然，他们对自己的同盟国的信任并不是绝对的，到非常感必要有一个自己的特工机关，以便证实和补充官方给他们提供的情报。

相反，德国的特工局则严格遵守希特勒的命令。德国驻意大利的外交人员给德国政府发回来的报告都不大可靠，就因为对意大利的国务活动缺乏可靠情报，以至后来产生了严重后果。直到1938年大改组的时候，乌里奇·冯·哈塞尔一直是驻意大利的大使。他对意大利的政治情况瞭如指掌，因此他发回来的报告总是客观如实的，而且非常及时中肯。他的继任者冯·马肯森就没有这种真知灼见，这是正确估计形势的必要条件。更糟的是，他也有德国官员中普遍流行的那种恶习，只向上级汇报他认为他们爱听的事情，他可以说是这种人的一个代表人物。其实，柏林方面对他这些缺点也知道得很清楚，但由于对他的父亲，一位卓越的老师的敬重，外交部就不愿把他召回国来。反而，给他派去了一个副手奥托·冯·俾斯麦亲王。由于这位亲王和罗马上层社会人士关系密切，因此就被认为是最适当的人选。他在大使馆负责办事处工作，但后来事实证明，他的工作也很令人失望。大家认为他虽然经常举行豪华的招待会，但是除了传播一般社会上的流言蜚语之外，没有什么其它收获。此外，他的妻子还是个极端

反对国社党的人，她从不放过一次批评德国政府体制的机会。

一直担任德国驻罗马教廷大使到1943年的冯·贝尔根也不能弥补德国驻意大利大使工作上的不足。冯·伯尔根的身体很差，年纪大，因此他没有什么政治野心，唯一的愿望就是从这项吃力不讨好的工作中解脱出来。希姆莱驻意大利的代表党卫军上校多尔曼也同样无法了解意大利政治生活中的机密图谋。他的才能是善于搞阴谋而不是严肃的政治活动。他之所以获得这个职位实际上是希姆莱认为大使馆的警务参赞卡布洛尔只是海德里希的一个走狗，所以急于派一个他可以信得过的自己人。

在这种情况下，就不难了解德国政府为什么长期以来在意大利没有得到一点带有权威性的情报的原因。可是到了1943年的春天，由于德国驻罗马的人事更动而使情况大有好转，当年的4月，外交部前部长冯·魏茨萨克接替了冯·贝尔根的职务，自此以后，希特勒才第一次开始收到没降低意大利国内严重危机情况的详细汇报。魏茨萨克作为一个外交家，具备非凡的才能，使他能对局势迅速地作出准确细致的判断。我在1943年2月被任命为德国特工组织驻意大利的顾问团的主任。我和冯·魏茨萨克的意见在下述问题上是一致的，即我们应当尽量把意大利法西斯政权面临的危机情况如实地向希特勒汇报。我们在另外一个甚至更重要的问题上的意见也取得了一致，就是一定要说服德国政府改变它对教会的政策，反过来，还应当邀请梵蒂冈作调解人，以便与西方国家达成和约。

为使德国政府接受这样一个建议铺平道路，我们两个人在所有通过里宾特洛甫和希姆莱递交给希特勒的报告中，都着重强调德意两国的彻底覆灭对梵蒂冈的主要利益是完全不

利的，梵蒂冈也深知如果发生德意两国覆灭的灾难只会对苏联有利。因此要说服梵蒂冈让他提醒西方国家注意这种灾难完全有可能发生，是不难的。但是，要使教皇与德意两国达成合作，先决条件是德国必须彻底修改它对教会的敌对政策，敌视教会一直是德国国内政策的一个显著特点。

1943年4月，特工局提出了一个特别重要的报告，全面揭露了法西斯政权的弱点，并发表了以下看法：这个政权既不能应付北非可能丧失的危险，也不能解决在北非丧失之后，敌人必然会对意大利本土的入侵。此外，意大利人民的厌战，某些更为重要军事部门对战争努力的破坏，某些最有权威的法西斯领导人对墨索里尼本人的日益增长的个人不满情绪（其中有齐亚诺，格兰迪和波塔伊等人），再加上墨索里尼本人的健康衰退。所有上述一切均在报告中用大量使人印象深刻的具体事例作了毫无保留的描绘。报告的最后结论是很明显，墨索里尼再也没有精力去干涉和制止这种腐败的混乱局面。这种局面正在暗中破坏意大利的道德准则，并把这个国家带到完全崩溃的边缘。

希特勒除了承认收到这份报告之外，未作任何表示。他不但丝毫无意修改他反对教会的政策，而且再次不同意在意大利建立谍报局的分支机构。虽然，他对墨索里尼本人的信心毫未动摇，并且深信墨索里尼不论遇到什么情况，他一定会最后取得胜利，但他也不能否认意大利的局势已到了严重的地步。

可是，德国特工局却没有希特勒这种信心。它的头子舒伦堡决定不顾希特勒的命令，就组织一个规模不大的机构。当然，要弥补过去损失的时间已不可能。但是，到了1943年春天，这个秘密机构已有足够的力量，发现反对墨索里尼的叛乱即将发生。在这种紧张情况下，特工局的地方负责当局冒

险在罗马架设一个秘密无线电台，其目的是为了不论在什么情况下都，能保证与德国直接通讯联系。这个特工组织发回的第一批报告就谈到法西斯最高委员会将召开会议。报告中还提出警告说，这次会议可能会出现一件令人十分不快的意外事件，建议德国当局应该充分准备一个应付意外局势的反措施。1943年7月24至25日的晚间，柏林和罗马之间的无线电通讯联络一直没有中断。尽管这个组织尽最大努力，却仍未能使德国政府清楚地认识到局势的真正的严重性。

使柏林产生这种不正确感观的主要负责人是冯·马肯森。他向外交部发出了象联珠炮似的一系列安慰性的电报。为了阻止别人发出与他的看法不同的报告，他甚至下令除了他个人那条与外交部副部长冯·斯滕格拉赫特直接通话的私人专线之外，禁止任何人与德国直接通话。他不知道特工局在罗马已经有了一个自己专用的无线电台。他这种愚蠢无知，充满幻想的绥靖政策发展到最高潮时，收到了里宾特洛甫一个电话。原来是里宾特洛甫在7月25日听到墨索里尼被逮捕以后，当即通过电话向冯·斯滕格拉赫特发了一个荒唐的命令，里宾特洛甫的指示是，以元首的名义：

我命令你立即把巴多格里奥和他的同谋者秘密逮捕，并把墨索里尼带到德国作国事访问。

这个人竟会得到如此错误无稽的情报，简直是令人难以置信。他如何指望别人能执行这个命令呢？整个法西斯体系像纸牌搭的房子一样，一下子就垮了；仅仅几小时之内，所有的党徽党章都消失不见了，连最忠诚、最老的党员都宣称他们是在强迫的情况下才加入法西斯党的。至于法西斯民兵团，甚至连抵抗的姿态都没作，就驯服地听凭别人解除了武

装。墨索里尼的个人警卫队是用德国制造的最现代的武器武装起来的一个整师，竟然毫无举动，呆在罗马城外，根本没想去营救他们的领袖。所以，在短短的时间内，罗马和意大利的每个重要城市都处于意大利新政府的管辖之下了。

巴多格里奥奉国王之命组织了新政府，把权力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当时，在罗马没有德国驻军，因为根据双方签订的协议，在宣布罗马是不设防的城市时，德军就全部撤出了。因此德国人对墨索里尼的下落，一点线索也没有。在这种情况下，里宾特洛甫给冯·斯滕格拉赫特的命令简直是毫无意义。

过了相当时间，德国特工局才采取一些反措施。7月底，德国驻安卡拉的特工局才报告，意大利驻土耳其的大使瓜里吉利亚（后来任意大利外交部长），已经与土耳其外交部长接触过了，并请他作与西方国家进行谈判的中间人。瓜里吉利亚一直被怀疑是反对墨索里尼集团和盟国之间的联络人，长期以来，他一直受到德国特工局的密切注意。意大利几次想缔结一项单独和约的消息不断地从马德里、里斯本和德国驻梵蒂冈的情报人员那里传来。

就在这时，出现了一段有趣的插曲。将近1943年8月中旬的时候，一位自称是（实际上也是）巴多格里奥元帅的同僚的意大利高级官员，带着一项建议去德国特工局，说这项建议和巴多格里奥元帅的意图是一致的。他说意大利不得不顺从意大利人民的意愿，早晚要退出战争。然而德国可以撤出意大利，沿着阿尔卑斯山脉占据一道防御阵地以便先发制人。如果德国这样做的话，意大利政府就准备保证意大利未来的中立立场。至于德国军队撤退的详细计划可随后在商谈中取得一致意见；可是巴多格里奥元帅认为这个撤退计划应

当按照预先安排好的步骤立即进行。

一眼就可以看穿巴多格里奥元帅计划的致命弱点。象意大利这样一个在军事上破产，被打败、被征服的国家，如何能自卫而且还能维持和“保证”中立呢？再者，也不能假定新政府有力量拒绝盟国利用意大利国土作为战场，进而作为未来军事行动的战略基地。因此，这个计划根本不值得考虑，可是使德国特工局感兴趣的是巴多格里奥元帅提出这项建议的动机。这位意大利的高级官员仅仅是一个内奸还是一位认真负责的官员呢？是谁说服巴多格里奥元帅，说这项建议是唯一可以解决意大利目前是背弃盟约还是彻底失败的两难处境的呢？

与德国缔结一项和约，既可以使意大利不受条约义务的限制（至少是默许的），与此同时还可以使意大利不致沦为战场，这样一来，可能会给新政府一个良好印象。巴多格里奥一再保证意大利根本不会退出战争的声明，也许是个遁辞。那位高级官员的第二次访问使巴多格里奥的真正意图稍微清楚地显示了出来。这位密使埋怨说，巴多格里奥元帅是个非常爱慕虚荣的人，他对于目前和西方国家的谈判进展之缓慢，而且谈判中间经常被打断的情况十分愤慨。他现在比以前更加赞成同德国立即订立中立协定的建议。

那么巴多格里奥元帅的真正动机是什么呢？那是难以推测的。他提出的建议，也许十分真诚——我们这些同他的代表谈判的德国军官们都是这样认为的。但是也许巴多格里奥之所以和德国人接触，唯一目的是想对盟国施加压力，从而可以敦促他们迅速与意大利结束停战谈判。如果是后者情况，巴多格里奥玩的把戏应该明白这一点，即他向德国提出的退出战争、保持中立的建议一定得让盟军知道。至于他是

否这样做了，至今仍是一个谜。

我们把巴多格里奥的建议递交给希特勒，随同还附上了一份备忘录，这是由德国特工局和驻意大利的德国最高司令部的一位高级军官共同准备提出的。我们在这份备忘录里，声称除了巴多格里奥的建议之外，对德国来说最好的军事解决办法是真正从意大利撤军，并且在邻近瑞士边界线，沿着波河到亚得里亚海岸建立一道新防线。这道防线不需太多兵力就能守住。这个计划还有一个好处，不惜解脱一个被打得筋疲力尽而又厌战的伙伴的责任，丧失北意大利的工业（在任何情况下，对德国的军事潜力并非必不可少的），而可腾出30万到40万的兵力到东线去。备忘录在评价局势时，甚至没有提及有关意大利保持中立的可能性。

没想到希特勒对这份备忘录的反应竟到了令人十分震惊的地步，即使那些深知他那反复无常的脾气的人也不例外。他完全不管备忘录中提出的建议和计划是如何合乎情理，看了之后竟大声喊叫起来。说“这是一个轻举妄动，不负责任的失败主义者”的行动。把他的朋友墨索里尼在危难时抛弃不管，他根本听不进去。他愤怒到下令立刻严惩写这份报告的作者。幸而卡尔顿布吕纳出头干预，才使我们免受惩罚。及至希特勒后来承认当时提出的这些建议还是正确合理的时候，已为时太晚了，1945年3月，他告诉卡尔顿布吕纳，他非常悔恨当时没有听从德国特工局关于对待意大利的劝告，埋怨意大利是给德国带来困难和损失的起因。如果德国驻意大利的军事力量早就被用于东线作战，那么今天东线的局势就不会变得如此严重。只有这一次，他的意见和那些杰出的德国军事专家的意见是一致的。

结果，德国什么事也没干成，既没有从意大利撤军，也

没有制止住意大利新政府改变阵营。相反，希特勒倒命令希姆莱准备一个拯救墨索里尼的计划，并逮捕那些所有参加过反对墨索里尼的阴谋政变的人。特别是国王和皇后、王储和他的王妃。此外，还有巴多格里奥和那些在内阁最高会议中投票反对墨索里尼的法西斯党的领袖们。上述行动的计划名叫“阿拉里克行动计划”，实际采取具体行动的详细计划是在柏林制订的，可是执行的地点是在罗马。但由于缺乏德国警探，准备工作不得不局限于侦察要去逮捕的40个人住的住所。

负责侦察住所的德国警务参赞的一个意大利特工人员被意大利警察逮捕了。在审讯时，他对意大利人吐露了谋害巴多格里奥的准备工作正在进行中。因此，巴多格里奥派遣了他的外交部长瓜里吉利亚到德国大使馆去，说他早已知道这个反对他的阴谋计划。实际上，那时（1943年9月），“阿拉里克行动计划”早已在特工局的建议下被放弃了。因为要实现这一计划必然会与意大利军队发生正面冲突，而德国又没有为实现这一行动计划所需要的军队，可是营救墨索里尼及其家属的任务却必须执行。

为执行这项任务的特别突击队是由柏林特工局编组的，全部由党卫军武装部队里的训练有素的人员组成。这支突击队到了意大利后，又补充了一批经过精选的伞兵。全部兵力不到一个营，由斯科尔兹内统率。在突击队到达现场时，放弃“阿拉里克行动计划”还没有宣布，尽管事实上突击队的实力很弱，根本不能胜任，但对整个计划的训练和准备工作仍然进行了一个时期。突击队住在罗马附近的普拉蒂卡·迪麦尔，每一个小组只能分批地一个一个地进城，以便去熟悉他们自己的环境和要逮捕的人的住房的布局。那时意大利还没

有进驻党卫军的部队，因在罗马穿着党卫军的军服必然会引人注目，所以整个突击队只好都穿上伞兵服。事实证明，这样乔装打扮很成功，以至于新政府中最干练的人物之一，警察署头子赛尼斯竟完全没发现这次行动计划的根据地在什么地方。他还以为警务参赞办公室在那里组织什么活动，因此对去那里的人都予以密切注意。此外赛尼斯还被德国警务参赞搞来的那个意大利特工人员说的话所迷惑，因为他说的话总提到卡普洛尔的办公室，而不是突击队司令部所在地的普拉蒂卡·迪麦尔和弗拉斯卡蒂。

在希姆莱的推荐下，希特勒把这项行动计划的指挥权交给了党卫军上尉斯科尔兹内。他出身于维也纳中产阶级家庭，并在维也纳技术学院受过教育。后来，他参加了他岳父主办的一家工程公司。由于他对汽车运输感兴趣，促使他参加了党卫军办的一支民办的摩托车部队。在战争期间，他被调到党卫军的武装部队，才取得后备军中尉的军衔。由于他有技术学院毕业的资历，大部分时间他都在当坦克驾驶兵的教官。

卡尔顿布吕纳早在斯科尔兹内学生时代就认识他了，现在又在党卫军武装部队遇到了他，于是便命令他指挥特工局中一个新成立的主要搞技术的部门。正当人们想要找一个既有军事才干又通晓技术的人来担任“阿拉里克行动计划”的指挥员时，希姆莱就提出了斯科尔兹内上尉。对大萨索山的那次奇袭自然而然地就使这位无名的上尉立刻变为名噪一时的英雄。但是他之所以能名噪一时，流传不衰，还得归功于戈培尔博士。那时为了宣传的目的，戈培尔急需德国出现一些胜利成就，斯科尔兹内得心应手，提供了一个极其动人的事例。希特勒对这位勇敢的军官也很喜欢，他身高一米九五，

肌肉丰满强健，脸上还留有学生时代与人决斗的伤疤，这些都给人一种深刻的印象。

领导一次袭击或营救的行动，他是最理想的人，可是在大战后期，希特勒委以指挥更大部队的重任时，他的成就却不大。他是一个单枪匹马的战士，一个优秀的突击队员，却不是一个师以上军队的指挥员。

营救墨索里尼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首先德国人不知道墨索里尼在哪里，因为警卫部队工作做得很严密，在墨索里尼7月25日被逮捕以后，由该警卫队押解他离开了萨伏依别墅，至于墨索里尼以后的行踪则毫无所闻。后来了解到墨索里尼被安置在警卫队的训练学校营房里，但在那里只呆了很短时间。当得到消息时，墨索里尼早已被迁到一个谁也不知道的地方。看来这个问题简直是无法解决了。因为德国在意大利特工组最近才建立起来，还没有形成一个特工网，因而他们不知道从何处下手，也不知道怎样开始工作。

突如其来的运气使我们取得了成功。在建立“法西斯民兵团”组织时，我们把一个名叫“港口民兵团”的小组吸收了进来，里面的成员都是些忠实可靠的人。在7月25日事件之后，我顺利地争取到从前受过德国特工局领导的一个核心小组。意大利新政府显然是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把墨索里尼放到一个岛上是最安全的地方。这样一来，墨索里尼的行动就受到了原来港口民兵的监视。他们报道说，墨索里尼在7月28日曾被带到停泊在加埃塔港口的小型护卫舰“冥神号”上，这艘船只是准备开往文托蒂内岛的。我们就这样找到了墨索里尼的下落。我们顺利地跟踪一直追到阿布鲁齐山脉内的大萨索山。

最初，护航舰“冥神号”发生了一件小小的纠纷，只好

在文托蒂内岛停留了一会儿，接着才继续向蓬察岛驶去。在斯科尔兹内对蓬察岛进行第一次空中侦察时，他的飞机失事，坠入海中，但是英勇无畏的斯科尔兹内却想方设法使自己和同伴从那架即将沉没的飞机中逃了出来。他们全部安全地游到附近的礁石上。斯科尔兹内用信号枪引起一艘过路的意大利防空快艇人员的注意，这艘快艇立刻驶过去把这群困在礁石上的人救上船，送到撒丁岛上的阿尔比亚去。不久以后，这位幸运而快活的勇士就在科西嘉岛上与一伙在博尼法乔的德国水手们庆祝他的脱险，他除了折断一两根肋骨以外，可以说是精神奕奕。

在元首司令部接到我们汇报墨索里尼的下落已有线索的报告后，他们的态度非常谨慎，以至对我们的报告竟到了不敢相信的地步。自从希特勒收到我们主张从意大利撤军的备忘录以后，对每一份从德国驻意大利特工局发来的报告都深感怀疑。这次他对报告的唯一的评语也是：“只有直接从墨索里尼那里听到情况，我才相信这个消息是真实的。”

希姆莱的行动举止更是稀奇古怪。他一向笃信那种超自然的特异功能之类的玩意，因此他想借助于这种魔法探索墨索里尼的下落，但作起来并非容易。希特勒曾经因为他的副助手丢脸地逃往英国，赫斯过去受到这种伪科学家的捧场，而且还以他们的保护人和支持者自居，这两件事使希特勒狠狠地批评了这类歪门邪道和那些巫师。在赫斯事件之后，希特勒即下令全国对这种人进行了大搜捕，占卜者、有特异功能者和给人算命的大多数都被关进了集中营。于是希姆莱也不得不对他自己的集中营彻底搜索一番，最后他收集到一窝星相家和巫师。他把这一门行道中的代表人物收藏在柏林附近的万恩湖畔的一座别墅里，并且交给他们一个任务，要占

卜出墨索里尼的下落。这件怪事我是从党卫军驻意大利的头子卡尔·沃尔夫将军那里听来的。这些倒霉的家伙，想要得到墨索里尼下落的结论，恐怕要被哄骗一段时候。他们原来在集中营的伙食很差，已经挨了好几年的饿。现在他们却乐得地一心一意地尽情享受，在佳肴美酒和高级香烟中寻求乐趣。不知怎的，其中一个星相大师竟然推算出（或者是凭狡狴的好运气猜到的）墨索里尼是“在那不勒斯以西的一个岛上”。希姆莱之所以迟迟下令执行那个冒险的行动计划，无疑是想靠这些神秘人士的妙算来确定墨索里尼的下落。第三帝国的重大决策有时就是靠这种不可思议的妙算来决定的！一个在德国仅次于希特勒的重要人物，也就是掌握着千百万德国同胞命运的人，竟然是一个算命者的信徒，想起来真叫人为之心灰意冷。

多亏意大利的原港口民兵团，我们特工组织才知道墨索里尼已经从蓬察岛转移到马达莱纳岛去了，以后又从那里转回意大利本土的大萨索山。墨索里尼这次得以安全脱险，主要归功于飞机驾驶员的技术高超。事情是这样的，拯救墨索里尼的滑翔部队要从一万英尺高度在一座弯弯曲曲断断续续的山脉中间降落真是一次非常困难的机动动作。他们乘坐的是一架小型的“非斯勒·斯托赫”牌小飞机，能起飞航行本身就是一次孤注一掷的冒险行动！这架小飞机还超载了，乘客除了墨索里尼以外，还有身材魁梧的斯科尔兹内。在航行中，飞行员迎面而来的是一座悬崖峭壁。擦边越过，当时天气很坏，风雨交加，原来想直接飞回德国，但在这种天气情况下，根本不可能。结果技巧和幸运占了优势，使墨索里尼在9月12日晚上出乎意外地在维也纳着陆了。

同一天，墨索里尼的妻子唐纳·拉契尔和她的两个最小

的孩子罗马诺和安娜·玛丽娅也被德国特工局的突击队营救了出来，并用飞机安全地送到慕尼黑。她们母子三人是从罗马被带到罗卡·德尔·卡敏纳特的，那是一座古老的城堡，多年来都作为墨索里尼和他的家人的乡间别墅。他们全家住在那里的时候，与外界完全隔绝，只有一支警卫队守卫。墨索里尼的长子维托里奥已经逃到德国。所以，现在墨索里尼全家都已安全地处在意大利新政府的权力之外。

在墨索里尼去德国的途中，斯科尔兹内仔细检查了他的行李，发现里面有一本薄薄的笔记本。这本小册子当即引起了德国特工局的注意。其实那本小册子只不过是意大利小学生常用的一种普通的练习本，其中记满了墨索里尼亲笔写的笔记。虽然，这个本子是他在蓬察岛上被拘留时期设法搞来的。只要随便翻阅一下，便可看出他写的是类似日记的东西，是他被囚在蓬察岛和马达莱纳岛的时期写下的。我们把这本日记一页一页地拍了照，并且翻译出来，上交给希特勒。尽管希特勒严令所有档案文件一律予以销毁，但这份富有人情味和有历史价值的文献仍然被保留了下来。我将在下一章将它转载出来。作为这个意大利独裁者在他被囚禁的艰苦岁月中的一份思想的揭露资料。

根据希特勒的原则，他要求人们在翻译外国文献资料时，力求做到尽量直译。他之所以如此要求，也许因为他怕如果不这样的话，翻译人员可能乘此机会把他不敢以寻常方式表达的思想偷偷塞入译文之中。因此这本墨索里尼的日记几乎是逐字逐句译成德文的，虽然我们没弄到意大利原文本，但我认为译文本并未丧失原文本的生动有趣的特点。

第十四章

独裁者的冥想

下面是墨索里尼1943年8月在蓬察岛和马达莱纳岛被监禁时写的笔记，这是斯科尔兹内在墨索里尼的行李里发现的。

1943年7月25日

大约下午两点30分的时候，最高委员会会议结束了，我回到办公室，跟随我的有斯可尔查、布发里尼、特林加里、比格尼和加尔培蒂。我们讨论了会上达成的协议的合法性，但这并不是我很感兴趣的问题。斯可尔查在会上是最后一个发言的，讲得既没有特色，也没有说服力。他提出要送我回家，我同意了。当我回顾斯可尔查在过去各种场合所采取的态度时，我开始感到极度不安。他在阿德里亚诺的发言结尾谈到了“下台”的可能性时——尽管他讲的是体面的下台——在许多人中间还是留下了最阴险的印象。

斯可尔查当时采取了公然与国家为敌的态度，而且还使用了一些严重干扰他行使自己行政职责的步骤。他那时提出的并为我所拒绝的一些建议，都使我意识到，他是一个缺乏感情和有些失去平衡的人。在根蒂勒发言之后，他还想让克罗斯发言（这是一个永远难解的谜）。他向我建议，由他所代表的党正式同教皇打交道，并要求拨款一百万里拉用于重建圣洛伦索。在会议日程的最后，他加进了一项向教皇致敬

的动议。对于这一点，最高委员会未予同意，因为齐亚诺伯爵和其他人都认为，这种敬意是梵蒂冈所不会接受的。

有一天，斯可尔查突然对我说：“我现在要告诉你一件对你来说有些‘荒唐’——非常‘荒唐’（令人不快）的事！你周围的人可靠吗？”我回答说，我从未向自己提过这样的问题。过后不久——即开会的前几天，他又重复问我这个问题，并说：“如果在夜间有人闯进托尔隆尼亚别墅，^①将会发生什么情况？”我回答说：“也许什么都不会发生。”我后来只是简单地向塞萨尔提过这件事，然而没有特别予以强调。

斯可尔查是否知道即将发生的事情？他是否已经得悉议事日程的措辞呢？显然他是知道的，至少对议事日程的初稿是了解的，因为他曾给我看过初稿，还告诉我他是怎样拿到手的。但是后来提交会议通过的稿本却简短了一些。

我在托尔隆尼亚别墅对斯可尔查告别后，便去找正在焦急地等我回家的妻子。女人具有的敏感和微妙的直觉，使她预感到正在发生一件极为重要的事情。可怜的拉契尔！我给予她的幸福太少了——而痛苦又是多么深重啊！

在整个30年的时间里，她没有得到一个星期的安宁！也许她不该和我的动荡不安的生活拴在一起，而该当有一个不同的更好的命运吧。我们说了一会儿话，我便睡着了。每当我生命的关键时刻，总是要面临这种时间虽短却非常深沉的睡眠，这成了一种预兆。

我七点钟起身，8点钟到了威尼西亚宫。正如21年以来我一贯做的那样，坐下来开始一天的工作——最后一天的工作！邮件里什么重要的事情都没有，只有要求为两名被判

① 墨索里尼的家。

处死刑的“达尔马提亚”游击队员缓刑的请愿书。我给省长朱恩达打了电报，表示同意。今天，我感到高兴的是，我行使的最后一项公务是救了两条命，两条年轻的生命！过了片刻，斯可尔查打电话给我，说投票支持格兰迪起草的决议的许多人，现在已经后悔了。我回答说，现在已经太迟了。就在这时，我收到了夏纳蒂部长的一封信，他在信里写道，他已经撤回了他投的一票。这件事在我看来没有一点重要意义。我叫人去找格兰迪，只不过想问问他，为什么他在星期四给我送来伦敦会议的议定书。他要求——不，象是哀求我不要召开最高委员会。是自我开脱，还是要花招？我当即回答说，现在太晚了，邀请已经发出，任何推迟都是不可能的。到了25日的早晨，哪里也找不到格兰迪的踪影了。他已经乘车走了，没有说明去向。在这期间，我向庞托尼将军传话，问国王是否能在下午5时接见我，地点或者在萨伏亚别墅，或者在其他地方。我得到了肯定的答复。12点时，我接见了日本大使，他代表日本政府来了解我对形势的看法，在场的有巴斯蒂尼尼。我回答说，整个形势取决于东线战争的进展如何，必须尽一切努力使苏联退出战争，即使这意味着放弃已经征服的领土，也必须如此。大使表示同意，我们便分手了。如果巴斯蒂尼尼保留了谈话记录的话，便可以从中了解到详细的内容。

过了一会儿，我接见了加尔培蒂，他告诉我，由于罗马铁路系统遭到轰炸，“M”师未能开动。他建议我该去看一看被轰炸的地区。我表示，我的视察看来已经迟了些，但是他说，他想让我看一看工作的进展情况。因此我们去到圣洛伦索，实际上工作没有任何进展——或者说，进展得微乎其微。反正这个地区已经几乎被炸光了。有几群当地居民围了

上来，向我讲述了各种情景，还发泄了满腹牢骚。我安排了一些救济措施。在圣罗伦索教堂附近，一群海军学校的学员临时举行了示威游行。那时正值下午3点钟，罗马城的上空一丝风也没有，闷热的气候压抑着人们的心灵，逼得人抬不起头来。我回到托尔隆尼亚别墅。我照常吃了点心，然后在小音乐室里和拉契尔闲聊了一小时。我妻子的情绪非常低沉，她担心正在发生什么不测的风云。

4点30分时，我换上便装，在塞萨尔的陪同下来到了萨伏亚别墅，陛下正在这小小的行宫门口等着我。我们的谈话历时30分钟，当我们分手的时候，国王热情地同我握了手。汽车正在行宫的右侧等着我。正当我走向汽车的时候，卡宾枪队的一个队长拦住了我，对我说：“陛下命令我对你的人身进行保护。”我正要进入自己的汽车，他把我挡住了，并把我带到正在等着的救护车。塞萨尔当然和我一起被带进去了！在两名手持自动手枪的便衣警察的严密监视下，我们行驶了极不舒服的一段很长的路程，车子颠簸得几乎翻倒。我们在RRCC的营房——我已忘记其全称——里停留了片刻之后，便来到了阿利维卡宾枪队的驻地。我被带进上校的办公室。走廊里布满了上了刺刀的卫兵。军官们待我非常友好。26日，我曾阿尔巴尼亚见过的菲罗纳将军在一点钟时给我带来了巴多格里奥元帅的一封信，内容如下：

阁下：

在下面署名的政府首脑谨通知阁下，对阁下发生的情况，完全出自对阁下人身安全的考虑，因为业已获悉有关正在对阁下人身进行严重阴谋活动的确凿细节。尽管署名人对不得不这样做感到悲伤，但

仍愿通知您，他准备下令以恰如其分的礼遇把阁下安全送到阁下愿意指出的任何地点。

署名

我口授了一个答复，说明我愿意去罗萨·德勒·萨米纳特。塔波利尼上校告诉我，派了一位将官前往罗萨去了解是否已全部安排就绪，回报说，已经一切准备好了。星期一过去了。

季里索上校、波尼塔蒂布斯少校和塔波利尼上校时常来和我聊天（我将永远不会忘怀塔波利尼的妻子的好意，她经常给我送冰淇淋和茶）；军医德尔费尼将军也时常来，还有卡塞塔的桑蒂洛中校，他对失去卡赛塔省当然是非常烦恼的——多么愚蠢！

我现在毫不怀疑我会被送到罗萨去。但是，星期二晚上大约10点钟的时候，他们把我带到楼下，把我交给了宪兵队的波利托将军，我当时认出他是我的一位老朋友——曾为我工作过17年，并多次顺利完成我交给他的警察任务的波利托警察局长。

一路上，我们东拉西扯地聊天，后来我才看出我们行驶的方向。我们走的既不是弗拉明尼大道，也不是阿比亚公路，而是直赴加埃塔，齐亚诺码头的防波堤，在那里停泊着非常整洁和装饰漂亮的“冥神号”小型护卫舰，舰长是杰拉人穆杰里海军上将。经过渡口时，我遇见了弗鲁戈尼教授的女婿。我们在文托特纳停留的时间很短，因为长时间的逗留是不可能的。我们的船又开往蓬察岛，大约11点钟便到达了。这不是我所选择的住地——我也从来不会做这样的选择。我受到了热诚的接待。在这个第一天，先是佩拉希上校，后来又是梅里上校和罗伦索中校，都煞费苦心来保证我的安

全，虽然那些阴谋家已经达到了自己的目的，并且把我弄到手，我看不出我的安全会比一个普通人受到更大威胁。

墨索里尼

1943年8月2日于蓬察岛

1.附言：这是一个机密报告。我委托梅里上校斟酌处理，不得到我的准许，他无权将报告转递任何人。

2.以上表达的意见，有些可能与事实不符，因为从7月25日起，我简直完全被隔离了，因而不知道那时以后发生的情况。

墨索里尼

1943年7月26日

1.我急于想感谢巴多格里奥元帅对我本人的关怀。

2.提供我居住的唯一地方是罗萨·德勒·萨米纳特，我准备随时到那里去。

3.我向巴多格里奥元帅保证，承认我们往日协作，在我这方面，不仅将不会制造任何困难，而且随时准备继续我们的协作关系。

4.我同意作出的决定，即：对同盟国的战争必须继续进行，这是我们国家的荣誉和利益所要求的。我希望国王陛下——21年以来直至今日，我都是他的忠实的仆从——赋予巴多格里奥元帅的任务，将顺利地取得成功。意大利万岁！

墨索里尼（签字）

1

发生的一切事情都是注定要发生的，因为如果事情不打算发生，它就不会发生。

2

说到感恩的问题，动物比人类强，这也许是因为它们是

凭直觉的，而不是凭理智的。

3

看起来，独裁者们没有选择的余地。他们不可能自行隐退，而必须被推翻；然而他们的被推翻并不会博得幸福。甚至当他们不再使人畏惧的时候，他们要么成为人们仇恨的对象，要么成为人们爱戴的对象。

4

我们所谓的生命，只不过是永恒的过去和无限的未来之间的一个几乎看不见的小点儿。这是一个令人宽慰的想法。

5

最近有两本书，引起我极大的兴趣：G·里契奥蒂著的《耶稣的一生》和萨波纳罗著的《吉亚可莫·里奥巴地》，从某种程度来讲，里奥巴地也是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

6

根据德尔·克罗依赫的说法，以大事来划分，我的一生命定要以7年为一期分为几个阶段：1908—1909年，从奥地利被驱逐出境；1914—1915年，出兵干涉；1922年，进军罗马；1929年，国家和教廷和解；1936年，建立帝国；1943年，被推翻；1950年……死亡……终于来临了！

7

所谓大人物的这些冥想被终止了，因为今晨一点钟我被惊醒了，听到有人说：“情况危急！我们必须离开！”我急忙穿上衣服，收拾好我的文件和财物，登上了正在等候我的巡洋舰。我在舰上遇见了曼索尼海军上将，他告诉我，我们的目的地是撒丁岛附近的马达莱纳岛。今天，我的思念转向布鲁诺^①。这是他去世两周年紀念。在当前的情况下，我觉得

① 墨索里尼的儿子。

比任何时候都苦恼得更为深重。亲爱的布鲁诺！在他去世的两周年之际，当我在被放逐的新居里写这段话的时候，他的照片正放在我的眼前。

穿越波涛汹涌的海面的航行持续了12个小时。我被带进了一幢过去属于一个名叫韦伯的英国人的别墅。这别墅的环境非常幽美。四周是种植了许多松树的大花园；它面对大海，再望过去，便是撒丁岛上嵯峨的群山。

一年以前，我曾在情绪高昂的人群中间访问过马达莱纳岛。今天，我则是秘密来到这里。谁知道是否还会有人想到我的儿子，想到他在美好而短暂的一生中所做的一切呢！

20年的工作，仅仅在几小时之内便化为乌有。我不愿相信在意大利不再有法西斯党人。说不定其人数比任何时候都多。但是不得不承认一点，即：这一切都是法西斯党人引起的，而且是由佩戴党徽的人干的，这多么令人感到辛酸啊！法西斯主义过去曾是引起全世界兴趣的、开辟了新的领域的先锋运动，它是不可能遭到全军覆没的。当我回顾这20年来所做的工作，完成的任务，取得的成就和孕育的希望时，我便问自己：我难道是做了一场梦吗？难道这一切竟是一种幻觉吗？难道这都是表面现象吗？并且毫无根基吗？

8

被放逐到马达莱纳岛的第一天即将结束的时候，我被一种深沉的忧郁感所打动。现在我真正意识到，我的儿子布鲁诺确实已经死了！

9

要不了几年，人们对我和我的命运的追忆将日益黯淡，终于会逐渐消失。

10

自7月28日中午以来，我没有读过报纸。但是我竟然并不感到有所丧失，这是令人惊奇的，因为我以前每日要贪婪地阅读十多份报纸。

11

命运在开玩笑：从权力的顶峰一落而陷入彻底的虚弱无能的境地；从群众欢呼赞扬的对象一下子成了彻头彻尾的孤家寡人。

12

从1942年10月以来，我日益强烈地预感到命运注定将把我制服。我的病情同这种感觉有很大关系。

13

一段时间以来，索要我照片的情况已大大减少，而我不乐于在这些照片上签字的踌躇心情也随之增长，不然的话，甚至增长得更大。（这件事我过去总是在每个星期日做的。）我那时的感觉是，总有一天这些照片会或者被撕掉，或者被收藏。而这几天，类似的情况肯定已经在公开和私下的场合都以真正“极权主义者”的方式发生了。那些胆小的人已经把照片撕掉了，而胆子稍大的人则把它们塞进碗柜，以至在出其不意的情况下，他们可以说已经把照片的事忘得一干而净了。光荣的形象就这样消声匿迹了。

14

在托尔隆尼亚别墅时，我们全家曾以极大的兴趣观看了影片《圣赫勒那小岛》^①。那是一个伟大人物的下场。那么，一个渺小得多的人，为什么不可以遭遇同样或类似的命运呢？

① 拿破仑被放逐处，位于大西洋。1921年拿破仑死于该岛。

15

过了两个星期，我仍不明白我现在是“什么”，或者不如说，我已经变成了什么。

16

据曼索尼海军上将说，马达莱纳岛上一年只有20天不刮风。今天，8月10日是一个不刮风的日子。海平如镜，林木静止不动。

17

塔勒斯感谢众神使他生来就是一个人而不是一个动物，是一个男人而不是一个女人，是一个希腊人而不是一个野蛮人。

18

当一座政治上的或社会上的金字塔倒塌时，甚至在产生它的最底层的基础也会受到影响。一些手里拿着网拍球的孩子们也会遇到一点小麻烦。

19

今天早上，太阳力图穿过来自东方的一片灰色云层。海面呈现暗灰色。这是冬天的最初迹象。（我的卫兵的确告诉我：8月就是冬季的开始！）

20

这个卫兵的名字叫费利切·达·努恩齐奥，是罗马省人。蓬察岛上的卫兵还有托雷拉（佛罗齐诺内人）和蒂索尼（里底人）。我也想到我来到蓬察岛的那一天看守过我的两个官员——卡塞塔的毕卡索和锡拉丘兹的根蒂莱。我记得还有特拉莫的布鲁尼和巴勒莫的维齐尼，这两个人曾要过我的签名。

独裁纯属古罗马时期的一种（共和）制度。在现代世界被称为独裁政权的，实际上是某种形式的间接专政或集体专

政，显然这是不能持续20年以上的。然而却有一个例外，那就是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无产阶级的专政。

21

今晚卫兵们向“可疑的声响”开了枪。今晨——8月8日8时，发了一次空袭警报，高射炮连开了火。我只看到了两架战斗机飞向这个岛。整个事情持续了三四分钟。

22

在最近发生的事件中令人格外惊讶的，一定是日本大使：因为我在7月25日的下午一时接见了她！

23

小昆虫是夜间的扬声器。在这个地方小昆虫太多了。

24

我的卫队里的一些人——卡宾枪兵和军官们——的脑子里，一定都在不断思索着许多问题。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啊？

25

1940年6月战争爆发以后，托尔隆尼亚别墅里最初的防空掩体是几个洞室。地下室位于剧院附近。当时人们把地下室看作相当安全的场所，直到主管专家们进行了检查，宣布地下室是一个死亡的陷阱时为止。因此需要加固别墅本身的地下室。但是在都灵、米兰和热那亚遭到空袭以后，才决定必须修建一个名符其实的防弹掩蔽部。然而有什么样的掩蔽部能经得住最重型的炸弹呢？修建任务交给了普利塞拉少校，费用为24万里拉，施工期为3个月。1942年12月开工。但正如经常在罗马出现的情况一样，人们发现在别墅附近选择的地点土质很松，挖掘不得不把原来设想的加深一倍。整个计划必须扩大，施工期也要延长。说来奇怪，随着施工的进展和接近完成（7月底），我对掩蔽部的反感也在增长，

而这不是因为增加的费用——比原来预计的大约多了一倍，而是由于我感觉到一种阴暗邪恶的先兆。我感到，这座掩蔽部完成后一定没有什么用处，我们永远不会躲进去的。说实在的，一个人有时是需要听一听自己的下意识的声音的。

26

意大利司令部的公报谈到敌人的地面活动时不提我们的活动情况，这是1940年以来的第一次。可以这样认为：这是为宣布我们在西西里岛的最后时刻已经来临的准备步骤。

27

一个被解散的政党，也就是说一个被禁止活动的政党，对许多意大利人来说是有迷惑力的。只要使法西斯党人也带上“颠覆分子”的标签，他们就对充当法西斯党人感到满足。这是一种奇怪的然而又是可鄙的精神状态。

28

我第二次接到拉契尔的信，她没有提到维托里奥。法依奥拉中尉说，他肯定维托里奥没有遭到伤害。从维托里奥还是个小孩时起，法依奥拉中尉便认识他了。

29

过去，在各条战线上作战的优秀士兵，都被吸收入了党，而现在，所有这些人都自动变成国家的敌人。

30

今晨的新闻是穆利上校、洛伦索中尉和30名卡宾枪兵的离去。

31

直到后来，我才发现，在威尼斯宫的大礼堂里工作成了一件使我感到压抑的事，这是令人奇怪的。那时我已决定搬进海军部或者比威尼斯宫小一点的地方。我选择了后者是考虑

到它正座落在民族纪念碑的对面。这是我有病的又一个迹象。

32

新的生活方式的开头几天——对我来说是作为犯人的开头几天——时间过得太慢了。后来生活被细枝末节的小事所充填，时间也好像过得快些了。

33

今天8月13日，我被一种奇怪的不安之感所侵袭，无法摆脱；果然，5点钟时，司令部的公报报道说，除了米兰和都灵遭到空袭外，罗马又遭到第二次袭击。这就是所谓“教皇城”应该免遭破坏的神话的好下场！这也就是所谓罗马之被轰炸只是因为它是法西斯总部所在地的神话的好下场！

34

难道每一件事真的象有人试图使人相信的那样吗？一个象维托里奥那样的空军上尉，怎么可能在“解除看管”的21天以后仍然毫无音信呢？

35

我和我的一些稀客之间的谈话很快失去了吸引力，于是特拉比斯特会修道士的清规戒律立刻奏效：默不作声。

36

对于纵横填字的字谜和其他类似的谜，我从来不感兴趣。然而今天，我没有东西可读，便用字谜来消磨时间，以免象俗话说的那样，让时间把我折磨致死。这里，一切都取决于你是否能把眼光看得远一些，是否能使自己习惯于它。

37

今晨，8月14日，巡官波利托——他现在是宪兵队的头目，因此军衔相当于准将——在巡察的过程中来到这里。我要求他来见我。他来了，并带来了布列伏奈希海军上将。波

利托说：“我奉陪拉契尔夫人上罗萨去了。我们坐汽车，一路平安。在罗萨同她一起生活的是罗马诺和安娜·玛丽亚。关于维托里奥，我至今没有得到他的消息。他现在在卡西罗的手下，7月26日去休假了。至于巴多格里奥的诺言，后来发现，根据你的情况是无法兑现的。行政长官、财务长官和军区司令的电报都一致认为，如果你送到罗萨，一定会出现严重骚乱。关于这一切，我们在当场也得到了证实。你应该记住，这次对政府的改组是一次极端彻底的改组。现在，在意大利的任何地方，人们不仅已经看不到法西斯的党徽，就是法西斯党人也都四处逃散、销声匿迹了。对你表示仇恨的示威不计其数；我自己便在安科纳的厕所里看到了你的半身雕塑像。在米兰，一群暴徒袭击了《意大利人民报》的办公处。工作人员从里面设置障碍物来抵挡，维托进行了自卫——这是到现在为止我所听到的全部情况。

“有大批人被逮捕，但是法西斯党的领导人还几乎全部是自由的，包括人们非常憎恨的斯塔拉斯。有人在2月26日看到齐亚诺伯爵穿着军装。我想他已经去里窝那。格兰第、波塔伊和其余的人都已经不见了。

“至于这场战争，人们只是在渴望它尽快结束，尽管他们都知道，自己已钻进了死胡同。但他们对于失败的思想已经相当安之若素，他们把这一失败看成是从法西斯主义下解放出来的胜利。

“你建筑的大厦已全部倒塌。你只需要知道，在今天，布鲁诺·布奥齐是工人的领袖了。高级文武官员几乎全部由退休人员取代了。

“最近的空袭非常严重。米兰的损失尤为惨重，整个市中心，除大教堂外，已完全被毁。对罗马的袭击也同样严

重，袭击的目标和早先的几次袭击相同。教皇再次离开了梵蒂冈。

“对德国城市的攻击具有同样的破坏性，伤亡数字估计有数万之多。

“在征服西西里岛之后，英国人将在意大利南部登陆。西西里岛的所有港口都停满了船只和登陆装备。正在准备进一步从叙利亚登陆，目标是多德卡尼斯群岛。还没有迹象说明将对撒丁岛或希腊采取任何行动。

“在地面上，德国前线的形势也很不妙。英美已经令人沮丧地取得空中的绝对优势。我们只能用为数少得可怜的武器来对付数以百计的攻击飞机。

“看来英国人的目的是用恐怖战术使我国在精神和物质上彻底崩溃，迫使我们无条件投降。

“这场战争对老百姓的负担要比对武装部队的负担更为沉重。老年人、妇女和儿童都身受其害，这就说明为什么大家对战争都感到厌倦，为什么对这场战争应负责任的人如此仇恨。”

在波利托将军做这长篇讲话时，布利伏奈希海军上将偶而插话，强调法西斯主义消亡的速度之快这一事实，在几天以前还可能被认为是不可能的，尽管那时法西斯主义已经不得人心了。

波利托将军劝我保持镇静。他询问我前些时和现在的情况如何，并且补充说，当人们的激怒情绪多少平息下去之后，便可能做出较为公正的裁决，因为“没有人能否认，你的目的是要使国家富强起来”。并且说，“难道谁也没有告诉过你吗？那时你周围的人干的是些什么事吗？”

至于信件，海军上将说，在当前情况下，是不可能正规

收发的。然后他说，我什么时候希望他来看我，他随时都可以来。谈话历时约一个半小时。

根据两名巡官惯于在他们的报告中所做的“添枝加叶的描绘”，我可以得出两个结论：

1. 我主张的体制已经破产；
2. 我自己的垮台已成定局。

如果我对群众的行动感到吃惊，那我就太傻了。且不说那些在阴暗角落里等候了20年的政敌，或者那些过去受过严重打击，以及那些失意的人等等，群众则总是随时准备推倒他们昨天的上帝们，尽管在第二天他们又会感到后悔。

但是，对我来说，却没有转变的希望。我的血液，血液所表达的可靠的信息告诉我，我这颗星星已经永远陨落了。

38

8月里一个安宁的日子，大海微波不兴。天下一切似乎都已成定局——包括我自己的命运在内。

39

今天下午，军医院的主任军官门地尼博士——他是切泽纳（维罗纳）的医生——来看望我。他是一位和蔼而有学问的人，一个名符其实的威尼斯人，一个来自我一向认为聚集着全意大利民族精英的威尼斯省的威尼斯人。他给我开了几味药，其中包括针剂，维生素C，滴剂药水和碳酸钙。我问他：“你认为还值得用药吗？”他回答说：“作为一名医生和一个人，我认为值得。”

40

当一个人和他的组织崩溃的时候，特别是如果这个人已年过60，那么跌了跤是再也爬不起来的。

上帝可以为我作证，在1939年8月与命运有关的日子里，我曾以绝望和急切的——我再说一遍，以绝望和急切的努力来维护和平。我的努力失败了，对于我的失败，英国人和德国人几乎都要同样负责。英国人要负责，因为他们对波兰作过保证；德国人要负责，因为他们已长期准备好一部强大的军事机器，而无法抵制开动这部机器的诱惑。

今天，8月16日，我第一次收听到了8月14日的纳维电台的广播，有柏林、丹吉尔、里斯本、马德里、伊斯坦布尔和斯德哥尔摩的消息。

我的政体的垮台，是一系列军事事件的原因和影响的必然结果。显然，如果英军7月10日在杰拉湾遭到真正类似迪埃普^①那样大规模的损失，我现在就不在这个岛上了。

正如对一切历史人物一样，将来也会有人寻找女人对我起的作用。然而女人在我的政治生活中从来没有产生过一丁点作用。这也许是一件令人惋惜的事。女人所具有的敏感性，往往比男人更具远见。

克里斯比^②以及被称之为“克里斯比斯莫斯”的十分令人惊讶的现象，在阿杜瓦战败后，便垮台了；而费利斯·卡瓦洛蒂却一跃而成为大得人心的人。在那时，人们也突然改变了看

① 法国西北部的一个港口，1942年英国曾对该港进行试验性登陆袭击，轴心国报刊宣传英国受到巨大损失。

② 意大利世19纪的政治家，是1882年德、奥、意同盟的坚决拥护者。

法，于是导致了富于戏剧性的4年，后来在本世纪初才在蒙札公园终结。^①

46

从崇拜的顶峰掉到落魄的极点。柏拉图理论的三个灵魂，群众具有头两个——繁殖和直觉的灵魂，但是他们缺乏较高一级的，即知识的灵魂。我不唯相信，昨天还在推崇我的数百万意大利人，今天就对我厌恶，并咒骂我的整个家族——当然可以咒骂活着的人，还可能包括已经去世的人。

47

有一次，上帝在地球的代表——教皇曾称我为“上帝的人”。那是多么幸福的时刻啊！

48

如果人类永远保持向上帝祷告！那么，我们就会把自己视为超人，甚至视为圣人。掉进尘凡又会使我们现出人的原形，也就是所谓的原人。

49

气氛越变得沉闷，人们向我提出的有关进行政府内部改革的建议的数字就越大。最根本的改革发生在1月份。除了两名部长以外，我撤换了其他所有的部长。其结果是，成了一个更不团结并因而比以前更为软弱的政府。在政府里，奇尼是失败主义的代表，他看不出意大利怎么能支撑到6月以后。这次变动所产生的后果并未持续很长时间。本来我是准备采取其他内部措施的，象在我所掌管的几个部任命几个新的部长，把一系列的问题移交给一些新成立的组织等等，只等在军事上打上几次胜仗——我称之为“明朗的一天”的来到——便立即贯彻执行；但是，这明朗的一天永远没有到来。人民确实

^① 指意大利1915年又退出法、意、奥同盟。

在盼望着这一天，甚至把老大难的粮食问题放在第二位。

人民原来指望至少使敌人的前进停止一下，这时他们已不再满足于斯可尔查一而再、再而三地做出一些“要点”。甚至在法西斯党人的圈子里，也开始对斯可尔查是否执行正确路线有所怀疑，我本人也对他的忠诚起了疑心。任何一天的胜利——不论是陆地上、海上还是空中的都会使形势得到恢复。这一点是很清楚的，从以下事实便可说明：7月10日和11日，人们是以狂热的情绪欢迎关于联军登陆业已失败的传闻的。12日司令部的臭名昭著的丢人的公报中，竟重复了这些传闻，而13日公报中又宣布叙拉古和奥古斯塔的陷落，以最严正的官方方式否认了那些传闻。

这一天，戏剧的第五幕揭开了。谴责和反谴责毒化了周围的气氛。人们谈论着海军方面一些高级将领先是在潘特莱里亚岛，接着又在奥古斯塔的背叛行为。原来应该为本届政府的政绩发言的那“12个人”，由于这次军事上的失利而把他们自己从马上摔了下来。斯可尔查把他们叫去参加党的会议，考虑该如何干下去。于是，他们几乎无一例外地来找我，随即交换了意见。这次交换意见实际上只可能得出如下必然的和实际的结果，即由我作出决定召开最高会议。星期五和星期六两天用来起草议事日程，争取必要的签名，准备搞突然袭击——或者不如说是玩弄政治花招。只有三、四个人知道他们要干什么，要达到什么目的。其他的人对正在进行的一切是一无所知的。他们当时作梦也不会想到，就在这次的最高委员会议上，政权本身的存亡问题会被提上日程。

50

自1918年以来建立的一切所谓“极权主义”的国家中，土耳其政府看来是建立得最牢固的。在那里，只有一个党，即

人民党，党的领袖就是共和国总统。

51

也许某些外国评论家过分强调了意大利人民在政治信仰方面的动摇不定。

52

又是一个新的早晨。8月16日——一次极大的不安之感，我的血液在沸腾。

53

今天，我想到3个人。真的，他们是民族党人，但是他们给法西斯主义带来了许多知识的启发，对信仰的虔诚和对法律的接受。他们是阿尔弗里多·罗科、恩里科·柯拉第尼和达凡查蒂。

54

镶有法西斯党徽的那些神圣不可侵犯的建筑物会得到尊重吗？我很想知道，那些为法西斯主义献身的人，如康斯坦丁诺、纳里纳·奥斯卡·特勒尼、瓦尔特·范尼尼、波尔—彼萨尼，还有其他许多人，他们是否还会被人们所怀念呢？

是否有一个针对我进行的“阴谋”呢？是的，有，否则不能解释巴多格里奥元帅25—26日夜间寄给我的那封信，他在信里说有一个反对我个人的“严重阴谋”。

自从1942年10月23日起，司命运的女神就转身背对我。20周年的庆祝活动，由于敌人的空袭和敌人对利比亚的进攻而遭到破坏。于是我推迟了本应在阿德里亚诺发表的、花费了许多时间并颇使我伤脑筋的讲话。12月2日我在议会发表讲话随后便发生了利比亚的不幸事件。5月5日在威尼斯宫外举行最后一次游行之际，我曾宣布我们将回到北非，而就在同一时刻，我们失去了突尼斯——我们在北非的最后一

块地盘。7月10日，我检阅了“M”师，接受了他们的敬礼，但就在同一天，敌人在西西里岛登陆了。对罗马的第一次空袭正是在我在费尔特雷会见德国国家元首的时候发生的。我将不必追述也许不那么典型的其他命运对我的打击了。即使如此，我还是认为，如果辞职，那将是懦弱的表现。我一直到最后都希望能象俗语所说的那样，把幸运帽戴在自己的头上，但是我没有成功。直到7月10日、11日、12日和13日，我一直还抱有某种希望，但是在此以后，我知道，一切都枉费心机了。

有两次，每当我在威尼斯会见希特勒时，厄运便接踵而来。

55

8月12日。大海象湖泊一样。可怕的单调压制了一切。

过去是真正属于我们的。不论是好还是坏，是欢乐还是悲哀——过去的一切都属于我们。根据基督教的神学，甚至连上帝也无法取消已经发生的事。

我无法相信在法里纳契的屋子里找出了160磅重的黄金。最近由于法里纳契总是以法西斯主义的卓越创始人自居，并且以卡托的角色来炫耀自己，我曾促使他稍稍收敛一些。

6月里，发表了两次讲话，一次是5日由德尔·克罗伊赫发表的，另一次是24日，由根蒂勒发表的。两次讲话都很精采，但是面对接二连三发生的使我们栽倒的军事失利，两个讲话也徒劳无益。尽管如此，司令部发表的任何公报如能不似往日那样令人不快，也还足以使人们的精神重新振作起来。但是，这样的公报变得越来越减少了。

我的卫队长是法依奥拉中尉，是个塞格尼的拉丁人，有辉煌的军事资历。当他在托布鲁克受重伤时，亲眼看到了英国

人给予我们伤员和俘虏的非人道的待遇,所以现在,凡是与英国有关的,他都恨之入骨。1935年,他在厄立特里亚遇见了布鲁诺和维托里奥,那时,他们二人还是空军里的非常年轻的志愿兵。8月24日是他们去非洲的第八周年。巴多格里奥元帅表扬并晋升了他们。1935年和1936年是意大利和他们政权的“光辉灿烂的年代”。能生活在那个时期目睹一切是值得的,尽管到了现在我们已为痛苦和灾祸所困,甚至把所有在罗马的官员聚在一起也无法把关于我的儿子和侄儿的消息告诉我。

56

正如在我写的书里所说的那样,布鲁诺的死亡,对我来说,是命运的愉快的冲击,但在那些日子里他是怎样忍受着痛苦而死去呢!

57

有一个声音告诉我:如果你现在死了,你不是丢下了威尼斯宫、托尔隆尼亚别墅,罗萨·德勒·卡米纳塔,亲友们和你心爱的一切吗?但是,这个声音忘记了一点,那就是我虽然丧失了这一切——我自己却还活着。然而,我觉得,我仿佛已经死了。真是永恒的利己主义哲学。法西斯主义的死难者——其人数是不少的——会受到尊敬吗?

58

今天,8月17日下午5时,马达莱纳岛的神父应我的要求前来看我。卡普拉先生是撒丁岛人,在这里已经生活了10年,他作为神父和意大利人,享受到所有人的共同一致的尊敬和钟爱。他告诉我,他曾经想到我,并且在前一天,当他看到我在阳台上时,他曾向我挥手致敬。我简略地告诉他,我在什么样的条件下生活,并且说,他的来访可以帮助我克服面临的、首先是由于孤独的环境造成的严重的精神危机。他

回答说，他永远听候我的吩咐，我可以信赖他的谨慎。“让我坦率地对你说吧，你走运的时候，你并没有经常表现出自己是个伟大的人物。现在你身处逆境，应该显现出自己的伟大气魄。世人会按你今后变得怎样而不是按你昨天怎样来评定你。上帝是洞烛一切的，他在看着你。我肯定你不会做出任何违反天主教的信仰原则的事，即使不幸的命运仍然给你更沉重的打击也不会。”我向他作了许诺。他星期四下午还要来。他还说了另一件事：“你曾为他们做过好事的那些人，不少已经把你忘记了。但是还有另外一些人，象我们崇敬在战场上倒下的人那样尊敬你，也许彼此还多少有些惋惜的情味吧。”

59

法依奥拉中尉告诉我，某××（一个英国人的名字）在罗马说过，艾登在英国下院的讲话中曾宣布，利比亚不会归还意大利了。英国电台也抱怨说，巴多格里奥“正在追随墨索里尼的步伐”；该台接着宣布占领了墨西哥。8月17日就以这种令人痛心的消息结束了。

60

一个月以前，我在里克契尼最后一次见到罗马诺、安娜、吉多和亚德里亚。我是下午五时到达的，我们大家一起听了斯可尔查的讲演。总的来说，这是一篇很好的演讲，但是讲得单调了些——而且带有悲感的调子。

61

我要以以下的几页把迪诺·格兰第，莫尔达诺伯爵从1943年初到同年7月的所作所为记录下来。这可能很有好处。直到2月，他的态度看来相当明确；但内阁危机以后，他开始有些暧昧了。有些集团把他看成是“等待主义者”；

另一些集团把他看成是亲英派。这个最后的指责是不公正的。那时，格兰第经常不在罗马，而是在波洛尼亚呆很长的时间，在那里他买下了《里斯托·德尔·卡尔利诺》报。此外，他拥有经营很成功的价值数百万的工厂。在3月初，他要求见我，提出要我提名授予他圣母领报勋章^①。为了说明他的要求具有正当理由，他指出他曾担任驻英大使和议会主席多年。我答应把这件事告诉国王。国王每周的星期一和星期四接见我，我在一次会见时这样办了。国王说，格兰第的第一条理由站不住脚，但第二条理由是站得住的。至于授勋的时间，国王说，将安排在圣母领报节，而那天正好是3月25日。事情按时实现了，报纸都不加评论地报道了这件事。不符合授勋条件的上院主席的威信因而受到了损失。4月初，我又见到了格兰第——确切的日期可以从我当时对历次会见所精心保留的真实记载中得到证实。他以极大的热诚对我表示感谢。“我认识你以前，我是《卡尔利诺报》的专栏作家，一个谨慎的记者。是你造就了我。我今生所获得的一切，都要归功于你。我对你的忠诚是无止境的，因为——让我说出来吧——因为我热爱你”。他的话是出自真心吗？当时我相信是这样的。我提到了他作为大使、外交部长和法西斯党的党员所作出的贡献。之后，他到波洛尼亚去了。我下次见到他是5月5日在威尼斯宫，时间是斯可尔查在亚德里诺讲话之后。他容光焕发。“领袖！”他叫道，“多么精彩的讲话！我们又一次发现了自己！我们又进入了旧时的环境！我们找到了正确的道路！”……还说了一些类似的话。然后，他又回到波洛尼亚，这时人们对他的“等待主义”态度的抱怨增多了。7月末，他出席了斯可尔查为巴尔波举行的

^① 意大利的最高荣誉勋章。

纪念仪式。他回去后，斯可尔查告诉我，格兰第不愿意上演讲台，而且整天都采取了非常谨慎和冷漠的态度。格兰第在伦敦逗留的期间，曾恶意诽谤过巴尔波，甚至对他个人的勇敢也进行中伤。

现在我们回到7月份。在7月11日至18日的一周间，斯可尔查选择了我们政权中的12名杰出成员，准备派他们到全国各主要城市去发表演说。在其他人中，他挑选了格兰第，然而格兰第打电报给党，恳求免除他这项任务。斯可尔查又通过省长向格兰第重申了自己的要求，但省长打电话回来说，格兰第断然拒绝发表演说。斯可尔查想对他采取纪律措施，但我建议他不要这样做，不要在这个关键时机提出，

“格兰第的问题”。由于格兰第在给斯可尔查的一封信中提到关于实现“神圣联盟”的必要性的问题，我把他找了来问他“神圣联盟”指的是什么，他想的是否就是恢复被我压制而取缔的各有自己领袖的那些老党？他回答说，他指的是全体意大利人的神圣联盟，只有这样才有可能消除人们对党在战争中的面貌。他说：“是时候了，不要再让人民在谈论战争时把它称作‘墨索里尼’的战争。这是我们大家的战争。由国王从战争的阴暗后面出现的时候已经来到了。我们的国土遭到了入侵，而国王却保持沉默。国王在躲避他的责任。他必须为这次战争承担他理所应当的责任，这次战争也是而且主要是维克多·埃玛努尔三世国王的战争，人民希望看到国王放弃他的谨慎态度，从而使战争具有真正的民族性质。”我的反驳是，在每一场战争中都能形成两派——主张战争的人和不主张战争的人。1915至1918年的战争，被称为干涉主义者的战争；当前的战争被称为法西斯战争。反对党之间的神圣的联盟是不可能，这一点已在法国得到证实，在那里，曾经

有过实现这种联盟的企图。有一个时期，克里孟梭曾作为神圣联盟的旗手挺身而出。当时会谈的调门很高，进行得很顺利，但是我一直有一个印象，克里孟梭真正是对方阵营里的人，他早已站在街垒的另一方了。斯可尔查在7月18日晚上发表了演讲。第二天早晨，格兰第从波洛尼亚给他打电报说：“你的演讲非常好，‘独立时代’^①的伟人们也是这样讲的……”等等。

后来，在7月18日至25日这一周的开头几天的谈话里，格兰第又对我说，甚至斯可尔查也使他失望了，他不再对斯可尔查有很多的想法了。星期四和星期五，格兰第来恳求我不要召集最高委员会，虽然在同时，连“计划”的所有细节都已安排就绪。格兰第当时希望的是，利用议事日程的最后部分促使国王采取决定性的行动。国王应当要末接受议程，因而对战争承担责任，要末应当拒绝接受议程，由此暴露其软弱。在这样进退两难的境地，国王挑选了第一个及其附随的一切相互作用，对这些我暂且不加评论。在最高委员会的会议上，格兰第宣布，这个决定将严守秘密。但是第二天清晨，却已传遍整个罗马，人人都感到有重大情况即将来到。

62

在写到过去组成我的最接近的随行人员时，我必须就波塔依说几句话。他是一名勇敢的战士和大胆的作家。他一生的工作还没有完成。作为政治家，他是孜孜不倦的，但也有事业心。人们说，他是个欧亚混血儿，而他的面貌的确象带了一副假面具；他的眼神总是犹豫不定的，他也不象人们所认为的那样清白得一丝不苟。他发了财没有？人们说他发了。他是一个不得人心的人。4月21日在罗马举行的最后一

① 指1831年至1870年意大利作为一个独立的统一国家出现的时期。

次老法西斯党员集会上，他简直是被人们轰下台的。当他离开曾由他颁布《学校法规》的那个政府部门时，他竟在身后砰地把门关上。一个月后，他来对我说：“我不能再呆下去了，我有如下建议要提出，你能不能或者把贝维奥尼在国家安全研究院里的职务给我，或者吉奥尔达尼在意大利皇家工业研究院里的职务给我，要不然暂时让我当一任大使好吗？”我回答说：“由你接替贝维奥尼是不合适的，他有权任职到6月15日为止。人们会说你偷偷溜进了清静无为的安乐窝，附加一年20万里拉的收入。你是前任的指导和组合部的部长，意大利皇家工业研究院对你更为合适；但是且莫说吉奥尔达尼还没有吐露任何退休意向这一事实，这里还必须包括多达10亿计的财务问题。我想还是设法给你找个大使馆——多半是柏林，在那里，阿尔菲里似乎对那个职务厌烦了。”他对这安排同意了，但是几分钟之后，他带着一个新的方案回来了。在本届立法议会即将结束之际，他能否被任命为议会主席呢？我告诉他，假如格兰第同意的话，这个解决方案对我来说是差不多可以接受的。不久之后，波塔依又来找我，这次他带来了格兰第的信，信中表示，他对选择波塔依接他的班是满意的。以后的情况就人所共知了。

63

我一生中从来没有过什么“朋友”，而我曾时常问自己：这是有利条件呢，还是不利条件呢？现在我肯定这是好事，因为现在没有人应召来同我一起受罪了。

64

谁知道，布鲁诺的纪念品是否还能放在米兰战争博物馆里，这些纪念品是否还会被重视？

7月25日，星期日，巴斯蒂尼尼打电话告诉我，戈林想在我60岁生日之际，到意大利来。我回答说，这将使我感到高兴。30日，戈林给我拍来一个电报，由卡宾枪队的少校带到了蓬察岛。作为档案材料记录如下：“领袖！由于情况阻止我实现原来打算亲自向你表达我的良好祝愿，我谨向你遥祝生日愉快，并表示我的深切敬意。由于真挚友情和不容置疑的忠诚的激励，使我必须对你表示我的谢忱，感谢你过去给予我的如此经常而热情的款待，感谢你对我提供的坚定不移友谊的许多证明。我的妻子和我谨为你本人的新的一年的幸福表示最良好的祝愿，尽管当前存在着艰苦的考验和令人不快的事件，我祝愿阁下今后继续以你的毅力和品格为战争最前线的欧洲人作出贡献。对你的敬意的表示，谨送上弗雷德里克大帝的半身像一座。致以坚定不移的友谊和我衷心的尊敬和毫不动摇的忠诚，阁下最忠实的、大德意志帝国元帅戈林敬上。”

这份电报使我比任何时候都深信，戈林是意大利的真诚的朋友。我被准许作复，但是我没有这样做，因为我不愿意对他的如此感人的兄弟般的问候，只能不可避免地用庸俗的文字去答复。

亚尔比尼：错误和失望。他的身心都令人仇恨。他了解一切情况，却对我守口如瓶。

难道我现在的这种合法地位是应该的吗：为防备人民的愤怒而受保护性拘留的前政府首脑。

8月18日（1937或1938年？）从罗马飞往潘特莱里亚

岛，随即返回。

69

很难估计7月25日事件对意大利青年联盟组织很可能造成的道德灾难的全部份量。7月25日事件肯定对法尔尼西纳学院的男生和奥尔维耶托的妇女，以及在布林迪西、威尼斯、弗利和波尔萨诺的三所武装部队学院的学生造成了特别惨痛的影响，而这些学院原来的组织纪律和成绩是卓著的。这些青年组织在全世界曾受到赞美：他们演出过如此难忘的体操和运动项目，他们在从比尔戈比到马里塔的青年法西斯师中都显示出了他们的英勇行为。这些高尚的年轻人确实应该受到比这更优越的待遇啊！这些遭到这样痛苦打击的青年，明天是否会消失呢！他们是否会因而摆向左派的极端主义者的观点，还是会就此完全幻灭，以至再对任何事物既没有信仰也没有信念呢？

70

一个叫达依尼的军士长刚从大陆回来，我同他谈了一次话。他是一个坦率的老实人，他的知识限度使他表达的思想具有一定程度的可靠价值。他说，革命力量的加强正在变得日益明显。人民已经完全失去信心，他们只有一个希望——不惜任何代价地看到战争的结束。拉齐奥地区的一些村庄里挤满了从罗马来的难民。

71

在过去侍候过我的稳重的人们中，有两个人是我希望永远牢记不忘的，即罗多尔费和纳瓦尔罗。罗多尔费差不多有20年每天都在我的身边骑马，是我的骑术和击剑的指导员，他自觉性高，从不斤斤计较，在最好的意义上说是忠诚的。我在想，难道他也会陷入麻烦吗？纳瓦尔罗当我的侍从班长长

达20年，有教养、庄重、谨慎，也从来不考虑自己。

我想对我的司机波拉托也说一句表扬的话，在两次有人对我行刺的图谋中，他都冒着自己生命危险保护了我。除了在弗莱西奥纳山压死了一条狗以外，他从来没发生过任何事故，尽管他把车子开得飞快。

72

谈完了人，我为什么不回忆一下动物呢？因为动物在我的一生中也曾占有一席之地。我养的马的名字是：鲁索维奇、齐布罗夫、纳德、蒂埃纳、埃隆（是多尔夫斯的礼物）。还有狗：卡尔洛特（一头可怕的小动物，但非常聪明）和巴尔，它是布鲁诺的狗。它在布鲁诺放东西的房间门口蜷伏好些天。这便是动物的忠诚。

73

8月19日。我受难的一周——如果我可以这样形容的话，是我和德国元首在费尔特雷会见整整一个月之前开始的。那次会见本应历时四天，正象前次在萨尔茨堡举行的会见一样，而选择费尔特雷是为了安全的原因，并基于它距边界最近。确切的日期没定下来，后来由于西西里事件的结果，才选定了7月19日，而且把会议时间限定到只有一天。这期限对于详细研究形势来说是太短了。官员们坚持要把费尔特雷作为开会地点，反之我们可以轻而易举地在特雷维索县举行，从而节约4小时的时间；但拖拖拉拉的公事程序是没有这类精神锻炼的能力的。19日清晨7时，我乘飞机离开了里西奥纳，8时30分准时抵达了特雷维索机场。在那里我看到空军官兵的通常的集合，看来全都相当愁闷。稍后，载着希特勒的参谋机构成员的一些德国飞机着陆了，其中包括陆军元帅凯特尔。9时元首准时到达了。他检阅了仪仗队，然后

我们上火车站去。一小时后，我们在费尔特雷前面的车站下了火车，又乘汽车到了被选来供会议使用的别墅。这座别墅是戈奇亚参议员所有，由大大小小的厅堂组成，使我想起阿尔卑斯山脉。在灿烂的阳光下，汽车旅程费了我们大约一个小时，途中我们仅仅和元首交换了一些琐碎的事情。

会议在中午开始。在场的有凯特尔、瓦尔利蒙将军和其他德国军官以及马肯森大使。意大利方面有阿姆布洛西奥将军及其译员巴斯蒂阿尼尼和阿尔费里。希特勒讲明了会议事项，讲了两个小时。他的发言用速记记录下来，全文存在外交部档案里。他刚开始发言，秘书就给我递过一则罗马的消息，说：“从11时起罗马遭到猛烈轰炸。”我把消息传给元首和其他人。忧愁和沮丧的气氛笼罩了我们所有的人，而且由于继续传来的消息而把这种气氛加深了。那些讲述了袭击的漫长时间、参战飞机数量之多以及大学和圣洛伦索教堂受到了严重损失。

元首发言后，我们进行了第一次秘密讨论。他给了我两件最重要的情报：1. 潜艇战争将用新的武器重新开始；2. 8月底，报复性机群将对伦敦开始行动，在几个星期内将把伦敦夷为平地。夹杂在其他事情中间，我告诉他，预料到对方的报复行动，意大利的空防必须加强。后来我被叫去听电话，这时已经到了动身的时刻。我只是在回程的火车上才十分清楚地说了以下几点。我说：意大利正面临着承担两个帝国——英国和美国的屠杀的大难，有覆灭的危险。空袭不仅破坏了人民的士气，而且也给战争的生产系统和国民生活的整个结构带来重大损失。我重复说，如果我们有空中优势，或者至少有同等的力量，非洲战役就会取得完全不同的转折。最后我告诉他，国内的士气是非常紧张的。他回答说，意大利的危

机是信仰危机，还说将派遣更多的援军来加强半岛的空中和地面的防御力量。他宣称，意大利的防御对德国是极重要的。我们谈话的调子非常友好，并且很融洽地分手了。元首的飞机起飞了，然后我转向凯特尔说：“尽快地把我要的一切东西送来，记住，我们是一条船上的人。”他正伴随我走向他的飞机。

下午6时，我直接飞回罗马。在我们飞越索拉特时，我命令降低航速，在地平线上我看到大片浓厚的烟云，那是利托利奥车站火灾场的浓烟。几分钟后，我们的飞机便飞越了这个车站。有数百辆卡车被烧着了，工厂被炸毁了，机场已无法使用。机车库和圣洛索地区呈现同样的情景，看来损失惨重。我着陆时，县长和几个其他知名人士迎接了我，我直接回到了托尔隆尼亚别墅。一路上我看到大群的人徒步或使用一切可能的运输工具到乡间去。水井完全给密密麻麻的人群围上了，因为给水系统被破坏了。晚上，我从托尔隆尼亚别墅看到天空依然被大火照得通亮。罗马遭受了火与钢的可怕破坏的一天，使一切幻想破灭了。

后来的几天中间，我察访了被炸最严重的地区，特别是车站和利托里奥机场、康皮诺航空港和罗马大学。我下令不得在报纸上发表详细情况。

与此同时，政权的反对者造谣说，费尔特雷的会晤完全没有结果，德国在我们危难时扔下不理了，还说英国人在征服西西里岛之后，几乎不会遭到任何抵抗就能打到罗马。这一切使已经接近饱和点的紧张形势增强了。同样的紧张也控制了宫廷。我是在同国王倒数第二次会见时意识到这一点的。我们最后一次会晤是25日星期日在萨伏亚别墅。

以急切心情等待的布里瓦尼斯海军上将今天早晨从罗马回来了，打破了我的孤独境遇。他带来了我妻子的信，日期是8月13日。她在信中说，她与外界几乎完全隔绝了，已没有电话，生活是惶惶不可终日。我不知道她是否指的是空袭警报，还是其他性质的。海军上将还给我带来了一整套尼采全集，装订精美——24卷，是元首为我60岁生日通过凯塞琳寄给我的。海军上将还告诉我，维托里奥已离开意大利，被宣布为逃亡，这使我深感痛心；维托在罗萨，而不可能去墨尔卡托·萨拉赛诺，这可能说明新政府当局的力量在罗马格阿不很强。米兰的《意大利人民报》已不再出版，或者已遭破坏。从威尼斯宫里带来的一些私人信件和书籍已转给了我。至于我自己的前途，并没有任何新的东西。

《蓬蒂尼和撒丁岛的冥想》的第一集就此结束。1943年8月19日下午3时。

法西斯党人的覆灭

墨索里尼获释的经过在最近几年间一直广为宣传，然而导致营救齐亚诺及其一家的冒险行径，却象被蒙在鼓里，未为人所知。因而，关于齐亚诺是违反了他的意愿，被转移到德国，然后又被移交给新法西斯政府审判的根本无稽之谈，便被许多人信以为真了。

由于我本人和营救齐亚诺一事曾有过非常密切的关联，使我可能提供有关这件事的最完全的细节。下面就是当时情况的真实的描述。大约在1943年8月中旬，齐亚诺家的一位朋友曾同希姆莱在罗马的一个特工人员多尔曼进行接触，向他提出这样的要求：应该把齐亚诺一家接到德国去，因为他们担心住在罗马有生命危险。那时，根据巴多格里奥的命令，齐亚诺正被软禁在他的罗马住宅，并禁止离开。好了，这位朋友说，他已经得悉，巴多格里奥准备把齐亚诺及其一家转移到地中海的一个小岛上，以防止他们任何逃跑的企图。

希姆莱向希特勒转达了齐亚诺的这个要求。希特勒早已准备同意这一要求，于是德国特工局奉命去安排营救爱达·齐亚诺和她的孩子们的事宜。希特勒的命令十分强调一点，即：“不论发生什么事，墨索里尼在自己孙辈血管中的鲜血，必须不惜任何代价地留传给后世。”希特勒尽管对爱达

有深厚的感情，并把她看成是墨索里尼子女中唯一配得上父亲的孩子，但是他唯一真正感兴趣的还是这些男女外孙，在他看来，他们是齐亚诺家中仅有的重要成员。

希特勒的命令没有提到齐亚诺。当被问及时，他说齐亚诺如果愿意的话，特别是如果他的妻子很重视的话，他是可以来德国的。这些指示被认为是不够明确的，因为，假使齐亚诺表示愿意来，而他的妻子却表示无所谓，或者甚至反对他来，那该怎么办呢？显然，希特勒受到了当时在德国流传的一些说法的影响，据说齐亚诺夫妻之间的关系从来没有这样坏过。希特勒以为爱达对于有机会摆脱自己的丈夫是会感到高兴的。当奉命执行这项任务的特工军官们请求希特勒作进一步明确指示时，希特勒才相当宽厚地表示，齐亚诺也可作为他的私人宾客被邀请到德国来。

用武力进行营救是不可能的。那时，罗马牢牢控制在新政府手中。如果一旦同城内的意大利警察和军队发生冲突，就势必要出动德国军队，而希特勒已经明确拒绝这样做。因此，营救工作只能通过秘密行动和精心谋划来完成。于是，我制订了一些相应的计划，并经希特勒和爱达及加里亚佐·齐亚诺双方一致接受，他们遵从了这些计划。

爱达·齐亚诺和她的孩子的转移，相对来说是比较简单的工作。在此之前，这位伯爵夫人获准每天带孩子散一次步，由一名秘密警察在考虑周到的距离跟随着。在约定的那一天，他们按商妥的办法，在一定时间顺着一条指定的马路散步。那时会有一辆美国汽车从她们的身旁驶过，司机探头出去好象普通人问路一样，于是孩子们被匆忙塞进车子后座，而伯爵夫人自己则坐进司机旁的位子。接着这辆大功率汽车便开足马力逃走。伴随的特务人员进行干预的机会很小。他通常使

用的交通工具是一辆自行车,即使他追赶,也不会造成危险。

营救齐亚诺本人的任务则困难得多。使这项任务获得成功的主要因素是,给看守人员的命令很含糊。他们被告知,齐亚诺不得离开住宅,却没有向他们交代他们被准许用什么办法来防止齐亚诺逃跑,尤其重要的是,如果齐亚诺企图逃跑,他们是否应该使用火枪。营救计划就是环绕这一情报制定的——因为我们设想,住宅门前的哨兵们是不会对一个地位尚有争议的要人开枪的。举例来说,谁也说不清巴多格里奥到底是把齐亚诺当作囚犯呢,还是在保护他不受法西斯分子可能的暗杀。

按照计划,齐亚诺应该精确地在约定时间走出住宅,随即钻进一辆正在那时驶近的汽车,那辆汽车将只停留够他上车的时间。只有在双方把时间遵守得一秒不差的情况下,这一计划才能成功。齐亚诺原建议先由他向窗外瞭望,以便肯定空车子是否正在驶近。但这样做,必然会引起人们的怀疑,因而被拒绝了。当时真正需要的,是双方把他们的表在时间上同步到一秒不差。但是,即使是这样一件简单的事,也花费了两天的时间才完成。到8月27日,一切准备就绪。

这两项安排都没有遇到任何意外事故,顺利地完成了。伴随伯爵夫人的警察根本没有起任何疑心。当汽车驶近的时候,他在伯爵夫人一行后方20码左右,而在汽车停住他还未来得及跑到出事地点时,车子已经开走了。齐亚诺伯爵在预定的准确时间迅速走出住宅,跳上那辆缓缓开动并开好车门来接他的汽车。整个过程发生得如此迅速,以致警察根本没有机会采取任何对策,而且即使有一名警察开了几枪,十有八九也都打偏了。显然,看守并没有向高一级的当局报告全部实情,因为后来传开的有关这次逃跑的时间和方式的种种

报道都是极不一致的，甚至连官方之间也是如此。

下一步的安排就容易了。那辆汽车奉命向罗马城里一所住宅的院落开去，一辆德国国防军的带蓬货车正等候着把他们送往机场。然而到弗拉斯卡蒂机场的距离太远了，货车一路上势必受到若干路障和交通岗的夹道阻难，在任何一处，车里的乘客都有可能被人发现。因此，另外选择了一个离城较近的降落场。但是即使在那里，也还会有意大利的部队，绝不能让他们对正在发生的事情有任何想法。为此，一架容克式运输机奉命大开着舱门，在那里作好准备。货车立即开倒车进了机舱，使车上的乘客有可能从一辆车转到机舱里，不被任何人发现。多亏采取了这些细致的防范措施，因为当货车到达降落场时，正好有一批意大利工人就在飞机旁站着，齐亚诺肯定会被其中的一个人认出来。

在驶向降落场的途中，货车有过一段危险的时刻。货车在每一道路障前必须完全停车。由于机身旁坐着一位携带了一切必要证件的德国空军军官，那些意大利哨兵才未加留难，但是一名德国宪兵却差一点使整个计划破产。他宣称，听到货车里传来孩子们的笑声，并准备在他的意大利同僚的眼皮底下进行检查。我坐在车篷里没有出声，由那位坐在前座的德国参谋去照管，他怒斥了那个德国哨兵，这才防止了一场非常麻烦的发现。

飞机还没有离地，齐亚诺便开始从衣服的所有口袋里掏出一些金制的烟盒、手镯和戒指，进行初步清点。他的小女儿也有一只塞满首饰的小背包。在被营救之前，他已经派遣他的贴身男仆先行把装满最珍贵小件首饰的小皮包转移到德国去，即使在这样极其危险的时刻，齐亚诺也显然没有丧失他那精明生意人的本能！

这次到德国的飞行顺利地完成了，唯一的意外是，为了避免引起人们的怀疑，他们这些乘客不得不穿上轻便的夏装——孩子们都穿着连裤外衣——而当恶劣气候迫使飞机在飞越阿尔卑斯山上升到大约 18 000 英尺的高度时，刺骨的寒气把他们都冻坏了，幸亏斯科尔兹内有先见之明，带去的两瓶白兰地酒帮助他们驱散寒气。爱达伯爵夫人和孩子们都痛饮了一番，只有齐亚诺可以说是滴酒未进。到了慕尼黑，有人以希特勒的名义正式欢迎了他们一伙人和营救者，接着驱车把他们送到斯坦伯格湖畔的一座别墅。

我在那里和齐亚诺一家作过多次谈话。最初，齐亚诺还企图掩饰那些导致墨索里尼倒台的情节。但是爱达伯爵夫人却丝毫不想隐瞒真象。她性格爽朗，爱憎分明，对任何这种躲躲闪闪的态度都是不能容忍的。尽管对自己的父亲仍怀有深厚的感情，她还是以无可辩驳的逻辑正确说明了她父亲的政策错在什么地方，怎样错的。齐亚诺逐渐越来越多地对她的意见表示同意，特别是当他看到，那些听他讲话的德国人对他的作为表示相当谅解时，更是如此。

他们俩都宣称，意大利的不幸是从 1940 年 6 月意大利参战时开始的。墨索里尼对自己国家所处的软弱地位是不存在任何幻想的；然而他曾深信德国人的最后胜利已近在眉睫，如果意大利在战争的最后阶段不介入自己轴心伙伴的一边去参战，意大利就会丧失一个独一无二的良机。据齐亚诺说，墨索里尼确曾不只一次表示过，害怕德国在赢得战争胜利后很可能转向意大利，把它变成彻头彻尾的附庸国。意大利参加对法国的作战，是出自墨索里尼独自的决定。齐亚诺夫妇反复说，他们当时是反对的，并且曾试图劝阻墨索里尼采取这样的措施。

但是，在他们看来，意大利最大的不幸来自德国对苏联

的进攻。领袖墨索里尼、法西斯头目们乃至整个意大利的人民，确实都对1939年8月缔结的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从心里抱有反感。但是在另一方面，大家都清楚地认识到，在西线战争结束之前便同苏联作战，不可避免地会导致一场灾难。在这一点上，不论是墨索里尼还是齐亚诺，都不曾有任何机会对希特勒施加影响，因为直到最后时刻，希特勒一直对他隐瞒了自己的打算。墨索里尼时常激烈地抱怨说，德国人总是要等到决定性时刻的前几个小时，才把一些极为重要的生死攸关的决定通知其意大利盟友。意大利政府曾一而再、再而三地发现自己被置于既成事实的面前。

看来，墨索里尼和齐亚诺在这样的问题上是有不同看法的：到底应该在这条战线还是那条战线单独缔结和约。齐亚诺认为，应尽最大的努力，通过协商和西方大国实现和平，而东线的战争则应进行下去，直到彻底消灭布尔什维主义为止。墨索里尼却倾向于相反的看法。齐亚诺是一个精明机敏的人，在评断外交事务方面要比墨索里尼高明；他希望看到德国的扩张野心能指向东方，并将会长时间地被拴住在那里。从而不再对意大利在地中海沿岸的霸权构成威胁。除了这些考虑以外，齐亚诺从根本来说是站在西方立场上的。而墨索里尼——根据齐亚诺的说法——则是一个对英国和美国充满了心理矛盾的人。墨索里尼一生的梦想就是要看到这两个大国被逼得无条件投降，他把英国的失败视为意大利向非洲扩张的先决条件。

但是，齐亚诺和墨索里尼之间关系的疏远，不仅仅是由于他们的外交政策上观点分歧。齐亚诺和他妻子一再声称，随着战争形势的日益恶化，墨索里尼的极端社会主义观点变得越来越明显了。领袖墨索里尼曾多次以最猛烈和粗暴的方

式痛骂资产阶级和贵族，对他们表现出十足的轻蔑；并进行威胁，说将来要把他们全部消灭掉。因此，齐亚诺和他的集团非常担心，在战争结束之后，墨索里尼会在意大利建立起一种和苏联无多大区别的制度。

齐亚诺对国家社会主义的德国是没有什么好感的。在斯坦伯格湖畔的谈话中，他毫无掩饰这一点的企图。他认为里宾特洛甫是一个祸害。当他发现，听他讲话的德国人也同意他的看法时，他说得越法坦率了。

齐亚诺关于希特勒和墨索里尼之间关系的描述，已经详尽地发表了。开始时，墨索里尼并没有把希特勒放在眼里，希特勒原是个奥地利人，而不是普鲁士人的血统，使他心里十分厌恶。墨索里尼终于站在德国的一边，并不是由于他个人对希特勒作为一个政治运动领袖产生了出自内心的同感，而是政治舞台上众多国家，特别是国际联盟在阿比西尼亚战争期间作出国际制裁所促成的。墨索里尼几次访问德国留下的印象非常强烈，在柏林组织的大规模的雄伟的军事检阅和群众游行，都使墨索里尼对国家社会主义德国的强大深信不疑。后来，他一再对自己的女婿说，意大利只能同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一道前进，没有别的选择。他在1938年3月德国入侵奥地利时采取的态度，可以被看作是一个例证，说明他已经意识到，由意大利从事或参与针对自己强邻的军事行动将是极端危险的。

据齐亚诺说，墨索里尼虽然站到德国一边，但有时也产生怀疑和危机感。德国是从来不讲究方式方法的，这使墨索里尼极度愤慨，有时竟会一连几小时地骂不绝口，说出最狂妄的威胁性语言。然而齐亚诺和那些与他观点相同的人企图利用这个机会推动墨索里尼加强其独立性时，他会立刻倒向另一

个极端，宣称世界上任何事物也动摇不了他对自己德国伙伴的绝对忠诚。

齐亚诺在蔑视意大利人民方面，和墨索里尼的立场是完全一致的——至少他住在斯坦伯格别墅时是这样的。他所处的环境可能是他具有这种态度的部分原因。他感到自己被出卖了，被推翻了，被放逐了。在他的苦难中，他衷心支持希特勒断言的话：墨索里尼是“整整一帮大意大利人中唯一的罗马人”^①。但是他对本国人民的厌恶感和墨索里尼发生的原因不同。领袖墨索里尼看不起意大利人——或者说承认是这样的，首先是因为意大利人太软弱、太顺从、太爱好和平；其次是因为意大利人对他的大帝梦想一直无动于衷，意大利没有分担他们独裁者的真正伟大的想法。正是由于这些原因，他过去经常希望意大利出现一个更为严酷的不顺利时期，以便使软弱的意大利人民坚强起来。他把普鲁士的军事纪律和组织视为自己的理想。他甚至做到这样的程度：在“罗马的步伐”的幌子下模仿普鲁士军队正式检阅时的步伐。

齐亚诺的理想采取了有别于他岳父的军事帝国主义思想的路线。齐亚诺原希望自己的国家能成为在欧洲领导精神和文化的盟主。他对意大利人民中的厌恶更多是出于本能，其矛头是指向意大利人民中的另外一些组成分子的，而不是引起墨索里尼反感的那一部分人。但是，他们双方都由于意大利未能按照他们各自的设想到应起的作用，产生了幻灭之感。齐亚诺在这个问题上感觉如此强烈，以致他竟然说自己的孩子不应作为意大利人培养，永远也不应回到意大利。他宣称，就他自己而言，他宁愿看到自己的孩子成为古巴人。

^① 指古罗马帝国时罗马人的后裔。

齐亚诺关于那些导致墨索里尼倒台的事件的描述，经过后来的调查，证明基本属实。他强调指出，最高委员会的行动与国王和巴多格里奥搞的阴谋毫无联系，两个集团之间实际上没有接触点。以格兰第和波塔伊为首的一批杰出的法西斯官员早就意识到，墨索里尼的政策正在把意大利引向毁灭。他们认为，领袖墨索里尼在体力上和精神上都已消耗殆尽，没有能力掌握极端险恶的形势向他提出的各项重大问题。他们还感到，法西斯运动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失去其原先的推动力。在行使极权国家的最高权力方面，这个运动已不再称职了。于是他们相应地制订了这样一个计划：墨索里尼将作为挂名首脑保持他的地位，但是他将被解除大部分独裁的行政权力。国王将被授予实权，这样，他将处于向西方大国提出和平建议的有利地位，并且有充分希望，这些建议将会得到迅速而详尽的考虑。这些谈判将立即由格兰第着手进行，他早已通过里斯本和马德里同伦敦方面进行了许多令人鼓舞的接触。这一计划得到了所有法西斯头目们的完全一致的赞同，包括墨索里尼的最老的支持者。如德·波诺、德·维奇和菲德尔佐尼等人。齐亚诺宣称，他曾一再促请墨索里尼正视现实形势实际存在的事物，把意大利从战争中摆脱出来。如果当时他这样做了，法西斯最高委员会也就无需发动政变了。墨索里尼承认齐亚诺的论点是站得住脚的，有道理的，然而他认为，在盟友危难时掉头不顾，是和意大利的荣誉不相容的。因此，当时别无其他选择，只有在最高委员会中提出不信任的动议了。

王室反对墨索里尼的活动完全是单独进行的。主要动力是女王储玛丽亚·何赛，她早在1942年就对齐亚诺说过，她将尽自己的最大努力使意大利退出战争。依照齐亚诺

的看法，王室的阴谋已经酝酿了很长一段时间；但只是到了盟国在西西里岛登陆、局势已经变得明显无望之后，这一阴谋才开始具体化。阴谋的线索捏在宫廷大臣彼得罗·阿瓜罗内伯爵的手中，他的主要同谋是参谋总长阿姆布罗希奥将军和警察局长卡尔米内·塞尼斯。在阴谋的最初参加者当中，没有一个人对巴多格里奥元帅抱有很大信心，直到很晚才把他吸收进去，那时也不过是考虑到他在武装部队里享有盛名而已。

如果说法西斯党的反对派和国王的一派之间有什么微妙联系的话，那是通过齐亚诺亲自进行的。国王对齐亚诺的政治家素质评价很高，曾在1942年指示阿瓜罗内向齐亚诺进行试探，看一看他能提供多大程度的合作。齐亚诺向我断言，他当时仅仅给了他们一个不置可否的回答。齐亚诺被解职以后，保皇派对他不再感到兴趣，因为他一旦离职，在意大利就没有多少影响了。在这阴谋的最重要阶段，他一场长时间的疾病进一步使他未能积极参预。诚然，他和巴多格里奥有过几次谈话，但是并未达成有关将来合作的明确协议。

根据齐亚诺的说法，在最高理事会内，法西斯党人的行动“既笨拙又愚蠢，只有德国的将军们可以比拟”。在那些负责人当中，没有一个人明确地知道一旦不信任的动议被通过后会将会发生什么情况。也许各人都有自己的某种计划，但完全缺乏思想和目的方面的任何一致性。国王迅速利用了这种混乱状态和举棋不定的局面，使他有机会比原计划更早地实现其反对墨索里尼的政变。墨索里尼象孩子一样落入了陷阱。当时如果墨索里尼享有健康和理智的话，他无疑会产生极大的怀疑，拒绝国王的邀请去萨伏亚别墅参加会议。

尽管齐亚诺在一定程度上有个人偏见，可是总的来说，他对当时形势的评价不但公正，而且正确。当然，有许多细

节是他所不了解的，因为他并不是保皇派阴谋家核心集团的亲信。最高理事会的反对派，由于大量各种不同的特殊利益和目标而四分五裂，这些利益和目标中间有不少纯粹是个人性质的，因而不可能实现联合阵线。理事会内大多数人当时是反对同齐亚诺合作的，后来只是由于考虑他作为墨索里尼女婿的名声可能会大有用处，才促使他们最后请他一道合作。可是，他仍未能在他们的会议中起任何领导作用，其原因可能是：他对形势所作的符合逻辑的总结毫无份量，未受重视。

齐亚诺认为，国王抓住了由最高理事会造成的局势所提供的机会，充分加以利用，这种看法可能是十分准确的。当然，现在确实没有任何证据能表明这两个阴谋曾有过任何协调行动，当墨索里尼谈到那些“叛逆者被叛变”时是有他的道理的。法西斯党的反对派和最高委员会精心经营的果实，确实被妙手空空的机会主义国王夺去了。

在齐亚诺被营救脱险之后，他的一个愿望是尽快地离开欧洲。他无意回意大利去，即使在取得胜利之后也不准备回去，而无限期地呆在德国对他也毫无吸引力。他的打算是先去西班牙，然后到南美去。作为保证他的出走的方法，他向我建议做一笔很好的交易。他表示要交出自己的日记，作为给他提供旅行方便的交换条件。

在斯坦伯格湖畔的历次谈话中，齐亚诺曾对我谈到他的日记，而且谈得那么多，使我对这些日记的政治和历史价值深信不疑。

齐亚诺通过暗示使人了解到，里宾特洛甫将因为过分妥协而无法再继续担任外交部长。这一实际情况给卡尔顿布吕纳大大加深了印象。因为如果卡尔顿布吕纳还有一件最希望

出现的事,那就是愿意看到里宾特洛甫的免职。齐亚诺从和他们的第一次会见起,便发现了这一敌对局势,于是他非常巧妙地利用了这一发现。这场交易赢得了卡尔顿布吕纳的赞同。

我通过德国特工局做了一切必要的安排。齐亚诺和他的妻子都已接到去南美的假护照,这时,在伯爵夫人方面的一个极糟糕的错误,把整个计划给毁了。她不听我的劝告,在元首总部拜访希特勒时,坚持要求得到希特勒的许可和支持。其结果和他原来所希望的恰恰相反。希特勒禁止德国特工局批准齐亚诺启程。他希望齐亚诺回意大利去,他肯定齐亚诺会在新政府里获得重要的职位,因为领袖墨索里尼和他的女婿之间同时已经在希尔斯贝格古堡(墨索里尼获释后一直住在这里)实现了彻底而正式的和解。戈培尔和里宾特洛甫支持希特勒的意见。里宾特洛甫正在酝酿一个灵活和西方停止战争的妥协方案,有可能被齐亚诺揭露出来反对自己,因此他最急切地要看到齐亚诺留在德国控制领土的边境之内。他向卡尔顿布吕纳承认,如果齐亚诺被允许到海外去,他很可能会对里宾特洛甫展开一场“十足的丑化运动”。

因此,当深受布法里尼影响的墨索里尼也要求齐亚诺回意大利时,希特勒同意了。齐亚诺虽然不愿意回去,但并不担心自己会受到危害。相反,他用这样的想法来安慰自己,对他来说,从意大利去南美可能比从被密封的德国去更容易一些。因此,当他在维罗纳机场着陆后被意大利警察逮捕并关进监狱时,确实大吃一惊。

虽然遭到这次挫折,我并没有放弃促成齐亚诺启程的计划。我很快同他取得了联系。我让我的罗马秘书希尔德嘎德·比茨冒充女译员偷偷混到他那里。她向他提出了不去西

班牙而去匈牙利的建议。卡尔顿布吕纳希望缓和希特勒的疑虑，通过这一办法，大体上把齐亚诺留在德国帝国的范围内。

齐亚诺同意了这个建议，于是我们找到了一位匈牙利贵族，他准备在特兰西瓦尼亚自己的庄园里接待齐亚诺。齐亚诺和卡尔顿布吕纳甚至起草并签署了一份正式的书面协议，就凭这个协议，他答应把自己的日记交给德国谍报局，作为把他从监狱里释放出来的报答。齐亚诺为了表示自己的感激之情，急着想做得更多一些，并且要预先交出一部分文件。他向那位已赢得他的信任的“女译员”透露了这些文件在罗马的贮藏处，并要求她立即把那些文件带给他。凭他指点的地方找出了那些文件。这部分实物对全套文件的巨大价值提供了充分证明。

营救齐亚诺的计划简单得令人高兴。根据计划，德国驻维罗纳的保安警察部队司令将借口自己收到了这样的情报：齐亚诺在意大利监狱看守人员的默许下，将任其逃亡，为此，派出队伍去占领监狱。事后德国人将简单地宣称，他们的干预太迟了，齐亚诺已经逃掉。齐亚诺一旦平安到达匈牙利的消息传到并经证实，他的妻子就将交出日记的其余部分。这样，希姆莱和卡尔顿布吕纳便同意由他们个人对这次行动承担责任，他们根据的理由是，希特勒的命令只是明文禁止把齐亚诺转移到德国控制地区以外的任何地方。他们希望齐亚诺文件的重要性和利益会促使元首对特工局的领导人的这一独立行动给予追认。

但是，到了最后一分钟，希姆莱和卡尔顿布吕纳丧失了这样做的勇气。他们听说戈培尔和里宾特洛甫都力劝希特勒不要偏袒齐亚诺。他们担心这个意见可能得势，于是希姆莱和卡尔顿布吕纳决定无论如何必须事先获得希特勒的具体允

许，才能进一步采取行动。正如只能象预料的那样，希特勒的回答是毫不妥协的，他禁止援助齐亚诺的任何尝试，还威胁说，任何不服从他的人都将受到严厉的惩罚。这时有人提出异议说，由于希特勒的拒绝，实际上无异于判处齐亚诺死刑。但希特勒却反驳说：“墨索里尼将永远不会批准处死他所钟爱的外孙们的父亲。”

无疑，希特勒真诚地相信，对齐亚诺被捕以及对他的起诉，都无需认真对待，那只不过是“一点儿意大利式的恐吓而已”，这位前外交部长是不会受到任何危害的。现在已经知道，希特勒曾对戈培尔说，他对墨索里尼没有惩罚齐亚诺和其他法西斯叛徒感到遗憾，但是他完全肯定，墨索里尼是会庇护自己的女婿免受极刑的。

就墨索里尼而言，希特勒的话是对的。但是他忘记了墨索里尼已经不再是往昔的“领袖”，也忘记了在墨索里尼已无法控制的新法西斯政府中，有人正利用各种势力在他的身旁反对他。在反对齐亚诺的运动中，布法里尼和法里纳奇是主要的推动者。这些新法西斯头目显然害怕他们会由于齐亚诺揭发出来的事实遭到严重损害，因此他们一刻不停地要齐亚诺的脑袋。墨索里尼竟然被他们恫吓到这样的程度，以至在维罗纳开庭审判期间竟没有做过一件能援助自己女婿的事，虽然可以设想，他一直打算在后期给他缓刑。所要说到处死齐亚诺的种种情节，还未为人们所尽知，但有一点是清楚的，即：直到1944年1月10日，也就是处死齐亚诺的前夕，墨索里尼还没有接到所期待的缓期执行请求书。齐亚诺已被枪决的消息传来，对他来说是一次沉重的打击。

第二天，齐亚诺怀着抱恨终天的心情死了，他认为德国人在同他的谈判中，以最卑鄙的方式欺骗和出卖了他。他拒

绝相信德国方面曾认真地计划对他的营救，而那个计划只是由于希姆莱的怯懦才未能实现。但是齐亚诺到临死时，仍保持着泰然自若的态度，他在被处决前用了一整夜的时间来和希尔德嘎德·比茨一起阅读塞内加^①的作品。

德国特工局的这位能胜任自己工作的女特工人员不仅把齐亚诺的信交给了他的妻子，从而使伯爵夫人有机会及时把那些日记转移到瑞士去，她还在安排伯爵夫人的逃亡，以及以我的名义设法保护了那些帮助过伯爵夫人的人不受惩处方面，都起了不小的作用。正是由于这个情况，艾米里奥·普奇侯爵虽然实际上和营救计划并无联系，但却是爱达的朋友——才免于处死。

众所周知，伯爵夫人在瑞士把齐亚诺的日记卖给美国人了。关于早已交给德国特工局的那一部分日记，事后还有一段传奇般的故事。1945年4月底，根据希特勒的总指示，那部分日记的原稿和译文，连同柏林的国家安全总部所有秘密档案，都被销毁了（曾经拍摄过微型照片，但其下落不明）。因此那些可贵的文件看来显而易见地永远消失了。但是突然，那些文件的副本却出现了。希尔德嘎德·比茨从罗马齐亚诺的贮藏处找到文件以后，曾委托她译成德文，她违反了约定，抄了一份副本。当苏联军队在战争的最后阶段向前进迫时，她把副本埋在自己的花园里。1945年夏天，在美国情报机关的协助下，她设法找回了这些文件。最后她把文件交给了美国国务院。全部的齐亚诺日记——短命的法西斯帝国的历史记录——就这样被保存下来了。

齐亚诺死去15个月以后，他的厄运迅速地被墨索里尼赶上了。

^① 塞内加，罗马的哲学家和作家。

在战争最后的几个月中，我对法西斯头目们保持了严密的监视，所以我可能对墨索里尼最后几天的一般情况补充一些材料。这是一部众叛亲离的诡奇小说，至今还未完全说清楚。人们已经写了许多关于领袖墨索里尼的最后几天和最后几个小时的情况，但是仍还有一些事实，如不加以说明，故事就不完整。

特别有趣的是由松松垮垮的内政部长布法里尼扮演的角色。4月23日，他通过我几个部下作为中间人，和德国在意大利的保安警察部队进行了接触，他向对方建议，象墨索里尼这样一个难以处理的人物，应该设法把他骗到游击队的手里去干掉。布法里尼建议，保安警察部队应该给墨索里尼及其一伙提供假护照，那时他本人会去说服墨索里尼逃往瑞士，取道科莫和梅纳基奥到达意大利的边境。但是在边境上，游击队将会埋伏在那里等候他……

几乎在同一时间，美丽的克拉拉·贝塔西的兄弟马西罗·贝塔西博士接近了一位驻在梅兰的德国警官，提出了差不多相同的建议。诚然，他并未特别强调要把墨索里尼交给游击队，但是——而这一点是更符合贝塔西的性格——他答应保证让领袖随身带走萨罗政府的金银财宝。这是争取德国人合作的诱饵，而贝塔西自己却满足于索取这批战利品的仅仅最不过分的一小部分作为他的辛苦钱。这时恰巧有一位德国特工局的高级官员在梅兰，于是向他呈报了这两项建议。这位高级官员立即予以拒绝，并禁止人们和布法里尼或贝塔西作任何进一步的联系。后来他可能感到这样做有超越权限之嫌，所以又给卡尔顿布吕纳发了一份电报，报告了详细情况并请求指示。事后才得知这份电报从来没有到达其目的地。

墨索里尼后来恰恰就是取道布法里尼向德国警察部队建

议的那条路线逃走的——而杀害墨索里尼的人们也正巧在准确的地点和正确的时间等着他吗？难道真的是一场巧合，是一些纯粹偶然而又出人意外地“相互联系在一起的事件”吗？还是布法里尼……

就人们所知，墨索里尼4月26日在科莫接见了布法里尼。这位前内政部长——早在三月以前墨索里尼曾说过永远不愿意再看见他——肯定曾建议墨索里尼应该逃往瑞士。他告诉过领袖，从他在科莫湖边的别墅，他曾有过多极好的机会研究走私犯选用的路线，并且提出愿为墨索里尼充当向导。但是有一点是非常令人奇怪的：布法里尼是很了解内情的，然而他自己却没有及早通过这条路线逃往安全之地，反而宁愿冒险在等候帮助一个自从自己免职以来深恶痛绝的人。

墨索里尼为此把给妻子的最后一封信交给了一名警察，这封信也同样落入了布法里尼之手，这是由墨索里尼的孀妻拉契尔夫人的回忆录中了解到的。所有这些事实都有某种连接关系，它们全都指出，邪恶的叛卖活动对墨索里尼之死有关系。布法里尼死了，他在逃亡中就在他向墨索里尼指引的那个地点被游击队擒获了，和贝塔西博士一样，被他们所杀害，而杀害的方式使人联想到，那些杀害他的人都是急于要消灭掉他们犯罪的同伙的。

不管对墨索里尼可能做出什么判决，无论他的政策对意大利带来了多少灾难，他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出现的，有不容否认的地位，因此希望现在还活着的人们讲述关于墨索里尼的结局真相的时候，把掩盖着他死亡的秘密揭开（编者按：墨索里尼死亡的真相早已揭开，是被共产党领导的反法西斯游击队擒获并和他的情妇一起枪杀，并吊在绞刑架上示众的）。

棱堡的神话

我们现在谈战争的最后阶段，在这个阶段希特勒在阿尔卑斯山的棱堡的神奇的传说起了显著的作用。但是，首先我们要谈谈我们的盟国意大利的背叛。

巴多格利奥知道，德国在认真考虑在意大利采取反措施。当然，这可能会给新政权带来灾难，因此新政权立即尽一切可能来减轻德国的怀疑和麻痹德国特工人员的警惕性。意大利军事谍报局局长切兹尔·阿梅将军奉命采取行动来蒙蔽德国人，他所处的地位适合于做这件事，因为德国军事谍报局局长卡纳里斯海军上将是他的密友。

卡纳里斯自己的情报来源明确地提醒他，说意大利打算放弃战斗，并且可能投向对方。这些结论同德国特工局得出的结论完全一致。尽管如此，德国军事谍报局，特别是这位海军上将本人，在给最高司令部和希特勒的报告中仍表示了这样的看法：这样发展的危险很小，或者干脆没有。希特勒的怀疑没有减轻，因此凯特尔向希特勒建议，让军事谍报局局长亲自到意大利去一趟，以便和他们自己的同僚和朋友阿梅一道就地澄清情况。很可能给凯特尔出这个主意的就是卡纳里斯本人。

这两位谍报局局长在威尼斯会面。阿梅把卡纳里斯拉在

一边，十分坦率地把意大利同西方盟国谈判停战的详细情况告诉了他的朋友，他还说巴多格利奥政府对希特勒采取某种反击的可能性感到非常担忧。他恳求卡纳里斯竭尽全力来保证意大利退出战争的决定，不致由于希特勒采取某种行动而遇到阻碍。卡纳里斯答应这样做，并且履行了诺言。

卡纳里斯后来只向他的心腹同事谈到过这次密谈。在这次密谈之后马上举行正式会谈。一切按程序表进行。卡纳里斯当着见证人的面提出了凯特尔指示他提的问题。阿梅摆出一副受冤屈而感气愤的样子，声色俱厉地说，希特勒对意大利新政府存有的怀疑，一点事实根据也没有，巴多格利奥决心继续同德国并肩战斗，直到取得最后胜利。会议的结尾是阿梅慷慨激昂和热情洋溢地叙述轴心国团结一致。由卡纳里斯的部下草拟的一份会议报告被送交希特勒。虽然凯特尔对卡纳里斯带有某些疑虑，但同时他完全信赖他的军事谍报局长。他大大加重语气对希特勒说，他相信意大利方面没有危险。希特勒并不是这样确信无疑的，但是他打算干预的意图减弱了，他犹豫起来。在这种程度上应该认为阿梅的蒙骗是成功的，然而当时要找到对意大利采取一次成功的军事行动所需要的德国军队是困难的，这无疑也是一个因素。也许对于这个诡计的犹豫实际上是德国未能阻止意大利背叛的决定性原因。

除了在1943年秋作出种种努力为了意大利同西方盟国商谈停战外，还通过梵蒂冈的其他努力同西方国家建立联系。德国特工局在这方面也起了主要作用。德国特工局的活动同德国军队中反对派的活动截然不同，因为前者从来没有一刻考虑过对希特勒本人策划一个阴谋。更确切地说，德国特工局的目标是在现有政体的结构内实行一种变革，为同西

方迅速缔结和约打开通道。早在1940年，德国特工局中我的小组早已作过初步尝试，劝说德国政府作出一些有利于德国天主教會的让步，从而谋求梵蒂岡的同情合作，担当同西方盟国接触的调停人。由格莱斯—霍尔斯特瑙发起的这种尝试是贯彻始终的。

拥护此举的消息最灵通和最有才能的人之一是耶稣会的会长弗洛德齐米尔兹·哈尔克·冯·列多乔夫斯基伯爵。由于他的耶稣会遍布各地的分会能向他提供情报，他远比教會内大多数其他高职显要人物对整个政治和军事局势有更清楚的全面图景。他清楚地认识到布尔什维克主义对他们的威胁，他知道，如果德国遭到浩劫，苏联会成为对整个西欧的一个紧迫而直接的威胁。由于这些原因，他准备根据共同的反共方针同意耶稣会和德国特工组织之间进行一定程度的合作。起初，这种合作应限于互换情报，而这应成为更大设想的开端，即：西方盟国和轴心国家之间达成谅解，组成一个反共反苏的欧美大联盟。

在会谈的最初阶段，立即开诚布公地讲明了这个最终目标。列多乔夫斯基已经认识到德国和苏联之间不久必定会发生一场军事冲突，他煞费苦心竭力保证德国国访军的行动不会由于俄罗斯长老会的牧师在德军计划占领的那些地区的活动而受到阻碍。俄罗斯长老会多年来一直从事于训练传教士，以便在苏联信仰正教的居民中进行工作。

但是，德国政府拒绝向教會作任何让步，政治特工局和国家安全总部双方的努力均未能取得任何成果。这些努力到头来差一点给德国谈判代表带来灾难，耶稣会会长通过罗马教皇驻柏林使团的媒介同他们通信，不幸得很，无孔不入的盖世太保竟在罗马教皇驻柏林使团中安插了它的特工人员。

海德里希一定害怕未经许可就开始的谈判传到希特勒的耳朵中去，因此出面干涉，对我采取了行动。幸而从交给他的列多乔夫斯基的信中看不出谈判的整个程度和范围，因此避免了招致直接的后果。我被降级为士兵，分配在党卫队的护卫团工作。在海德里希死后，我在1943年2月回到了我的原来岗位，并立即比以往更积极地从事和平探索工作。

在整个1943年和1944年期间，我参加了德国特工局，从事寻求同西方达成一项协议的努力。在表示愿意将德国主和派的意图传给伦敦和华盛顿的主要中立政治家中，有贝当元帅、佛朗哥将军和葡萄牙总理萨拉查博士。他们愿意充当中间人。结果是非常令人沮丧的，对此，英美政府和德国人一样要受到责备。希特勒本人决不是反对谈判，他急切地等待军事形势好转，那将加强他的讨价还价能力。后来，当这样一个机会出现时——直到1943年时常出现这种机会——他却变得洋洋得意，并且宣称不再需要谈判。西方领导人的态度从一开始就非常坚决，令人为难。罗斯福从来没有作出丝毫的暗示，表示他也许可以改变他曾正式宣布的必须无条件投降的政策。

尽管屡遭失败，德国特工局却继续努力，坚持不懈。随着盟国对德国采取的军事行动节节取得胜利，通过谈判实现和平的前景变得暗淡起来，任何可能达成协议的机构和范围也缩小了，结果只在北意大利和阿尔卑斯山地区达成地方投降协议。

1944年秋，柏林的特工局总部初次接到情报，说是在瑞士有一个美国机构，其任务似乎不仅仅是一个正常的谍报中心。这个机构的头头是一个名叫艾伦·韦尔什·杜勒斯的律师，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作为美国的外交人员的一

员参加凡尔赛和约的谈判，特别是调解奥地利—南斯拉夫的争端，因此已成为知名人士。他被安置在美国驻伯尔尼公使馆中工作，这个事实多少有点表明他的实际活动。他向华盛顿发送无线电报。这些电报被匈牙利监听人员截获，大部分破译出来传给德国人。从这些电报中，德国特工局能够准确地了解他对世界政治的重大问题的看法，美国驻伯尔尼公使把从德国传出的最荒唐和最愚蠢的谣言当作既定事实报告华盛顿，而杜勒斯同他不一样，显示出自己不仅是一个才智高超的人，而且是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死敌，他反对布尔什维克主义是根据知识、推理和目光锐利而得出来的。对于多年来寻求与一个权威性的美国组织建立联系的小组来说，这种毫不含糊的态度为他们提供了寻找已久的大好机会。他们开始设法同杜勒斯进行接触。他们通过一个奥地利工业巨头和德国驻伯尔尼空军副武官居间搭桥，很快地做到了这一点。

我们这批德国人充分认识到，到这个时候即1944年底，根据平等伙伴关系通过谈判达成任何协议再也不可能了，经过初步交换意见，他们对于能够达成什么结果没有得到任何具体线索。他们的第一个考虑是说服美国人避免把德国和奥地利的任何大部分领土交到苏联人手中去，为此感到他们必须拿出具体证据来证明苏联对其西方合伙人的意图具有两重性。

但是，谈判的实际基础得出了完全不同的结果。德国特工局总部早就知道，英国和美国的总参谋部对于德军可能在筑有坚固堡垒的阿尔卑斯山地区进行长期抵抗这一点感到担忧。根据盟国得到的情报，据说这个棱堡由北意大利—奥地利阿尔卑斯山崇山峻岭的大片土地组成，在他的最前沿阵地中有一带开阔有利的射界，盟军的专家认为，这样的防御地

区可以成功地守住很长时间。盟军总参谋部错就错在以为德国在阿尔卑斯山进行抵抗的准备工作已做得很充分。

实际上，这些准备工作刚进入初步阶段。在 1944 年 11 月，蒂罗尔的地方长官弗朗茨·霍费尔派遣鲍曼将一个建筑阿尔卑斯山防御棱堡的完整而详细计划转交给希特勒。但是，鲍曼考虑到，鉴于当时的军事形势，把最后的拚死抵抗的计划交给希特勒，失败主义的味道太浓了，因此他扣住了这个备忘录。但是，后来在他得知希特勒已经从特工组织那里知道，盟国对这种可能性感到非常害怕，并且意识到希特勒已经关注这个问题时，他把霍费尔的计划给元首看，结果是希特勒命令霍费尔快修筑这个棱堡。

这个主意变得很时髦，赖纳也开始干起来，他是卡林西亚的地方长官，因此也负责保卫阿尔卑斯山棱堡，铁托可能会进攻克罗地亚沿海地区。但是这里的准备工作从来没有越过计划阶段。在意大利北部的德国集团指挥部设立了一个阿尔卑斯防御研究处，希姆莱也不甘落后。他派一批党卫军的地质学家同武装部队一党卫军山地作战学校一起研究“使用大规模炸山爆破的方法建造山岳防御阵地的可能性”。但是，再往北，贝聿特斯加登附近的准备工作还没有超过初步讨论的阶段。也没有采取什么措施把工厂从奥地利迁到山地里去，尽管有许多非常精良的设备。

盟军最高司令部的担忧并未经事实证明。一部分是由于德国的宣传，另一部分是由于德国特工组织捏造的假情报落入盟国手中的结果。但是，这种担忧还是存在，德国特工局便利用它作为取得更好地位的一个手段，如果不是为整个德国，那么至少也是为有关奥地利的那部分地区。盟国军事专家认为，为了肃清假定的山岳要塞，可能需要若干年的游击

战才能制服，因此，盟国可能准备作出很谨慎的让步。

从同杜勒斯的最初几次会谈中，可以清楚看出，阿尔卑斯山棱堡是，并将仍然是讨论的主题。从德国的观点来看，目标是设法以和平的方式交出这个在盟国的心目中非常可怕的神话般的奥地利防御地区，来换取某些实质性的让步，例如建立一个只是象征性的占领政权。特工局终于争取到所有主要军事指挥官支持他们商定的计划。如果要开始防御这个棱堡，这些指挥官是有责任的。负责防守东奥地利的将军们自己是奥地利人，欣然同意支持一个有希望拯救自己祖国大部分领土的计划。

勒尔将军答应支持这个计划，他刚刚以高超的才能把自己的军队从希腊撤出来，现在驻扎在奥地利—南斯拉夫边界。最近被任命为驻扎在奥地利—匈牙利边界的集团军的总司令伦杜利克将军也许诺支持这个计划。南方集团军总司令凯塞林元帅表示他大体上同意。驻捷克斯洛伐克的舍纳元帅总司令部和西线的冯·朗兹代提元帅总司令部的联络官都报告说，假如只限于同西方国家谈判，可以得到这两位总司令的合作。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还缺的是，能够从这个山地要塞内部产生出具有谈判权力的最高权威的人物。如果要防止混乱，这个人必须是现政权的首长之一，要在法律上和宪法上有权根据自己的权威行事。

在战争的最后阶段，希特勒把越来越多的权力移交给地方长官，特别在采用地区防御制度以后，这些地方长官已经成为几乎独立的专制君主。除希特勒外，希姆莱由于担任内政部长，党卫军首领和后备军总司令是唯一能向他们发布命令的人。但是在1945年3月，在德国将被苏联和英美部

队的从西到东一分为二的威胁面前，他任命卡尔顿布吕纳为他的副手，对南部德国掌有全权。后来在他听说卡尔顿布吕纳参与了同西方国家的谈判尝试后，他开始不信任他，于是任命柏林党卫军总部参谋长党卫军上将贝格尔担任巴伐利亚的司令，掌有同样的全权。但是，他对任何奥地利领土没有管辖权。

因此，卡尔顿布吕纳具有统管各地方长官的必要权力，如果他准备行使授予他的权力，他处于支持这个拟议中的计划的理想地位。从1943年起，有人多少经常不断地把他的特工组织为在西部取得和平而进行的努力向他报告，虽然他从来既没有表示赞同，但也没有表示反对，他的态度直到那时仍然是模棱两可。但是，现在德国的处境是那么明显地毫无希望，他就很容易地被说服来提供支持了。

舞台已完全布置就绪，演员们现在全都准备装作防止在阿尔卑斯棱堡进行最后的无谓的抵抗。到1945年3月底，德国谈判代表得以向西方盟国提出所需要的一切保证，担保他们的承诺能够并将得到尊重。还要开最后一次会议，在会上要求西方国家作出一个保证，即保证不让苏联人参加占领奥地利，如果以前的条约义务规定不能作出这种保证，那么就保证不把奥地利分成区，而让奥地利隶属于盟国间混合的和联合的占领，作为形势所许可的象征性应急措施。

不幸得很，这个如意巧妙的解决办法始终没有实现。在此期间还进行着其他活动，虽然这些活动旨在达到同样的总目标，却完全损毁了特工局有关奥地利的计划。德国驻意大利新政府的大使拉恩博士在执行其困难的任务中显示了杰出的外交才能，他自己始终设法同杜勒斯进行接触。为了这个目的，他使用了一个人，这个人由于同希姆莱有联系，能够

担负对任何其他国防军军官来说都将是极其危险的使命。这个人党卫军将军沃尔夫，是驻意大利的党卫军和警察高级军官，多年来担任希姆莱的参谋长，是他最亲密的朋友和合作者。

沃尔夫丝毫不是那种沉醉于权力的残暴类型的人。他已认识到，德国的处境是绝望的，他欣然同意了拉恩的看法，认为能避免现在几乎不可逃避的一场灾难的十足恐怖，唯一希望是同西方谈判。通过意大利工业家路易吉·帕里利同杜勒斯建立了联系，帕里利已经在为德国特工局工作。帕里利是朱格·贝格教育学院的瑞士院长胡斯曼教授的朋友，而胡斯曼教授又是魏贝尔少校的朋友，魏贝尔少校是瑞士特工组织的一名军官，也是他自己的首领和艾伦·杜勒斯之间的联络官。

杜勒斯是个经验丰富的情报官员，由于沃尔夫和他的同事都没有任何外交的或官方的身份，他自然而然地引起了怀疑，曾造成许多困难。但是，通过这些十分迂回曲折的通讯联系线路，终于安排了第一次会晤，这次会晤是杜勒斯和沃尔夫之间三月初在美国驻苏黎世总领事馆内举行的。杜勒斯要求他释放弗鲁乔·帕里，并把他带到瑞士去，作为一个证据，证明沃尔夫的许诺得到履行这些许诺的当局的支持。帕里是被俘的游击队领导人，后来担任意大利总理。沃尔夫遵守了这个要求。

如果沃尔夫将军在会见杜勒斯之前对自己的任务的可能范围抱有任何可以讨价还价的幻想的话，那么这些幻想一定很快破灭，因为立即看得很清楚，杜勒斯对除了南部德国军团投降以外的任何事情既不感兴趣，也不准备谈判。这次会议的结果是，沃尔夫保证，不管柏林可能发出任何正好相反的命令，他要安排该集团军的投降。此外，他还要阻止任何

破坏、拆毁、枪毙人质的行为和阻止同意大利游击队作战。这个协议的代号被称为“日出字谜”行动计划。

沃尔夫访问瑞士及其同杜勒斯谈判，并不是没有被人觉察。卡尔顿布吕纳立即认识到，沃尔夫的独立行动即使不会完全毁掉他自己已决定支持的事业，也会不利于这个事业。如果像设想的那样，沃尔夫已提出南方集团军向美国人投降，那么神话般的阿尔卑斯山整个防御体系，就会被揭穿，盟国也会解除那个忧患。因此卡尔顿布吕纳同希姆莱商定，让沃尔夫不要同杜勒斯继续交往。希姆莱还把正在进行的活动告诉了里宾特洛甫，而里宾特洛甫害怕这位大使的活动招致希特勒把气出在他的头上，因此决定召回拉恩。但是，有人及时把情报通知了拉恩，拉恩非常巧妙地利用他对希特勒和希姆莱的心理的了解，显示出他在他目前所担任的职务下如何责无旁贷。他送去了一份叙述墨索里尼的随从人员在外交部中发生的事情的耸人听闻的长篇报告，内容有些是真实的，有些是虚构的，但是全都容纳了耸人听闻的可能性，因此没有立即召回他。沃尔夫也不理希姆莱的指示，继续他同杜勒斯的谈判，卡尔顿布吕纳未能制止对他自己的计划带有这样严重的危险的沃尔夫—拉恩活动。

在凯塞林调任西部集团军司令后，拉恩和沃尔夫感到自己失去了原来主要的军方保护人。但是，凯塞林的继任者冯·菲廷霍夫将军和他的参谋长勒廷尔将军恰恰抱有同样的见解，支持凯塞林的所有行动。于是，谈判得以继续进行，杜勒斯飞往盟军在卡塞塔(意大利那不勒斯东北)的总司令部加速谈判进程。这次访问的结果是，派美国第五军副参谋长莱曼—兰尼兹尔上将和在意大利的盟军英国军事情报局局长艾雷少将以假名去瑞士会见德国人。

会谈在1945年3月19日举行，出席会议的人有党卫军将军沃尔夫，他的同僚和两位盟军将领以及艾伦·杜勒斯和他的德国事务专家格罗·冯·舒尔策-格维尔尼茨博士。就投降的条件达成了全面的协议，在会谈之后，沃尔夫决定去见希姆莱，他正处于心惊胆战的状态，唯恐希特勒听到谈判的事情。沃尔夫急切地想，如果可能，就使希姆莱坚决同意已完成的工作，但是他未能做到这一点，希姆莱只说，他必须取得卡尔顿布吕纳的同意，卡尔顿布吕纳目前在判断上处于比他强的地位。

在这个时候，卡尔顿布吕纳决定，也希望亲自参加与盟国的会谈。为此他安排同国际红十字会主席布克哈特教授在奥地利—瑞士边界会面。他这样做非但没有促进谈判，反而差点毁了谈判。有人立即把第二次会面告诉了杜勒斯，杜勒斯已经同沃尔夫谈判了南部集团军投降的问题，并且同德国特工组织谈判了阿尔卑斯山棱堡的问题，现在又出现了第三个谈判代表，自然感到怀疑。除了这一切外，墨索里尼还发现，在沃尔夫的煽动下，把最著名的游击队领导人中的两人释放了，因此他向德国大使提出了最强烈的抗议。光是这些事情就足以使德国方面的行动放慢下来，但是当时在盟国方面发生了一件事，有使全部计划彻底告吹的危险。

在沃尔夫将军和盟国驻意大利总司令的代表举行了会谈之后，陆军上将哈罗德·亚历山大爵士关于谈判的报告转到了莫斯科。报告把谈判说成纯粹军事性的，并且说，奉盟国最高司令部发出的命令，亚历山大上将将等候英国和苏联政府的指示，然后派谈判代表到瑞士去。

莫洛托夫要求立即允许当时恰好在法国执行联络任务的一些苏联将军参加这些谈判，但是由于苏联和瑞士之间没有

外交关系，因此无法马上安排苏联的将军们到瑞士去，美国人就找到了拒绝这个要求的好借口。苏联政府提出了抗议，要求立即放弃关于投降的谈判。在西方国家拒绝这个要求后，斯大林拍了一个强烈的私人电报给罗斯福，责备美国人公然背信弃义，还说由于这样违背条约义务，苏联政府现在认为自己有理由在波兰采取独立的行动。

在此关键时刻，罗斯福还没能来得及答复斯大林的电报，就突然中风，在4月12日去世。

杜勒斯除了在战略情报局任职外，还是罗斯福的私人代表。总统的去世连同苏联的强烈抗议似乎削弱了这位主要美国谈判代表的地位，美国政府指示他暂停谈判。然而，杜勒斯不愿不经一番斗争就服从。他同亚历山大将军进行了联系，亚历山大将军答应自己负责向英美政府建议接受德国的提议。亚历山大比华盛顿和伦敦的那些负责人更清楚地看透苏联的战术，这个战术的目标是，推迟停止敌对行动，从而使苏联军队有时间进一步向西推进，并且转向南方为铁托打开进入波河平原的门户。亚历山大将军的干预取得了圆满成功。

可以设想，教会也竭尽全力进行劝告和施加影响，来说服盟国不对苏联的渴望让步。米兰的大主教伊尔德方索·舒斯特尔红衣主教始终完全得知谈判各阶段的情况。可是仍然有些困难有待克服，但是，终于在1945年4月27日在卡塞塔签署了投降协定。由于这个行动，阿尔卑斯山棱堡的庞大计划——不论是作为最后抵抗的地点，还是作为讨价还价的基础——也就全部告吹。没有德国南部集团军，防守这个棱堡的核心和主力也就没有了，盟国在南方再也没有什么可担忧的了，同时他们也终于知道他们原先的忧虑过了头。

当莫德尔陆军元帅的集团军在鲁尔投降后，美国人配备好大型地图，就阿尔卑斯山棱堡的问题对德国参谋官员组织了一次详尽细致的讯问。他们大为惊奇，发现这些参谋官员中的大多数要么根本没有听说过这个工程，要么对他们道听途说的事情认为实际上无足轻重而不予考虑。

瑞士总参谋部已得出同样的结论。由于认为这对瑞士的利益有切身的关系，因此已经进行了详细的调查，瑞士对于德国在战争的最后阶段在最靠近瑞士的边界建立防御地带不能漠不关心。

我的特工人员从1944年12月到1945年5月同杜勒斯保持接触，取代了不幸的反对派。虽然我们没有取得我们努力争取的影响深远的结果，但是德国特工组织同杜勒斯的接触，至少保证不用徒劳无功的流血和毫无意义的破坏便完成了对奥地利的占领，并在该国重新建立政府。

现在的秘密战线

阿尔卑斯山游览胜地阿尔特—奥西座落在奥地利死山山脉脚下，这里，在1945年5月，游客摩肩接踵，甚至比和平时节最美好的几个月还要多。来此地旅游的人向来自世界各国的都有，但是，此时，由于德意志帝国崩溃，此地的国际性比以往更加突出，在当地的旅馆里可以听到十多种外国口音。

我认为我已完全确定，希特勒从来没有认真打算在奥地利阿尔卑斯的崇山峻岭中修筑一个要塞式棱堡，让国防军的残余部队在那里进行最后的抵抗。但是，同样地，他也没有采取任何行动来使人不相信这个传说，到最后，他的许多支持者，特别是他在东南欧的盟友，也相信这个棱堡的神话，因为他一直以暗示掌握新的秘密武器和进行停战谈判的办法鼓励这些盟友坚持下去。在1944年底到1945年初，德国外交部的京特·阿尔滕贝格博士在阿尔特—奥西为东南欧各流亡政府找住处时，流亡政府的成员比任何时候更相信，希特勒决心在他的山地棱堡继续战斗。他们把德国的境况同英国在1940年的境况相比，那年，各国流亡政府在这个被围困的岛上避难。如果需要进一步的证据，那就是无数德国高级文官来到阿尔特—奥西和邻近的萨尔茨卡默古特地区。还有一批艺术珍品藏在

萨尔茨堡的矿井洞里，这是世界上从未见过的最大的珍藏。

把阿尔特—奥西作为山地作战指挥所，它的位置是理想的。它巢居在达赫施泰因和死山的高耸一万英尺的悬崖峭壁之间一个狭窄的山谷里，几乎连飞机也看不见和进不去，只要进行两次大爆破，就可以使仅有的两条道路长期不通。如果希特勒的贝格霍夫总部的安全处于危险中，上奥地利的地方长官奥古斯特·艾格鲁贝尔便希望看到德国领导人到这个地点来。他就是希望在这里修筑庞大的防御棱堡。但是，他当时不知道希特勒无意离开柏林。而希特勒在躲入柏林的帝国总理府最后发号施令时，曾把脸转向他信任的朋友马克斯·阿曼作逐字的解释说：“如果他们再要使我跨出这道门槛，出去的将只是一具尸体”。当他留在总理府的地堡中等候末日时，他没有突然改变他的主意。他的确是完完全全始终如一的。然而，全体党干部不知道他的真正意图，忙碌地想在阿尔特—奥西筹建一个新的总司令部。

艾格鲁贝尔是个象公牛般的人，对艺术珍宝的收藏不怎么感兴趣，这些艺术珍宝是来自欧洲各地的。他自称为“上多瑙河要塞”的司令，这位司令本来不会抽出一辆运货汽车，一个人力，肯定也不会省下一滴宝贵的汽油来运输这些财宝。但是，连艾格鲁贝尔也不能不理元首发来的直接命令，虽然他是有时敢于同希特勒顶撞的少数几个高级官员之一。确实有一次艾格鲁贝尔使希特勒的全体随行人员大为震惊，他用他土里土气的奥地利方言对希特勒说：“我的元首，你知道，我们这儿的人不称呼你的外交部长为里宾特洛甫，我们管他叫里宾特洛夫。”（“特洛夫”在德文中的意思是“蠢人”）

希特勒虽然已经不再看重里宾特洛甫，但是不能承认这个事实，所以感到不高兴。那位遭到奚落的外交部长从此对

艾格鲁贝尔怀有刻骨仇恨。甚至在审讯主要战犯期间，他们在纽伦堡法庭上面对面相遇时，里宾特洛甫也假装没有看见他。

艺术也许已使艾格鲁贝尔感到厌烦，但是他急切地想把国家的秘密档案转移到萨尔茨堡难以进入的矿穴中安全的地点去。希特勒1945年2月底在柏林举行最后一次地方长官会议，在这次会上，艾格鲁贝尔在私下问希特勒，他打算何时下去组织山地棱堡的防御。希特勒作了一个躲躲闪闪、含糊其词的答复，但是他可能告诉艾格鲁贝尔，他不久就把最重要的文件和他个人的全部档案送交给他，他必须用自己的生命保卫这些文件和档案。

虽然盟国特工局人员在阿尔特—奥西搜查多年，寻找希特勒的秘密文件，但是今天我们晓得这样一个事实，这些文件从来没有运到阿尔特—奥西去。不管怎样，我能确切地叙述希特勒的私人文件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这些文件无疑被毁掉了，这对将来的历史学家来说是一个非常重大的损失。我的主要情报来源是希特勒的高级副官、党卫军将军尤利乌斯·夏勃，夏勃从1933年直到希特勒死之前几天，从来没有离开过他身边，按照最确切的意义来说，夏勃是自己主人的忠心耿耿的奴仆，忠诚地执行了主人所下的销毁其全部私人文件的最后命令。

1945年4月22日，在炸得七零八落的柏林总理府下面的元首地堡中，希特勒首次承认，战争打输了，末日即将来临，现在什么也挽救不了柏林。他在每天的情况汇报会上向凯特尔·约德尔、鲍曼和布格道夫大声喊叫，说了这番话，并且以歇斯底里地大发脾气的语气宣布这次会议到此结束。

在这之后，他立即派人去叫他的副官尤利乌斯·夏勃，

夏勃20年来一直跟随着他，从慕尼黑小客店的后客厅，到帝国的总理府。夏勃把经过情况告诉了我。希特勒命令他把存放其私人文件的所有保险柜内的东西都销毁。这些保险柜放在全国各地。有些放在柏林元首的地堡中，其他一些放在遭受严重破坏的总理府内希特勒的卧室里，慕尼黑摄政王广场16号他的住宅里，还有另外一些放在贝希特斯加登的山宫里，这些保险柜的钥匙从来都放在希特勒的身边，甚至谁也没有看过一眼里面的东西。

夏勃立即开始执行托付给他的任务。一次沉重的轰炸炸毁了总理府最后剩下的一排房子，希特勒的卧室就在这排房子里。夏勃依靠党卫军军官的帮助，在猛烈轰炸下，从两只保险柜中把文件收拾了出来。这两只保险柜真是有点出奇，一点没有受到损坏。接着他把这些文件和从地堡中保险柜里取出的文件合在一起，极其小心地放在总理府花园内一个炸弹坑中予以焚毁。希特勒有一段时间眼巴巴地望着他，一声不吭。

到4月25日晚上，希特勒才又派人去叫夏勃，命令他赶快逃跑。在东部苏联军队已经开到离那里不到两千码的亚历山大广场，炮弹到处爆炸，街道上已经堆满了倒塌的和正在倒塌的颓垣残壁。但是，夏勃经过艰难危险的行车后终于抵达加图机场，在那里，孤零零的一架容克52型飞机尚能飞行，在4月26日清晨，他在正向前挺进的苏联步兵发出的一连串枪火下离开了柏林。他在慕尼黑机场着陆，尽管空袭，他还是从希特勒在摄政王广场的住宅的卧室内小保险柜里抢出了文件，装进一只手提箱，接着前往贝希特斯加登。在那里，他也在希特勒的未遭损坏的书房里，找到了保险柜。在同一天，他在屋外的一个垃圾堆外点火烧掉了希特勒的最后一批私人文件。

多年来，夏勃对他所参与的事一直保持沉默，直到一家德

国画报发现了一些蛛丝马迹，登载了一篇歪曲报道，他才感到不得不披露事实真相，实际经过就是上面所叙述的。对希特勒的贴身随从中的另一些人进行的审问证实夏勃叙述的每一个细节都是准确的。因此我们现在知道第三帝国的一些最重的文件到底出了什么事。

1945年5月8日以前，艾格鲁贝尔自己留在他的地方长官专区的首府。接着，林茨陷落。他派一名部下留驻在阿尔特—奥西，命令他等候一个携带希特勒的私人文件的信使，并把那些文件埋在当地的盐矿里。其实从来没有这样的信使突然出面，虽然艾格鲁贝尔同夏勃一起在纽伦堡的监狱中关了好几个月，但是他到死也不知道这件事。夏勃保持绝对的沉默，什么也不说，直到他确信希特勒真的已经死了。

另一个人在阿尔特—奥西等候重要的文件送到，也白等了。但是，在这时候不知道这些文件是否销毁了。这个人是安全部的首脑卡尔顿布吕纳博士，在德国崩溃前的最后几周中，他大部分时间是在阿尔特—奥西度过的。卡尔顿布吕纳从他在1943年担任国家安全总部首脑的职务的时候起，始终倾向于赞成通过同西方国家单独讲和来缩短战争的主张。但是，他缺乏一定要实现他的意志的个性和魄力。一定不要忘记，虽然卡尔顿布吕纳升任为德国居第二位的最有权势的人物，但是他不是靠自己的能力达到这个高位的，而更确切地说这是由于他的前任海德里希授予这个职位的巨大的权力。卡尔顿布吕纳地位上升还由于希特勒愈来愈看出希姆莱是个实在无足轻重的人。但是，那些努力争取同西方盟国早日讲和的人主要依靠卡尔顿布吕纳的支持。这一点已在上文提到。

禀性冷漠的卡尔顿布吕纳在1945年3月底到柏林去了一次后回到阿尔特—奥西，心情非常乐观，令人感到惊讶，因

为希特勒终于鼓起了犹豫不决的人的新的信心。但是恶梦般的消息一个接一个传来，连他也开始神经紧张起来。他急于拿到他放在柏林自己专用的保险柜中的某些文件，他在最后一次去柏林时感到不得不把这些文件留在那里，因为他不愿意让人怀疑他在思想里认为柏林必定陷落，他永远不能再回到那里去。所以，他把这些文件留给盖世太保的首脑缪勒妥为保管，缪勒留在柏林担任他同希特勒之间的联络官。卡尔顿布吕纳发过电报，打过电话，甚至派了一个特使去要这些文件，但是缪勒既没有回话，也没有把文件送来。

什么文件使卡尔顿布吕纳如此忧心忡忡，我们只能猜测了。在这些文件中肯定有第三帝国主要领导人物的个人档案，这些档案保持了好多年，据卡尔顿布吕纳告诉我，其中最重要的档案存放在他自己的私人保险柜里。在这些文件中有许多重要的“供元首考虑的计划”——卡尔顿布吕纳向希特勒提出的各种建议。卡尔顿布吕纳对其中一些计划特别感兴趣，因为他希望这些计划向盟国提供证据，证明他向元首提出的外交政策建议是明智稳妥的。他在纽伦堡审判中使用了这条辩护口实，而看来他不能理解这样一个事实：他之受审不是由于他担任德国特工组织的首脑的活动，而只是由于他担任国家秘密警察（盖世太保）第五局的首脑。

他在为自己辩护时非常详细地重述了在德国特工局外事处中他的一些部下的活动，他曾委派这些人传递他提出同西方盟国单独讲和的建议，这对他也没有起什么作用。但是，卡尔顿布吕纳的内心始终是非常开朗的。在纽伦堡审判中，他甚至请我这个由于同杜勒斯小组接触而在4月23日遭他逮捕的人作为他被告方的主要见证人。我对他提出的各点写了一份宣誓书。

据卡尔顿布吕纳说，他于1945年4月在奥地利时派人去取的文件中，有卡纳里斯海军上将的著名日记，那本日记后来引起了那么大的轰动。它不可能是原本，原本是在这位海军上将受审时由检查当局拿出来的，那本可能是在制成摄影拷贝或微型胶卷存放在安全总部的重要文件中的。

盖世太保的首脑，党卫军上将海因里希·缪勒的情况怎么样？无多大疑问，缪勒成功地逃出了柏林，并且仍然活着。精心编造的叙述这个令人惊骇的人物脱逃的故事，读起来象一部惊险小说，但是看来它还是真实的。

在希特勒死后和在纽伦堡判处死刑的主要战犯处决以后，盟国谍报机关，把力量集中于寻找同这些主要战犯关系最密切的三个人，盟国特工机关许多富有经验的人员认为，这三个人比处决的人中的任何一个都重要。这三个人就是总理府办公厅主任赖希斯莱特·鲍曼、安全部第四局局长海因里希·缪勒和缪勒掌管的犹太人科的下属阿道夫·艾希曼。

关于鲍曼的命运，有人已经写过那么多，因此，如果没有新的事实可以引用，再在这里叙述也是多余的。除了少数研究德国特工组织的专家外，搜索另两个人的工作已平息下去。不知道由于什么缘故，不论是公众，还是即使很少错过这样轰动的故事的机会的画报，都没有对他们表现出一点兴趣。然而，其中一人是盖世太保的首脑，这个人在德国扩张最厉害的时期实际上对整个欧洲大陆执掌生杀大权。另一个是以可怕的效率执行灭绝犹太人的骇人计划的人。

阿道夫·艾希曼现年43岁，原籍奥地利。他个子矮小，外貌象犹太人，精力充沛，讲起话来喋喋不休，擅长于组织工作。他出生在德国，但是他的青年时期是同他父亲一起在林茨度过的。起先，他似乎过着正常的生活。他是某一家小商

店的职员，后来成为纳粹党党员和党卫军成员，1933年在奥地利宣布纳粹党为非法时，他逃到了德国。他加入了奥地利军团，最后参加特工组织。虽然他决不是一个出类拔萃的特工人员，但是他那极大的热诚引起了注意，1937年，他被海德里希派到巴勒斯坦去研究那里的情况。当时，他并未自认为是犹太问题专家。何况他把这次旅行当做一次旅游，后来对他的朋友说，那里有漂亮的姑娘，党的种族法律在巴勒斯坦不能当真。在那时，有人提到他自己的外貌显得象犹太人，他并不生气。他同犹太人相处得很好，掌握一定的希伯来文和意第绪文的知识。在奥地利并入帝国时，他的大好机会来到了。他当时被提升为在维也纳新建立的安全部分的党卫军首领和犹太人问题顾问。立即掀起的犹太人出境的浪潮使他想出了一个主意，并经海德里希批准实行。他建立了“中央犹太移民局”。

这个机构一扫官僚机关的程序，把同移民有联系的一切活动置于它的控制之下。这个局的工作非常成功，因此在柏林和布拉格设立分局，都归艾希曼掌管。于是，他想出了一个确实远大的主意——起码是根据国际协定组织犹太人大批迁离欧洲。

在法国战败后，艾希曼老想着这个主意。他重新提出了把马达加斯加变成欧洲犹太人的家园的建议。已经在同维希（1940至1943年法国贝当政府的所在地）政府进行谈判，并在巴黎设立了一个联络处，这时突然对苏战争爆发了。艾希曼继续制订他的计划，但是海德里希把它否决了。在海德里希的脑子里，他自己那个“最后解决犹太人问题”的残酷计划的种子已经生了根，海德里希在取得希特勒的同意后，任命艾希曼负责这个计划的第一阶段——把受害者大规模集合在一起。

艾希曼对这项任务使出了他的组织才能，在以后的几年中，他把数百万犹太人从欧洲的每个国家引渡到东部的灭绝人种的集中营。

在1944年艾希曼通过德国监听站听到盟国无线电广播节目经常提到他是主要战犯之一的时候，他的忧虑变得严重起来。他知道他没有生路了，从那时起，他开始为逃跑作准备。他本来可以直接逃到某一个中立国去，但是他没有打算这样做，他决心坚守自己的岗位，直到尽可能的最后时刻，然后隐姓埋名，湮没无闻。

在盖世太保在阿布尔列希特王子大街的总部被炸弹炸毁以后，他在库尔菲尔斯特大街设立了柏林办事处。在新办公室下面修筑防空洞时，他趁机组织他所谓的“狐狸窝”。修筑了地下室，贮存了食物、水、药品和急救用具；安装了照明设备和卫生设备，准备长期待下去。这些防空洞不是建在办公室下面，而是离办公室有一段距离，由迷宫似的曲曲折折的通道同办公室相联，这些通道可以用各种装置封死，出口处和通风口通向各炸弹炸坏的地点，上面加上了伪装，以便同周围环境调和一致，使人们看不出来。据说，最长的一条通道长达一英里以上。

这个狐狸窝并不只是想象力的产物。艾希曼让卡尔顿布吕纳看过，卡尔顿布吕纳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的目的并不在于建成这样的保命狐窝，而是到南部建造阿尔卑斯山要塞。待最后关头，艾希曼也没有能够使用这个地方。他在1945年3月间在布拉格和维也纳执行公务，耽搁了几个星期，在4月份准备回柏林时已经回不去了。战争结束时，在死山脉山脚下奥地利一些湖泊中间的阿尔特——奥西发现了他。然而，有人却十分感激地搬进了这个地下藏身处——他们是盖世太保

的首领海因里希·缪勒和他们的心腹舒尔茨。

缪勒奉卡尔顿布吕纳之命留在柏林，担任他和希特勒之间的联络官。作为盖世太保的首领，他本来可以轻易地找到一个连希特勒也无法反对的理由离开这个被围困的城市。显然他没有试图这样做。他天天到总理府的地堡中去汇报，然后失踪了，据推测他到库尔菲尔斯顿大街的办公室去了。没有人到那里去找过他。由于德国摇摇欲坠，走向最后崩溃，没有人有任何特别的理由要与盖世太保的首领接触。恰恰相反，大多数人希望同这个可憎的官员离得远远的。据查，他最后一趟到总理府去是在4月29日，所有活着的人都一致说，在希特勒死的时候和最后一次企图突围逃出柏林的时候，缪勒肯定不在那儿。从那时起，缪勒销声匿迹了，他的情况到底怎么样，就纯属猜测。最有趣的是舒伦堡的分析。

自从1944年以来，舒伦堡一直疑心缪勒利用某些用来欺骗敌人的无线电情报通讯线路同苏联人建立真正的联系。他声称，在他对许多这种无线电部门布置监听时获得了这一事实的证据。总而言之，舒伦堡对卡尔顿布吕纳说，他准备拿出证据。卡尔顿布吕纳并不把这事当真，而认为舒伦堡的告发是出于同行的妒忌。可是，舒伦堡仍然坚持，他说，如果卡尔顿布吕纳什么也没干，他自己将保留他的证据，在今后几年里会证明德国盖世太保的首领曾为苏联人做过工作。他断言，缪勒在住进库尔菲尔斯顿大街的狐狸窝后还在同苏联人进行无线电通讯。

如果缪勒确实从那个掩体里继续进行无线电活动，那件事本身就大大有助于证实舒伦堡的说法。因为什么神志清醒的人——缪勒是头脑极冷静的现实主义者——会在最后崩溃之前的最后日子里，在正挺进的敌人已经相距只有一英里

左右的地方时，还在开动旨在迷惑这股敌人的复杂通讯系统呢？因此，如果缪勒真在使用他的无线电通讯，那么他非常可能如舒伦堡所说的那样，是在使用无线电同苏联情报机关进行真正的联系。谁也不知道缪勒和舒尔茨最终是如何逃出柏林的。参加保卫柏林的决战的德国高级军官们的声明证实，4月29日，缪勒的办事处所在地还没有敌军。所以，他从总理府回到那里去并没有什么困难，接着他得以通过许多通道中的一条脱逃，由此进入挺进中的苏联人的后方。便衣和各种假证件总是盖世太保首领及其心腹可以弄到的。他一旦到了苏联人的后方，就可以等待时机了。如果舒伦堡的疑心是有根据的，如果缪勒在为苏联人工作，那么他可能在他的掩护体里悄悄地等候他们来到。

自从1945年以来，有某些迹象表明缪勒仍然在为苏联人工作。苏联人竟然毫无顾虑地使用一个对他们造成那么大损害的人，这也并不新鲜。以前的盖世太保官员和军事保安部的高级官员——巴姆勒将军就是一个——尽管过去做过反对苏联人的事，但是现在在为“东部”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工作，这种例子太多了。

在维也纳的盖世太保总部，一个名叫扎尼策尔的人，在战时同缪勒和舒尔茨密切合作，他在使用无线电蒙骗苏联人方面获得相当突出的成功。扎尼策尔是奥地利国家警察中最有才干的犯罪学家之一。战后，他被一个奥地利人民法庭判处无期徒刑。他无异议，承担了他的部门所从事的一切活动的全部责任。他从维也纳的监狱中设法同美国情报机关联系请求把他转移到奥地利西部地区的一个监狱中去。作为报答，他交出有关用无线电蒙骗苏联人的宝贵情报。美国人拒绝同一个被判刑的战犯有任何瓜葛。但是在把他转移到苏联

占领区的服刑地区时，苏联内务部的一辆汽车来把他接走了。自那时以后，没有再见到他的踪迹。但是，有一个人显然知道他后来的遭遇如何。这个人就是阿道夫·斯拉维克博士。

所谓的“国家联盟”领导人斯拉维克，以前是希特勒青年团和党卫军在维也纳的一个微不足道的领导人，年约35岁。苏联人选中了他，让他设法把奥地利的国家社会党人争取过去支持苏联的事业。他的国家联盟组织是仿照纳粹党的方针组成的，虽然他没有纳粹党一度在奥地利拥有的大批追随者。斯拉维克的追随者从来没有超过几千人。虽然苏联人完全知道这些局限性，他们仍然支持他，并且告诉他说，不要他组织一个群众的政党，而要为未来的共产主义奥地利培养专门干部。

他的任务是从以前的国家社会党人中间收罗各种各样的专家——技术人员，宣传家，情报专家和军事专家。这些人并不是马上要使用的，而是留起来当作一支第五纵队。斯拉维克在全国东奔西走，会见苏联谍报机构向他提名的人，或他自己从以前的同事中间物色。他力求说服这些人相信他们真正希望在于同苏联人合作，他为这些人安排同苏联官员会面，随后让他们去谈判。

奥地利惩罚前纳粹党党员的法律为他提供了广阔的园地，他可在这些被剥夺了权力的人中招募他的成员。尽管如此，正如斯拉维克自己承认的，他收效甚微。

在50年代初，他招募青年人去参加一种无线电训练班，这个训练班预定在德国的苏联占领区鲍岑举办。未来的学生显然是经过精心挑选的，要他们保证从事一年的学习。之后，他们可以自由离开，看来斯拉维克的提议没有得到多大热情响应。他非常重视一个青年人，希望他参加，为了说服这个青

年人，他不得不泄露一个秘密。他向这个青年人保证说，这个建议实际上是刑事调查部官员扎尼策尔提出的，扎尼策尔了解他在电子学方面的才能，希望在经过短期训练后使用他当教官。斯拉维克解释说，这不是平常的军用无线电报，而是为一个秘密无线电组织训练人员，负责训练班的人正是扎尼策尔本人。在经过训练以后，一些人员将分配到西欧工作，而另外一些人员将分派到一些无线电台去工作，这些电台目前还没有发报，而在某种环境下将开始活动。

这个被问及的青年人甚至在听到如此令人振奋的解释以后仍然拒绝参加。他是够愚蠢的，竟然向人谈及这个建议，于是，有一天他永远失踪了。有些目击者说，他们看到他在维也纳附近被三个汉子塞进一辆黑色汽车。从那以后就没有再听到他的音讯。斯拉维克仍然在为这个训练班招兵买马，但是，由于这段插曲，据说那所学校搬到波兰去了。

如有个学生接受提议报名参加这个短期训练班，就可能证明斯拉维克的断言是真是假和整个密谋的事实真相。到那时，如果他回得来，他将了解很多情况；其中之一就是，是否象舒伦堡所断言的，缪勒是包括扎尼策尔在内的整个组织的头子。

苏军在1941年占领伊朗，据莫洛托夫说，他们是由于“两名盖世太保的特工人员”加莫塔和迈尔的活动而这样做的。这两人确实是由德国特工总部第六局1939年派遣到伊朗去的。他们没有发挥很大作用，1941年他们都逃到山里，到波斯山地部族中避难去了。最终，迈尔被美国人抓住了，而在此前不久同他分手的加莫塔则仍然躲藏着。德国特工组织的另一个来源提供报告的大意说，他已落入苏联人之手。这无法核实。后来在1943年底，加莫塔在土耳其突然出现，

据他说，是经过70天非常冒险的历程徒步穿过波斯山地才抵达那里的。他受到德国侨民的欢迎，之后不久前往柏林，在那里担任第六局伊朗问题顾问。但是，他未能同他的局长和好相处。这位局长从一开始就多少有点不信任他，在发生了与这段故事毫无关系的一件小小事件后，他被撤职，被派遣到维也纳，重新在大学里学习。

面对挺进的苏联军队，德国特工局的各基层单位准备在1945年3月底撤离维也纳。加莫塔显得比大多数人更危险。他没有被人们忘掉。有一辆汽车被派去接他。要把他送到西部的安全场所去，但是他拒绝了这个帮助，仍旧留在维也纳，莫洛托夫曾把这个人说成是波斯的战犯，他的活动是苏联人占领伊朗的借口，而这个人却选择留在维也纳，等候红军的来到！

他太平无事，直到1945年夏天。后来他突然失踪了，他的妻子接到一封偷带出来的亲笔短简。据说，这封信是他被带走时扔下的。加莫塔写道，他已被判处25年强迫劳役，正在去西伯利亚的途中。那些了解苏联警察的方法的人认为，像加莫塔这样重要和能引起兴趣的一个人，不大会在被捕后几天之内就判罪的。这类的案子要进行几个月，并可能要由在苏联的总部亲自处理。虽然那封短简书信的笔迹毫无疑问是加莫塔的，但是在我看来定罪和到西伯利亚去是可疑的。看来他自从在波斯的时期起就为苏联人工作并不是不可能的。

再者，加莫塔还是斯拉维克的老朋友。他们在希特勒青年团的党卫军中呆在一起，斯拉维克始终利用加莫塔的名义活动，特别在希特勒青年团以前的成员和在德国特工局的时代认识加莫塔的人中间。据斯拉维克说，加莫塔现在在布拉格掌管一个局，是专门对奥地利和西德进行特工活动的。许多洞

察国家联盟的事务的人认为，就是设在布拉格的这个局向国家联盟发布命令，斯拉维克本人肯定频繁到布拉格去，由苏联人秘密护送越过边界。这样看来，在布拉格这个神秘的局的首要任务不是秘密情报工作，而更恰当的是打入以前的国家社会党人和法西斯人士中去。这个谍报网不仅遍布于意大利和西班牙全境，而且遍及中东一些国家。

在结束离缪勒和他逃跑的话题之前，还必须谈一下另一件肯定值得思考的事，才算窥得这幅图画的全貌。盖世太保的首领以前有一个司机，他自称熟识舒尔茨，由于参与杀害一名盟军飞行员而被达豪的军事法庭判处死刑。1947年，他同我关在一起时告诉我，他知道缪勒和舒尔茨的确切下落，他说，这两个人在德国外省一个城市经营五金业，在他们逃跑以后，他甚至和他们还有所接触。他说，缪勒是个不值得怜悯的人，他乐意把有关缪勒的所有详情细节都告诉美国人，但是舒尔茨是个十分正直的人，把他连累进去就会感到遗憾。

我说服这个人把他经历的事告诉美国当局。美国当局不肯相信他说的话，说这个人为了免处绞刑而编造了这一套。他们的看法很可能是正确的，但是这件事也很值得核实一下。

舒伦堡在盟国审判德国外交人员时被判处6年劳役监禁。但是这个德国谍报局的前首领是个病人，这个判决被认为只是一个象征，让他进了医院，因此在他服刑期满之前很久就出狱了。舒伦堡应瑞士的吉松将军或他战时的谍报首领马森上校的邀请，先到瑞士，接着去西班牙。在那里，他设法同他极其了解经济情况的前同事取得联系。他未能在那里找到一个立足点，于是前往直意大利，在那里开始为一家瑞士出版公司写他的回忆录。他设法靠这家公司预付给他的稿酬维持生活，但是他花不起钱来治病，在他健康状况不佳的情形下，治

病是最要紧的。1952年夏天，他旧病复发，在动了手术后死掉了，这次手术要么是不成功，要么是动得太迟了。他的死没有引起世人的注意。

现在折回来谈谈阿尔特—奥西和第三帝国的最后那些日子。艾希曼在他的亲信的陪同下抵达阿尔特—奥西，向卡尔顿布吕纳报告，他在布拉格的副手根室已经自杀，他意识到他和他一伙人指望不了赦免。他对阻止他回柏林并到他完全有把握的藏身地去而大发雷霆。卡尔顿布吕纳的指示完全不起作用。

他说，“你最好还是钻空子逃跑吧，碰运气你也许能逃到西班牙。”

卡尔顿布吕纳为他做的只是给他一大笔黄金和可流通的外币，他并不需要这种援助，因为他从布拉格来时随身带着著名的“犹太人珍宝”。艾希曼在财务方面是严格的。人们向他行贿的钱确实以百万计，如果接受这些贿赂，他本来可以在国外积蓄一大笔财产。但是，他始终拒绝，他对他所抓到的任何一个受贿的部下都给予十分严厉的惩处。

艾希曼转而投奔斯科尔兹内。斯科尔兹内在阿尔特—奥西，忙于为打游击作准备，在山里设立了粮食和弹药库，安装了无线电台，并且威胁要处死任何拒绝同他并肩战斗的叛徒。虽然艾希曼处在绝望的境地，无疑会战斗到底，但是斯科尔兹内却不要他。

最终，他同一个人——罗马尼亚流亡政府的总理霍里亚·希马通力合作。可能由于希马在游击战术方面有丰富的经验，艾希曼在关键的头几周坚持了下来。当美国第三军的一支先头部队在拉尔夫·E·皮尔逊少校（他后来自称为“阿尔特—奥西的征服者”，写了一本有关他的经历的书）的率

领下和平地开进一个村子的一端时，艾希曼和他的队伍溜出了另一端。后来，他陷入了困境。通往巴德伊施尔的狭窄森林小道仍然被雪封住，艾希曼的重型无线电卡车完全过不去。带不了的东西只得加以破坏或埋藏起来，毫无疑问，整整一大堆黄金和其他贵重物品被埋藏在森林中的某处了。后来阿尔特—奥西成为名符其实的第二个克朗代克^①金矿。远远近近的人都来探宝。1951年，一辆法国牌照的汽车开到，下来一队潜水员，搜索那个湖泊，据说他们找到了财宝。美国宪兵后来发现那队人不是法国人，他们很可能是艾希曼本人的朋友或同事。时至今日，还有一队人马在发生事件的地点出现，用雷达和盖革（geiger）仪器寻找黄金。

在阿尔特—奥西度过德国崩溃之前最后几个月的所有巴尔干政治领导人，也带足了黄金和外币。他们也把他们的财宝埋在地下，以便以后回来取出。于是，在阿尔特—奥西周围的森林里星罗棋布地窝藏着贵重的财宝。艾希曼和希马两人都是有办法的能人，因此取得了成功。所有艾希曼的人都逃掉了，据推测现在正在国外靠变卖他们十分精明地埋藏起来，后来又取回的财宝过日子。

在几个星期后艾希曼同希马分手，开始倒运了。他落入一支美国巡逻队之手，因此无可奈何地自首了。他毫不迟疑地说出了自己的真实姓名。接着在一刹那间，他意识到他还有一点生路。他没有被认出来，他的姓名并没有使队长引起什么反应，这位队长把他的姓名记成艾克曼。他一下子变成了党卫军中尉奥托·艾克曼！

因此，他没有引起特别的注意，不久发现自己被关在纽

^① 克朗代克是加拿大西北部育空河流域的一个地方，1897年在那里发现富饶的金矿，造成1897年至1898年的淘金潮。

伦堡附近的一个普通战俘营里，被委派负责一个伐木工作队。结果是盟国首先要缉拿的战犯竟然作为一个普通战俘坐在一个美军看管的战俘营里。当然他本来可以在森林里值勤时随时逃跑的。但是，由于某种奇怪的原因，他感到像他现在这样倒是绝对安全的，因此他不想逃跑了。

接着，在纽伦堡开始审判主要战犯。战俘们在营地里装上了一些收音机，聚精会神地收听审问过程。艾希曼部属中的一个在1945年11月走上了证人席作证，第一次讲出了全部骇人听闻的经历。艾希曼的姓名也第一次为德国人所熟知，把大家吓坏了。对艾希曼本人来说，应该销声匿迹的时刻显然来到了。他在战俘营中又待了两天，然后穿过森林逃跑了。他的逃跑没有引起多大震动。这类事情在每一个战俘营中是天天发生的。看来这件事是符合实况的，时至今日美国当局还不知道自己如此一心要抓的这个人曾接连几个月一直在他的手中。在开罗一度搜寻过他，逐渐松弛了，跟着搜索工作也就停止了。

对艾希曼的注意减弱了，但是斯科尔兹内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一直占领着国际报纸的大字标题。这是他自己造成的。

1945年5月，斯科尔兹内无疑自以为他已是即将到来的德国游击战的总司令，虽然后来他不愿承认这个事实。他把准备工作的进展情况全部向卡尔顿布吕纳汇报，多半是为了取得欢心，卡尔顿布吕纳给他起了个“游击队的拿破仑”的外号。

斯科尔兹内在战争的最后阶段和战争刚结束后的时期发展成为一个使人讨厌的人物。由于他取得明显的成功，他一心想举世闻名的欲望大大膨胀了。他被无边无际的野心迷住了心窍，认为自己肯定会逐步出名，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起初，他密谋反对自己的上司舒伦堡。1945年4月初，他设法说服卡尔顿布吕纳解除舒伦堡第六局局长兼军事安全部部长

的职务，而把后一个职务委派给他。

斯科尔兹内的军事计划中切实可行的部分实际上是由他的“参谋长”福尔克萨姆上尉和后来的瓦尔特中校制订的。这两个都是受过高度训练的有本事的参谋部军官，而没有受过训练的斯科尔兹内却给他们惹出很多麻烦。斯科尔兹内在1942年的连长考试中不及格，这并不是普遍都知道的。他当时在“帝国”师服役，于是被从前线调回柏林，在一所汽车学校中担任驾驶教官。后来，卡尔顿布吕纳选中了他，在两年左右的时间里，他统帅了几个师。这种流星似的高升只有在第三帝国才会出现，斯科尔兹内下属的秘密政治特工局局长是党卫军少校卡尔·拉德爾。在第六局中，人们称他为“斯科尔兹内的奶妈”，因为他的主要活动是把着手教他的上司。拉德爾在军衔上只比斯科尔兹内低一些，可是斯科尔兹内却大言不惭地称他为“我的副官”。拉德爾到处伴随着他的这位朋友和上司。甚至在被俘后也是如此，他老是说，如果他不在那儿，必定会发生什么不愉快的事。同样也多亏拉德爾，斯科尔兹内的案子结果才确实对他有利。拉德爾在源源不断偷送进去的信息中指导他如何为自己进行辩护。这两个人在获释后又呆在一块儿，直到斯科尔兹内前往西班牙。

拉德爾在那些年把着手教斯科尔兹内，而斯科尔兹内的报答是菲薄的。1951年，斯科尔兹内在法兰克福再次遇到这个从1943至1948年共享他的全部机密的人，在街上碰到他时竟会假装没有看见。拉德爾由于敢于纠正斯科尔兹内吹嘘自己功绩的一些谎话而得罪过他。斯科尔兹内不原谅他。

由于斯科尔兹内的名字仍然受到西班牙人和阿拉伯人的尊敬，因此他至今同这些国家中最重要的人物仍很亲近。除此以外，他还通过他的第三个妻子同沙赫特博士发生了亲戚关

系，也给他利用上了。

尤其是在英国和美国，这个人是享有盛名的。从职业上看，斯科尔兹内不论当一个军人还是当一个特工人员都没有什么成就。解救墨索里尼的行动主要是经过巧妙的计划和侦察工作后的一个飞行技艺。斯科尔兹内对计划或侦察也没有作出什么贡献。他命令驾驶员们在大萨索山强迫降落得过早了，这个命令是同行动计划相抵触的。好在这次冒险取得成功，否则他会受到军法审判。参加这次行动的德国伞兵对斯科尔兹内的冒险做法感到很愤慨。

至于卡尔顿布吕纳怎么样呢？他的逃跑和随后的就俘对一个德国特务机构的头子来说是丝毫没有戏剧性的。他不相信斯科尔兹内能当好一个共谋者，因此拒绝躲进斯科尔兹内在达赫施泰因地区为他准备的一间小屋，宁愿信赖一个奥地利的向导，却不知这个向导已经订好背叛他的计划。卡尔顿布吕纳自信，阿尔特—奥西的居民会帮助他，因为他曾经阻止炸毁萨尔茨堡各矿山的坑道，而从全欧洲收集来的艺术珍品都埋藏在这些坑道内。这件事使阿尔特—奥西的人民获得了欧洲的无价艺术作品的救星的荣誉。有人已经写了一些有关这个题材的书籍，也许在这里再简单扼要地重述一下实际情况也不会不适当吧。

艾格鲁贝尔那时仍然在等候接收要他妥为保管的希特勒秘密档案，他想出了坑道的入口处进行爆炸的主意，以便把这些非常宝贵的文件保存在绝对安全的地方，直到依靠新发明的和秘密的奇妙武器最终打赢这场战争。在准备时，他从空军那里得到许多重型炸弹，在装这些炸弹的箱子上写上“大理石”字样，把它们堆在闪闪发亮的盐矿坑道的入口处。甚至在他相信希特勒已死之后，他还不撤除爆炸物。他

预测，萨尔茨堡地区将被苏联人占领，因此他变得更加决心防止这些财宝轻易地落入敌人之手。看来他从来没有想到过，他的爆炸物很可能使这个地方全部炸毁，并且也把艺术宝藏毁掉。

同时，盐矿工人自己已经悄悄地查明这些箱子到底装的是什么。他们把这个发现告诉了领班，领班又把这个消息传给总经理和负责保管艺术宝藏的人。这些人都竭尽全力来阻止艾格鲁贝尔的意图。但是，他仍然顽固不化。于是，一个名叫阿洛伊斯·劳达斯赫尔的普通矿工鼓足勇气去找卡尔顿布吕纳，卡尔顿布吕纳立即制止了这个计划。他行使希姆莱授予他的权力，强令艾格鲁贝尔立即搬掉炸弹。

因此，一幅幅威尼斯和荷兰的名作被保存了下来。有些功劳应当归于后来作为主要战犯被处绞刑的卡尔顿布吕纳和普通矿工劳达斯赫尔。所有其余的人——美国的皮尔逊少校、要求得到重赏的盐矿总经理珀赫缪勒，以及奥地利抵抗运动领导人，至多只能说曾抱有同样的想法。

5月7日，卡尔顿布吕纳在他的副官、一个勤务兵和他的汽车司机的伴随下逃到死山山脉中的一间小屋。他没有作逃跑的准备，他所携带的伪证件，对一个德国特工部门的首领来说，简直是荒唐可笑的，那是一个军医的军薪簿，盖有一个假图章，证明他是被派驻国际红十字会的。无论如何他的外貌是不会弄错的。他身高一米九五左右，脸上有在学生时代决斗留下的伤疤。即使在几千人中，他也会被立即认出来。他所走的方向同样是愚蠢的，因为当年那个时节，死山仍然覆盖着厚厚的积雪，没有雪撬是通不过的。他想逃跑的决心的确不大。他真正希望的是一次休息、睡眠和思考的机会。在派去搜寻他的美军偶然找到他时，他正熟睡。一百多人在背叛

他的向导的带领下冲到那间小屋。一个睡眠惺松的人踉踉跄跄地走了出来。在经过非常简短的讯问后。这个人承认他确实就是卡尔顿布吕纳。

他在那时和后来在受审时都试图为自己辩护，这些辩护是那么幼稚，因此很难使人相信他曾当过律师。他之所以采取这种态度，是由于他以为他办公室里的所有文件都已奉命销毁，因此没有材料能证明他有罪了。这种粗糙但还能搪塞的方法竟使他能强词夺理，实在使纽伦堡检察当局丢脸。检察当局控告他从事种种活动，他毫不费力地一一否认，在他们的诉讼程序进行到无疑大家知道的罪行时，他们拿不出证据。荒唐可笑的是听到这个德国盖世太保的首脑声称，他从来没有签发过一张逮捕状。在纽伦堡的朗瓦塞尔拘留营中关着一个官员，他是掌握保护性拘留处的，曾以卡尔顿布吕纳签名的一个橡皮图章发了逮捕几千人的拘票。美国人已经审问过这个人，人人知道他的底细；但是纽伦堡的检察当局竟拿不出他的证据！最终，卡尔顿布吕纳的一些原先签名被拿到法庭上，这并不会令人奇怪。但是卡尔顿布吕纳却无动于衷地说，这些签名不是真的，他说，他同维也纳市长布兰克保持有亲密友好的关系，这些信是写给布兰克的，如果他要签名的话，他肯定会签他的名字“恩斯特”，而不会签他的姓“卡尔顿布吕纳”！

卡尔顿布吕纳和躲藏在阿尔特—奥西的其他德国高级官员多数被抓到，而巴尔干的一些头子却都毫无例外地逃跑了。马其顿独立运动内马其顿革命组织的领导人范洽·米哈伊洛夫——人们常常称他为“巴尔干半岛各国中最神秘的人”——在1945年5月作为马其顿的代表驻在阿尔特—奥西。他既没有要德国人给予帮助，也没有要伪证件——象这样的区区

小事，米哈伊洛夫能应付自如。苏联人对他非常感兴趣，想把他抓住，因此他们派了一个特工人员来弄清他是否在阿尔特—奥西。这个特工人员没有什么特别知识，以为要搜寻塞尔维亚的叛乱领导人米哈伊洛维奇，于是上报要抓的人不在阿尔特—奥西，而且从未来过阿尔特—奥西。在此期间，米哈伊洛夫和妻子（同他一起的老共谋者）失踪了。

他的这个老婆有一段有趣的经历。她原先是米哈伊洛夫的秘书，曾受托执行几项特别困难的任务。在纳粹分子占领奥地利之前若干年，她被派去刺杀一个保加利亚政治家，这个人被内马其顿革命组织在一次模拟裁判中判处死刑。当这个人坐在维也纳国家歌剧院的一个包厢里时，她开枪打死了他，然后听凭奥地利警察逮捕她，丝毫没有企图逃跑或抵抗。48小时之后，她又获释了。内马其顿革命组织通知警察局长说，如果在48小时内不释放这个女人，他们已布置好炸毁苏联公使馆！维也纳警察局很了解内马其顿革命组织，知道这个威胁不是说说而已，于是悄悄地把这个女人放了。

今天，米哈伊洛夫作为一个地下运动的领导人发挥着比较重要的作用。1951年，他出版了一本论述马其顿的前途的书，提出解决这个表面上看来解决不了的问题的办法是，大致按照的瑞士方式建立一个国家，在这个国家中，全部三个民族——希腊族人、保加利亚族人和阿尔巴尼亚族人——都能和谐相处。

轴心国的首脑——希特勒、墨索里尼、安东奈斯库、萨拉希、菲洛夫、提索以及同他们一起的奎斯林、穆塞尔特和奈迪奇——全都死了。只有一个还活着，这个多次该死的人是克罗地亚的“领袖”安梯·帕夫里克博士。早在1942年，德国驻克罗地亚的全权代表格莱斯·冯·霍尔斯特瑙将军已经授

予他战犯的荣誉称号。格莱斯给我看过一张帕夫里克的的照片,在这张照片上,在军装外面逼真地添加一件画出来的囚衣,因此看上去实在像罪犯照相本中的真展品。像这些事情无助于使这位将军在元首的总司令部成为红人。“铁腕人物”帕夫里克——实际上是残酷无情和无怜悯心的恶棍——当时很受希特勒的尊重。尽管冯·霍尔斯特瑙将军在克罗地亚担任过高级司令,但是铁托对他不怀怨恨,从来没有要求引渡他。这位将军1946年在老朗瓦塞尔战俘营里自杀了。

帕夫里克1945年5月初才离开他的首都萨格勒布。当时,他和德国公使卡希以及他们的工作人员一道离开那里。他们在途中听到德国投降的消息,于是两伙人就此分手。帕夫里克取道卡林西亚前往施蒂里亚。在尤登堡附近,他意外地和戏剧性地遇到了苏联的先头部队。这使他决定秘密继续行进。他的目的地是阿尔特—奥西,他知道他的妻子和全家都在那里。他在阿尔特—奥西没有见到一个人,似乎只呆了几个小时,但是已足以了解到这里并非久留之地,而是一个致命的陷阱。他发现他的全家被安顿在富施尔附近的兴特西,离阿尔特—奥西不远。德国外交部负责接待这些有来自不同国家官员的家属。他们在阿尔特—奥西的时候受到很好的照料。但是,某些政府成员被留在阿尔特—奥西,据推测是留下来埋藏不容易带走的国家财宝。在阿尔特—奥西的帕夫里克一家居住的旅馆里,只收一种货币——金币。甚至在1945年秋,还发现古老的法国金币埋藏在地窖里。随后,那批财宝都及时取走了,帕夫里克把这部分工作组织得非常好。

帕夫里克毫不掩饰他躲在兴特西。他派他的副官克里索马利海军少将到萨尔茨堡去访见美国师长,这位师长准许他留在兴特西。令人奇怪的是,真正要缉拿的人却无人操心,虽

然在克罗地亚境内，乌斯塔希^①政权的各类低级官员正在被铁托的游击队员处死。英国人和美国人不仅把乌斯塔希的党徒移交给南斯拉夫，而且把克罗地亚的武装部队的士兵也移给南斯拉夫。他们的领导人帕夫里克却一直稳坐在几英里外的萨尔茨堡附近！

他并不是在6月13日从这个地方消失。他仍然留在奥地利，同他的朋友一起住在一个城堡里，直到1947年年底。他在奥地利平平静静地住了两年半，而盟国的所有情报组织却在全世界搜寻他。铁托派了一个特务人员到西班牙去调查一则帕夫里克定居在那里的传说，帕夫里克擅长于保密，看来肯定有某个有权力的人在保护他。

他又从奥地利翻山越岭到了意大利，在那里又待了两年。他持有一个匈牙利将军的证件。虽然效率高的意大利警察查明了有关他的全部底细，他还是没有受到干扰。显然不管保护他的人是谁，这些人是有权势的。1949年底，帕夫里克飞往布宜诺斯艾利斯。在那里，他发现富裕的生活等待着他——是他的巴尔干宝藏吗？

对于这一点，他得感谢克罗地亚以前驻柏林的公使本松博士。本松是原先的乌斯塔希领导人之一，很快脱离了一个对他没有什么吸引力的政权。在柏林和他1944年担任驻布达佩斯公使一样，这个漂亮和机智的人在中立的外交官中间，特别是在夫人和小姐们中间是很受欢迎的。他意识到战争打输了，决心趁早脱身离开。这对一个极权国家的高级代表来说决不是容易的。诡计多端的本松找到了一个办法，他同卡尔顿布吕纳关系很好，因此他说服卡尔顿布吕纳派他到西班牙去，作为德国特工组织的代表。卡尔顿布吕纳像他的主子希特勒和

^① 克罗地亚的民族主义恐怖组织。

希姆莱一样，特别偏袒特工系统这个部门的人员。他喜爱搞一些自己的小帮派。在本松极其小心谨慎地暗示，也许他能够在西班牙为卡尔顿布吕纳本人安排一个小小的避难地时，卡尔顿布吕纳非常粗暴地拒绝了这个提议。这个马屁表示差点毁了本松为自己订的计划。

卡尔顿布吕纳并没有趁此机会在西班牙储存一大笔黄金和外币。他的目光太短浅了，没想到这种事情，看起来由于弄错了身份才引起了种种传说。驻里斯本的警务参赞当时正好在柏林开会。由于法国南部已经在盟军的手中，为了万一在同德国的联络被切断时维持他的组织，他在回工作岗位时随身携带一大笔黄金和外币。那时德国飞机必须在夜间飞行或者绕道在海上飞行。这个警务参赞所坐的飞机在飞行时坠毁了，据说法国游击队在比利牛斯山发现了这架飞机的残骸。这件事从来没有得到证实，但是看来这符合弄错了身份的说法。

亏得卡尔顿布吕纳，本松在最后一批飞抵西班牙的德国飞机中的一架飞机上获得了一个座位。当时为了一个座位要拿出大量钱财。据悉，没有一个第三帝国的重要人物是用这种办法逃走的。在战争结束后，本松接着从西班牙到阿根廷，很快成为庇隆的密友。他显然还得感谢伊娃·庇隆，他作为医生为她治病。本松在进入外交部门工作之前已经是个著名的心脏病专家了。因此他能为帕夫里克准备后路。无疑庇隆当时很看重帕夫里克，认为他有用处。

显然，苏联方面和英国方面对帕夫里克看来都是关上大门的。他的目标是成为“第三力量”的领导人，认为庇隆和佛朗哥是他的伙伴和保护人。他希望在欧洲组织一种法西斯国际的模式。意大利似乎是一个理想的根据地，因为自从1945年以来，来自欧洲的每一个国家的成千上万政治难

民在那里找到了避难所。同时，他希望把阿拉伯国家包括进去，指望在这些国家中找到许多朋友。帕夫里克向来在自己的国家对少数穆斯林给予很好的待遇。他知道，特别在阿拉伯国家里，波斯尼亚军官由于英勇善战而受到高度的尊重。

起初，他的计划取得某些成功。在1951年4月10日独立的克罗地亚国成立十周年时，帕夫里克在蒙得维的亚电台上宣布“改组”克罗地亚政府。他仍然认为他的流亡政府是该国的唯一合法政府。之所以使用蒙得维的亚电台，是因为庇隆不愿意让人家知道他同帕夫里克有交往，因此拒绝把任何阿根廷电台供他使用。

当然，帕夫里克自己保留“领袖”的职位。库莱诺维奇博士被任命为总理。佩雅切维奇博士和博班将军分别被任命为外交部长和国防部长。库莱诺维奇是南斯拉夫的穆斯林中最知名的人士之一。他在贝尔格莱德议会中当过他们的领导人，在成立独立的克罗地亚国时，虽然库莱诺维奇同非常激进的乌斯塔希政权没有什么共同之处，但是帕夫里克却巧妙地利用他作为傀儡，让他担任副总理。

其他流亡分子在阿根廷庇隆的保护下组织他们的秘密战线。其中有前克罗地亚外交部长杜尔坎斯基博士。他为人严峻，对帕夫里克十分冷淡。杜尔坎斯基也是通过阿尔特—奥西逃跑的。他在那里的使命同政治毫无关系。杜尔坎斯基在里宾特洛甫的操纵下被排挤出克罗地亚政府后，把自己的注意力转向企业，掌管了一家小小的化工厂。他在苏联人向前挺进下逃走时，想到如果带走他比较宝贵的化学产品就能最好的保证他的前途，因为他的化学产品能在全世界找到现成的市场。在这些产品中有20箱未经加工的吗啡，这些吗啡立即在奥地利边界被没收，艾格鲁贝尔在那里设立了自己的海关。杜尔坎

斯基后来请求卡尔顿布吕纳归还他的行李，并得到了同意，但是，艾格鲁贝尔在这期间已把20箱东西分给国防军各医院，而不知道吗啡未经加工对医院是无用的。他这样做却放出了一股罪恶的洪流。因为人们知道未经加工的吗啡，在黑市上是一种有利可图的商品。这批货物的重量超过五百磅，于是一股吗啡的毒流流向四面八方。奥地利警察局的防止毒品和麻醉品科因此忙了多年。然而杜尔坎斯基终于到了南美洲。

在我向外瞭望这片平静的湖水和山峦的时候，想起了这个安静的阿尔卑斯山休养地在8年前却是半数欧洲“被通缉的”人的避难所和希特勒从欧洲被压迫人民那里掠夺和盗窃去的财产贮藏处，不禁暗暗称奇。德国特工组织土崩瓦解了，人员散向东方和西方。有些人在为美国人工作，有些人在为苏联人效劳。另一些人潜伏下来窥测风向。有些人在铁幕两侧玩火，有些人在南美洲和中东，把这里围绕着他们的动乱和不安带去了。在希特勒手下得意一时的巴尔干各国的政治冒险家也是如此。

我很熟悉其中的一些人。在我参加特工组织忙碌地工作的7年中曾见过其中的大多数人。同德国周报上某些耸人听闻的消息相反，我没有设法把据说埋在奥西矿穴里的金银财宝找出来过豪华的生活。我已开始从事出版印刷工作。我在这里把我参加德国特工组织，去欧洲从事秘密战线斗争的经历与见闻写下来，写成这样一本书，留给我自己的只是与世隔绝的孤独与宁静。

写于阿尔特—奥西，1953年5月

Images have been losslessly embedded. Information about the original file can be found in PDF attachments. Some stats (more in the PDF attachments):

```
{
  "filename": "MTAzMjc1NzAuemlw",
  "filename_decoded": "10327570.zip",
  "filesize": 21646113,
  "md5": "5f772f49fcb89b64aff1c121cd907d89",
  "header_md5": "b0143d681dc680b2c1e868316e432228",
  "sha1": "77b588ee46e7a104b138b523d38c28c9259f7d55",
  "sha256": "e290c880c3348513f55697cb11736d8ab4042686512a00c465218c84067a1898",
  "crc32": 930471822,
  "zip_password": "",
  "uncompressed_size": 22114901,
  "pdg_dir_name": "",
  "pdg_main_pages_found": 307,
  "pdg_main_pages_max": 307,
  "total_pages": 313,
  "total_pixels": 1033446400,
  "pdf_generation_missing_pages": false
}
```